逛舊書店 淘舊書

王晓建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逛旧书店淘旧书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逛旧书店淘旧书/王晓建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1

ISBN 7-5034-1122-8

Ⅰ.逛… Ⅱ.王… Ⅲ.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 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4522 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北京京丰印刷厂
装　　订：双峰装订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9.75　　　字数：219 千字
印　　数：3，000 册
版　　次：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2.8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小　引

王晓建

自打9岁那年随父亲第一回走进东安市场旧书店的门，就算与旧书店结下了不解之缘。30多年来，刨去“文革”没有任何书卖的岁月，我是每隔十天半月，一准光顾一趟旧书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逛旧书店淘旧书，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日程。

1992年初秋，我被撞断了一根肋骨，不得不在家休养一个半月。这一个半月着实难熬，不但例行的逛旧书店被迫辍止，连一年一度的琉璃厂古旧书书市也眼巴巴地漏了过去。

遗憾之余，忽然想起几年来收集到的数十篇关于旧书店的文章，读一读岂不是可以解解“瘾”吗？待到翻腾出来细细品读了一遍之后，却又产生了一个念头：嗜好逛旧书店买旧书之士，必定大有人在，若是将这些文章辑成一本小书，总不至于没有人读吧？

足不能出户，我就俯身案前，一手护着肋骨，一手抄写这些文章。虽然是原始的手工劳动，却也得到了“卧游”的享受，因而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等肋骨愈合、病休结束

时，居然抄出了10万多字。接下来，我又有侧重地搜集了一些中国人逛外国旧书店和外国人逛中国旧书店的篇什，把小书选编成了今天这么个样子。

愿这本小书能够让旧书店、旧书铺、旧书摊的光顾者们、经营者们感到温馨、感到亲切。

目　次

小引……………………………………………… 王晓建(1)

旧书店………………………………………… 施蛰存(1)
买旧书………………………………………… 施蛰存(4)
旧书店………………………………………… 叶灵凤(7)
旧书铺………………………………………… 茅　盾(9)
旧书摊 ……………………………………… 汪曾祺(13)
逛旧书摊 …………………………………… 唐　挚(15)
逛书摊 ……………………………………… 陈平原(18)
逛书摊 ……………………………………… 柳　萌(21)
买书 ………………………………………… 朱自清(25)
旧书 ………………………………………… 华　嘉(28)
由旧书想起的 ……………………………… 张中行(31)
书林即事 …………………………………… 唐　弢(36)
访书琐忆 …………………………………… 黄　裳(41)
旧书梦寻 …………………………………… 辛　笛(48)
淘旧书 ……………………………………… 袁　鹰(53)
淘旧书 ……………………………………… 田　原(57)
读书志 ……………………………………… 郑振铎(60)
皇朝礼器图式 ……………………………… 郑振铎(62)

买《太平广记》记 …………………………… 孙　犁(64)
冷摊得来 ………………………………… 姜德明(66)
旧书新得题记 …………………………… 梁　永(69)
我与海淀的一家书店 ……………………… 陈建功(74)
淘书之乐乐淘淘 ………………………… 叶永烈(77)
乐而不疲"淘书"翁 ……………………… 士　铮(80)
津津乐道旧书店 ………………………… 王晓建(82)
古旧书的笑与泪 ………………………… 马立诚(85)
旧书之灾 ………………………………… 朱光潜(88)
救救旧书业 ……………………………… 萧　乾(93)
琉璃厂书肆记 ………………………… (清)李文藻(99)
琉璃厂…………………………………… (清)金　梁(103)
海王村人物……………………………… (清)张祖翼(104)
厂甸……………………………………………… 周作人(107)
琉璃厂的优良传统……………………………… 叶灵凤(111)
琉璃厂…………………………………………… 黄　裳(113)
琉璃厂寻梦记…………………………………… 姜德明(120)
琉璃厂…………………………………………… 陈平原(128)
海王村记………………………………………… 李书磊(132)
北平的书摊儿…………………………………… 唐鲁孙(135)
北平旧书肆……………………………………… 商鸿逵(138)
北京的书店和书摊……………………………… 吴小如(142)
记北京旧书店…………………………………… 刘自立(146)
来薰阁琴书店——琉璃厂杂记
　　……………………… [日本]吉川幸次郎　钱婉约译(153)
琉璃厂后记…………… [日本]吉川幸次郎　钱婉约译(157)

三十年代北京旧书业及其它
……………………[日本]长泽规矩也　索介然译(161)
城隍庙的书市……………………………………阿　英(180)
西门买书记——《城隍庙的书市》续篇…………阿　英(189)
海上买书记……………………………………阿　英(193)
古城买书续记…………………………………李高信(201)
长安有家旧书店………………………………金　平(204)
外省旧书店两记………………………………王晓建(207)
旧书店一二三…………………………………奋　斋(212)
忆南后街旧书铺………………………………郭　风(217)
面对旧书摊……………………………………唐　希(220)
香港的旧书市…………………………………戴望舒(222)
漫话世界古旧书业……………………………孟宪义(226)
三家书店………………………………………朱自清(230)
牛津的旧书店…………………………………沈　弘(238)
访书小录………………………………………董　桥(242)
圣米歇尔的旧书摊……………………………沈大力(249)
塞纳河畔旧书摊………………………………王聿蔚(253)
巴黎的书摊……………………………………戴望舒(255)
“旧书之都”海昂怀 …………………………逍　遥(262)
诺埃尔·安塞洛特与旧书村 …………………舒中胜(264)
美国的热门生意——旧书店…………………周水玉(267)
纽约求书记……………………………………梁治平(270)
漫游多伦多旧书店……………………………余　杰(275)
东京的书店……………………………………周作人(278)
东京的旧书店…………………………………姜德明(284)
东京的旧书铺和旧书摊………………………晄　㬉(287)

神田的本祭…………………………………… 白杰明(291)
东京的神田书祭……………………………… 黄　天(293)
神田书店街的旧书铺………………………… 黄　天(296)
东京淘书琐记………………………………… 陈子善(299)

后记…………………………………………………… (304)
重版后记……………………………………………… (305)

旧 书 店

施 蛰 存

解放以来，我对旧社会的一切事物，毫无留恋。不但今天毫无留恋，就是在 1950 年，已经毫无留恋了。我既非地主，亦非老板；家无一椽之屋，瓮无五斗之粟；生活在任何制度的社会里，反正一模一样。因此，我可以轻松愉快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毫无留恋。

但是，虽说“毫无”，也不是绝对的。仔细检点起来，可能还有一二例外。解放以前，各大都市的旧书店，就是我至今还不免留恋的一种事物。旧书店并不是封资社会特有的商业机构，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还有旧书店。所以，虽然我留恋的是旧社会里的旧书店，似乎也并不意味着留恋旧社会。

逛旧书店是爱好书籍的知识分子的“好癖”。为了手头拮据，想以廉价买得一些需要的书，他不去新书店而踱进了旧书店。为了想

访求一些新书店里没有的书，他到旧书店里去碰机会。为了给自己的研究课题找一些向来不知道的参考资料，他到旧书店里去搜索。单纯地为了爱好书籍，丰富自己的书库，他到旧书店里去物色古本、善本、珍本。这是旧书店的高级顾客了。

抗战以前，上海的福州路、汉口路、城隍庙、蓬莱商场，抗战胜利后，还要加上常熟路、襄阳路，都是旧书店集中的地方。一段路上，并列着好几家旧书店，都是一个门面的小店。有西书店，有中书店，有古书店，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货源。下午4点钟，下班出来，逛一条马路的旧书店，足够我消磨3小时。到7点钟回家吃晚饭，总有两三本书迫不及待地在电车上翻阅。

我在古旧书店里经常遇到的是郑西谛。有一天，我在来青阁的书架上找出一部《秋风三叠》，恰巧西谛先生进来，把我手中的书略一翻阅，就说："这部书你让我买吧。"我看他很有欲得之心，就把书递给他。郑先生虽然自己常说没钱买书，但在我眼里，他已经是财力雄厚了。当时伙计在旁，听说郑先生要，势必开个高价。我即使不让给郑先生买，自己也未必买得起。

城隍庙里桥上有一个旧书摊，我在那里屡次碰到阿英。有一次，我正走上桥去，阿英已站在那里。一眼看见我，就说："来得正好，借我一块钱。"接着，他告诉我：挑了一大堆书，老板讨价5元，还他3元不卖。大概非4元不可，无奈口袋里只有3元。我一看，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有光纸铅印、石印书，有《国粹学报》，有《新小说》，有弹词唱本，有小说戏曲，全是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和期刊。我借给他1元5角，1元凑足书价，5角做车钱，我和老板帮着扎了两捆，

又帮他提一捆到电车站。

西谛先生孳孳矻矻地搜罗古本戏曲，终于成为研究古代戏曲的专家。阿英兄到处捡破破烂烂的残书小册，终于写出了《晚清小说史》和其他许多关于通俗文学的著作。他们的成就，可以说是旧书店给了很大的帮助。这里我只举了两位我所熟悉的人，此外，肯定有许多知识分子曾体会到旧书店对他们的学识起过有益的作用。

如今，上海只有一家古旧书店和一家新旧书店。西谛先生要的书，绝不上架，属于内部之内部，专供应单位和首长的。阿英兄要的书，也不会上架，上了架太不像样，只配送到纸厂里去做卫生纸。

这样，我怎么能不回忆解放前的旧书店呢！

1979 年 9 月 10 日

买 旧 书

施 蛰 存

吾乡姚鹓雏先生有句云："暇日斩眉哦大句，冷摊负手对残书。"近来衣食于奔走，殊无暇日，轩眉哦句之乐，已渺不可得，只有忙里偷闲，有时在马路边看见旧书店或旧书摊，倒还很高兴驻足一番。我觉得这"冷摊负手对残书"的确是怪有风味的。

上海的旧书店，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卖线装旧书的，这就等于骨董店，价钱比新书还贵。第二种是卖中西文教科书的，大概在每学期开始时总是生意兴隆得很，因为会打算盘的学生们都想在教科书项下省一点钱下来，留作别用，横竖只要上课时有这么一本书，新旧有什么关系呢。第三种是卖一般读物的西文书的，也就是我近年来常常去消遣那么十几分钟的地方。

在中日沪战以前，靶子路虬江路一带很有

儿家旧书店，虽然他们是属于卖教科书的，但也颇有些文学艺术方面的书。我的一部英译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便是从虬江路买来的。

西文旧书店老板大概都不是版本专家，所以他的书都杂乱地堆置着，不加区分，你必须一本一本地翻，象淘金一样。有时你会得在许多无聊的小说里翻出一本你所悦意的书。我的一本第三版杜拉克插绘本《鲁拜集》，就是从许多会计学书堆里发掘出来的。但有时，你也许会翻得双手乌黑而了无所得。可是你不必抱怨，这正也是一种乐趣。

蓬路口的添福书庄，老板是一个曾经在外国兵轮上当过庖丁的广东人，他对于书不很懂得。所以他不会讨出很贵的价钱来。我的朋友戴望舒曾经从他那里以十元的代价买到一部三色插绘本魏尔仑诗集，皮装精印五巨册，实在是便宜的交易。

说到这部魏尔仑诗集，倒还有一个好故事。望舒买了此书之后一日，来了一个外国人，自称是爱普罗影戏院的经理，他上一天也在添福书庄看中了这部书，次日去买，才知已经卖出了，他从那书店老板处问到了望舒的住址，所以来要求鉴赏一下。我们才知道此公也是一个“书淫”，现在他已在愚园路和他的夫人开了一家旧书铺。文学方面的书很多，你假如高兴去参观参观，他一定可以请你看许多作家亲笔签字本，初版本，限定本的名贵的书籍的。他的定价也很便宜，一本初版的曼殊斐儿小说集“Something Childish”只卖 15 元，大是值得。因为这本书当时只印 250 部，在英国书籍市场中，已经算是罕本书了。

买旧书还有一种趣味，那就是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题字和藏书帖(Exlibris)。我的一本爱德华利亚的“无意思之

书”，本来是一种儿童用书，里页上却题着：

To John

Fr. his loving wife Erza

X，mas，1917。

从此可以想象得到这一双稚气十足的伉俪了。藏书帖是西洋人贴在书上的一张图案，其意义等于我国之藏书印，由来亦已甚古。在旧书上常常可以看到很精致的。去年在吴淞路一家专卖旧日本书的小山古书店里看见一本书中贴着一张浮世绘式的藏书帖，木刻五色印，艳丽不下于清宫皕美图（即《金瓶梅》插绘），可惜那本书不中我意，没有买下来。现在倒反而有点后悔了。

旧 书 店

叶 灵 凤

每一个爱书的人，总有爱跑旧书店的习惯。因为在旧书店里，你不仅可以买到早些时在新书店里错过了机会，或者因价钱太贵不曾买的新书，而且更会有许多意外的发现；一册你搜寻了好久的好书，一部你闻名已久的名著，一部你从不曾想到世间会有这样一部书存在的僻书。

当然，有许多书是愈旧愈贵，然而那是Rare Book，所谓孤本，是属于古书店，而不是旧书店的事。譬如美国便曾有过一家有名的千元书店，并不是说他资本只有一千元，乃是说正如商店里的一元货一样，他店里的书籍起码价格是每册一千元。这样的书店，当然不是一般人所能踏进去的地方。

上海的旧西书店，以前时常可以便宜的价格买到好书，但是近年好象价格提高了，生意

不好，好书也不多见了。外滩沙逊房子里的一家，和愚园路的一家一样，是近于所谓古书店，主人太识货了，略为值得买的书，价钱总是标得使你见了不愉快。卡德路的民九社，以前还有些好书，可是近来价钱也贵得吓人了，而且又因为只看书的外观的原故，于是一册装订略为精致的普及版书，有时价钱竟标得比原价还贵。可爱的是北四川路的添福记，时常喝醉酒的老板正和他店里的书籍一样，有时是垃圾堆，有时却也能掘出宝藏。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在三年之前，他将一册巴黎版的乔伊斯的《优力栖斯》，和一册只合藏在枕函中的《香园》，看了是纸面毛边，竟当作是普通书，用了使人不能相信的一块四毛钱的贱价卖给了我。如果他那时知道《优力栖斯》的定价是美金十元，而且还无从买得，《香园》的定价更是一百法郎以上，他真要懊丧得烂醉三天了。不过，近来却也渐渐的识货了。

沿了北四川路，和城隍庙一样，也有许多西书摊，然而多是学校课本和通俗小说，偶尔也有两册通行本的名著，却不是足以使我驻足的地方。

对于爱书家，旧书店的巡礼，不仅可以使你在消费上获得便宜，买到意外的好书，而且可以从饱经风霜的书页中，体验着人生，沉静得正如在你自己的书斋中一样。

旧书铺

茅盾

来重庆的人，常常被街道的新旧名称弄得头痛。当然新名称有它方便的地方，可是你雇人力车时如果只说一个“中正路”，那恐怕你就不大受欢迎。因为中正路并不短，车夫们懒得多费口舌问明你究竟要到中正路的哪一段，旧名称却比较的富于精确性了。然而一位不知道重庆街道旧名称的“特点”的新客也往往有点小烦恼；譬如说，他会站在“小梁子”的口上问人：“小梁子在何处?”因为重庆街道的旧名称往往是在一直线上分段而题名的，和别处的一条街只有一个名称不同。

从这些街道的旧名称看来，可知旧时重庆各街也颇“专业化”。例如“鸡街”、“骡马市”、“打铁街”之类，单看名目便可想象从前这些街的特殊个性了。我不知道旧时重庆有没有一条旧书铺集中的街道，但照今日重庆还保

存着旧日面目那一小段连衡对宇的旧书铺集团看来，这或者也就是从前的旧书街了。不过这段街的旧名称却叫做“米亭子”。

这里的旧书铺集团，共计不过六七单位(连摊子也在内),说多呢实在不多，可是说它少么，似乎今日重庆市内也还找不出第二处有这样多的单位集中起来的旧书市场。当然不是说这里的旧书最多，比这里各单位所有旧书的总数还要多些的大旧书铺，我想重庆市内也不是绝对没有，可是单位之多而又集中，俨然成为小小一段的“旧书街”，则恐怕除此以外是没有的。

至于块然独处的大大小小的旧书铺——或文具而兼旧书之铺，则在今日重庆市内外，几乎是到处可见的了，可是也得说明：无论是“米亭子”或其他单独的旧书铺，旧书诚然是旧书，可不能用抗战前我们心目中的所谓“旧书”来比拟，今天的旧书，只是“旧”书而已，战前一折八扣的翻版书，今天也在那些旧书铺内，俨然珍如宋椠元刊；1930 年香港或上海印的报纸本小说(其实也有土纸本在发售)，也成为罕见之珍品。合于往日所谓“旧书”的标准的旧书，自然也不是没有，只是太少了，说不上比例。差可说是约占百分之一二的，是木板的线装书(这比一折八扣的板本自然可以说是“旧”些了罢)，然而这又是医卜星相之类占多数，我曾在两处看见两部木板线装的——一是《曾文正日记》，一是《诗韵合璧》——那书铺老板视为奇货可居，因为这两种是在医卜星相之外的。

但是千万请莫误会，今日重庆的这些旧书铺对于读书人是没有贡献的，比方说，从沦陷区来的一位青年，进了这里的某大学，他来时身无长物，现在至少几本工具书非买不可

了，那他就可以到那些旧书铺去看看，只要不怕贵，他买得到一部10年前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这是现在此地可能买到的最好的英文字典。又比方说，一位写作者如果打算随便“搜罗”一点旧材料，破费这么几天工夫，上城下城，上坡下坡，出一身臭汗，总也可以略有所获，10年前的旧杂志有时竟能淘到若干，但自然，怕贵是不行的。

当真不是夸大其词，这些旧书铺有时真有些“珍贵”的书本。原版的外国文书籍，极专门而高深的，也会丢在报纸本的一折八扣书之间，有一位朋友甚至还找到了一册有英文注释的希腊古典名著，因此竟引起他学习希腊文的兴趣。不过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罢了。有些英文或法文的原版丛书，虽只零落数册，而亦非难得之书，可是扉页上图记宛在，说明这是战前某某大学或某某学术机关的故物。这样的书，如何颠沛流徙了数千里，又如何落在旧书铺中，想象起来真不能叫人不生感慨；这样的书，放在家里虽不重视，但在别一意义上，可实在算得是具有“藏珍”资格的“旧书”了罢？可喜而又可怪者，是这样的书，近来愈见其多，常常可以遇到了。这一件小事，如果推想开去，却又叫人觉得可忧而又可悲。

最后，我们来谈一谈旧书的价钱。

先述一二近事，桂柳沦陷之时，有人流亡到贵阳，旅费不继，卖掉一部丙种《辞源》，得价1万元，——这还是急等钱用贱卖了的，独山克服以后，有人在重庆买得一部报纸本的《鲁迅全集》，出价2万5，——这也是沾了时局的光的。看了这两件“买卖”，旧书的时价，略可概见，一句话，旧书时价虽然赶不上米布，更赶不上高级化妆品，可也够惊人了；今日重庆一家小小旧书铺，论其货价，谁敢说它没有几

百万；倘以旧时币值计，直堪坐拥百宋千元！但今天不过是白报纸本道林纸本的铅印书而已。旧书价格之提高，似与供求关系无涉。旧书价是跟着粮价走的，这也有一个小小故事不可不记。有人在“米亭子”某铺看到了一部《综合英汉大辞典》(袖珍本)，索价2600元，买不起，隔了两天再去看，却已涨为3000元了。问何以多涨400，则答曰：“这几天粮价涨了呀！”书是精神食粮，书价跟着粮价走，似亦理所当然。

但是今日重庆的旧书铺老板计算他的货价尚有另一原则，此即依纸张(白报纸或道林纸)及书之页数为伸缩，即使是极不相干的书，只要纸好，页数多，则价必可观，这简直是在卖纸了！自有旧书铺以来，这真是历史的新的一页。对于这样的“现实主义”，版本权威只能摇头叹息。所以今日重庆跑旧书铺的人，决不是当时在北平跑琉璃厂，在上海跑来青阁的人们了。

今天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时代，今天重庆跑旧书铺的人，绝大多数是为了某一个小小的“现实”的目的，“发思古之幽情”者，恐怕百不得一二罢？旧时也还有坐在旧书铺里看了半天书的人，今天也没有了；今天如果有这样的好学者，那不是在旧书铺中，而在“新书店”内了。

不过，旧书铺的内容虽然变了，但从“市上若无，则姑求之于旧书铺”这一点看来，今天重庆的旧书铺还是“旧书铺”，只是所有者是现实意义的“旧”书罢了。可以说旧书铺也染上了战时的色调了，这也是“今日重庆”之一面。

旧书摊

汪曾祺

昆明的旧书店集中在文明街，街北头路西，有几家旧书店。我们和这几家旧书店的关系，不是去买书，倒是常去卖书。这几家旧书店的老板和伙计对于书都不大内行，只要是稍为整齐一点的书，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都要，而且收购的价钱不低。尤其是工具书，拿去，当时就付钱。我在西南联大时，时常断顿，有时日高不起，拥被坠卧。朱德熙看我到快11点钟还不露面，便知道我午饭还没有着落，于是挟了一本英文字典，走进来，推推我："起来起来，去吃饭！"到了文明街，出脱了字典，两个人便可以吃一顿破酥包子或两碗闷鸡米线，还可以喝二两酒。

工具书里最走俏的是《辞源》。有一个同学发现一家书店的《辞源》的收售价比原价要高出不少，而拐角的商务印书馆的书架就有几十本崭新的《辞源》，于是以原价买到，转身即以高

价卖给旧书店。他这种搬运工作干了好几次。

我应当在昆明旧书店里也买过几本书,是些什么书,记不得了。

在上海，我短不了逛逛旧书店。有时是陪黄裳去，有时我自己去。也买过几本书。印象真凿的是买过一本英文的《威尼斯商人》。其时大概是想好好学学英文,但这本《威尼斯商人》始终没有读完。

我倒是在地摊上买到过几本好书。我在福煦路一个中学教书。有一个工友,姑且叫他老许吧,他管打扫办公室和教室外面的地面,打开水,还包几个无家的单身教员的伙食。伙食极简便,经常提供的是红烧小黄鱼和炒鸡毛菜。他在校门外还摆了一个书摊。他这书摊是名副其实的“地摊”,连一块板子或油布也没有,书直接平摊在人行道的水泥地上。老许坐于校门内侧,手里做着事,择菜或清除洋铁壶的水碱,一面拿眼睛向地摊上瞟着。我进进出出,总要蹲下来看看他的书。我曾经买过他一些书——那是和烂纸的价钱差不多的,其中值得纪念的有两本。一本是张岱的《陶庵梦忆》,这本书现在大概还在我家不知哪个角落里。一本在我看来,是很名贵的: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我对董西厢一直有偏爱,以为非王西厢可比。汤显祖的批语包括眉批和每一出的总批,都极精彩。这本书字大,纸厚,汤评是照手书刻印的。汤显祖字似欧阳率更《张翰帖》,秀逸处似陈老莲,极可爱。我未见过临川书真迹,得见此影印刻本,而不禁神往不置。“万有文库”算是什么稀罕版本呢？但在我这个向不藏书的人,是视同珍宝的。这书跟随我多年,约10年前为人借去不还,弄得我想引用汤评时,只能于记忆中得其仿佛,不胜怅怅！

1989年8月

逛旧书摊

唐　挚

许多人对于书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阿英同志在《海上买书记》中说："获得了不常见的珍秘书籍，有如占领了整个世界，这说法虽不免有些夸张，但欢快的心情，确实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这种心情大概也是许多"嗜书如命"的同志所经历过的吧。

记得 50 年代初期，那时尚无家室之累，每到节假日，逛旧书摊是我最大的乐趣之一。当时北京旧书摊不少，最集中的，要数东安市场，即现在的东风市场。那时的东安市场，并不像现在这样全部打通为售货大厅，而是回环纵横，曲径通幽，如同穿迷宫一般，初次进去的人，甚至会转来转去地找不到出口。吃穿用各类物品分别在市场各个部分，而东北部分，则是集中卖旧书的所在。那里除了几个规模较大的旧书店以外，围绕四周的全是名副其实的

旧书摊，成排成行古今中外的旧书，任顾客随意翻阅选购，每逢到了那里，便觉书香扑鼻，目醉神迷。虽然书架上并不都是珍藏秘籍，却品类繁多，琳琅满目。东翻西翻，忽而被那本书所吸引，便会驻足在那里看得忘了周围的世界，忘了时间之流逝，直到中午肠胃打起架来，才匆匆到卖各种小吃的摊上，胡乱地吃点爆肚、烧饼、枣糕之类，然后重又返回去，继续徜徉于文浪书海之中，神游于精神殿堂之内，简直觉得人间似乎没有比这更大的快事了。那时编辑部同志中，有此癖好者不在少数，文艺评论家侯金镜便是其中的一个。有时星期天会在那里遇见他，便相对会心一笑。有一次在他家中闲谈，他忽然兴致勃勃地从书房中取出一本书来，原来是 1933 年新月书店发行的，闻一多先生的名著《死水》，全书装帧朴素，只有 91 页，薄薄的一小册。但那诗里为中国命运担忧的悲愤煎熬之情，却如同烈火在每一页上燃烧，震撼了多少人的灵魂。金镜同志高兴地告诉我，这是他在东安市场旧书摊上发现的，他虽然已经有了一本，但还是忍不住把它买了回来，如果我没有，他就把这本送给我。这对我真是喜出望外，仿佛意外地得了什么奖赏，那欢乐之情“确实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这本书至今仍珍藏在书柜中，不仅因为闻一多先生的诗，也因为那友谊的温馨。

东安市场改建时，我虽已被打发到农场劳动去了，听人告诉我，改建后的东风市场，旧书摊、旧书铺全没有了，我怅然若失良久，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但后来“文革”厄运降临，认定“知识越多越反动”，那时，我想，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如果一直保留下来，大约也逃脱不了传播“四旧”的罪责，那些书籍也逃不脱聚而焚之的命运，倒不觉有点释然。人的心理真很奇怪。到了现在，偶然到夜市一游，只见

许多风味小吃都恢复了起来，不免想起逛旧书摊的无穷乐趣。那么，旧书市、旧书摊是否也能恢复起来，让人们重有机会到书海中遨游一番呢？不过那时，旧书摊的书是很便宜的，只要你有慧眼，花几角钱就可以买到自己心爱的书，花几块钱甚至就可以满载而归，像个凯旋的将军了。如果是作为奇货可居，漫天要价，唯利是图，或者再来个爱搭不理，冷眼相向，恐怕那欢快也就要大大地打折扣了。

逛书摊

陈平原

早上醒来，天气晴朗，灵机一动，骑车赴东四隆福寺街访书。这里从清代到民国曾书肆云集，据说五、六十年代还有三、四十家书店，如今就剩下孤零零一家旧书店了。好在店里人不多，与街上的喧嚣形成鲜明对比，顾客低头翻书，售货员低声耳语。

总算没白跑，一下子就看中钱基博的《版本通义》。钱钟书这几年声誉甚高，其父似乎也沾光，《现代中国文学史》等书已经重印，只是这本1957年古籍出版社版的小书未见再版。

季镇淮先生乃妻子念研究生时的导师，治学很严谨，压着两三部书稿，从60年代一直琢磨到现在还不肯撒手。正式出版过的除《闻朱年谱》外，就这本《司马迁》(1955年初版，1979年出版修订本)。如今书店里早就售罄，居然在这里相遇，买下来留作纪念。

劳伦斯的书这两年大出风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小书摊上卖高价，据小说改编的电影(黑白片)在北大放映过，反映平平，可票照样很难弄到。劳伦斯的其他作品则未必有此好运，花城出版社刚出的《儿子和情人》，旧书店里已经开始削价出售。高价的“情人”买不起，只好借阅；降价的“情人”不妨买一本，书架上总该有劳伦斯的一席地位。

谭正璧父女著的《古本稀见小说汇考》，1984 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对治小说史者很有用。著者 1945 年曾出版过《中国佚本小说述考》，所考佚本只限于日本所藏；次此补充了英、法等国的藏本和国内所藏珍本，共收古本稀见小说 163 种。这个工作不需要多少灵气，但要下苦功夫，二、三十年代郑振铎和孙楷第做过，60 年代柳存仁也做过，谭氏此书明显吸收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这次访书，最得意的还是廉价购得上海书店影印的《历代小说笔记选》7 册和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年版的《古文小品咀华》甲、乙种本。前者由江畬经编辑，收录汉代至清代笔记小说集 200 种，据编者自称，不收神鬼报应之作，“至于殊方异俗，奇闻轶事，凡足广后贤之耳目，引读者之趣味者，则仍博取无遗”。只是所收各书多为选录，对于研究者来说，不如《笔记小说大观》或《说库》合用。不过如果作一般阅读，此选本也还可以。

《古文小品咀华》为清人王符曾所编选评点，收先秦至明代短篇古文 291 篇。书目文献出版社同时推出甲、乙两个版本，甲种本为原耕读轩刊本，乙种本据周作人祖父周介孚收藏的清人抄本影印，前有周作人小记。编者不录佛老之言、四六对偶、牛鬼蛇神和插科打诨，这些都情有可原；可称“予辑古文，凡渐染月露风云，及道儿女闺房之事者，尽汰

之，防其渐也”，则又未免有点道学味道。不过编者在《序》和《赘言》以至具体作品评点中，屡屡道及文章之长短，颇有见地。如“尝试论之，文章一道，学步者，丰满毛羽，矜奇炫异；其继也，则涣然冰释，怡然理顺；逮乎入室之后，笔墨矜贵，必敛才就法，以驯至于入化出神而后已。”作文章的这三种境界，舞文弄墨者多能领会，却难得他一语道尽。

近来忽对笔记、题跋、小品之类感兴趣，大概是年龄的关系，不过也跟读厌了高头讲章式的宏文和浓得化不开的美文有关。小品好读不好写，弄得不好既浅且白，日渐无聊。大致读大书写小品，出手自然不俗；而读小品写小品，则容易小里小气，且矫揉造作。也就是说，此类颇需灵气的东西是逼不出来的，最好是厚积薄发，无意为之，一挥而就。最近为友人所诱，赶写“学术小品”，颇为忙碌了一阵，心里老不踏实。明知突击写小品本身就有点好笑，平日里还讥笑友人每天创作若干格言的写作规划，真怕小品写完灵气也没了，成了吃“小品饭”的。

不过，还是希望能两条腿走路，能写严谨的专著，也能写洒脱的小品。前几年似乎时兴在学术论文中发牢骚乃至插科打诨，本人也未能免俗。这代人读起来带劲，后人则可能莫名其妙。还是角色界定清楚好，干什么就该像什么，别老当秀才时像和尚，做和尚时又像秀才。倘写小品，则笔记野史乃至明清小品都大可借鉴。不过，这里所读的“小品”，与王符曾所选择的“小品”并非同一个概念。

1987年12月3日

逛 书 摊

柳　　萌

我在内蒙古工作那些年，每年休探亲假回天津，至少要住上十天半个月，这期间断不了上劝业场一带转转。那时我比现在年轻几岁，腿脚也利索，尽管我父母家住西沽，距劝业场足有二三十里路，但有时兴致一来，连电汽车也不乘，拔腿徒步走到劝业场。这一路之上边走边看，遇有熟地熟事，不免勾起我对幼年生活的回忆。特别是走进原来的天祥商场，虽然它与劝业场连在一起，但我依然会想起老天祥商场的格局。尤其令我怀念的是它的旧书摊。

天祥商场的旧书摊，对于当时像我这样的中学生来说，那是个极有吸引力的地方。一是这里有着各式各样的书画，我们可以随意挑选翻看，营业员从来不会阻拦干预；二是这里不似图书馆那样有严格制度，三两个同时凑在一起抱着一本书看，指指点点说笑着也无人理

会。记得有一次，我们看到一本小说，写的正是天津马场道一带的故事，离我们读书的第一中学极近，我们几个同学越看越来劲儿，扔下书一起跑到马场道，寻找小说中描写的主人公的住宅，在一家大宅第的红大门前徘徊时，险些被人当做小偷抓走。

现在回想当初这些举动，连我自己都不免好笑，这里面透着多少孩子的傻气和任性呵。但是再仔细地想一想，谁又能完全否认，激发起孩子们纯真的好奇心，不正是蕴藏在书中的那些故事和知识吗？只有这股力量才会支配我们自觉自愿地去为一个目标行动。

我参加工作以后从天津来到北京，50 年代在一家报社工作，每逢星期天上街的头桩事，总是身不由已地逛书摊。东安市场和琉璃厂的那些旧书摊，都曾留下我青春的脚印，至今想起来心中都有种欣慰的感情。当时和我一起工作的有位老编辑，他也是个旧书店的常客，我们俩经常在旧书店相遇。有次他好奇地问我：“你年纪轻轻的，怎么也往这里跑？”言外之意，青年人只能进图书馆、新华书店，好像这旧书摊只是上岁数人的领地。我对他的询问笑而不答。其实他哪里知道，幼年时代在天祥商场逛书摊的经历，于潜移默化中形成了我的癖性，只有在书摊前呆上个把钟头，看上几页书，才会觉得这个星期天，过得充实有意思。直到 1958 年我被错划为右派，离开北京去北大荒劳改后又到内蒙劳动，再很少有逛书摊的福分和机会。但是只要在闲暇时回忆起早年的生活，那逛书摊的情景就会历历在目，这时在我心中激起的情感依然是亲切的，同时希冀有这么一天，让我重新享受这逛书摊的乐趣。

经过 20 多年的坎坷生活，在风风雨雨中跑了许多地方，

1978年再回到青春初绽的北京城，我开始跻身于年长人的行列了。青年时代的许多习性都改掉了，唯有逛书店逛书摊的嗜好还保持着。我当时工作的单位《新观察》杂志社，与东安市场和新华书店同在王府井大街上，简陋拥挤的编辑部办公室，中午不便休息，那旧书摊和新华书店自然成了最好的去处。有时中午休息到新华书店去得早些，正赶上书店的职工下班回家吃饭，常会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我虽然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更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职位，但有一点是敢肯定的，他们在50年代都是营业员，只是现在都霜染两鬓了，成了老头儿老太太，唯有那挂在眼神嘴角的微笑，还依稀使我想起他们年轻时的热情服务。

这几年的改革开放，以及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渴望，现在北京东单等处又开设了旧书店，条条主要街道也摆了不少个人经营的小书摊，给北京街头增添了文化气息和绚丽色彩。当我走进这些旧书店或者驻足街头小书摊时，幼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便会油然显示在我记忆的屏幕上，心海里立刻荡起甜蜜蜜的涟漪。从内蒙调回北京以后这些年里，虽说也经常回天津探望年迈的老母，但因不能享受探亲假，每次都是头天去次日归，也就无时间和情致逛大街了。天津劝业场里的旧书摊，现在究竟怎么情况，我也就不得而知。不过我相信它会同北京东单旧书店一样拥有更多新读者。

我为什么会对旧书摊有着如此痴情的眷恋呢？我想，不仅仅是因为它紧紧系着我那颗青春年少的心，而且更因为它慷慨地给过我一些零星知识。浩瀚的江河起源于举步可越的溪流，丰富的知识又何尝不是来自一字一句的传播。难道我们不该感念那小小书摊的哺育之恩吗？

我们的城市正在变化着，将会变得更美丽、更文明。街

头的雕塑和空间的绿化，毫无疑问，是城市美丽、文明的标志。但我想，在大街小巷建造些多姿多彩的书报亭，在群众容易聚集的地方摆设些书摊，该会给城市带来多少高雅、清丽的气氛啊！更何况她还会用知识的乳汁滋润着人们的气质和心灵呢？

1985年8月

买　书

朱自清

买书也是我的嗜好，和抽烟一样。但这两件事我其实都不在行，尤其是买书。在北平这地方，像我那样买，像我买的那些书，说出来真寒尘死人；不过本文所要说的既非诀窍，也算不得经验，只是些小小的故事，想来也无妨的。

在家乡中学时候，家里每月给零用一元。大部分都报效了一家广益书局，取回些杂志及新书。那老板姓张，有点儿抽肩膀，老是捧着水烟袋；可是人好，我们不觉得他有市侩气。他肯给我们这班孩子记账。每到节下，我总欠他一元多钱。他催得并不怎么紧；向家里商量商量，先还个一元也就成了。那时候最爱读的一本《佛学易解》(贾丰臻著,中华书局印行)就是从张手里买的。那时候不买旧书，因为家里有。只有一回，不知哪儿捡来《文心雕龙》的名

字，急着想看，便去旧书铺访求：有一家拿出一部广州套版的，要一元钱，买不起；后来另买到一部，书品也还好，纸墨差些，却只花了小洋3角。这部书还在，两三年前给换了磁青纸的皮儿，却显得配不上。

到北平来上学入了哲学系，还是喜欢找佛学书看。那时候佛经流通处在西城卧佛寺街鹫峰寺。在街口下了车，一直走，快到城根儿了，才看见那个寺。那是个阴沉沉的秋天下午，街上只有我一个人。到寺里买了《因明入正理论疏》、《百法明门论疏》、《翻译名义集》等。这股傻劲儿回味起来颇有意思；正像那回从天坛出来，挨着城根，独自个儿，探险似的穿过许多没人走的碱地去访陶然亭一样。在毕业的那年，到琉璃厂华洋书庄去，看见新版韦伯斯特大字典，定价才14元。可是14元并不容易找。想来想去，只好硬了心肠将结婚时候父亲给做的一件紫毛(猫皮)水獭领大氅亲手拿着，走到后门一家当铺里去，说当14元钱。柜上人似乎没有什么留难就答应了。这件大氅是布面子，土式样，领子小而毛杂。——原是用了两副“马蹄袖”拼凑起来的。父亲给做这件衣服，可很费了点张罗。拿去当的时候，也踌躇了一下，却终于舍不得那本字典。想着将来准赎出来就是了。想不到竟不能赎出来，这是直到现在翻那本字典时常引为遗憾的。

重来北平之后，有一年忽然想搜集一些杜诗。一家小书铺叫文雅堂的给找了不少，都不算贵；那伙计是个麻子，一脸笑，是铺子里少掌柜的。铺子靠他父亲支持，并没有什么好书；去年他父亲死了，他本人不大内行，让伙计吃了，现在长远不来了，也不知怎么样。说起杜诗，有一回，一家书铺送来高丽本《杜律分韵》，两本书，索价300元。书极不相

干而索价如此之高，荒谬之至，况且书面上原购者明明写着"以银二两得之"。第二天另一家送来一样的书，只要二元钱，我立刻买下。北平的书价，离奇有如此者。

旧历正月里厂甸的书摊值得看，有些人天天巡礼去。我住的远，每年只去一个下午——上午摊儿少。土地祠内外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地来往。也买过些零碎东西，其中有一本是《伦敦竹枝词》，花了 3 毛钱。买来以后，恰好《论语》要稿子，便选抄了些寄去，加上一点说明，居然得着 5 元稿费。这是仅有的一次，买的书赚了钱。

在伦敦的时候，从寓所出来，走过近旁小街。有一家小书店门口摆着一架旧书。上前去徘徊了一下，看见一本《牛津书话选》(The Book-Lover's Anthology)，烫花布面，装订不马虎，400 多面，本子也不小，准有七八成新，才 1 先令 6 便士，那时合中国 1 元 3 毛钱，比东安市场旧洋书还贱些。这选本节录许多名家诗文，说到书的各方面的；性质有点像叶德辉氏《书林清话》，但不像《清话》有系统；他们旨趣原是两样的。因为买这本书，结识了那掌柜的，他后来给我找了不少便宜的旧书。有一种书，他找不到旧的，便和我说，他们批购新书按七五扣，他愿意少赚一扣，按九扣卖给我。我没有要他这么办，但是很感谢他的好意。

旧　书

华　嘉

太无聊了的时候，我是会把自己安置在一些清静的角落里的。因此这摆设在马路的边缘上的旧书摊，倒是我常驻足的地方。这一天却发现了奇迹了，我在一堆旧书里看见了两本书，于是我拿起来亲切地看——没有错！这不是眼睛骗我的事，这是我一个遇着那不好的运气的朋友的书，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版权页上我瞎涂上的几个开玩笑的字，和在第 123 页上夹有一张剪报，一点还没有错，一点都依旧，虽然这书已并不知经过了几许人的手上。从这本书我想起了四个月前的生活，我们还是在那里谈笑，还在那里在闹着青年人的玩艺儿，在快乐地过去那一连串的痛苦而困难的日子。在这时候，谁也不会想到现在是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尤其是我，在这偌大的都市里变得孤独而且寂寞，没有微笑地去忍受那生活的给予。想

到了这，我变得更眷恋了这本旧书来了。

“老板，这本要多少钱？”

虽然，我明晓得袋子里是一个铜板也没有，但是只有一线的希望，我从来是不会放过的，因为我知道这里的老板他是认得我的，也许叫他留起来让我过几天再来买是可能的，所以才冒昧地要向他打探一个价钱。

“老实说，我们从来不要说谎价，你要是买，八角大洋。”

他也带着希望的音调来答复我。因为我知道有些时候他这个摊子是简直没有生意的，一会儿他又接上来说：

“还有咧，这里还有几本，都是一起儿收得来的。”

于是他接连地翻了五六本出来，这五六本旧书都是我认得的，而且其中有两本，还是我自己的书而存在他的家里的。我看到那些书像看到了熟朋友一样，投着亲切的眼光。虽然有点埋怨；那个朋友不应该把这些爱护了几年的书都卖掉；但是回头想他的环境，我明白的，在他离开这地方时是如何的穷，他如果不把这些书卖掉，他是更不能过生活的。同时，我也愿意原谅他，他不把这些书送给他的朋友，是因为他没有了这个的权利，同时他也不能在朋友中间借到什么钱，或者获到什么帮助。比如我，便是最抱歉不过的，我答应了他的帮助，却变成了不兑现的支票，实在我也是给生活压得透不过气的一个，在失业半年的长时间中，我是尝到了人生的一切享受的了。……

“要买吗？”

老板看见我在那里看书，奇怪而不满意地看着我。

“啊，是的，我要买。不过，今天实在没带钱，请给我留起来，明天我就来买，可以吗？……”

我恳切地对他说，他也算作是答应了。

但是，我从哪里找钱哩，在房钱还没有着落的时候，可以再从哪里找到一笔钱来买这书哩。于是，只好让他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虽然心里是空着急，但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直到有一天借到了一只洋，本来是为了这几天的吃饭的，可是我却忘记了一切地跑到了旧书摊去了。

“老板，书?”

他带着微笑的抱歉：“你一个礼拜多没有来了，我当作你忘记了，所以书都卖出去了。现在只剩下这一本。”

这一本是《妇人与社会》。在一个最低的价钱中我买到了。当我拿那剩余下来的最后财产去吃阳春大面的时候，我翻着书，显出了微笑。

1935 年端午节后。上海。

由旧书想起的

张 中 行

不久前，为找什么材料，翻腾书橱，随手拿出两本，检阅扉页，看看有没有买时的记录，这是“无意地”想温一温旧事。两本都是鲁迅先生著作。一本是《彷徨》，扉页有题记，是：“1939 年 4 月 24 日买于北京西单商场，价 4 角。昔在通州有此书，乃李文珍女士所赠，记得为初版，此则为第 13 版。李女士为同学赵君之友，情投而未能意合，书则 37 年毁于战火。抚今思昔，为之惘然。”书是旧书，有“虚真藏书”白文印。另一本有些怪，内容是《南腔北调集》，封面和书脊却印《故事新编》，没有版权页，我想这是为了逃避查禁者的“慧”眼，伪装为《故事新编》的。这个妙计是鲁迅先生还是书店老板想出来的？由书上自然看不出来。书也是旧的，扉页有原主人胡君的名章。我没有题记，什么时候从何处买到是难

于知道了。

说起旧书，真是酸甜苦辣，一言难尽。一位老前辈，是名作家，有一次同我说，他杂览，是因为他不吸烟，闲坐无聊，只好用看书来消遣。我同另外两三个朋友喜欢逛书铺，逛书摊，买点旧书，也可以用吸烟来解释，是求书成瘾，很像吸惯纸烟之难于戒除。买旧书要费些时间，粗略估计，是一周用半天左右，也要费些钱，但不多，因为不求好版本，不求大部头的堂皇典册。买旧书，因书而得有两种。一是因杂收而可以杂览，因杂览而可以杂知。二，我们常常认为更重要，是因巧遇而获得意外的喜悦。所谓巧遇是买到久已不见于市面的书，因为难得，所以觉得好玩。在这方面，可记的经历很有一些，只举两个例，如友人韩君买到鲁迅弟兄在日本印的《域外小说集》(封面“域”作“或”)，我买到光绪三十五年《时宪书》(光绪只有三十四年)，就都是因为罕见而觉得很有意思。

一晃40年过去，当年零碎收集的旧书，有些由废品站送往造纸厂，有些化为灰烬，还有些残余卧在书橱里。文化大革命风停雨霁之后，像是可以重温旧梦了，但苦于不再有温的条件。主要是已经没有往日猎奇的心情和精力；其次，即使有，也不再能找到弯弓放矢的场所。因而关于旧书，剩下的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记忆。这正是琐话的题材，所以决定拉杂地说一说。

旧时代，出版业不发达，有名的几家集中上海，印书种类不多，数量不多，售书的处所，尤其在北京，总是由旧书独霸。北京，文化空气比较浓，读书人比较多，因而售书的处所比较多，几乎遍布九城。这方面的情况，孙殿起的《琉璃厂小志》有详细记录，有兴趣卧游的人可以看看。售书的

处所，有等级之分，从而有性质之别。等级高的集中两地：一是琉璃厂，二是隆福寺，主要售线装书，其中偶尔有价值连城的善本。中级的也集中两地：一是东安市场，二是西单商场，所售书杂，古今中外。其中又有等级之别：等级高的铺面大，所售之书偏于专，如专售外文；等级低些的铺面较小，所售之书较杂，更低的没有铺面只摆摊，所售之书也杂，因为买来什么卖什么，所以不能不古今中外。这中级的还有不集中的，那是散布在某些街道的小书铺，如鼓楼之东的“得利复兴”，之南的“志诚书局”就是。下级的是散布在各热闹处所的书摊，自然也是买到什么卖什么，古今中外。这又有种类之别：一种是长期的，如地安门外大街、安定门内大街的许多书摊就是；另一种是间断的，如护国寺和隆福寺等庙会，只有会期有，什刹海荷花市场，只有夏季有。此外还有级外的，是德胜门、宣武门几处小市，鼓担和住户卖旧货，间或也有旧书。这种处所，旧书的出现更富于机遇性，有时候会出现大量的，甚至有善本。

旧书上市量的多少，价的高低，与治乱有密切关系。量多少与治乱成反比，治少乱多，因为治则买者多而卖者少，乱则买者少而卖者多。价高低与治乱成正比，治高乱低，原因与多少一样，治则大家抢着收，乱则大家抢着扔。抢着扔的情景，记得最惊心动魄的有两次。一次是七七事变之后，以德胜门小市为例，连续多少个早晨，旧书总是堆成几个小丘，记得鼓担的收价是六七分一斤，售价是一角一斤。可是买主还是很少，只好辗转送往造纸厂了。另一次是文化大革命风暴初起之时，小市的情况如何，因为没有余裕去看，不得而知；且说自己，匆忙点检，把推想可能引起麻烦的中西文书籍百余种清出来，由孩子用自行车推往废品站，回来

说，废品站人说不收，愿意扔可以扔在那里，就高兴地扔了。我当时也松了一口气。及至风暴过去，才想到其中有些，扔了实在可惜，想买就再也遇不到了。这使我想到古人“人弃我取”的策略，道理自然不错，但那究竟是局外人的风凉话，至于被迫处于局内，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还是转回来说平时，旧书价的高低，与售书处所等级的高下成正比，因而一种同样的书，比如说，由东安市场买要两角，由街头书摊买也许只要一角，由级外的小市买也许只要5分。搜寻旧书，更喜欢多逛街头书摊和小市，原因之一就是图省钱。但还有原因之二，也许更重要，是可以买到中级以上书商看不起的不见经传之书。中级以上书商收书有个框框，这框框一部分来自师傅所传，一部分来自书架上所常见，总之要是他知道的。街头书摊和小市则不然，以小利速销为原则，所以总是遇书不拒，因而它就有个大优点，是因杂而博。譬如鲁迅弟兄早年译著，《侠女奴》《玉虫缘》《红星佚史》《匈奴奇士录》等，清末刻本富察敦崇著记八国联军入北京的《都门纪变三十首绝句》，以及嘉庆八年无名氏稿本记嘉庆皇帝一年活动的《癸亥日记》，等等，我都是从这类地方买来的。

这样说，好像下级的售书处所只能买到破烂，其实不然。自然，这要看机会，如果碰到机会，买到见经传的书也并非不可能。机会是难得的，但日久天长它就会成为必然。比如我现在还喜欢的书，明版绿君亭（汲古阁）刻《苏米志林》，乾隆十二年(1747)初刻沈德潜著《杜诗偶评》，就是由小市地摊上买到的。

50年代以后，等级较低的售书处所逐渐消失。“文化大革命”以后，旧书稀如星凤，其中的线装刻本成为和璧秦

玺，出售处所只剩中国书店一家。有一天，一位喜欢逛书店的朋友谈起琉璃厂的情况，举一些例说明货之少和价之高，只记得劣拓粗裱的《郑文公上下碑》，定价超过千元。这使我想起当年由小市地摊买到乾嘉精拓当时裱本《始平公造像记》的情况，其价只是一角，不免兴起对于“旧游”的回忆。

书林即事

唐　弢

考场外面设立临时书铺，这个风气由来已久，另外如灯市庙会，向例也有书摊。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记云："昔在京师，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乾学)，徐笑谓之曰：此易耳，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书摊候之，必相见矣。如其言，果然。庙市赁僧廊地鬻故书，小肆皆曰摊也。……"孔尚任作《燕台杂兴》诗，有一首即咏此事：

弹铗归来抱膝吟，
侯门今似海门深；
御车扫径皆多事，
只向慈仁寺里寻。

清初北京书铺，大都在广安门内慈仁寺一带，每逢初一月半，往游的人很多，临时增设小摊，比平日更为热闹。慈仁寺又称报国寺，

顾炎武曾在寺里借住，朱彝尊、何焯也常出入于此，如今遗址尚在。后来岁朝集市，改在厂甸举行，书摊也随着迁移，逐渐在海王村设肆。到了乾隆年间，李文藻作《琉璃厂书肆记》，提到的书铺有三十几家，已经俨然是一条文化街了。这时正值“四库”开馆，江浙两地贩书的人，每次运载入京，也都在琉璃厂附近驻足。据翁方纲说，参加《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大臣，午后自翰林院回寓，往往带着待查待校的书单，过海王村，在书店里来回徜徉。在些掌柜乘机找寻门道，结纳权贵，慢慢的气焰熏天起来。光绪初年，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劾宝名斋主人李钟铭，说他招摇撞骗，卖官鬻爵，带五品官服，出入宫禁，大概并非虚语。比这稍早，还有宝文斋一件公案。相传同治年间，五城都堂某甲路过琉璃厂，车盖擦着宝文斋书铺的挂牌，将牌招碰了下来，店伙一哄而出，拦住不放，非要这位都堂大人亲自下车挂好不可，都堂也只得从命。不过这是极个别的例子。大部分掌柜都如《旧京琐记》所说，宁愿保持一点“书卷气”，学学斯文样子，决不肯当面得罪顾客。

继李文藻之后，缪荃荪又作《琉璃厂书肆后记》，追述自同治丁卯(1867 年)至辛亥革命一段时间内的情形。从书店本身来说，此起彼落，沧海桑田，变化的确很大，但厂桥东西，仍然是图籍集中之地，嫏嬛风光，不减往昔，两记在这点上没有什么区别。20 年后又有人作《琉璃厂书肆三记》，1963 年 5 月号的《文物》上，还发表了《四记》，说明自 1912 年至解放初期，大致状况还是如此。

前年 10 月，中国书店自国子监迁至厂甸，这本是合营后的一件大事，我因事没有前去参观。去春过海王村，才知公园旧址，重经修葺，中间坐北主楼，放着善本珍籍，左右

两厢廊屋，迤逦而南，狭长如双臂平举，室内纵横列架，满眼都是图书，近肘处各有圆阁，看书的人可以在这儿休憩。腕以下折而相向，两肆并列，铺面临街，一个叫做翰文斋，一个叫做文奎堂。街上除了原有的来薰阁、邃雅斋、松筠阁等之外，又多了这两家创设于光绪年间的老店，而园内面积，几乎抵得上20家书铺，一时车马盈门，看上去的确热闹得很。

但我觉得真能给琉璃厂带来新气象的，却不是这些刚刚开辟起来的铺面，而是正在铺子里边活动着的人。他们已经由书贾一变而为书业工作者，重要的不是写文章的人大笔一挥，换了称呼，而是他们自己由衷地感觉到了这个改变的意义。书店的经营方针不同了。本来是为少数藏书家服务的，现在却是为学术服务，为研究工作者服务，为大众的文化需要服务；本来是秉承掌柜的旨意，一切为了赚钱，现在却知道了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解放前经常为我送书的书店学徒，合营后重又遇到，不知怎的，对我就像一家人一样，仿佛格外亲热起来。

由于研究项目的变动，近几年来，我买的主要是“五四”以来的旧书，尤其是期刊。我有一种想法，要研究某一问题，光看收在单行本里的文章是不够的，还得翻期刊。期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时期内的社会风尚和历史面貌，从而懂得问题提出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在当时的反应和影响。这样，我和古书的关系比较疏远了，每到厂甸，常去的两家是曾经刻过《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的邃雅斋和补刻了续编的松筠阁，这倒不是因为我对鞠部怀有好感，因此连及书店。邃雅斋如今经营的是“五四”以后的旧书，不过好的很少，浏览一转之后，如果时间许可，自不妨在附近几家出售古书、

碑帖或者笺纸的铺子里走走，否则的话，那就往东直奔松筠阁。松筠阁专营期刊，曾有“杂志大王”之称的刘殿文老人，年逾七十，现在是中国书店期刊门市部主任。据说他年轻时常跑西晓市，为人配补期刊，随见随录，辑有《中国杂志知见目录》稿本12册，目前每周一次，在店内讲解这方面的目录学。后起的有王中和、刘广振等，王中和新旧版本，都有素养，刘广振是刘殿文老人的儿子，记忆力强，对期刊知道的较多。过去头本不另售，书店准备逐渐配全的刊物不另售，现在如果确知为研究需要，或者顾客手头已有的期数远远地超过于书店所有，也肯破例成全。有些一时不易访求的期刊，书店还能根据多年来售货的线索，代为借用，譬如我要了解外来文艺思潮对“五四”初期文学社团的影响，需要翻检一下绿波社、艺林社、弥洒社、骆驼社、浅草社、白露社、飞鸟社、髯簾社等主办的刊物，就从松筠阁那儿得到了不少的帮助。

至于单行本书，我所需要的大部分得自东安市场。除了厂甸之外，隆福寺、西单商场、东安市场都有中国书店的分号，兼营着线装古书和“五四”以来的旧书。星期假日，谁如果愿意把时光消磨在里边，慢慢翻检，也常有好书可得。东安市场还经营按照机构和个人的需要，代留一些书籍，先送书至家，由买主挑定后再开发票，这样既有选择余地，又可从容核对，避免与已有的重复，完全是一种为顾客着想的好办法。给我送书的王玉川，大家叫他小王，解放前在春明书店当学徒，为人勤勉诚实，知道顾客要买什么新书，本来不是他份内的事，也愿意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千方百计地代为买到。近年以来，我得了心脏病，养成早起习惯，燕都入夏，晨凉如水，趁着朝暾未上，时而策杖街头。有好几

次，看到小王骑着自行车，车座上驮满书籍，在清晨的几乎是洗过一样的长安街上，疾驰而去，很快地消失在远处的绿树荫里。我心里不免充满赞叹：这么早，这个年轻的传播文化的使者，又在执行他的任务了。

写着写着，想不到竟从书房写到街头去了，这在文章来说实是一种破格——也就是不成章的意思。关于北京书市，前人已经写过不少诗文，记得最受赞扬和常被引用的，好像是潘际云的一绝：

细雨无尘驾小车，
厂桥东畔晚行徐。
奚童私向舆夫语，
莫典春衣又买书。

典衣买书，原是会有的事，但一定要让奚童与舆夫私语，终不免带点大老爷口气。直白地说，我不喜欢这首诗，这大概也是自己只能写些破格文章的缘故吧。前后一数，共计8篇，因谓之“八记”云。

访书琐忆

黄　裳

几十年来胡乱买书，颇有些特别的经历，不易忘记，当时就随手写在题跋里，闲时重看也觉得有趣，常想记录一点下来，大概也可以算作“书林逸话”之类。说起题跋，自来就有学术性与随笔性两大类。学者重视的是前者，考辨故实，校订文字，有功于学术研究，历来被看做题跋的正宗。但在我自己，喜欢的却往往是后者，而其代表作者则是黄荛圃。他的藏书题记经缪荃荪、吴昌绶等搜辑重刻，有煌煌10册之多。看那内容，虽然也谈板本，雠校，但更多的是记书坊、书友、藏书家故事的“闲言语”，而这是很为许多学者所不取的。黄荛圃先是买书、刻书，后来又卖书，还开设了滂喜园书店。商人当然要重视广告，在黄荛圃那个时代，还没有近代流行的种种广告手段，于是有人就说他的题跋也就是广告。这很丢了读

书人的面子。遭到讥笑是当然的。不过我觉得这种指摘并不公平。黄荛圃在题跋中总是直白地记下了书价，书籍的抄刻先后，是否善本，是全本还是残帙这些细节，而这作为广告是不合适的。因此我怀疑他在买书的时候，是否就先已算计着出卖、获利。

真的把题跋、目录做为广告手段的是缪荃荪，那已是比黄荛圃晚 100 多年的清末民初。古书作为商品，有了更广阔的市场，大官僚、大商人、大地主为了积累财富附庸风雅也纷纷收罗古本，日本、美国的“洋庄”生意也日见兴隆。缪荃荪的办法是刻书目，每当他聚积到一批书以后就急急的刻“艺风堂藏书目”，在每种书后面附加的板本说明，就大有广告气味，夸张的语句是经常出现的。从许多实物看，这种说明常常有错误；但并不是缪荃荪的鉴别力特别低下，只是他千方百计地想把这些书说成不可多得的宝贝而已。他的藏书目录一刻再刻，以至三续，这就给书坊开了先例，纷纷印发书目，变木刻为石印，出板更为迅速，成为不折不扣的广告了。

继缪荃荪而起的有傅增湘，他先后刻成了几种书目与题跋，而尤值得注意的是不久前出版的他与张元济的通讯集。这是比题跋更为直白的经营古书业务的纪录，不但保留了大量古书流转的珍贵史料，也更暴露了藏书家活动的真相。

以上说的都是旁人的事，与我本来无甚关系。不过天下事有时确是不可思议，20 年前承蒙一位熟人揭发，说康生有话，我在书前书后写的许多题跋都是企图“以伪乱真”的手段，目的则是投机倒把。因此造反派就要细查、追查，责令我细细交代历年所买的书，每本的进价……这可是个艰苦的任务，只能坐在牛棚里苦苦思索，这时最容易记起的就是

买书中一些有趣的经历。按照指定的前提，加以点染，是可以制作出符合要求的货色来的。当然，在“创作”过程中常常不免背离了真实，带有“哗众取宠”的趋向，则是难以摆脱的“历史局限”。自己虽然不满意也没有法子想。从这里是可以悟出“报告文学”写作的困难的，特别是个人的回忆，无论是痛骂或夸赞自己，都只能表现出扭歪丑恶的面目。这些“创作”的故事已经找不到了，并不可惜，不过作为“创作”的教训失误，总是不应忘记的。

1953年的秋天，我在杭州住了两个月。有很多时间就消磨在书店里。住处在里西湖，出门叫一只小船横渡过去就是湖滨，上岸以后沿解放路走入新华书店，又从这里走到延龄巷、丰乐桥、清河坊，这些地方都零零落落开设着一些书坊。当时旧书业很不景气，货色也少得可怜。有一天踏进了抱经堂，店里空空地没一个顾客，只有女主人抱着小孩在看守。案上摊着零碎的破书，真是一无可观。这时发现书架背后一叠叠放着许多残书，大约多年不曾触动，书上的灰尘也有寸把厚了，抽出两本来看，多半有结一庐的印记，真是意外的高兴。选了半日，得书一叠，问价付钱，正要离开时，店主人一步踏了进来，立时惊惶失色，打开纸包，一一检点，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卖了。最后讨价还价，以10倍于原价成交。还被抽下了一本吴枚庵抄的《百川书志》残卷。在这中间，他还大声地叱责着主妇，使她几乎哭出声来。

塘栖朱氏的遗书本来藏在杭州，后来把重要的善本移至上海，残零书册都就地处理掉了，这大概就是这些书流落在旧书店头的来历。书并不珍贵，只是这点流转因缘很值得纪念。现在还在手头的是蒙古博明希哲所作的《西斋偶得》3

卷，《风城琐录》1卷，《西斋诗辑逸》3卷。嘉庆辛酉刻本，纸墨明净，是刻成后最早的印本。书前有翁方纲的序文和手书上板的"附识"，知道这是心斋(广泰)为妇翁刻梓的遗集。更难得的是书前有"大兴翁氏石墨书楼珍藏图书"的朱文大方印。可知是书刻成后持赠翁氏的本子。在卷尾还有墨书一行，"甲戌仲夏叶老诜借看一过"，下钤"平安馆印"白文方印。甲戌是嘉庆十九年，是书刻成后的第十三年。叶东卿是藏书家，还不能不从翁方纲展转借读，也可见此书流传之少了。

杭州丰乐桥堍有松泉阁书肆，主人王松泉与阿英相熟，是颇有眼力的书业经营者。那年秋天，在他的店里买到不少清代杭州诗人的集子，携归旅寓，颇能驱遣岑寂。清人别集那时真是贱如泥沙，可惜当地的图书馆不加重视，听任这一大批地方艺文流散毁弃了。杭州也真是文风极盛的地方，乾嘉以还竟自出现了那许多诗人，当时雕板的工值又贱，刻集成了一时风气。当然这中间缺乏第一流的诗人，但也有名姓不彰、著作自有分量的作者。如王曾祥的《静便斋集》就是那时所得。他的两篇吴梅村集书后就是我所见仅有的对吴伟业的严肃评论。

也是在松泉阁，前一年的冬天曾经见到一册明初黑口本的《睎颜先生诗集》，写刻，字体静雅朴厚，黄皮纸印，是浙东汤氏藏书。当时钤有汤氏印记的旧书，狼藉市上，比论斤的市价高不了多少，但这本书却为主人看重得非常，认定是元板，因为原书卷前只列编录校正人姓氏，没有撰人题名，而在陈颀的前序中却有"公讳翥，字仲举"的话，所以就确认这是元代著名诗人也字仲举的张翥的遗集。我翻看序文，发现中间又有这几句，"若礼部尚书致仕杨公，其颜之徒欤？

公苏人也，……”就说这是一位明代姓杨名翥的诗集，主人听了不大高兴，立即将书收回去了。转过年来的秋天，又走过松泉阁，主人一把拉住我，说那本黑口本不曾卖掉，是特为我留下的。劝我一定要买下，价钱虽然依旧很贵，但已不再坚持是元板。于是就买下，回来细看，才知道卷尾被割去了4行，已用旧纸粘补，虽然是个残本，不免有点懊恼。不料下一个春天再到杭州，书店主人却高兴地对我说，上次买去的是个残本，不过下半已经发现，还是劝我一定买下，凑成全璧。这次我不再迟疑，用比残本更高的价钱买下了。

这书前面有两方旧印，“金星轺藏书记”和“汪鱼亭藏阅书”。知道是先在文瑞楼后归振绮堂的。查稿本《振绮堂书目》，有这样的记载：

“睎颜诗集，不分卷，二册。刊本。金星轺藏，后归曹倦圃。明杨翥撰。字仲举，吴县人，官至礼部尚书。”

这里说书曾归曹溶，却不见旧记，今汪氏印上有挖补痕，灭去的大约就是曹氏藏印。流传次序也应该是曹氏在前才对。值得高兴的是，这书藏在汪家，在太平天国战役中失散，分别为两家所得，又都未因残帙而弃去，终于在整整100年后得以重圆。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我过去也曾有几次用先后买得的残卷配全成书的经验，不过那到底是拼配，是百衲本，与原是一书的分而复合是不能相比的。

诗集以“在朝”、“纪行”、“述怀”、“游览”……等若干细目分类，诗语平稳，缺乏特色。朱竹垞《静志居诗话》说：“睎颜集借之琴川毛氏，蒙叟为施铅评，云宜亟焚毁，勿暴其短于后世可也。”可以看出钱牧斋的豁刻，连竹垞也觉得他“未免太过”了，还是在《明诗综》中选入了两诗。余淡心《东山谈苑》也记有有关作者的故事，原来他是因为曾让馆于

流寓武昌的杨士奇，后来士奇当国，“乃相引拔，官至尚书”的。梁维枢《玉剑尊闻》也记有他的一段故事，“邻省作檐沟注水于其庭者，则曰晴日多，雨日少。”说他是深通黄老之术的人。

上海复兴中路淡水路口曾有一家春秋旧书店，主人严氏，能装书。解放之初书市寥落，生活困难，我曾请他修补过旧书。有一天他对我说，过去他曾在宁波一家人家装书，这家的主人不懂书但喜收书，只要送到门上，不论完缺一律收入，出价大约是明板白棉纸书每本一元。因此得了个“垃圾马车”的绰号。不过当时宁波市上的好书是很多的，散出的浙东故家藏书集中在这里，天一阁流出的书也常常可以遇见。所收满满的一屋旧书虽然大半是残本，但确也有不少好书。现在主人已经 80 多岁了，住在上海，藏在宁波的书已先后给族人论秤卖出了不少。他取得主人的同意，可以到宁波去收书，不过缺少盘费，向我通融。我就借给 50 元，答应书到之后请我来看，选中的书作价折回借款。

大约 10 天以后书由轮船运到。一起大约有几十麻袋，只好堆在书店隔壁的弄堂里。我得到消息后去看书，从清晨一直看到过午，弄得两手如漆、混身灰土。书大半是残书，明本不少，但没有一部全书。当时我正收集明刻书影，大量的残本正是绝好的素材，就选了几十种。偶然在书堆里又发现了一包书，包皮的报纸已经发黄变脆，细白皮纸的原书却一些都没有损坏。这是 4 本《王状元标注唐文类》，明铜活字印本。卷首大题下次行题“祁东李氏铜板印行”。这是很少见的明初活字本，祁东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过去的书目里只瞿中溶的《古泉山馆题跋》中曾加著录，也不能确定祁东的地

位，只是推测而已。原书4册，每册前有“春、夏、秋、冬”的签条，还保留下两纸。看铜模字体，扁体写刻，与苏南一隅的安氏华氏活字的风格不类，与较早的唐人小集等更是不同。这4册书却是全的，可以算得这次所得书中的白眉。全书别无藏印。《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了同样的一部，则是劳权、徐渭仁的旧物，现不知流落何处。

这一次的买书经过大略如此，但在10年动乱中却成为一件大案。据说我曾到宁波去贩书一船，其中有多少种宋元本，发了大财云云。历数多年买书的经验，要算这次惹出的乱子最大了。

我的买书，正是有啥买啥，杂乱得很。买来的书也未能本本细看，总的印象是，旧书中间多的是封建说教的陈词滥调，偶尔发现片段的好意思，好文字，可真像披沙拣金那样的繁难。不过换一种眼光看，这又是可贵的资料，真想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不能不从这里着手。杂和乱并不是坏事，只有这样才有希望较能窥见全局。

抄写旧时的记忆，实在也是很无聊的事。在今天的书市上，旧书已经不再可能遇到。几十年中间，有的化为灰烬，有的变成纸浆，剩下来的也大都藏在图书馆里，想看一下也不容易，因此这些访书的故事，也真的成为梦一般的故事了。

1986年5月23日

旧书梦寻

辛　笛

一个人是要有点“好癖”(Hobby)的，甚至积习既久，垂老难忘，而且也不尽然都是以无益之事，来遣有涯之生的。以我个人为例，平生最爱的就是逛书店，尤其是逛旧书店，往往一入其中，便好像有无数老友在期待着我良晤交谈，大有莫逆于心，相视而笑之感。

话说距今60余年前，那时尚在天津读中学，就常常老远从南开跑到梨栈的天津书局去看新书，记得我就这样地和《创造》、《洪水》、《语丝》、《北新》等刊物杂志结下了不解之缘。主持店务的那几位中年人，哪怕对我这么一个青年学生，接待也很殷勤亲切。相识久了，发现他们原来都是酷爱搞出版工作的知识分子，还为我提供不少方便，诸如预约、留书之类，真是有点亲如家人呢。也就是在这般时候，由于急切地要找一些杂志的 back numbers（过期

刊物)或缺号，便又留心跑起旧书摊、旧书店来了。可惜天津毕竟是座工商城市，在这方面是无法和近在咫尺的北京相比拟的。

随后到北京进大学读书，我逛旧书店的热望终于得到了非凡的满足，不过，由于念的是外国语文系，就把注意力转向西文书籍了。课余之暇，除整天泡在图书馆书库中，每到周末，从清华进城，首先总要到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几家专售西文旧书的书店如中原书局等溜它一圈，往往一个下午就在那里度过了。有时也常去琉璃厂、隆福寺的几家旧书店找几本古版线装书看看。路过有旧书地摊，也会驻足下来，流连一下。其心情正如深山探宝，其味无穷。

回想起来，那些年对专卖新书的英文书店却始终没有什么好感！那为数有限的几家，我也曾先后领教过，但实在只落得一例不高明的印象。天津，上海的伊文思是以卖外文教科书和文具为主，北京饭店附设的书店所备的书籍大都以供应外国旅游人士、传教士和所谓老“中国通”(old China hand)为对象，而上海的别发洋行(Kelly & Walsh)则是专门招徕大腹便便的洋商富贾作座上客了，没有多少具有高深文化水平或是典型文艺的书，完全不对胃口，再一看标价奇昂，折合当时外汇牌价总要高二三倍，显然是硬敲竹杠，这使我们这些年轻读者只好悻悻然而去矣！这期间，经过师友的介绍推荐，学会向英国伦敦的福艾尔书店(Foyles)和日本东京、东京桥的丸善书店写信打交道，要他们随时寄一些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旧书目录来，就是选中一些“二手”的文艺书，总是用C. O. D. (书到付款)的办法订购了来，这两家的邮购部服务得很好，没有让我失望过。

30年代中叶，我教了一年中学的书之后去欧洲读书。

在巴黎塞纳河畔，看到一排排旧书摊，一面看着圣母院建筑的入水倒影，一面听着秋风吹动书页画册的声音，深觉别饶风致，只是当时苦于自己的法文程度还是限于入门而已，远远谈不到沉湎其中的味道，这也是不无惆怅的事。待到了伦敦，一下火车，安置好行李旅宿，立刻奔向福艾尔旧书店，那情形就迥不相同了。由于本来有过邮购往来的关系，一见到好几层的唐楼的倒影，就仿佛是老相识了。店内分室陈列，书架高与壁齐，任人攀登取阅，内容丰富不下于一个中型图书馆。我踱进去，有时随身带上几片三明治当作一天的干粮，就不想出来了。

后来在爱丁堡的几年，当地的詹姆士·辛(James Thin)书店更是我每周必去两三次的处所。那地下室真是古香古色，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在那里，和在福艾尔一样，英国有名作家如哈代(Thomas Hardy)、萧伯纳(G. B. Shaw)、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巴蕾(J. M. Barrie)、毛姆(S. Maugham)、普瑞斯特莱(J. B. Priestley)等人的亲笔签名本随处都是，当然价钱也是动辄以当时英镑计，贵得惊人，不是我们所能问津的。我的兴趣所在倒是在那些书架的角落里，偶然拨开厚积的灰尘一看，正是一本心爱的书，说它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还不够，而更像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萍水相逢，直如梦遇，哪能轻易放过呢！每当黄昏时候，书店家都快上门了，我这才挟着书踱了出来。街上古老的煤气路灯已经点燃着了橙色的火团，远看像是萤火样的光，我踌躇满志地踏过了已经是秋雾弥漫的草原，回到侨居的寓所，拉起窗前的帘幕，便开始贪婪地翻阅起当天的狩猎物来，真是一卷在手，太上忘情，竟不知人间何世也！当然，也有时旁搜

博采，一无所获，废然而返，则又不胜其惘然了。

海外归来，一直在上海工作，遇有空闲，也总还是改不掉爱跑旧书店的习惯。解放前，福州路的旧书店如来薰阁、修文堂等，善钟路(今常熟路)上几家旧书店也总有我的足迹。那时在白色恐怖下，友好很少往来，却往往在这些书店里，不期而遇到一些同样喜爱买书的老朋友，其中如郑振铎、巴金、靳以、陈西禾等人。旧友之外，也常会因购书而结识了一些新知，像谭正璧老先生，我就是这样认识他的呢。

我买旧书的主要兴趣在于买来有用，也就是为我所用的书我才买。既不是为装点门面，附庸风雅而买书，如有些富丽堂皇的客厅里，总要摆上廿四史、四部丛刊，以至大英百科全书之类，实际上，书主人却不见得会去翻阅一下的；更不是为了博取“藏书家”的虚名而专为追求宋元名椠，甚至等而下之，不惜贱进贵出，从中取利，做一名精明的俗客。因此，一本心爱的书，我总是一经买进，便不轻易让手于人了。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到处横行，气焰迫人，认为中外古今书籍不外乎都是“封、资、修”，“知识越多越反动”论大有市场，在此情势下，只好忍痛毅然毁弃自有的积存书籍不少，盖所谓“争取主动”者也！逮后见到图片中毛主席书斋仍然是芸丛满架，则又有点嗒然若丧了。少年时，读到李清照写的《金石录后序》，略叙世间事物聚散靡常，似有前缘之意，一直在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如此也大可不必介介于怀了。可是，爱书成癖，到头来还是改变不大，可叹亦复可笑！近几年来，区区如我，又重新稍稍收集一些旧书来了。虽然如旧藏的木刻本明胡震亨的《唐音癸

签》、《黄鹤集千家注杜诗》等书一时已不可复得，但我终于在上海旧书店买到吴之振的《宋诗钞》，还是令我大喜过望的。何况，寒斋中除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之外，居然还保持着当年从爱丁堡詹姆士·辛书店中买来的一本小小的破旧的袖珍版(19世纪重印本)约翰生(Samuel Johnson)著的《英语字典》呢！为此不可无记，但也适足以表明1973年致钱仲书兄诗有云："结习可知终少改，年年枉说旧年非"之正确欤！

淘旧书

袁　鹰

前些时在《新闻出版报》看到一条消息，说“个体旧书刊摊在上海重新崛起”。作者写道：“漫步上海街头巷尾，你会发现个体户的行列里又崛起一种新行当——个体旧书刊摊。笔者近日到卢湾区一游，发现经营旧书刊的有近十家。”尽管这则新闻不无一点矛盾：既是“漫步街头巷尾”就能发现，何以偌大一个卢湾区仅有近十家？但我还是不禁为这个行当的“重新崛起”遥致祝贺。上海旧书摊，曾经吸引过一代又一代读书人驻足，将他们领进知识文化的海洋，并且在不同的港湾中找到自己的世界。

一排排木板条钉成的简陋书架旁，一只只肥皂箱改制的书柜前，一张张旧床板搭成的书摊周围，站满三三两两、你去我来的顾客。安详宁静，只有轻轻移动脚步的嚓嚓声和低头翻

动书页如春蚕吞桑叶的沙沙声。站得腿酸，就蹲下来继续看。找到称心的，讲好价钱，就满意地放入书包或夹在腋下，看了个把小时的书而不买一本，摊主也决不讲什么闲话。直到街灯骤然亮了，看书的、寻书的茫然抬起头，啊，天不早了！于是告别书摊，匆匆归去，明天下午再来。

这种淘旧书的乐趣，只有向40多年前旧梦中去寻觅了。想当年，中学到大学时代，课余的重要活动之一，便是淘旧书摊。这种“淘”，是普及的，低档次的，同搜求海内孤本、讲究宋版明版的藏书家们的访书不同。自然，有时候也会意外的发现珍贵的版本，比如作者签名赠人的，十年动乱期间抄家后流落到旧书店的极多，在那时却是罕遇的。有时找到一本久寻未得的书，那喜悦的心情，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境界不远了。

当时旧书摊集中的福州路、麦家圈、北京西路、静安寺，我都常去。复兴中路也有不少，但一来离家远，二来多是外文书，因而去得不多。去得最多的是爱文义路卡德路，即现在的北京西路南北侧石门二路一带，大约总有几十处旧书摊。这里地处市区中心地段，四通八达。书摊上大中学校教科书又占相当大比重。每到开学前后，总是挤满了学生顾客。有的自己细心寻找，有的干脆将书单掏出来交给店主，店主一看就明白有还是没有。那时学费和书价都昂贵，清寒学生是负担不起的。我的《三S平面几何》、《范氏大代数》和大学的英语课本，都是从这里淘到的旧书。

旧课本虽然解决了一些书费的困难，但那是暂时的，读完就丢到一边，或者再卖给旧书摊。最使我至今每想起来就有温馨如梦的情怀的，是淘旧的文学书籍。旧书摊有如那海上大轮船的一个个圆形的舷窗，从小小的舷窗里能窥到浩渺

无垠的大海。海涛汹涌，海鸥翱翔，气象万千，变幻莫测。上海，上海，对入世未深的青年学生如我来说，首先感受到的是广阔而又丰盈深厚的文化之海。古典的、近代的、五四时代的、30年代的、西欧的、北美的、东亚的、旧俄的、阿拉伯的，只要你有心，总能从那一堆堆简陋、灰暗的书摊上发现意想不到的文学矿藏。如果不打算立即买下，尽可以不慌不忙，从容阅读。薄薄一本诗集或散文集，站一会儿就能读完。实在翻不完，明天再来时，只要它没有被别人买去，还可以接着读。天长日久，兴趣越来越浓，犹如武陵渔人进入桃花源，曲径通幽，豁然开朗，目迷五色，欣喜莫名，就此被引上文学道路，也是常有的事。解放前我拥有的文学书籍，十有八九是从旧书摊上淘来的。而且一般来说，我都记得它的娘家在哪里。

那时家住沪西，每天经过万航渡路，必定在百乐商场一侧旧书摊前逗留一番。天长日久，同摊主渐渐熟识了。其中有位姓浦的吴江人，我和同伴称他为“浦家里”，他的摊上常有些新文艺书籍。有一次，摆出一套光明书局1942年第三版的《静静的顿河》，几乎是全新的，连封套纸都完好无损，价钱却也不低。我每天摩挲，实在爱不释手，但是囊中无有足够的钱，只好同“浦家里”情商，请他为我留着，我一定凑钱买下。“浦家里”够交情，见我心诚，答应先从架上取下，免得被别的买主捷足先得。他时常催问：“好拿去了哦?”我总是抱歉地笑笑：“再等两三天。”如是大约过了半个多月，终于等到一笔稿费，立即将四本《静静的顿河》捧回家，那喜悦心情，如同捧回一件稀世奇珍。“浦家里”表示友好，免费奉送一本小书，带回一看，是一本用小32开软抄簿手写的短诗集。但当时不晓得珍藏此类手稿，匆匆翻

阅一过，就丢在一边，并未去考证它的主人，后来也就不知去向。40多年来，住处屡易，当年保存的书刊，遗失殆尽，只有极少一部分一直跟着我，这部《静静的顿河》便是其中之一。见到它，就会想起“浦家里”那平顶头、高颧骨的面影和一口吴江乡音。倘若他仍健在，该是70以上的老翁了。

我盼望上海旧书摊的“崛起”能够广泛而持久。我一直认为，旧书店(包括旧书摊)未尝不是一个城市文化积累、文化素养和文采风流的标志之一。这些年回上海，总是抽空去一次上海书店，过一下淘旧书的瘾。有时也能买到几本好的旧书，但同当年淘的韵味全不相同。而且，若是果真有意寻访，还需带介绍信，找熟人，才得登楼入室，哪像过去那般悠游自在呢？因而将这条消息看了又看。他日再去上海，一定到沪湾区或者虹口区去温一番淘旧书的梦。

淘旧书

田　原

逛旧书肆、买旧书叫淘旧书。这“淘”字用得太准确了。常逛旧书肆者，才有这个“淘”的体会。在众多的旧书中，“淘”得一本好书，真如“沙里淘金”。有时“淘”得腰酸背疼，眼花缭乱，却“淘”不到一本中意的；可有时竟能“淘”到一本梦寐以求的好书，真如“淘”得一块金子！

我虽幼年失学，但从小却养得淘旧书的习惯。

在七八岁时，我父亲开老虎灶(即熟水店)，店面的半间，借给一做烧饼、馒头的，这店的老板极喜欢我，因此他每次称进成捆的旧书(垫烧饼、馒头用)就任我去“淘”。这是50多年前的事了。这些旧书真是五花八门，有木刻版本，有线装石印本，有洋装本，有平装本。当时我实在太小，幼稚无知，只是“淘”看得

懂的。最初“淘”的是石印唱本，如《王清明合同记》、《梁山杯》等，(“杯”字可能是“伯”字，恐是民间老艺人口传时误录。)大都是二二三，三三四一句的唱词，什么“鼓儿一打开言道，诸公听我说根苗”之类，其中还夹杂些道白。

这种“淘”书，持续三四年，直到店铺被日寇炸毁为止。其间“淘”得：《七侠五义》、《小五义》、《施公案》、《彭公案》、《罗通扫北》、《济公传》、《三国演义》等，还有一部残缺不全的线装本《聊斋志异》，文前有插图，是王渔洋批注的，记得最牢的，是卷前王渔洋的诗：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似丝，
聊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从少年到青年，除谋生外，淘旧书是我生活中的大事。

在上海，住南市城隍庙附近，一度在静安寺为犹太人画漆画。城隍庙到静安寺，只要见到旧书店、旧书摊，就一路“淘”去。这时“淘”的书较多，但大都是文学艺术方面的，有关名人传记方面的。因为当时无钱求学，也无专长，只有看这些书，来为自己打气。如：罗丹、米开朗琪罗、贝多芬等的传记，还有一本叫《苦儿努力记》的，都看得入迷。文学方面，“淘”的有冰心、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等人的小说集、诗集，继而“淘”鲁迅、邹韬奋、老舍等的书籍；同时还“淘”外国文学书籍，如《爱的教育》、《茶花女》、《福尔摩斯侦探案》、《汤姆沙耶》、《我的大学》，还有契诃夫、莫泊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其它还有金石碑帖等。

解放后，到了南京，那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当时夫子庙是旧书肆大本营，每星期非去不可。我住新街口，一早出发，直奔夫子庙，从大成殿的两旁旧书店“淘”起，一直到明远楼旧书地摊。吃些点心充午饭，再到杨公井古旧书店，

最后到文化宫隔壁的新华书店，然后“打道回衙”吃晚饭，终年不断。或遇要事去不成，那这个星期心里就不舒坦，好像损失了一大笔财富。

这时因为有了固定工作，手头钱也有点剩余，“淘”的书籍字画，就较丰富了。而且涉及了一些木版本书籍、拓片字画真迹等。大大地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

可是我只是个囊中羞涩的“穷”淘书者。“富”淘书者，要推淘书老将鲁迅、郑振铎、阿英先生等。鲁迅先生日记中查看，他淘的书，完全可办个图书馆。我喜欢搞点书法，也买了些碑帖，仅从淘碑帖这方面比较，他淘的碑帖名称，大都我还没有见到过。郑振铎和阿英淘得大量的宋元明清的版本，弥足珍贵。

近年来旧习未改，仍淘书不迭。当然不可能淘得古旧珍本，只能淘些自己看得中的。最近淘得《田中娟代》、《乙羽信子》传记，还有大量的杂志。

我曾作过一首不像样的诗，名：《书》，发表在湖南一本杂志上。

现抄录如下：

你在我的案前，
你在我的身旁，
你在我的枕边，
你在我的心上！
你是密友，
你是知音，
你是亲人，
你是生命！
一日不见彷徨，
两日不见神往，
三日不见情伤，
四日不见断肠！
幼年时朦胧，
青年时启蒙，
中年时情通，
老年时珍重。
你赐我的情义啊！
似海深，比山重。
我甘愿活在你
身边，
死在你的怀中！

读书志

郑振铎

余今晨得明刊本澹生堂藏书训约一册，不禁大喜，快读数过，余味若犹在舌端。此诚是真藏书人，真读书人之精神也！语语浅近，而无不入情入理。天阴欲雨，清晨皆消磨于斯。饭后微雨，地膏润若暮春时节。余欲访叶某，商购若干明人集残本，便冒雨至中国书店。心头犹带轻快之感。未遇叶而遇石麒。桌上堆满乱书，多为友人某君托售者。好书已去不少。余亦选购数种，皆诗人小传之属。此类材料，至有用。正选时，石麒打开一包云："此为某先生所托售者"。内为兰桂仙及读书志二书。兰桂仙，余已有，遂置之。细阅读书志，正似将祁承㸁读书训扩大数倍之物。不分卷，却分"好、蓄、护、专、癖、慧、适、友、助、激、观、遇、闰"13 部。周氏编纂此书时，与读书训刊刻时间相差不过 5 年，或者受祁氏影响

而纂辑者，采摭颇富，而皆不注来历。仍不免明人纂书通病。但甚罕见；亦足为好书者案头常备之物。一日而连获此二书，颇自喜“书”运之佳也。

皇朝礼器图式

郑 振 铎

一书遇合之巧，殆无过于余之收得皇朝礼器图式。初，余在中国书店，见平贾王浡馥打包寄平之书中，有残本皇朝礼器图式9册。略加翻阅，见其印本甚佳；衣冠之花纹，毛片，极为细密光致。虽非上乘之版画，然殊精工可爱。便对店中人云：此书余欲得之，可留下否？数日后，再过之，闻此书终于寄去。余心殊怏怏！但店中忽复收得此书五册，石麒云：此五册足配前九册，系从同一家散出。余即收得之。并嘱其作书至平，将前九册寄回。10日后，书果寄来，惟已3倍其售价。然余竟收得之。此14册，装璜一律，果是一书。细阅之仍缺四册。私念：此一书将终无能配全者矣！顷于旁晚过传新书店，与绍樵闲谈。见某贾正以残书一包，与绍樵论价。中有残本三才图会数册，绍樵指以示余，云：郑先生正收三

才图会，此数册可售予之。余颔之。复翻阅他书，忽见有礼器图式四册杂于其中。余立检出，讶其装璜与余所得者酷似，即询其从何处得之。某贾云：与前售予平贾之九册同出一家。余知其必为所佚之余册，立与论价，得之，持归，与前14册合之，果为一书，竟完全无阙。深叹其巧合！夫时近2月，地隔平、沪，书归3肆，余乃一一得之，复为之合成全帙，快何如也！书之，不仅见余访书之勤，亦以见有心访购，终可求得。费一分力便得一分功。一书之微如此，学问之道亦然。然在劫中散佚不全之书多矣！此书固幸，却亦为无数散佚之书浩叹无穷也！

1941年

买《太平广记》记

孙　　犁

我第一次买得的《太平广记》，是扫叶山房的石印本，共 4 函，32 册。其中短缺两册，用两本《人海记》充衬着。书是从天津劝业场三楼藻玉堂买的，当时的掌柜，是深县一带口音，他诚实地告诉了我这个情况，并说："闲看去吧，不好补。"

回到家来，把书装订整理了一下，也没有仔细读，就放起来。文革以后，所抄书籍发还，我把这部书，送给了韩映山同志。这部书，我买时价钱 5 元。

对于这部声名显赫的书，我有了这部残缺的石印本，还是不甘心，后来又在天津古籍书店和平路门市部，即过去的泰康商场楼下，买了一部小木板的《太平广记》，木夹，共 8 套，64 册。书是山东开雕的，字体倒也清整，只是纸张不好，是一种很薄的黄色土纸，就像乡

下用的烧纸。前两册，还有些圈点、批注，是原阅书人做的，弄得纸面很不干净。书籍发还以后，这部书送给了李克明同志。其实这些同志，并没有版本之好，对于这些古董玩意儿，一定不会喜好的。这部书，我买时，价钱18元。

这种小木板的《太平广记》，我还见过广东的一种刻本，虽系白纸，但字体漫漶过甚，还不及此本清晰。

买书的欲望，和其他欲望一样，总是逐步升级，得陇望蜀。我又托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旧书店觅购明刊影印本的《太平广记》。不久，书籍寄来，共10函，60册，宣纸印刷，磁青书面，丝线装订，雍容华贵，不可言状。价100元。据书店人称，茅盾同志亦在寻找此书，因我登记较早，故归我所有。此书抄家后，被列为珍贵二等，发还书籍时，示意我“捐献国家”，我当时答称，业务所需，不愿捐献，请按政策办事。执事者遂把书还我，书尚完好，只是碰掉几个骨签。

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的《太平广记》，我也买了一部，是1961年印本，纸张稍黑。近年我们排印的古籍，虽所据为善本，然因校对工作搞不上去，常常事与愿违，不能令人满意。

此外，在50年代，天津僻静街道上，常有书摊，在北大关一胡同中，我曾见明刊本《太平广记》十余册，蓝色虎皮宣纸封皮。我有洁癖，见其上有许多苍蝇粪，犹豫未买，遂为会文堂主人买去，失之交臂，后颇悔之。会文堂在夫子庙街，主人为清朝一宦官，时常挟一青包袱，往来于早市冷摊，精于版本之学。

冷摊得来

姜德明

寒斋的书橱前，从来不敢贴这样的告示："自用书，不外借，请原谅。"但，我理解在书橱前贴此类告示的主人的心情，非常羡慕这种直言的勇气。

我的很多藏书都得自冷摊，买时花不了几个钱，想不到日后竟成了"海内孤本"，身价倍增。比如狂飙社的高长虹，1926 年他在北京编过一种小型的杂志《弦上》，是极小的 64 开本，每期仅几页，很多研究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人都不曾过目，仅仅知其名而已。某年，我吃过午饭之后，照例去东安市场的旧书摊漫步，无意间得到了这个小刊物的合订本，只用了 8 角钱。后来唐弢、陈漱渝同志先后借用过。去年高长虹的家乡来人，要印行高的文集，他们又借去复印了几份。果然按时还来了。"文革"当中，我到天津出差，顺便到当

时设在东门内文庙的旧书店去看书。那是个内部门市部，正殿、侧殿里都有旧书，书价也不贵。其中署名马天安的剧本《出狱之后》，是个薄薄的很不起眼的小册子，只用了 4 角钱。回到北京便放在旧书堆里了，多年不曾翻动过。直到前几年，我在编邓颖超同志的《纪念与回忆》时，才发现马天安就是马骏烈士的笔名，剧本正是在天津出版的。当年马骏与周恩来等人一起组织觉悟社，共同领导了“五四”时期天津的学生运动，后来还担任过地下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待我就此写了一篇书话之后，远居西北的马骏烈士之子来信说，他第一次知道父亲写过剧本，要求借阅。此外，写过《马骏传》的作者也来信说，不知此事。当马骏烈士的孙子还回我的藏书时，他说已经复印了几份，还诡秘地使了个眼色：“您当年花几毛钱买的旧书，现在成了革命文物了。”我深为这位年轻人懂得旧书的价值而欣慰不已。

60 年代初，北京中国书店在国子监设有旧书门市部，进门需要购书证，实在是个好去处。阿英、唐弢是常客。那时唐弢正在西郊主持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有周末才回城，我则天天上班，只有星期日上午才能去看书，所以我们常在这一天碰面。阿英同志几乎天天到，竟连星期日也不漏，有这种痴劲儿的人，现在见不到了。我在这里买到一本在当时来说可买可不买的书，那是土纸印的 64 开本的《缪弘遗诗》。书很薄，作者又名不见经传，结果花了 4 角还是买来了，主要为着前面有李广田的一篇短序。这是西南联大一位学生的诗集。前些年，碰到李先生的家属，知道他们正编李先生的文集，一问果然漏收此篇，便借给他们抄补进去。青年朋友刘君，志在编撰《中国现代新诗目录》，他的腿很勤，跑遍了各地的图书馆，有好几本书却只见其目，《缪弘

遗诗》和闻一多作序的《三盘鼓》即是。我借给他这两本书复印，他高兴得跳起来。我受到他情绪的感染，俨然以为自己真的拥有了金矿，飘飘然了许久。

事情还没有讲完，友人王景山教授，为撰写西南联大文艺社团的回忆录，也来找我借《缪弘遗诗》。我把书寄给他，他回信说——

“缪弘和我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同系、同级，又同是当时联大文艺社社员。捧读这本诗选，40 年前事，历历在目。这本诗选，当初我们都有的，但后来经过复员、解放，以及历次运动，大都没有了。现在竟从兄处看到，真可谓有缘矣。但更值得为兄一说的是，今天上午我已经把诗选拿给扉页署名‘少伟’的那个人了。”

真有这样的巧事，景山兄说，这位原书的藏主“少伟”也是西南联大同学、文艺社成员。他是夏衍同志的女婿，已故女作家赵慧琛的胞弟。赵女士在 30 年代演过电影《马路天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景山兄等都各自复印了一份，并将原书还我，说来这已经是 1986 年的事了。

我感谢这些找我借书的识者与不识者，他们都给我带来愉快的回忆，也不枉我多年来在冷摊前耗费的光阴。他们也没人强索我的藏书，因为连我也感到，他们保存那书也许比我更有理由。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这种尊重别人的感情是美好的。我还遇到过这样的借书人，以为我是图书馆，什么书都应该有。我说没有某本书，对方冷冷地一笑：“你再找找看么，何必说得这么肯定。”我想糟了，人家不相信我了。难道人世间还有比不被人家信任更难过的事吗？

旧书新得题记

梁　　永

一、两本《大马戏团》

三年前，也是冬天，我从上海书店里买到一本师陀著的四幕剧《大马戏团》，是解放前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列为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八辑中的一种。

《大马戏团》是师陀的名著，曾在孤岛上海多次上演，受到观众的欢迎。师陀自己说：靠这个剧本所得的收入曾帮助他度过艰难的日子。

解放后师陀因为这个剧本写得过于灰暗，曾于60年代初进行修改重写，但尚未来得及出版，就来了“文化大革命”，修改稿本被抄家时抄去，以后也未发还，大约是丢失了。

抗战时的那个旧本是师陀不愿重印的。

我在旧书店里购到这本旧书，仍感到欣喜，便拿去找师陀先生，请他在书上写了个小小的题记：

蒙梁永同志购得此册旧书，谨签字留念。

师陀 1987 年元月 17 日

想不到 1988 年也是在上海书店，又买到第二本《大马戏团》，虽是旧书，却比去年的那个第一本更整齐些。

但师陀先生已于去年十月去世，想到这次我来上海后，前几天曾去师陀家慰问，师陀夫人陈婉苍同志谈到师陀去世时泪下如雨的情况，感到人生真是如梦如烟。我只能以他们的儿子庆一将来从美国学成归来，必能光大门楣，后福可望来安慰她。

如今面对这第二本《大马戏团》，想到师陀已经音容具渺，想请他再写一篇题记而不可得，不禁悲从中来了。

二、《洪水》中的《昙花庵》

这两本《洪水》合订本算不得是旧书，因为是上海书店近年影印的；而也可以算是旧书，因为影印出版时我未买，这次是从上海书店旧书部购到的。像这样情况一般打八折，而这两册《洪水》，成色较旧，故按七折处理了。

我买《洪水》主要是为了二叶(叶灵凤与叶鼎络)，更主要是为了叶灵凤，为了他的文章，也为了他的插图。而尤其吸引我去首先翻看的，是发表在《洪水》第 8 期(1926 年 1 月 1 日出版)上的那篇小说《昙花庵的春风》。

首次读到这篇小说，是我读初中一的时候，年才十一、二岁，在 20 年代末期。那时我读一家私立中学，同班学生有大有小，我在班中是年纪最小的。

当时国语课的教材由教员自选，油印发给学生，我们的国语教员姓李(已忘其名)，是个醉心新文艺的人，他所印发的国语教材中即有《昙花庵的春风》一篇。

那时我还在读《小朋友》、《儿童世界》水平，对《昙花庵的春风》哪能领会得了？只是《昙花庵的春风》这个篇名，却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数十年不忘。

到现在约60年了，如今再得重读，重温儿时旧梦。

近年我早有找到《昙花庵的春风》重读的打算，可是找来找去，各小说选中选用叶灵凤的都是《女祸氏的遗孽》，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的是他的大众小说《时代姑娘·未完的忏悔录》，《现代》杂志影印本上有他的《紫丁香》等新感觉派小说，《昙花庵的春风》一篇却始终未能找到。

这次重读后，我认为篇中写少年女尼性的觉醒很细致，心理刻划入微，无怪20年代的李先生欣赏它，并选它为教材(但作为教材,又未必合适)。

上海书店曾将叶的《灵凤小品集》影印出版，希望能将姊妹集《灵凤小说集》也影印出来，供大家阅读研究。

三、未校正前的《边城》

《边城》为沈从文先生小说名篇，近年各种沈从文选集中均有之，且有江西人民出版社百花洲文库单印本。但近年所印，大抵为校正本。

今我所得为初印本。《边城》完成于1934年4月19日，是连载于《国闻周报》，1934年10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为“创作文库”之九。我的这本为1937年5月第三次印刷者。

生活书店的“创作文库”，为36开小本，封面为绿色虎

皮宣式图案，上以深紫色印作者书名手迹及签名，外罩透明纸外封(另有精装本)，内每页竖印十行，疏朗有致，精美可爱。现上海书店影印的几本“创作文库”(如朱湘《中书集》、吴组缃《西柳集》等,)，将开本放大为 32 开，封面改为纯绿色底子，无复原生活书店本之喜人矣。

按，沈从文与张兆和于 1933 年 9 月 9 日结婚，《边城》写成于次年 4 月，正沈氏沉浸于新婚后幸福日子之时(这段生活情况沈氏于 1936 年结婚三年时曾写有小说《主妇》加以描述),故《边城》写得特别美妙动人,这与其心境不无关系。

《边城》经 1940、1957、1981 年三次校改,虽所改不多,但初印本仍值得保存。我所得的这本,书且甚新,弥足珍贵。

沈氏逝世后,挽文挽诗挽联很多,我欣赏施蛰存氏的挽联：

沅芷湘兰一代风骚传说部
滇云浦雨平生交谊仰文华

又，施蛰存 1937 年于湘西辰溪渡口所作的一首七律，咏及沈氏，亦凄婉可喜，录于此：

辰溪渡口水风凉，北去南来各断肠。
终古藤萝牵别绪，绝流人马乱斜阳。
浣溪坐老素足女，捉棹行歌黄帽郎。
湘西一种凄馨意，彩笔争如沈凤凰。

(沈氏为湘西凤凰县人,末句故云。)

一联一诗，足徵两人交谊之深。

四、二十年代旧《菊芬》

无锡市的西河头是一条不宽的街道，它东接中山路，西

连解放西路，正在闹区中间。现在西河头是小商品交易市场，街两旁排满了各种摊贩(尤以卖衣服的为多)，狭狭的街道更为拥挤了。

西河头路北，正在摊贩后面，有个一间门面的梁溪旧书店，不注意是不会发现的。它与中山路的无锡古旧书店有分工，后者卖新印旧籍，而梁溪旧书店卖回收书籍，以及处理的减价书。

回收书籍中自然以近年出版者为多，但偶尔也能见到几本解放前的旧书。我从中购到过蒋光慈的《菊芬》和洪深、马彦详译的雷马克著《西线无战事》(两书均为20年代上海现代书局版)以及傅东华编《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30年代纸面精装本)。

我尤其喜欢这册《菊芬》。这个中篇小说虽然也不过是当时革命加恋爱的内容，而且现在出版了《蒋光慈文集》，不难找到了，但我得到它，仍像藏书家获得宋版书那样欣喜。

这册《菊芬》，是1929.4.1第三版(初版为1928.4.1出版)，淡黄色封面，印橘红色宽横条，上以黑色印“菊芬”两字。内容横排，天地头宽阔，疏落有致，无局促之感，且为毛边本，用厚道林纸印。拿到手上，一股20年代气氛扑面而来。

全书约25000字，印74页，环衬、扉页俱全，扉页后有一页专印“菊芬”两字，然后才是正文。环衬用白纸，无花纹；扉页除书名外也只印两道朱红色粗横线，看起来质朴无华，但却落落大方。

看来书籍的装帧印制方面，二、三十年代的书籍，也还有可供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

我与海淀的一家书店

陈 建 功

几天前，遇见了一位仍住在海淀镇附近的朋友，问他："海淀街南口的那家旧书店，还有吗?"

他一愣，嘿嘿地笑起来，说："你可真把我给问住了，天天从那街上过，尽看见满街筒子的小贩了，卖皮鞋的，卖袜子的，喊声震天。旧书店？真没注意。怕是也早'改戏'了吧?"

我的表情一定是露出了点什么，朋友诧异地看了看我，问："怎么，你要找人?"

"不不不，只是随便问问。"我说。

唉，只有我自己知道，那家书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7岁由南方迁居北京，家住人民大学，上学在人大附小、人大附中，其后有十年到京西挖煤，每个月还是要回到人大的家中。1978

年我上了北大，仍然没有离开这一块地方。屈指算来，竟然在海淀住了 25 年之久。在那个时候，对于人大、北大来说，附近最繁华的地方，应该就属海淀镇上的海淀街了。

海淀街南端路西的那家卖旧书的中国书店，是培养我走上文学道路的摇篮。

我大概是在一个星期天发现这家书店的。那时候我上初中一年级，奉了母亲之命到海淀街去买什么东西，无意中闯进了这家书店。这实在是一个小得可怜的地方，宽不过 10 尺，深不过丈五，里面还有隔开的半间小屋，大概是这旧书店的书库，时不时就有工作人员抱着一捆一捆的旧书，从里面出来，解捆，上架。十几个书架把小屋的四壁围了一圈，书架上摆的全是各种减价出售的旧书，人们在书架前翻检、选购。我记得我从那书架上拿下的第一本书,是《茅盾文集》,开始看的时候，还东张西望了一会儿，生怕人家赶我出去。可后来我发现，身旁的人们，和我一样只看不买者居多，于是便渐渐地踏实起来。踏实了便把后背倚到了书架上，歇歇发酸了的腰。更踏实的时候，便蹲到了地上，借着人腿的缝隙中透过的一点亮光，舒舒服服地读，最后，甚至把位置换到了一张木制的人字梯旁，坐到了梯阶上。有人要用木梯登高取书的时候，我当然很自觉地让开，可他取完了，居然能把那木梯还给我，让我依然坐在上面……这一次，我在这小小的旧书店里看了大约三个钟头，等到想起了母亲交派的差使，天色都已经擦黑了。

我和这家旧书店的缘分，就这么开始了。那时我的家境不算宽裕，买书的钱，是没有的，即便是减价书。忽然发现了一处白看书的地方，不光是白看，而且随你挑拣。更妙的是，你就是从开门看到“上板儿”，售货员们也绝对不会给

你冷眼。他们或是忙他们的，或是聊他们的。如此自由惬意的读书胜地，岂不让人乐而忘返！每天，我都是在下午的两节课后到书店去，那正是这小书店里人最多的时候，大多是北大的学生，也有几个像我这样的中学生。人虽然多，可每一个人又都能很恰当地找到自己的位置。譬如我，总是在那张木梯的边上，寻找时机候补那木梯的位置。就这样，我或蹲或站，或倚或坐，在那里读完了《战争与和平》、《子夜》、《霜叶红于二月花》、《骆驼祥子》……算一算篇目，居然可观。最近这几年，常有报纸刊物要我写写“如何走上文学道路”之类的题目，我觉得，这题目挺没意思，既没有作这文章的欲望，也没有作这文章的勇气。不过，谢绝这种稿约的一刹那，不止一次地想起了那家小小的旧书店。

但愿它还有吧，但愿它没变成卖裤衩卖皮鞋的地方吧。

把这心思告诉了那位朋友，他笑了，说：“那可保不齐。不过，别看旧书店的事我不知道，我可知道，现在的海淀街里，新近都建成全国的图书中心了，那个旧书店，改成什么都无所谓了！”

我说：“是，那消息我知道，报上登了。只是不知道，您说的那‘中心’，能容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儿，蹲在那儿白看书吗？”

“哟，您又把我给问住了。”朋友说。

1993.5.19

淘书之乐乐淘淘

叶 永 烈

真绝，人们把买旧书说成“淘书”，这“淘”字传神极了。我就是个“淘书迷”。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每趟进城，少不了到东安市场和西单的旧书店转悠转悠。空书包而入，满书包而出，每月除了伙食费之外，节余的钱用在买书上。

有一回，我在东安市场看到一本布面精装、烫着金字、16开本的《化学史通考》，丁绪贤教授著，北京大学1925年出版。我爱不释手，可是，这本旧书标价5元，相当于我当时10天的伙食费。我站在那里，一页页看着，越看越想买，终于咬咬牙，掏出5元钱。将近30个年头过去，这本书一直保存在我的身边。书中被我画上各种各样的阅读记号，在写这篇文章前几天还引用过书中的资料。

1978年5月，我在上海遇见教育部原副

部长董纯才，对他说起《动物漫话》一书。他大为惊诧，问道："你怎么看过我的《动物漫话》?"我一听，也大为惊诧，答道："我家里就有呀!"他要我第二天马上带书来，急急地要看这本书。奇怪，书是他写的，干嘛这般着急要看。原来，他写好书稿之后，交给商务印书馆，便奔赴延安了，一直没有见到过样书。解放后，他多次向商务印书馆查询。由于书的印数不多，商务印书馆已无存书，各图书馆里也没有。我是在旧书摊里淘到的，那书的封面上盖着"商务图书馆藏书"印章，可想而知是他们卖掉的。当然，我买这本旧书时，压根儿不知道作者还未见过此书……当我把书送到董老手中，他说："我借用几天，请人抄一遍，把原书还给你。"我笑了："我是花两角钱买的，送你吧!"他非常高兴。两年后，《董纯才科普创作选集》出版了，董老特地寄我一本，书中收入了《动物漫话》中的文章——他用这本新书换我的旧书!

当高士其要出版他的科普创作选集时，我从我淘来的旧书中，寻出 5 本 30 年代出版的他的著作寄去——他自己手头也没有这些书了。

后来，天津科技出版社的编辑来我家，见到书架上有许多解放前的科普书籍，便约我主编《中国科学小品选》。如今，150 万字的《中国科学小品选》已分三卷印行，其中不少文章选自我当年淘来的旧书。

其实，我淘这些旧书时，只十七八岁而已，不过是想买来学习、参考罢了，哪晓得二三十年后会派大用场。很可惜，在"文革"中被抄家时，我淘来的旧书，丢了一大批。仅根据抄家者很不完全的"收据"加以查对，丢失 144 册。落实政策时，每本按 3 角钱赔偿损失。唉，有的绝版的书丢

了，已不是能用3角钱所能补偿的！

至今，我仍喜爱淘书。特别是出差，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便是书店。现在，我家四壁是一排排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大书架，号称“万卷户”。我最大的乐趣，便是读这些从各地淘来的书，从中汲取知识的滋养。

乐而不疲“淘书”翁

士　　铮

我的床头柜上压着一张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手书对联：“养心莫善寡欲，至乐无如读书。”这确是至理名言。读书之乐乐无穷。一卷在手，不知老之已至。但是，书从何来？借，只能偶尔为之。心爱之书，常人都不愿出借。买，一则新书价贵，二则也未必皆能如愿以偿。这就得想法子去找、去觅、去淘了。读书是至乐，淘书也是读书人的一大乐事。

30年代末我初到上海，40年代后期又重来十里洋场，前后十余春秋，直至50年代将终，沪地的旧书店摊逐渐合并、消失为止，我的空闲时间几乎都是消磨在那些店里摊前。淘、翻、寻、搜，乐而不疲。

像我这样不名几文的识字分子，绝对不能见书就买。故此便得捻斤掂两，精打细算。记得当年在福州路上一家专卖古旧书籍的小店

里，我曾见到一部大本线装《稼轩长短句》。当时爱不释手，可是阮襄羞涩，几番考虑，多次踌躇，终于想别处或许会有旧一点、便宜些的本子。谁知跑遍了上海滩的旧书店，此书竟无第二部。后来再去看，仍旧下不了决心。到第三次下定决心去买时，岂料此书已归属他人。然而，可惜之余亦有乐趣，因为这期间倒也给我翻、拣、查、阅了不少其它的书。哪里的本子好一些，或者便宜些；哪里的店摊有我想要而未买的书，我心里都有了个“谱”。

1957 年以后，旧书不那么好“淘”了。自那以后，我就逐渐问津于新书之列。新书也要“淘”，因为有些书印数少，也不见得好买。像 1959 年夏，我见有人拿着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从书店里出来，便随之尾入，但已告售尽，而且迄今再未见到。所以，淘新书也要勤跑勤看，勿失时机。要买的书，见到即买，否则也会后悔。4 年前，我见书店有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标价 8 元 5 角。一书抵我半月的伙食，但也只能咬咬牙将它买下。事后虽曾吝啬了好一阵，但如今想来还是颇值庆幸的。要是那时不下这个决心，今天也只能闻其名而不见“全豹”了。不过，淘新书毕竟没有淘旧书味道浓。我盼望着哪一天，我能在旧书店摊里度过我的余生。

津津乐道旧书店

王 晓 建

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念书时，因受父亲的影响，小小年纪就喜欢逛旧书店。

记得我是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开始在旧书店买书的，买的第一本书是苏联作家盖达尔写的《铁木耳和他的伙伴》。这本厚厚的书原价很惊人——14000 元！不过那是旧币，换成今天的概念是一块四毛钱，而旧书店的标价才两毛，仅为原价的 1/7。我于是掏出四枚五分钱的钢镚儿交了款，然后兴冲冲地将这本虽旧可一页不缺的儿童文学名著捧回了家。

既尝到了甜头，我也就成了旧书店的常客。从三分钱一本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到三毛钱一本的《中国近代史》，从解放前夕出版的小说《围城》，到五、六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散文集《东风第一枝》、《艺海拾贝》，陆陆续续买了许多书，以致去陕北延安插队前竟塞满了一

个四层的小书架。同学们每每在艳羡之余惊奇我的零花钱不多而藏书颇富，我总是津津乐道地提起旧书店的好处。

旧书店的好处不仅仅是书价便宜，还在于能够让人们买到新书店里买不到的书。前年回北京探亲，我就在东四的一家门面很小的旧书店里买到一本梁园东先生译注的《西辽史》。这本书，可以说是研究新疆历史的必读书之一，但只在1955年印行过区区两千册。我托过不少的人费了不少的事，还是一直未能借到。不想这天只花了三毛五分钱就轻而易举地买到了手，当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弄得其他的买书客纷纷盯着我瞧。

我还曾在西单旧书店为我的一位专攻西藏阿里地区历史的朋友买到一本《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这本花八毛钱买的书他朝思暮想而不可得，一度甚至打算借他老师那本手抄下来，他接到书以后在给我的信中列了一个奇特的式子：0.80元≠0.80元。

旧书店的魅力，也是与它坚持开架售书分不开的。在新书店用柜台把顾客拒之于书架二米开外的年代，旧书店的光顾者却能站在书架前自由自在地随意翻阅，哪怕翻一天书一本不买，也不用担心营业员给脸色瞧。我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问过一位老营业员，他说打从清朝康熙年间琉璃厂有书摊儿那天起，顾客就可以随意翻书，刨去“文化革命”那些什么书也没有的年头儿不算，这个老规矩多会儿也没破过。

久而久之，我渐渐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一地，都要打听打听此地有无旧书店可逛，遗憾的是得到的回答多半令人失望。除了北京、上海等少数大城市以外，旧书店并不多见。甚至许多号称文化古城、历史名城的都市也连一家旧书店都没有。

有人觉得没有旧书店无伤大雅，可他却没有想一想无数有价值的好书惨遭毁灭是多么的有伤大雅。我在西北一个大城市街头的废品收购站，亲眼看到过被当作废纸收购的是些什么样的书——精装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1959年俄文版《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华书局40年代出版的《化学原素发现史》，还有一本发了黄的无头无尾的线装书，我拿起来翻了几页，竟是清朝末年刻印的《新疆图志》！废品收购站的女工告诉我：这些书都将送往造纸厂化为纸浆造纸……

这不过是我偶然间看到的几本好书，至于已经无声无息地化为纸浆的好书，真不知更有多少！写到这里，我禁不住想大声疾呼：多开几家旧书店吧！多开旧书店，既可以保护历经劫难日渐珍稀的古旧典籍，又可以在书价猛涨的今天减轻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经济负担，还可以提高书籍的利用率，还可以为国家节省纸张，还可以增加就业机会……总之，于国、于民、于文化事业有百利而无一弊。

1986年6月

古旧书的笑与泪

马 立 诚

10 月上旬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举办的古旧书市，我去了一遭，有两点惊讶。

一是顾客多。这几年古旧书市场的萎缩，有心人都见到了。我原以为问津者不会很多，不料 8 日这天就有 1 万人光临。中国书店不大的院子里摩肩接踵，连靠近书架都要费一番力气。难怪这个书市作为热门新闻上了电视。

二是年轻人多。大约总要在顾客中占到八成。这些青年主要购买各种新旧古籍如《易经》、《昭明文选》等。我见一位 20 岁左右的女青年，一个人买了 6 本七折的《古汉语常用字典》，可见她还是个代表。

书市组织者精心准备了 4 万多种古旧书刊和新印书籍，原计划 10 天内成交额 20 万元的，谁知开市第 5 天就突破了 20 万。这些平日压在库房里的古旧书得遇知音，亦该开怀一

笑了。

但前边提到的萎缩也是实情。

市面上见到的是，古旧书店门市网点日渐减少而且破旧，所售的旧书也多是新华书店滞销的下架书。联想到近些年来世界上古旧书业日益发达兴旺，甚至成了一些国家观光旅游资源的势头，不免遗憾。

一般说来，人们对各种书的需要，是因时因地不断变化着的。家中的存书，自然也不时要调整、出让、更新。随着出版业飞速进步，书越印越多，品类丰富，日见其工。调整、出让与更新的幅度也越来越大。苏联目前古旧书店已超过 4000 家，日本东京一地，仅在导游图上注明的专业古旧书店就有 200 多家。不少发达国家的城市，还建起了旧书城，吸引大批旅游者。这些勃兴，正是适应了上述客观需要的缘故。可以预测的是，这个势头还会经久不衰地发展。

在这调整、出让与更新的过程中，书籍的利用率翻了几番，而社会财富却得到不少节约。这也是符合艰苦奋斗的精神的。何况我们这里的读者受居住空间及手里钞票的限制，书的调整、出让与更新必然更为迫切。

可惜的是，我国古旧书店却在不断减少，全国这类书店目前不到 40 家，1/4 的省份没有古旧书店，1/3 以上的省仅在省府市有一两家。北京历史上高峰时曾有 400 家古旧书店，现在只有一家。上海的古旧书店也由历史上的 130 多家减少到一家。读者卖书、买书非常困难，要享受逛旧书店的乐趣也只好打消。鲁迅当年在日记中记述他逛北京旧书店访书买书 480 次的经历，今天已成了好事难再的陈迹。说到这里，古旧书如有知，难免要落下几滴泪呢。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不少，重要的一条，是有些领

导对古旧书业重视不够，没有把它提到文化建设应有的高度来评估。古旧书业是一个标志文明程度的特殊行业，甚至还是一项市场开阔的文化企业和旅游资源。因此，为了发展这项企业，开发这个资源，是否可以考虑适当给予若干政策上的扶持呢？比如，古旧书店的发售业务与新书店差别很大，收购工作要花很大力气，所以对旧书店的税收比率应适当考虑与新书店有所区别，才符合事理。

旧书之灾

朱光潜

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是印刷业最早兴起而也最盛行。我们略翻阅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之类书籍，便可以明白我们的祖先在印书和藏书方面所费的心血和所表现的崇高理想。远者不必说，姑说满清时代，刻书是当时国家文教要事之一。在京师的有武英殿，在各省的有金陵、杭州、成都、武昌、广州各大官书局，都由政府资助，有计划有系统地刻印四部要籍，地方文献多由各当地书局分印，大部头著作一局不能独刻的则由各局合刻。刻书流传文化，是一件风雅的事，官书局之外有许多书籍的爱好者，像阮元、卢文绍、毕沅、鲍廷博、伍崇曜、黍庶昌、王先谦诸人都以私人的力量刻成许多有价值的丛书。当时读书人多，书的需要大，刻书也是一件可谋利的事，官局与私人之外，又有许多书贾翻刻一般销行较广的书籍，

晚起的商务印书馆是一个著例。现在，官书局久已停闭了，私人刻书也渐没落了，书贾更不必说。从前许多辛辛苦苦刻成的书版大半已毁坏散佚，偶有存在的也堆在颓垣败壁中，无人过问。

从前，各大都市都有几条街完全是书肆，有钱的去买，无钱的去看，几乎等于图书馆。现在的情形就萧条不堪了，抗战初我到成都，西御龙街和玉带桥一带还完全是书店，到抗战结束那一年我再去逛，这些书店大半都已改为木器铺和小食馆，剩下的几家都在奄奄待毙。从前我在武昌读书的时候，沿江一带旧书店也顶繁荣，去年我经过那里，情形比成都更惨，有些像穷人区，破书和破铜、破铁或是纸烟、花生糖夹杂在一起，显然单靠卖书就不能撑持那破旧的门面了。听说苏州、广州、长沙各地，情形也大相仿佛。我因而联想到伦敦的切宁十字路，巴黎的赛纳河畔，以及东京的神田(?)区，我不相信经过这次大战破坏之后，那些著名的书肆区就冷落到这种程度。

中国旧书聚汇的地方当然是北平。经过9年的抗战之后我回了这旧都，看见厂甸和隆福寺的那些书店居然都还存在，而且还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心里颇为欣慰。可是每一家都如深山古刹，整天不见一个人进来。书贾为维持日常的开销，忍痛廉价出售存货，我花了4万元买了一部海源阁藏的《十三经古注》。2000元买了一部秀野草堂原刊的《范石湖集》，其它可以类推。买过后，我向店主叹了一口气说："如今世界只有两种东西贱，书贱，读书人也贱！"事隔一年，今冬我逛这些旧书店，大半只是"过屠门而大嚼"，书价比去冬要高20倍了，我买不起了。显然读书人比去年更贱了。书是否真贵了呢？古逸丛书的零卖每册合到两万元，

许多明刻本及乾嘉刻本也只要一两万元一册。稀见的书或许稍贵一点。我买最平常的稿纸也要 8 万元一百页，一册旧书至多就只合到纸价的四分之一，刻工运输储存等等都算不上钱。旧书除研读以外还有一个用途，可以当废纸。当废纸它可以卖到两万元至 3 万元一斤。许多大部头的书现在是绝对找不到雇主的，像《图书集成》只能卖一千余万元，如当废纸卖，可望加倍。所以，这一年来，许多旧书是当作废纸出卖的。废纸有什么用场呢？一，杂货店可以用来包东西，买花生米拆开纸包一看，往往是宣纸莫刻南监本《五经》的零页；二，废纸可以打成纸浆做“还魂纸”，质料好的印报章，质料坏的作厕所手纸。手纸也要值二三十万元一刀，一刀手纸和 20 册左右旧书价值略相等。请想一想看，这情形是多么惨！

想什么！在这科学昌明时代而且是新文化运动时代，旧书本已无用了，活该做手纸！于是我联想起科举初停的时候，我父亲把家里几大箱时文闱墨送到荒地里，亲自掘一个塚，把它们“付之丙丁”，“葬之中野”，我当时幼稚，不免惋惜，父亲说，“它们没有用处了，留着占地方。”现在一般线装书的无用是否等于时文闱墨的无用呢？其中无用的当然不少，可是大部分是中国民族几千年来伟大的历史的成就，哲学思想的结晶，文物典章的碑石，诗文艺术的宝库，于今竟一旦一文不值了么？西方文化发展到现代这样的高潮，荷马、柏拉图、但丁、莎士比亚、康德、歌德、卢梭等一长串的作者并未变成陈腐无用，何以孔子、庄子、屈原、司马迁、陶潜、杜甫、朱熹一类人物就应该突然失去他们的意义呢？

于是我又联想起一些我所知道的藏书家，父祖几代费尽

心血搜罗起许多珍善本，到了家庭衰败时，子孙们不知爱惜，把书籍送到灶房里引火，或是称斤出卖去换鸦片烟。就一家来说，这是家风的没落，子孙的不肖。现在我们整个民族也就像败家子了。各都市旧书的厄运很明显地指出两个事实：第一，过去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已到没落期了，黄帝的子孙对于祖传的精神产业已不知道爱惜了；其次，一般中国人不像欧美人那样以读书为正常的消遣，在读书中寻不到乐趣，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所以书不行销。

我知道，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拿珍惜旧书来谈，未免“迂阔而远于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想到秦始皇焚书一事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那么，目前书灾并不是一件小事。汉兵入咸阳，萧何马上就派人抢救官府的图书，他所做的在当时也似是不急之务。我们要记得，现在各大城市遗留的一点旧书，是在这过去9年空前大劫中所未被敌人毁坏或抢掠的一部分，如果这些再毁于我们自己之手，我们不但对不起祖宗，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人类。纵然目前有许多大家认为比较更紧急的事要做，我仍然认为，抢救旧书亦是一件急不容缓的事。好在这件事只要有人肯做，做起来并不太难。

第一，我向政府建议：在最近三五年中，每年提出约当现值100亿的款项，这数目实在很微，不过是维持一个国立大学两个月费用的数目——分发各大都市的公立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责成它们就近采购当地旧书。采购的程序，须尽量把大部头书及善本书摆在前面。各图书馆已有的书复制几部也无妨，反正这批新购书是国家的产业，现在造册刊目代存，将来可以由国家分发以后陆续成立的新图书馆。

第二，我向有资产的私人建议：抢救旧书是一件有功德的事，他们应该尽他们的力量设法采购，供自己研读，传给

子孙，或是捐赠给学校或图书馆，都无不可。或是再说得低调一点，他们把这件事当作投资，将来到了承平时代，再拿出来出售，也还是不会亏本的。

第三，我向各地旧书店建议：他们这些年来在艰苦中挣扎，值得我们同情，他们流传书籍，所做的仍是文化事业，千万不能把旧书卖去做还魂纸。从生意立场说，许多小门面分立互竞，是他们的致命伤。他们应化零为整，组成合股公司，消耗较小，维持也就较易。

救救旧书业

萧　乾

人入老年，一个难免的倾向是怀旧。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于老北京的一切，自是无限眷恋。可倘若要我讲出顶怀念的是什么，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反正我想的不仅仅是那已拆掉了的城墙，而是城墙内熙熙攘攘、丰富多彩的生活：隆福寺庙会，天桥的杂耍，蟠桃宫的沙雁或白云观的大糖葫芦，都在我记忆中散放着馨香。有些事物本身虽很美，但却属于应该被时代所淘汰的，诸如踩出清脆铃声的有轨电车或运煤的驼群。另外也有些在革新的形式下至今依然存在着，如没有了香火的庙会和讲求卫生的风味小吃。作为读书人，仔细想来我最心爱的还是往日散在京城各个角落(尤其是东安市场)的那些旧书铺。可惜 50 年代中期它们就从北京人的生活中基本上消失了。这比城墙的拆除更要使我痛心多了。

如今，我很少去百货公司，尤其怕进东风市场。楼那么高，货品那么齐全，可就是再也不见丹桂或桂铭商场里中原或春明书店的踪影了。当年，那里穿蓝大褂的店员那么朴实殷勤，时而在耳边亲切地递个话儿：店里又新到了什么什么。你只要照顾过一回，他们就能晓得你的兴趣所在。每去一次旧书铺，那就像逛了一趟宝山，花不多钱就能拣回一件或几件寻觅多时的珍物。50年代初期我住在东总布胡同时，东安市场卖洋书的中原书店还常派伙计夹个蓝布包儿到我家来。多卷本的全集，不论是狄更斯还是马克·吐温，他们总是先捎来两本供我观赏。他们是书贾，那里也没有“物价监督员”，然而他们在利润上却十分懂得克制。“文革”前，我有一批书由于放在办公室里，竟然幸免于难。至今，我书架上还有四套百科全书，都是从东安市场旧书店搜集来的。一套29卷的《大英百科》，书上至今还写着标价：人民币50元！

我从未跟古籍沾过边儿，但我也是旧书业的一个受惠者。我自己解放前出的书，大都毁于“文革”那场浩劫。有些旧作如《人生采访》和《梦之谷》，就是中国书店帮我觅到的，我也因此而结识了该店年轻有为、知识渊博的沈望舒经理和这方面的资深行家王炳文。我是先采访了他们二位，才动手写此文的。

世上有文学史，新闻史，出版史，可就是没有旧书业史，然而这一行业对于保存、传播——尤其抢救古籍的功绩，是独特的，也是不可磨灭的。倘若撰写这样一部历史，内容必然会是十分丰富的。文人、研究家一向与这一行业结下不解之缘，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它占有特殊位置。翻看《鲁迅日记》，光提到琉璃厂就有480处之多。郑振铎、冯友

兰、刘半农等五四以来的学者，无一不是旧书业的常客。从孙殿起所著的《贩书偶记》中，可以领略到不少学者与书贾之间许多感人的逸事。书贾虽属商人，但他们却对保存古老文化看得远比金钱为重。这也正是他们与学者之间情谊的基础。社科院历史所的老研究员胡厚宣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任教。他急需北平来薰阁独家所藏的一部古籍。当时平渝间邮路不通。来薰阁的陈济川竟忍痛把全书拆成单页，作为信件一页页地经香港寄给胡教授。抗战胜利后，胡教授专程到来薰阁致谢并提出结帐，陈济川笑笑说："算了吧。"我的老同学侯仁之(地理学家)敌伪时期被捕入狱。释放后就寄住在天津，开通书社旧书贾郭济森利用收售旧书之便，往返于平津之间，为洪煨莲和侯仁之传递信件。

太平年月，古旧书业能为学者们提供踏破铁鞋也难以觅到的珍贵资料。中国书店曾为金石专家胡厚宣提供甲骨拓片和《古钱大辞典》。使他得以编写成《甲骨文合集》。容庚在编写《商周彝器通考》时，也曾得力于旧书店为他提供的《金石聚》和《西清古鉴》等重要资料。已故老友翁独健校点《元史》时，有赖于这家书店为他提供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家村主邓拓托他们找过《唐人写经》、《说郛》等，都如愿以偿。《金瓶梅词话》最早的版本和《聊斋志异》篇目最全的早期钞本都是古旧书业发现的。

中国书店不仅仅面向文史界，他们也在为现实建设服务。书店曾为农业经济学家吴觉农提供过古代的农书和有关茶的资料。当冶金部编写《中国冶金史》以及黄河治理委员会设计治河方案时，中国书店都及时地作出贡献。

旧书业还有一宗鲜为人知的行当——一项独特的技艺：修补。多少残卷珍本书都经他们灵巧的手整旧如新。在保全

文化方面，这也是一宗可贵的贡献。它需要高超而熟练的技巧和无限的细心和耐性。老教授刘盼遂将此技艺称为古旧书刊的“续命汤”。班禅大师在现场看到赵树枫老师傅将一部破烂不堪的经卷修整如新时，感动得对那位修补师傅说，你是国宝！

读书人虽然也经常进出新书店，但我却没听说过这类逸事。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新书业从各出版社渠道进书，上了架，然后与顾客就是普通的店员与顾客之间的关系了。有就卖，没有就拉倒。虽然有的新华书店设有代觅的服务项目，无奈出版物的印数卡得很紧，售光又不再版！旧书业则不然。首先，进货渠道可没那么现成。他们得到处打听。60年代我倒楣时，就有一位琉璃厂旧书店员叩我的门。也不知他怎么晓得了我有一部鲁迅与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他可能还了解到那时我在经济上正拮据不堪，就几次登门反复劝我把它卖给国家。他们大概就是这么凭知识和眼力从山东一农家购到半部宋版的《春秋公羊传》。在那之前，又从北京一住户购到一部宋版《楚辞》。当时，《人民日报》还为此发了消息。许多珍贵资料硬是在纸厂化浆池边或即将焚毁的垃圾堆中抢救回来的。20年代旧书业就是这样从白纸坊救出大批清宫档案，近年来一部宋版的《古今注》也是这么抢救的。80年代他们曾收购到一本破破烂烂的画册。经前驻美大使黄镇辨识，正是他在长征途中所作的素描。如今，已作为反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唯一画册出版了。

在动乱时期，旧书业更是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城之后，古籍大量散失。正是琉璃厂的行家们抢救了多少珍贵文物。高举“破四旧”大旗的“文革”浩劫中，中国书店从一开始就成了“斗批散单位”。店里的行家

们立即靠边站了。中国书店的营业项目只限于卖红宝书、像章和样板戏。那时，查抄的各种本册成车地往纸厂拉，多叫人心焦啊！在可能范围内，中国书店还是从纸厂化浆池边抢救出不少贵重古籍。

这样一个对祖国文化卓有贡献的行业，今天的命运如何呢？它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厦里，又占了何等样的位置呢？

写到这里，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分。解放后，许多行业都大力扩展，唯独旧书业则只见萎缩，至今已濒于消灭。解放前仅北京就有近400家专售古籍的店铺，现只有中国书店一家。43年来，上海由130家减到两家，天津原有74家，现在只剩了一家。广州原有120家，苏州也有过12家，如今都只各剩一家了。北京今天许多行业的门面都由茅屋变成巨厦了，惟独旧书业却恰恰相反。在新兴的城市建设中，根本没有它的位置。1968年，东安市场旧书店由3000平方米一下子缩为200平方米，西单商场本来有一家规模相当大的旧书店，重建后，索性整个挤掉了。

再看看仅存的旧书店的实际营业状况吧。以位于首都的中国书店而言，旧书只占它销售额的28%。各地旧书店都因对旧书限价机械、赚头有限，而改以售新华书店下架书及出版社的积存及尾数书为主。由于利润相距悬殊，有些旧书店宁愿卖音响影视产品——甚至冰箱服装。现在中国书店营业面积已减少2/3，店铺残旧到中国保险公司都拒绝受保。

再放眼看一看世界。日本仅东京就有六七百家旧书店，一年前的苏联，还有4000家。而曾以旧书肆闻名于世的中国，如今统共只剩了风雨飘摇中的36家——其中，真正在卖旧书的，只占1/10。

说到这里，很自然地就要问：旧书业在社会主义的中国

何以如此凋零？

首先的打击是来自政治方面：某些现行政策以及历年“左”的政治运动。我们举国上下学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然而在实践中——在制定法规政策时，往往却相反。开国初期就有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等许多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书不能卖的说法。接着，一反胡风，100多位受牵连的作家的书一夜之间就成了禁书。跟着反右了，然后是对文人“一扫而光”的“文革”，在因人废言的原则下，就全不能卖了。旧书业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岌岌可危。

更致命的打击，还是来自沉重的经济负担。

欧洲共同市场规定对旧书业的课税不得超过7%，英国及葡萄牙干脆免征。他们是把旧书业当作文化事业看待，就像对图书馆或博物馆那样，只扶植而不榨取。

中国的旧书业并不是像影剧那样被作为文化事业看待的。在国家工资类别表上，它被列为“商业三类二等”，与碾米加工为伍。生意本来就不景气，税收压力又很大。中国书店一年毛利约205万元，需上交税利170多万元，全年销售的实际盈利仅1.51%，还要应付一些没谱的摊派。可是在上亿兆的国家预算中，从旧书业究竟能得到多少呢？据说统共也不到100万元！

所以关键不在于国家财政困不困难，而是还要不要这个曾为抢救文物古籍立过功勋，而今后仍能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这一行业。

1992年2月17日

琉璃厂书肆记

（清）李 文 藻

乾隆己丑五月二十三日，予以谒选至京师，寓百顺胡同。九月二十五日，签选广东之恩平县。十月初三日引见，二十三日领凭，十一月初七日出京。此次居京师五月余，无什应酬，又性不喜观剧，茶园酒馆，足迹未尝至。惟日借书抄之，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虽所买不多，而书肆之不到者寡矣。出京后，逆旅长夜，不能寐，乃追忆各肆之名号，及所市书之大略，记之。

琉璃厂，因琉璃瓦窑为名。东西可二里许。未入厂，东门路北一铺，曰声遥堂，皆残破不完之书，予从其中买数种，适有《广东新语》，或选恩平之兆也。入门为嵩口堂唐氏，名盛堂李氏，皆路北。又西为带草堂郑氏，同升阁李氏，皆路南。又西而路北者，有宗圣堂曾氏，圣经堂李氏，聚秀堂曾氏。路南者，有

二酉堂、文锦堂、文绘堂、宝田堂、京兆堂、荣锦堂、经腴堂，皆李氏。宏文堂郑氏，英华堂徐氏，文茂堂傅氏，聚星堂曾氏，瑞云堂周氏，其先后次第，忆或不真，而在南在北，则无误也。或曰：二酉堂自前明即有之，谓之“老二酉”。而其略有旧书者，惟京兆、积秀二家，余皆新书，而其装潢纸不佳而册薄。又西而南，转沙土园。北口路西，有文粹堂金氏，肆贾谢姓，苏州人，颇深于书。予所购抄本，如《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芦浦笔记》、《尘史寓简》、《乾坤清气》、《滏水集》、《吕敬夫诗集》、《段氏二妙集》、《礼学汇编》、《建炎复辟记》、《贡南湖集》、《月屋漫稿》、《王光庵集》、《焦氏经籍志》，之属；刻本如《长安志》、《鸡肋集》、《胡云峰集》、《黄稼翁集》、《江湖长翁集》、《唐眉山集》之属，皆于此肆。又北转至正街，为文华堂徐氏，在路南。而桥东之肆尽此矣。

桥居厂中间，北与窑相对。桥以东街狭，多参以卖眼镜、烟筒、日用杂物者。桥以西街阔，书肆外，惟古董店，及卖法帖、裱字画、雕印章、包写书禀、刻板镌碑耳。近桥左右，则补牙、补唇、补眼，及售房中之药者。遇廷试进场之具，如试笔、卷袋、墨壶、镇纸、弓棚、迭褥，备列焉。桥西卖书者才七家，先月楼李氏，在路南，多内板书。又西为宝名堂周氏，在路北，本卖仕籍，及律例路程记，今年忽购得果亲王府书二千余套，列架而陈之。其书装潢精丽，俱钤图记。予于此得梁寅《元史略》、《揭文安集》、《读史方舆纪要》等书，皆抄本。《自警编》半部、《温公书仪》一部，皆宋椠本。又方望溪所著书原稿，往往有之。又有抄本《册府元龟》，及明宪宗等《实录》。又西为瑞锦堂，亦周氏，在路南，亦多旧书。其地即老韦之旧肆，本名鉴古堂，八年前韦

氏书甚多。又郃阳人董姓，同卖法帖其中。吾友赵六吉，精于法帖，亦来此，遂客没，其榇至今未归。又西为焕文堂，亦周氏。又西为五柳居陶氏，在路北，近来始开，而旧书甚多。与文粹堂，皆每年购书于苏州，载船而来。五柳多璜川吴氏藏书，嘉定钱先生云：即吴企晋舍人家物也。其诸弟析产，所得书遂不能守。又西为延庆堂刘氏，在路北，其肆贾，即老韦前开鉴古堂者也，近来不能购书于江南矣。夏间，从内城买书数十部，每部有楝亭曹印，其上又有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记，盖本曹氏而归于昌龄者。昌龄官至学士，楝亭之甥也，楝亭掌织造盐政十余年，竭力以事铅椠。又交于朱竹垞，《曝书亭》之书，楝亭皆抄有副本。以予所见，如石刻铺叙《宋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太平寰宇记》、《春秋经传阙疑》、《三朝北盟会编》、《后汉书年表》、《崇祯长编》，诸书皆抄本。魏鹤山《毛诗要义》、《楼攻媿文集》，诸书皆宋椠本，余不可尽数。韦颇晓事而好持高价，查编修莹、李检讨铎，日游其中。数年前，予房师纪晓岚先生，买其书，亦费数千金。书肆中之晓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谢，及韦也。韦，湖州人，陶、谢皆苏州人，其余不著何许人者，皆江西金溪人也。

正阳门东打磨厂，亦有书肆数家，尽金溪人卖新书者也。内城隆福诸寺，遇会期，多有卖书者，谓之赶庙。散帙满地，往往不全，而价低。朱少卿豫堂，日使子弟物色之，积数十年，蓄数十万卷，皆由不全而至于全。盖不全者，多是人家奴婢窃出之物，其全者固在，日日待之而自至矣。吾友周书昌，遇不全者亦好买之，书昌尝见吴才老《韵补》，为他人买去，快快不快。老韦云：邵子湘《韵略》，已尽采之。书昌取视之果然。老韦又尝劝书昌读魏鹤山《古今考》，以为

宋人深于经学，无过鹤山者。惜其罕行于世，世多不知采用，书昌亦心折其言。韦年七十余矣，面瘦如柴，竟日奔走朝绅之门。朝绅好书者，韦一见念其好何等书，或经济，或辞章，或掌故，能各投所好得重值。而少减辄不肯售，人亦多恨之。予好书几与书昌同，不及书昌能读耳。朝食后，即至厂手翻，至晡或典衣买之。而积秀堂有《杨万里》、《洪盘州》二集抄本，索钱三十千，皮数日仍还之，而不能释于念也。延庆刘，项生大瘤，人呼之刘噶哒。又西为博古堂李氏，在路南。其西为厂西门，门外无鬻书者。

琉 璃 厂

(清)金　梁

琉璃厂,为都城文物所聚。余下车即往游,各商店方备考具,笔则贺莲青,墨则一得阁,而纸必懿文斋。以试卷向由松竹斋承办,已改归懿文也。书籍则二文,曰文友、文德。字画则二古,曰茹古、悦古。余见《陶渊明集》汲古阁复宋本、《杜工部集》宋刻残本,各以十金得之。又购汤贞愍、戴文节山水扇面,仅各二金。又见吴渔山、王石谷山水中堂,问其值,皆索百金。惟御笔独昂,康、乾小条,各须五十金,尚非精品也。尤难得者,傅青主父子批校《汉书》,青主朱笔行草,其子眉则恭楷细注,凡志、传皆遍,乃至诸表,亦一字无遗,足见古人读书之勤。余倾囊购之,众皆笑为书呆也。书铺大者,实多在隆福寺街。有文奎、带经二堂,为王氏兄弟分设。文奎之王,以信义为人重,人称老王,士大夫多与往还,阛阓中之君子也。

海王村人物

(清)张 祖 翼

今京师之琉璃厂乃前明官窑制琉璃瓦之地，基址尚存。在元为海王村。清初尚不繁盛，至乾隆间始成市肆。凡骨董、书籍、字画、碑帖、南纸各肆，皆麇集于是，几无他物焉。上至公卿，下至士子，莫不以此地为雅游而消遣岁月。加以每逢乡会试放榜之前一日，又于此卖红录，应试者欲先睹为快，倍形拥挤。

至每年正月初六起至十六日止，谓之开厂甸，合九城之地摊皆聚于厂之隙地，而东头之火神庙，则珍宝书画骨董陈列如山阜，王公贵人命妇娇娃车马阗塞无插足地，十日乃止。此厂肆主人所以皆工应对，讲酬酢，甚者读书考据，以便与名人往还者不知凡几，不似外省肆佣之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也。

予出入京师几三十年，厂肆之人几无不识

予者，以予所知有数人焉。有若琴师张春圃者，其志节高尚，已纪于前矣。有若刘振卿者，山西太平县人。佣于德宝斋骨董肆，昼则应酬交易，夜则手一编专攻金石之学，尝著《化度寺碑图考》，洋洋数千言，几使翁北平无从置喙，皆信而有征，非武断也。德宝斋主人李诚甫，亦山西太平人。肆始于咸丰季年，仅千金资本耳，李乃受友人之托而设者。其规矩之严肃，出纳之不苟，三十年如一日，今则其肆已逾十万金矣。诚甫能鉴别古彝器甚精，潘文勤、王文敏所蓄，大半皆出其手。诚甫卒，其犹子德宣继之，亦如诚甫在日，犹蒸蒸日上也。有若李云从者，直隶故城人，幼习碑贾，长益肆力于考据。当光绪初年，各衙门派员恭送玉牒至盛京，盛伯兮侍郎、王莲生祭酒、端匋斋尚书，皆在其中。一日夜宿某站，盛与王纵谈碑版，端询之，王奋然曰："尔但知挟优饮酒尔，何足语此。"端拍案曰："三年后再见。"及归，遂访厂肆之精于碑版者，得李云从，朝夕讨论，购宋明拓本无数，又购碑碣亦无数。其第一次所购，即郛休碑也，以五百金得之，罗列满庭院，果不三年而遂负精鉴之名矣。云从为潘文勤所赏识，有所售辄如数以偿，故云从得以挥霍十余年，终以贫死。

至书肆主人，于目录之学，尤终身习之者也。光绪初，宝森堂之李雨亭，善成堂之饶某，其后又有李兰甫、谈笃生诸人，言及各朝书板、书式、著者、刻者，历历如数家珍，士大夫万不能及焉。又有袁回子者，江宁人。亦精于鉴别碑帖，某拓本多字，某拓本少字，背诵如流。有若古泉刘者，父子皆以售古泉为业，其考据泉之种类，有出乎各家著录之外者，惜文理不通，不能著述为可恨耳。至博古斋主人祝某，鉴赏为咸同间第一，人皆推重之，炳半聋时为予言。予

生也晚，不及见此人矣。

及新学盛行，厂肆多杂售石印铅板诸书，科学仪器之属，而好古之士，日见寥寥。此种商业与此种人物，皆将成广陵散矣。世运升降盛衰之故，不其然哉！不其然哉！予深惜阛阓中有如是之人，而无人传之也，因拉杂书之。

厂　　甸

周 作 人

琉璃厂是我们很熟的一条街。那里有好些书店，纸店，卖印章墨合子的店，而且中间东首有信远斋，专卖蜜饯糖食，那有名的酸梅汤十多年来还未喝过，但是杏脯蜜枣有时却买点来吃，到底不错。不过这路也实在远，至少有十里罢，因此我也不常到琉璃厂去，虽说是很熟，也只是一个月一回或三个月两回而已。然而厂甸又当别论。厂甸云者，阴历元旦至上元十五日间琉璃厂附近一带的市集，游人众多，如南京的夫子庙，吾乡的大善寺也。南新华街自和平门至琉璃厂中间一段，东西路旁皆书摊，西边土地祠中亦书摊而较整齐，东边为海王村公园，杂售儿童食物玩具，最特殊者有长四五尺之糖葫芦及数十成群之风车，凡玩厂甸归之妇孺几乎人手一串。自琉璃厂中间往南一段则古玩摊咸在焉，厂东门内有火神庙，为高

级古玩摊书摊所荟萃，至于琉璃厂则自东至西一如平日，只是各店关门休息五天罢了。厂甸的情形真是五光十色，游人中各色人等都有，摆摊的也种种不同，适应他们的需要，儿歌中说得好：

新年来到，糖瓜祭灶。
姑娘要花，小子要炮。
老头子要戴新呢帽，
老婆子要吃大花糕。

至于我呢，我自己只想去看看几册破书，所以行踪总只在南新华街的北半截，迤南一带就不去看，若是火神庙那简直是十里洋场自然更不敢去一问津了。

说到厂甸，当然要想起旧历新年来。旧历新年之为世诟病也久矣，维新志士大有灭此朝食之慨，鄙见以为可不必也。问这有多少害处？大抵答语是废时失业，花钱。其实最享乐旧新年的农工商他们在中国是最勤勉的人，平日不像官吏教员学生有七日一休沐，真是所谓终岁作苦，这时候闲散几天也不为过，还有那些小贩趁这热闹要大做一批生意，那么正是他们工作最力之时了。过年的消费据人家统计也有多少万，其中除神马炮仗等在我看了也觉得有点无谓外，大都是吃的穿的看的玩的东西，一方面需要者愿意花这些钱去换快乐，一方面供给者出卖货物得点利润，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见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假如说这钱花得冤了，那么一年里人要吃一千多顿饭，算是每顿一毛共计大洋百元，结果只做了几大缸粪，岂不也是冤枉透了么？饭是活命的，所以大家以为应该吃，但是生命之外还该有点生趣，这才觉得生活有意义，小姑娘穿了布衫还要朵花戴戴，老头子吃了中饭还想买块大花糕，就是为此。旧新年除与正朔不合外别无什

么害处，为保存万民一点生趣起见还是应当存留，不妨如从前那样称为春节，民间一切自由，公署与学校都该放假三天以至七天。——话说得太远了，还是回过来谈厂甸买书的事情罢。

厂甸的路还是有那么远，但是在半个月中我去了四次，这与玄同半农诸公比较不免是小巫之尤，不过在我总是一年里的最高纪录了。2 月 14 日是旧元旦，下午去看一次，十八十九廿五这三天又去，所走过的只是所谓书摊的东路西路，再加上土地祠，大约每走一转要花费三小时以上。所得的结果并不很好，原因是近年较大的书店都矜重起来，不来摆摊，摊上书少而价高，像我这样“爬螺蛳船”的渔人无可下网。然而也获得几册小书，觉得聊堪自慰。其一是戴氏注《论语》二十卷合订一册，大约是戴子高送给谭仲修的罢，上边有“复堂所藏”及“谭献”这两方印。这书摆在东路南头的一个摊上，我问一位小伙计要多少钱，他一查书后粘著的纸片上所写“美元”字样，答说五元。我嫌贵，他说他也觉得有点贵，但是定价要五元。我给了两元半，他让到四元半，当时就走散了。后来把这件事告诉玄同，请他去巡阅的时候留心一问，承他买来就送给我，书末写了一段题跋云：

“民国廿三年二月廿日启明游旧都厂甸肆，于东莞伦氏之通学斋书摊见此谭仲修丈所藏之戴子高先生《论语注》，悦之，以告玄同，翌日廿一玄同往游，遂购而奉赠启明。”跋中廿日实是十九，盖廿日系我写信给玄同之日耳。

其二是《白华绛柎阁集》十卷，二册，一函。此书我以前有，今偶然看见，问其价亦不贵，遂以一元得之。《越缦堂诗话》的编者虽然曾说：“清季诗家以吾越李蓴客先生为冠，《白华绛柎阁集》近百年来无与辈者”，我于旧诗是门外汉，

对于作者自己“夸诩殆绝”的七古更不知道其好处，今买此集亦只是乡曲之见，诗中多言及故乡景物殊有意思，如卷二《夏日行柯山里村》一首云：“溪桥才度庳篷船，村落阴阴不见天。两岸屏山浓绿底，家家凉阁听鸣蝉。”很能写出山乡水村的风景，但是不到过的也看不出好来罢。

其三是两册丛书零种，都是关于陆氏《草木鸟兽虫鱼疏》的，即焦循的《诗陆氏疏》，南菁丛刻本，与赵佑的《毛诗陆疏校正》，聚学轩本。我向来很喜欢陆氏的《虫鱼疏》，只是难得好本子，所有的就是毛晋的《陆疏广要》和罗振玉的新校正本，而罗本又是不大好看的仿宋排印的，很觉得美中不足。赵本据《郘亭书目》说它好，焦本列举引用书名，其次序又依《诗经》重排，也有他的特长，不过收在大部丛书中，无从抽取，这回都得到了，正是极不易遇的偶然。翻阅一过，至“流离之子”一条，赵氏案语中云：“窃以鹗枭自是一物，今俗所谓猫头鹰，……哺其子既长，母老不能取食以应子求，则挂身树上，子争啖之飞去，其头悬著枝，故字从木上鸟，而枭首之象取之。”猫头鹰之被诬千余年矣，近代学者也还承旧说，上文更是疏状详明有若目击，未免可笑。学者笺经非不勤苦，而于格物欠下工夫，往往以耳为目，赵书成于乾隆末距今百五十年矣，或者亦不足怪，但不知现在何如，相信枭不食母与鸟不反哺者现在可有多少人也。

琉璃厂的优良传统

叶灵凤

去年我到北京，在琉璃厂的古籍书店里买了一部《金陵丛刻》。我想买《金陵遗书》买不到，买《日下旧闻》也买不到。

今年又去了，当然仍是由阿英兄陪我去的，到了内部楼上的那座大书库里，接待我们的仍是去年见过的那位服务员。我一直走到史地部门的书架前，还不曾动手翻书，那位服务员已经笑嘻嘻的对我说：

"仍是只有去年的《金陵丛刻》，没有别的什么新的……"

我不觉一怔，这位服务员的记忆力可真惊人。他不仅还记得我，更记得我去年曾经买过什么书，以及想买什么书而买不到。

"那么，《日下旧闻》仍是没有？"

"没有，没有《日下旧闻》。也没有《金陵遗书》。这类大部头的掌故书，近年愈来愈不

容易得了。”

从前人都说北京琉璃厂旧书店的店员记忆力好，对于汗牛充栋的架上藏书，只要一经过目，就能说出它的版本源流、优点和缺点。不仅如此，对于那些常来的顾客，更记得他们喜欢哪一类的书，以及曾经买过一些什么书。所买的是什么版本，书价如何。能够侃侃而谈，如数家珍。现在根据我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优良的传统，在今日的琉璃厂不仅被保存下来，而且更发扬光大了。

以我这样的顾客来说，去年去过一次，逗留的时间也不过一小时，东翻翻，西看看，随便买了几册价钱很便宜的书，当然也同他们随口聊过几句，留下的印象至多是这个外来的顾客还不是门外汉，其他就不该还有什么值得他记忆之处。但这位服务员今年一见了我，不仅记得我在去年同一时期曾经来过，而且还记得我买过什么书，以及想买什么书而买不到，这就不简单了。

北京商店的店员，一向以对人和悦，服务殷勤周到闻名全国。今日新北京各行各业的服务员，对这光荣的传统作风，更懂得郑重的加以保存。忠于所职，勤于所事，为顾客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一点道理，他们一定早已搞通了。因此在琉璃厂的书店里，这才可以遇到将自己的职务发挥得这么出色的好店员。

在同一条街上的荣宝斋画店，那里的风格又全然不同。因为书画是要仔细欣赏的，一切布置得十分舒服宽敞，你到了里面，随意四处走动，仿佛在自己家里一样，他们也不来陪伴你。除非你向他们询问什么，否则总是没有人跟在你的身边，扰你的清兴的。

琉璃厂

黄裳

3 年前来北京，住了 10 天。琉璃厂也去过一次，不过只是匆匆地走了一转，前后一总不过半小时。后来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起，那次来京，没有买到一本旧书，没有听过一次京戏，觉得可惜。不料这句话被朋友记住了。他这次特地到吉祥去买了两张票，又约我吃过中饭一起到琉璃厂去看旧书。使我一下子弥补了3 年前的两种缺憾，真是值得感谢。

6 月初的骄阳已经很有点可怕了。马路平直而宽阔，不过路边的行道树却稀疏而矮小，提供不了多少绿荫。走过全聚德烤鸭楼大厦，走过鲁迅先生当年演讲过的地方——师大院外高墙，随后发现了一座有如小型汽车加油站似的“一得阁”墨汁店。加紧脚步，好不容易才奔到了琉璃厂。看见在荣宝斋对面正加紧恢复兴建原有书铺的门面与店房。“邃雅斋”和“来

薰阁”的原址都已出现了青砖砌成的铺面，除了柱子是水泥构件以外，其他似乎都保存了原貌。橱窗镶上了精细镂花的木框，还没有油漆。这一切看了使人高兴，在大太阳底下也不禁伫立了好半晌。

接着我们就走进了中国书店。朋友和在这里工作的两位老店员相熟，我们被邀坐下来喝茶，看书，谈天。这一切都还能使人依稀想见当年琉璃厂的风貌。不过几十年过去，一切到底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旧样了。

翻翻零本旧书，居然也买到了几册，没有空手而归。

《百喻经》二卷，1914 年会稽周氏施银托金陵刻经处刻本。这是有名的书。37 年前我在南京曾亲自跑到刻经处买过一本，不过已是新印，印刷、纸张都远不及这一本。但这是否就是原跋所称最初印的“功德书 100 本”之一，却也难说，但初印则是无疑的。

此书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印行，是为纪念鲁迅诞辰 100 周年而重印的，而且有两种版本。但到底都不如这原刻的可爱。也许这就是为许多人所嘲笑的“古董气”，不过我想多少有一点也不要紧。

《悲盦居士文存一卷·诗剩一卷》。赵之谦撰。光绪刻本。作为书画金石家，赵抝叔的声誉近来是空前地高涨了，印谱、画集都出版了不少。但他的诗文却极少为人所知。这虽然不过是光绪刻本，但并不多见，“诗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薄薄的一本诗集，中间却有不少史料。太平天国攻下杭州，赵之谦逃到温州，这样，“辛酉以后诗”中就往往有记兵事和乱离情景的篇章，小注记事尤详。“二劝”诗并前序记平阳“金钱会”与瑞安团练“白布会”斗争情形甚详尽，是珍贵的史料。当然赵之谦是站在清朝官方一边的，他对太

平天国的议论自然可想而知。

使我惊异的是，赵之谦对吕晚村也深恶痛绝，没有别的理由，只因吕是雍正帝钦定“罪大恶极”的“逆案”首要。诗注说，“南阳讲习堂，留良居室也。籍没后犁为田。今则荒烟蔓草矣。”这是吕晚村故居的结局。诗注又说，“然理学大儒合之谋反大逆，言行不相顾，不应至斯极也。往居都下，见书摊上有抄本留良论学书数篇，邵阳魏君源加墨其上，言留良人当诛，言不可废。余不谓然，取归摧烧之。”

这种推理方法与行动今天看来都是奇怪的。在赵㧑叔看来，“理学大儒”必然应该也是忠臣，如与这模式不合，就是“言行不相顾”了。当然更不必追究逆案的是非曲直。这是从典型的僵化头脑中产生的思想，是极有价值的一种标本。魏源就和他大不同，虽然不能不承认“其人当诛”，但却肯定了其人的思想，至少他明白两者之间应有区别。但赵之谦不能同意，取来一把扯碎烧掉了。这种行为简直不像是一个艺术家干得出来的。思想僵化之后就有可能化为卤莽灭裂以至疯狂，这里就是一个好证据。

像这样的旧书，是算不得“善本”的，但买到之后还是感到喜欢。这大概就是所谓“书癖”了吧。不用说更早，就是50年代，像这样的书也多半没有上架的资格，它们大抵睡在地摊上。30年来，琉璃厂(以至全国)旧书身价的“升格”是惊人的，根本的原因是旧书来源之濒于绝迹。这在我们的闲谈中也是触及了的，书的来源日渐稀少，这与全国机关学校大小图书馆的搜购有关。经营旧书的从业者也大大零落。仅有的一两位老同志都已白发盈颠，接班人则还没有成批成长起来，青年同志对这一“寂寞”的行业也缺乏热情。谈话中彼此都不免感到有点沉重，但也想不出什么“妙策”。

前一天正好访问了周叔弢先生。93岁的高龄了，他的精神依旧很好，眼睛能看小字，记忆力也一点都没有衰退。只是耳朵有点背了。只要一提起书来，还是止不住有许多话想说，他说的自然都是“老话”，但有许多是值得思索的。

他听说琉璃厂在重建了，非常高兴。但又担心，这些老字号恢复以后，有没有供应市场充足的货色，有没有精通业务的从业员，读者、买书人能不能从琉璃厂获得过去那种精神、物质上的满足，好像都是问题。

典籍、文物、艺术品、纸墨笔砚……，这些都不是单纯的商品，过去读者逛琉璃厂也不只是为了来买书。我想，我们至今还没有足够的、标准的、门类齐全的图书馆、博物馆，但在过去，我们却有很好的替代物。例如，人们到琉璃厂来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奔向一所庞大的、五彩缤纷的爱国主义大学校、展览馆。不只能看，还能尽情欣赏、摩挲品味，可能时还能买回去。这是一座文化超级市场，门类之广博，品种之丰富，新奇货色的不时出现，对寻求知识的顾客带有强烈的诱惑。这一切，今天的博物馆、书店……一切文化设施都不可能完全代替。人们在这里得到知识，还受到传统精神文明的熏染、教养；封建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但归根结底爱国主义内容的比重是占着重要地位的。

过去人们到琉璃厂的书铺里来，可以自由地坐下来与掌柜的谈天，一坐半日，一本书不买也不要紧。掌柜的是商人也是朋友，有些还是知识渊博的版本目录学家。他们是出色的知识信息传播者与咨询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踪迹和学术研究动向，自然终极目的还是做生意，但这并非唯一的内容。至少应该说他们做生意的手段灵活多样，又是富于文化气息的。

在书店里灌了几碗茶，依旧救不了燥渴，这时就不禁想到在左近曾有过一家“信远斋”。小小的屋子，门上挂着门帘，屋里有擦得干干净净的旧八仙桌、方凳，放在角落里的几只盛酸梅汤的瓷缸。那凉沁心脾、有桂花香气、厚重得有如琥珀的酸甜汁水，真是想想也会从舌底沁出津液来。那不过是用“土法”冰镇的，但在我的印象里却觉得无论怎样先进的冷冻设备都不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也许关键不只在“冷”，选料、配方、制做也有极大的关系。这样的“汤”吃了两碗以后就再也喝不下了，真是“三碗不过岗”。酸梅汤现在是到处可见了，人们一致公认这是好东西，还制成了卤、粉、汽水……，但好像都与信远斋的味道有些两样。

不久前在银幕上曾出现过一批以北京地方为背景的作品，其中有些是相当突出的优秀制作。《茶馆》、《骆驼祥子》、《城南旧事》、《如意》、《知音》……。广大观众对此表现了浓厚的兴趣。能不能把这看作一种“怀旧”的风呢？从现象上看好像很有点像。但这与好莱坞曾掀起过的怀旧浪潮并不就是一码事。像这样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出现，那原因往往是非常复杂的。过去的事物中确有值得怀念的东西，历史不能割断，记忆难以遗忘，这是极自然的。不同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则大不相同，好恶也两样。往往许多人都喜欢某种东西，但取舍之点并不一致。鲁迅也是爱逛琉璃厂的，但与某些遗老遗少就全然不同。鲁迅北来也到过信远斋，买的是蜜饯，那是因为天冷了，酸梅汤已经落市了的缘故。

从几十年前起，在北京这地方就一直有许多人在不断地“怀旧”。遗老们怀念他们的“故国”，军阀徒党怀念他们的“大帅”，……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中间很换了不少花样。但这与住在北京的普通老百姓的牵连则不大。比较复杂的是作

为文化积累的种种事物。有几百年历史的名城，这种积累是大量的、丰富的。好吃的菜肴、点心，大家都爱吃；故宫、北海……旅游者也一致赞叹。吃着“仿膳”的小窝窝头而缅怀慈禧太后的，今天怕已没有；游昆明湖而写出吊隆裕皇太后的《颐和园词》的王国维，也早已跳进湖里死掉了。总之，许多事物，在今天已只因其现实意义而为人民所记住，多时不见了就怀念。至于这些事物产生发展的政治历史背景，一般人是不大注意的，或简直忘却。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怀旧”，与任何时代的遗老遗少都扯不到一起去。

研究近代文化史文学史的专家，还没有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近几十年以北京为中心产生的许多文化现象上，其实我倒觉得这是颇重要的，是了解新文化运动的产生与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

以谭鑫培为代表的谭腔、以程砚秋为代表的程腔，为什么先后在北京这地方风靡了一世，我想这和当时的政治局势、人民心理都有极密切的关系。他们创造的新腔，正好表现了人民抑郁、愤激的复杂心情，新腔的特点是低回与亢奋的交错与统一。旧有的声腔，无论是黄钟大吕或响遏行云都已无法加以宣泄了。谭、程的声腔是不同的，这些差异也正好细致地反映了他们所处不同时代的细微变化。

以黄晦闻(节)为代表的新型宋诗流派，或“同光体”的发展继续，也可以看作一种时代的声音。梁启超喜欢集宋词断句作对联，同时搞这花样的还有一大批人。如其中有名的一联“更能消几番风雨，最可惜一片江山”，就不能看作简单的文字游戏。它道出了住在北方的中国人的普遍心情。姚茫父(华)曾为琉璃厂的南纸店画过一套小小的笺样，每幅选吴文英词句，用简练的线条加以表现。我以为也不失为杰出

的作品。画面境界的萧瑟荒寒，不只表现了画家自己同时也是人民的情怀。

30年代林语堂编的《宇宙风》上，发表过不少记载北京风土、人情的文字，后来汇成了一本《北平一顾》，这应该说是有代表性的典型怀旧之作。过去我一直觉得这是没有积极意义的小品文、小摆设，发抒的是没落的感情与趣味。但后来想，这些文字都作于“九一八”与“七七”之间，那正是北平几乎已被国民党政府放弃了的时候，那么，这些文字就不能简单地划入闲适小品，而应更深入地体会那纸背的声音。

在那段时期，像这样的社会文化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综合起来就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人民的内心活动。在许多艺术家或并非艺术家说来，这就是他们反映社会现实的独特方法。

时代发展，社会变革必然要使许多事物化为陈迹，这有时是不可避免的、理所当然的。其中也有一些是还应该存留、或以新的面貌恢复存在的。无论是哪一种情形，我们都应该加以分析、研究，为之作出可信的历史总结。这将为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从而保持必要的清醒，不致陷入胡涂的、低级趣味的怀旧的泥坑，也可避免做出可笑的蠢事。对社会上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的一切事物，人们都必须表态，回避不了。而这正是对人们思想是否健康、成熟的一种考验。

1983.6.10

琉璃厂寻梦记

姜 德 明

现在，北京东西琉璃厂的一些老店铺是正在拆除了。

这里将要建成一座新的文化街，是适应外国旅游者的要求，听说还可以赚外国人的大钱呢。

那天，我站在海王村路口，往西看，邃雅斋书铺的原址不见了；往东看，信远斋的原址也不见了。它引起我无限的遐想，把我对琉璃厂的一些温馨的记忆一下子也都撕碎了。

我并不感伤，我期待着新的琉璃厂快快建成。旧的总要被新的代替，琉璃厂的确古旧破败得可以了，人们要寻觅它的新梦。

一

琉璃厂旧书肆形成于清乾隆年间，已经有

二百多年的历史了。古今来，记载琉璃厂书肆盛况的有多少著作啊，而我记得最真切的还是当年鲁迅先生在这里留下的脚步。翻开《鲁迅日记》，你可以看到当他 1912 年到北京的一周以后便去逛琉璃厂了。从此时有所至，往往隔几天便去一趟，说起来总有几百次之多吧。

1932 年鲁迅最后一次北返探亲，他还留连于琉璃厂书肆，并发现笺纸的可贵，鼓动郑振铎同他合编了一部《北平笺谱》。我常想：鲁迅先生写《中国小说史略》，整理《嵇康集》，拟编汉唐石刻，很多零散的原始材料都是琉璃厂供给的，而鲁迅先生回赠于琉璃厂的却是千古不朽的研究成果，包括目前世界各大图书馆珍藏的《北平笺谱》在内。只有鲁迅先生的眼光才能发现这些行将淹没的民族文化精华。他还预言这部出自琉璃厂书肆的笺纸，可以走向世界而无愧，到 30 世纪"必与唐版比美矣。"琉璃厂应该以接待过鲁迅这样的知音而感到荣耀。

当时身在北京的郑振铎也承认，他的目光的确不如鲁迅先生："至于流行的笺纸，则初未加以注意。……引起我对于诗笺发生更大的兴趣的是鲁迅先生。"又说《北平笺谱》的印成："全都是鲁迅先生的力量——由他倡始，也由他结束了这事。"这些话都见于郑振铎写的《访笺杂记》。

当我还没有到过北京而先读到《访笺杂记》这篇散文时，我便向往琉璃厂，作着梦游厂甸的美梦了。

"留连到三小时以上。天色渐渐的黑暗下来，朦朦胧胧的有些辨色不清。黄豆似的灯火，远远近近的次第放射出光芒来。我不能不走。那么一大包笺纸，狼狈不堪的从琉璃厂抱到南池子，又抱到了家。心里是装载着过分的喜悦与满意。……

“那一天狂飙怒吼，飞沙蔽天；天色是那样惨澹可怜；顶头的风和尘吹得人连呼吸都透不过来。一阵的飞沙，扑面而来，赶紧闭了眼，已被细尘潜入，眯着眼，急速的睁不开来看见什么。……”

鲁迅先生以为郑振铎的这些描写“是极有趣的故事”，也许引起了他当年漫步于琉璃厂的回忆吧。

鲁迅先生是忘怀不了琉璃厂的。不知今天琉璃厂的人们，当你们骄傲地向外国顾客展示《北平笺谱》的时候，可曾想到正是鲁迅先生，以及郑振铎先生完全依靠了个人的微薄力量来发掘和抢救这些国宝吗?

二

三十多年前，当我刚到北京的时候，心里总是想着琉璃厂。我要沿着鲁迅先生的脚步，去重温那些迷人的旧梦。有一天，我终于来到琉璃厂，推开了一家家店铺的门。

这条名街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陋巷，一片荒败的景象。顾客不多，房屋低矮而阴暗，线装书散发出一股霉气，连荣宝斋也空荡荡的，店员闲得正下象棋……我的梦幻破灭了，琉璃厂的盛况在哪里？多彩的文化宝藏又在哪里？

这破败的景象是日伪和国民党摧残的结果，而我们刚刚进城，百废待兴，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正在进行着，一时还顾不上琉璃厂。

多年来，我很少到琉璃厂去。我感到今天的琉璃厂同我所向往过的书肆有很大的不同，书铺越来越少了，这里已经变成一座专卖古玩和字画的小巷。旧书大概都被全国各大机关抢购一空了吧。50年代初，一些苏联专家常来这里搜求

古玩，中国顾客是不能靠前的。到了十几年前，这些古玩铺、碑帖店索性都挂上只接待外宾的告示，自己的同胞连看一看自己民族的古董也不可能了。我也就更加不愿意到琉璃厂来。

还是从旧籍里去寻找温暖吧。

鲁迅和他《新青年》的朋友们，多年来搜求一部古典小说《何典》，始终找不到。1926 年刘半农在厂甸的地摊上偶然发现了，鲁迅高兴地为它写了序言。

一本《碧血录》，是关于明朝东林党人同阉党斗争而被残害的纪事，吴晗一直把它作为珍藏书。这还是他 1933 年在清华大学作学生时买来的，书末写道："在厂甸巡礼，凡帙巨者，虽翻阅不忍释，顾终不敢一置问，偶于海王村侧一小摊得此书，价才三角，大喜，持归。"

朱自清先生也是琉璃厂的常客，他诗咏厂甸：

故都存夏正，厂市有常期。
宝藏火神庙，书城土地祠。
纵观聊驻足，展玩已移时。
回首明灯上，纷纷车马驰。

这一切，终于都是消逝了的旧梦。琉璃厂究竟要以什么来吸引他的同胞？难道是几百元一本的普通的碑帖吗，上千元的一幅时人的绘画吗？

三

目前的琉璃厂，只有一家卖旧书的中国书店。但是，也很少能见到几本可心的旧书了。近几十年来北京古旧书行业的兴衰史，似乎还少有人研究。几百年来琉璃厂的旧书市场

是不是就这样渐渐衰落下去了呢？人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听说，巴黎和东京都有旧书市场和专卖旧书的书铺大街，未来的文学家、科学家很可能最初是从这书摊前起步的。我们正在提倡保护民族文化和发扬精神文明，琉璃厂这地方不是应该吸引着未来的学人从这儿走向他们的理想世界吗！

十几年前，我在东琉璃厂的松筠阁配过解放前出版的文艺杂志，见过书店主人刘殿文先生。他满头白发，沉默寡言，但是一谈起旧杂志来却如数家珍。他能一口气回答你提出的某一期刊创刊于何年，终刊于何月，编者何人，中间是否换过编辑人。如果你想细谈的话，他还可以告诉你，某一期刊未及发行便被查禁了；有的刊物的某一期再版过，等等。他的记忆之精确，令人惊异，素有“杂志大王”之称。多年来他还结合业务著有《杂志知见录》稿本。琉璃厂旧书肆中就有这样的有心人。

有一天，我碰见刘殿文先生的后人，现在是子继父业的刘广振同志，承他告诉我他父亲经营旧杂志的一段掌故。今照录如下：

“我父亲刘殿文是1965年退休，1974年78岁时死的。我祖父刘际唐是1942年死的。松筠阁创设于清光绪二十几年，当然经营的是线装书。我父亲也是学徒出身，是个夹包袱的。您还不知道什么叫夹包袱吧，那时讲究给学者送书上门，把新收来的书拿出头本来当样子，送到人家的府上。五四运动以后新期刊风起云涌，我父亲的思想也紧跟潮流，注意到同行里还没有人留心，同时也看不起的这门新生意。当时的旧杂志很便宜，又因常常遭到查禁，寻找不便，我父亲便走街串巷，四处搜购，每天天不亮就到崇文门外的小市上，从烂纸堆里挑拣期刊。慢慢别的同行知道他专收期刊，

有了货便往他那儿送。他零收杂志，却不零卖，专门为了配套，《新青年》、《向导》、《东方杂志》、《少年中国》，以及《语丝》、《沉钟》等等，都有全套的。

“我父亲是个做买卖的，但是他也是个中国人，有民族感情。日本占领北平期间，很多杂志都有抗日内容，全不能公开出售了，连存放这些杂志也非法。我父亲想了个办法，就大胆地把《东方杂志》等刊物放在书架的最里层，外面又摆上一层线装书遮挡着。终于逃过了日本人的眼睛。

“多年来，我父亲把五四以来的每种期刊都留了一本创刊号，作为研究杂志的样本。到 1949 年已经存了创刊号几千种。几大厚本的《杂志知见录》稿本在十年动乱中也遭到劫掠，到现在关于文艺杂志的那一本仍不见下落。

“说起我父亲的经验，那时也无非是为了生活，如果在旧书行业里不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也许就不能求生养家。在我们旧书业有个行话叫‘单吃’，我父亲就单吃一行，注重经营特色而已。”

刘殿文先生当然有他的局限性，他终归是一位商人，但是公平地说，他也为搜集和保存文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所经营的松筠阁还印过一些有用的书，如有名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等即是。不知道今天的琉璃厂还能不能出现新的“杂志大王”？还能出现那样精于业务，对几十年来各种期刊的来龙去脉倒背如流的人才吗？我想，在新社会更应该出现这样的人才，我默默地期待着。

解放前，在琉璃厂学徒十几年，解放后又在琉璃厂旧书店辛勤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店员们，现在还有不少，我以为他们也都是些经验丰富的人。比如帮助《贩书偶记》的作者、通学斋主人孙殿起整理《贩书偶记续编》的雷梦水君便是。近年

来他又整理了已故藏书家伦哲如先生的著作《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到现在，他还保存着朱自清先生给他的一封信，那是四十多年以前，朱先生鼓励他在琉璃厂不仅要学会卖书，还要拿起笔来写下所见所闻。雷君果然写下了稿本《旧书过眼录》，于图书目录学也大有裨益。

那天，我在海王村碰到了雷君，他手持一份讲义，正要给书店的年轻人去讲业务课，每周两次。我心中为之一动，琉璃厂不是已经开始培养人才，后继有人了吗！

我真想告诉雷君，在他讲课时不要光讲版本知识，也要讲一讲琉璃厂的历史沧桑，特别是外国人在琉璃厂的劫掠，以及唯利是图的书商、古玩商人们怎样帮助外国人盗卖我们的珍品。那时候，我们的政府软弱腐败，日本人从清末便开始在琉璃厂来搜刮我们的珍本册籍了。到了抗日战争以前，他们更疯狂地广搜我们的地方志，为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服务。他们买书时不论本，而是论摞，一摞书只花一元钱就够了。甚至用文明杖一挥，他们就把整个书店的旧书全部席卷而去。这就是我们的很多古籍版本在国内已经失传，而在海外却有留存的原因之一。这些话也正是雷君曾经亲口对我说过的。

现在东西琉璃厂的店铺是正在拆除了。我拣拾一些过往的旧梦，也无非为了向往着未来的新文化街能保持琉璃厂真正的传统。我想，只有当琉璃厂的传统文化和经营特点真正能为自己的同胞服务的时候，也才能真正保持它那永远不会泯灭的价值吧。

琉璃厂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骄傲，当然也应该向外国顾客和旅游者开放，赚一些外汇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琉璃厂

当初并不是为外国人建立的橱窗，我也不相信一个不能很好地为本国人民服务和受到人民热爱的琉璃厂，竟能受到外国人民的喜爱。让琉璃厂发扬它的特长吧，让向往着琉璃厂的同胞们能在这里随意推门而入，就像鲁迅先生当年那样留连忘返。琉璃厂终归是我们自己的！

1981年3月

琉 璃 厂

陈 平 原

到北京来的读书人，罕有不逛琉璃厂的。读《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等清人记载北京风物的著作，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负曝闲谈》等晚清小说，读周作人、胡适、刘半农等人的散文笔记，你自然会对琉璃厂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如果有机会读到李文藻、缪荃荪、孙殿起、雷梦水的《琉璃厂书肆》一、二、三、四记，了解这两百年来琉璃厂作为京都文化中心的兴衰起伏，对琉璃厂的兴趣定然倍增。仿佛到这儿来不只是逛书店，还有参观博物馆或者凭吊先贤的味道。在这条小街上走过多少文化名人，我没做过详细统计；不过我知道鲁迅曾经3个月内来了26次，这有1916年5至7月的鲁迅日记为证。

琉璃厂辽时不过是京城东郊一乡村，元时因建琉璃窑而得名。清中叶后渐成闹市，乾隆

三十八年(1773 年)，四库开馆，文人学士颇有至此游赏访书的，书市乃大发展。此后 200 年，琉璃厂书肆虽有盛衰，可作为京城的文化中心，一直驰名海内外，读书人罕有不闻之心动者。

1958 年公私合营后,各私营书店合为中国书店。1980 年重修文化街，好多老字号逐渐恢复，如邃雅斋，来薰阁、文奎堂、松筠阁、汲古阁等，还有那以酸梅汤和杏脯蜜枣著称的信远斋。不过企业国营的性质似乎没变，起码那几个书店是如此。

今天的琉璃厂，虽说不能跟全盛时代比，可也大有可游之处。先说西街，路北有萃珍斋、荣宝斋、商务印书馆门市部、中华书局门市部，路南有珍古阁、朝花书画社、来薰阁、庆云堂、观复斋、古籍书店、文奎堂、华彩文化服务公司、文物出版社门市部、清秘阁、通古斋、濯锦斋。而琉璃厂东街则有邃雅斋、北京市中国书店第一、第二门市部和机关服务部、汲古阁、瞻云阁、安徽四宝堂、一得阁、松筠阁、墨缘阁等。大大小小各种斋、阁、堂、店，加起来不下六、七十家，也算洋洋大观了。可对我辈读书人有吸引力的，实际上就那么十几家。余者经营珍宝古玩、名人字画，真的买不起，假的又可能看不上，还是眼不见心不烦好。偶尔进去买点笔墨纸砚，或者印石、拓片也还可以，可我没有一逛再逛流连忘返的习惯。不过初来乍到者，也应该进去走走，开开眼界，也听听清闲的营业员在练英语、日语口语。

“朝花”、“华彩”、“文物”都专营音乐美术书籍，“商务”、“中华”又基本上只卖自家的书。剩下那六、七家“兼收并蓄”的书店，都隶属于北京市中国书店。“中国书店”，原来专售旧书，如今基本上都改售新书。

这里曾经是木版线装书的天下。清末民初，开始流行铅印平装书和石印线装书。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72、73回中，就有关于琉璃厂新、旧书店之争的有趣描述。随着价廉物美的平装书的逐步盛行，再加上海内外学术机构和公共图书馆的大力搜求秘籍珍本，琉璃厂所能提供给一般读书人的有价值的线装书必然是越来越少。

其实，琉璃厂书肆的魅力不在于“线装书”，而在于“旧书”。如今谈旧书，当然不只是指明清刻本，还有清末民初乃至五、六十年代铅印的各种书刊。买新书挑选的余地不大，想读什么就买什么，只要书店里有就行了，连讨价还价都用不着。买旧书可就不一样了。不止是个价钱高低的问题，还要考眼力、凭机遇、看胆识，这才谈得上其乐无穷。买新书尽可托人去办，买旧书却必须自己去翻检查询，因为这种访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乐趣。郑振铎的小说《书之幸运》中，主人公仲清买到一种好书，自觉“占了敌国大片土地似的喜悦”。我未曾如仲清访到稀世珍本，可很能体会他的心情。几乎所有写买书记的，都不记其买新书的经历。固然因新书印数以千以万计，根本成不了珍本，除非遭查禁销毁；更因买旧书“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惊喜，绝非买新书可比。前几年我还能在这里买到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李霖编的《郭沫若评传》、冯至著的《伍子胥》、丁西林著的《妙峰山》，以及“文革”前出版的《判断力判断》、《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等，如今旧书基本绝迹。

文奎堂和古籍书店二楼有一点线装书和解放前的书刊，可价钱又贵得吓人，大有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味道。一本1932年上海出版的英文版《中国神话辞典》，600页，标价400元；一套30年代出版的《考古学社社刊》，6册，标价

600 元。我想除了外国学者或哪个图书馆愿意收藏，国内读书人大概没有愿出这笔冤枉钱的。

手头保留着一张 1976 年 4 月 4 日琉璃厂古旧书刊门市部的发货票：共购买《昭明太子集》、《禅月集》、《石柱记笺释》、《文山题跋、石门题跋、遗山题跋》、《于湖居士文集》五种六册(前两种三册为线装)，书款合计 2 元 5 角。那时候“文革”还没真正结束，书籍便宜理所当然；如今科学文化受重视，旧书涨价也可以理解。甚至再新办几十所大学，琉璃厂的旧书一扫而空也说不定。也许正是为了保留几部像样一点的旧书以壮门面，书店才故意漫天要价。跟书店里一位老师傅谈起旧书业的不景气，他却告诉我当年全北京城送到造纸厂的旧书可“海”着呢。当 3 个月后他们奉命赶去挑选旧书时，已不知有多少秘籍珍本早就成了纸浆。言下之意，经过那场浩劫，旧书的来源近于枯竭，旧书业的不景气是不可避免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在琉璃厂能有那么一个真正出售旧书的市场。没有解放前的旧书可卖，就卖解放后的，乃至这几年出版的处理书刊。倘若利润太低，有些书不降价乃至稍微提价也可以。有好些书在新华书店里一闪而过，再也找不着。比如前些年出版的《知堂回想录》，我漏过了，此后虽也寻寻觅觅，却再也无缘得见。把售书的重点放在几年前、几十年前乃至几百年前的旧书，而不是当年出版的新书，这才能保持琉璃厂书肆特有的魅力。要不再过几年，琉璃厂中国书店和王府井新华书店没什么区别，我怀疑这里会成为一个纯粹的旅游胜地，而对真正的读书人失去吸引力。

海王村记

李书磊

旧书店比新书店更吸引我。新书店里的书往往与时下的文化氛围、学术热点和潮流密切相关，往往只是强化和印证你即时的关怀而已，使你多有会心而少有惊喜。旧书店就丰富多了，你根本想不到你在那里会遇见什么，它对书籍完全偶然的搜罗与陈列常使你有匪夷所思的意外感，感受到冒险和随缘的双重快乐。而且，你还常常会从那里得到一些早已被文化记忆系统所遗忘的书籍并从中受到重要启发，这就弥补了文化的正统传承与你自己自觉阅读的不足，作为一种学术机会是颇有意义的。所以我总觉得旧书业的发达与否是一个城市文化水准的天然标志。

在北京并不值得夸耀的旧书业中，当然是琉璃厂最有规模，琉璃厂中又以海王村为大。今年8月4日我来到海王村古旧书店，走进正

厅就被摆在中央的一方巨大的端砚镇住了，看标价是 35000 元。这正厅卖的全是文房四宝，书籍反被安排在极不起眼的侧房中。不愧是物质主义时代，文具竟得堂而皇之地居于文化之先；不过这样也好，书籍的深藏使其失去许多顾客反倒是增加了我选书的机会。这书店大约分成线装古籍、1949 年前的现代旧书、1949 年后旧书和外文旧书四部分。线装书的价钱动辄成千上万，我看一眼就赶紧走开，这要价的蛇蝎心肠使我感情受伤。1949 年前的现代书价钱也不善，一套初版的《胡适文存》用绳拴着摆在架上，我问多少钱，售货员看我一眼回答说 400 多。她没告诉我多多少，大概看我也不像买贵书的人。我确实不买太贵的书，第一是没钱，第二也是因为不平；既然我买孔子、爱因斯坦这些圣贤的书才花数元钱，我就觉得任何人的一本书向我要数百元钱都是一种无耻。并非是不知道版本之类的重要性，但临到眼前这旧书的文物价格仍使我感到气恼。据说中国的旧书是被日本、韩国的汉学家买贵的，这又一次使我们感到了市场经济的神奇。

不过，走出海王村时我还是有点心满意足的，因为这里英文旧书相比之下堪称便宜。1949 年版玛丽·列文(Mary Lavin)的小说《克利弗街的房子》才 5 元钱，1913 年版简·奥斯汀的《理智与情感》也不过 15 元。在我以 20 元以下的价格买得的英文书中，印刷最精美的要算是莫斯科外文出版社 1948 年版的《别林斯基哲学著作选》，500 多页足有三四斤重，序言中也对别林斯基高度赞美，见出刚经过生死之战的俄罗斯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加倍珍惜。当然这些书中最触动我的是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水仙号上的黑人》。康拉德的小说在大学时代曾唤起我对大海的无限神往，并由此引发

我一种难以言说的浪漫主义情怀；如今时过境迁，心境不再，在这间昏暗的旧书店里无端地遭逢少年证物，使我感到一种微微的刺痛。

另外还有两本书引起我的兴趣，一本是威格姆(A. E. Wiggam)的《科学新十诫》，另一本是柴奥兹(T. L. Childs)的《教育与实验主义哲学》，这两本书都出自一个原主叫吴叔班，扉页上都有吴氏的印章和签名，并有“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落款，日期都是1931年。书都经过吴氏仔细的阅读，满书都是他用铅笔做的记号、问号和眉批。想来吴氏该是30年代初俄大的中国留学生，大概还是很用功的学生，可惜后来竟默默无闻使我们难考其行实了。翻读这书我忽然生出一种感受和感慨，想近百年来无数中国学生和学者出国求学，是他们一点一滴地给我们带来了域外的思想、文化至少是书籍，他们中的大多数我们已是受其惠而不知其名了，对这些无名者我们应该格外致谢。美国汉学家雷诺兹(D. R. Reynolds)说他反对文化上的英雄史观，认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创造者不是那些被推举的名人及其代表作，而是包括无数无名者在内的全体知识分子(《新政革命与日本》)。我很赞同他的话。

北平的书摊儿

唐 鲁 孙

在北平，读书人闲来无事最好的消遣是逛厂甸溜书摊。厂甸在和平门外，元明时代叫海王村，清初工部所属的琉璃窑设在该处，所以改名琉璃厂。从厂东门到厂西门，街长2里，廛市林立，南北皆同，这些店铺以古玩、字画、纸张、书籍、碑帖为正宗，从有清一代到民国抗战之前，都是文人墨客访古寻碑、看书、买画的好去处。每年从农历正月初一起，经市公所核准列市半个月；海王村里是儿童耍货，所谓琉璃喇叭、糖葫芦、大沙雁，各种吃食如凉糕、蜂糕、炸糕、驴打滚、爱窝窝、豆汁、灌肠；小贩仿佛各有贩地，年年在原地设摊，居中是几家高搭板台的茶座，居高临下得瞧得看，既喝茶，又歇腿；村里边边牙牙地区，就是些像荒货，又像破烂古玩摊了。海王村外书摊大摆长龙，有些书店在自己门前，设

摊营业，有的是别处书商赶来凑热闹的，大致可分木版书、洋装书两类，还有卖旧杂志、旧画报的。吴雷川先生在这种书报摊上，买过88本全套的《国学萃编》；丰子恺收藏《点石斋画报》，就是溜这种书摊补齐的。

好的宋元明清版本精镌的古籍，书店恐怕放在外面风吹日晒，纸张变脆变黄，多半把书名作者，写在纸条上，夹在别的书里。纸条垂下来，给买书者看，如果中意，摊上招呼客人的伙计，就把客人引进店里来了。

琉璃厂专卖讲究版本的书叫旧书铺，最有名、存书最多的有翰文斋、来薰阁、二酉堂、经香阁、汲古山房几家。他们书的来源，多半是由破落户的旧家整批买进来的，这一拨书里可能有海内孤本，也可能有鼓儿词、劝善文，有的到手就能很快卖出去，有的压上三年五载也没有人过问；年深日久，一家大书铺的存书，甚至于比一个图书馆还多还齐全。旧书铺的服务，有些地方，比图书馆还周到，北平之所以被称为中国文化中心，由北平旧书铺，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

旧书铺里，总有两间窗明几净的屋子，摆着几张书案长桌，凡是进来看书的人，有柜上的徒弟或伙友伺候着，想看什么书，告诉他们，一会儿就给您拿来；如果参考版本，他可以把这本书不同版本，凡是本铺有的，全部一函一函的拿出来，任您查对；有的资深伙友，告诉他要找什么样资料，他们还可以一页一页的给您翻查，如果有些书客人想看，而本书铺恰巧没有，他们知道哪一家有，可以借来给您看。请想想，这种方便，不管是哪家图书馆不论公私都办不到吧！

看书时，抽烟柜上有旱烟、水烟，喝茶有小叶香片、祁门红茶；如果客人想吃什么点心，客人掏钱，小徒弟可以跑

腿代买，假如您跟柜上有过交往，由柜上招待，也是常有的事。不但此也，您跟书店相熟之后，酷暑严寒您懒得出门，可以写个便条派人给书铺送去，柜上很快就找出送到府上；放上十天半个月，您买下固然好，不买也没关系，还给他就是了，这就是北平书铺可爱之处。像南京夫子庙左近也有不少书店，您要看了半天不买，他们绕着弯俏皮您几句损人的话，能把您鼻子气歪啦！

清朝光绪年间所谓清流派如张之洞、洪钧、王仁堪、潘祖荫、文廷式、盛昱、黄体芳、梁鼎芬、于式枚都是琉璃厂书铺的常客，既可多看自己手边没有的书，又可以以文会友；时常有许多朋友不期而遇，凑在一块研究学问，或是聊聊天。张香涛就是主张多往书铺看书的，他有两部专讲目录学的书，初稿就是在二酉堂写出来的。翰文斋的掌柜的韩克庵，大家都叫他老韩，他对于目录学、金石学，精心汲古搜隐阐微，能令舒铁云、王懿荣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民国初年先母舅李锡侯在琉璃厂西门，把先外祖鹤年公累世收藏的古籍金石整理陈售，开了一家汲古山房。陈师曾、樊云门、傅藏云、沈伊默、瑞景苏、柯劭忞，都是汲古山房常客。当时我想收集名贤书画扇面100把，半年之间不但收集齐全，而且都配好各式各样扇骨子，由此可见汲古山房当年人文荟萃，朋从之盛了。

初来台湾时，台北福州街厦门街之间，还有几家书铺书摊可逛，现在如果发现哪儿有一套或几本线装书，简直有如沙中淘金，掘到宝藏了。来到台湾，令人念念不忘的，就是旧书摊了。

北平旧书肆

商 鸿 逵

我记得在《人间世》某期上读过一篇“书店”觉得写得很好，很在行，只是所写多偏于上海新式书店，这截止到现在还不失为中国旧文化中心的北平城里那些“旧书肆”，却也蕴藏有不少“奥妙”，趁今闲暇也写它一写。

北平的旧书肆区，在老年，就我所知，有一厂二寺，厂即琉璃厂，它是具有几百年历史的，迄今未衰，“厂肆”二字在中国藏书史上，至少是免不了要提提的一个名词吧。二寺即慈仁寺与隆福寺，慈仁寺(今名报国寺，在宣武门外)在清初颇兴旺，顺康间人笔记中常见述及，如今却是连一些书影儿也没有的了，隆福寺起初只是些书摊，每逢会期，赶来摊卖，现在发展的也不下二十家肆了，其中还有几家规模够大的。记得去年南方某书店来北平采购旧书，先到隆福寺，进入一家，骤睹琳琅满目，便拣

选了些，又进一家，又买了些，顷刻用去数千元，后来又到琉璃厂，见藏书之多且十倍于隆福寺，未见大买，囊资已尽，遂赞叹叫绝而返。

过去书中谈及厂肆等地方的很多，专记的有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缪荃荪后记，叶德辉买书行等，以繁不引，只叶氏书林清话上有几句话："吾官京曹时，士大夫犹有乾嘉余韵，每于退值或休务日，群集于厂肆，至日斜多挟数破帙驱车而归。"这种余韵，今日犹有，什么考究版本的鉴赏家，爱往旧书堆里钻的大学教授，附庸风雅的买书者，侨居我邦、研究所谓"汉学"的洋人等等，都算是厂肆的当期主顾。

书肆主人，已往都是江西金溪籍，兼有江浙籍，盖皆南人也。到现在却多换了别地方人了。这里面怎样一个衍递，不甚了了，或谓，在先之南人，多为进京会试，名落孙山的举子，赧颜归里，便思作生意，旁的生意不曾作，只好卖书，念书人卖书算最接近的一行了。可是，虽然作生意，究系"由儒而买"，难免要带点"酸狂气"，对于奉承，自然差忒。偏巧一般买书的达官贵人又好"奉承"这个调调，纯生意人于是便大得手了，主顾一到，装烟倒茶，躬出揖入，一味周旋，再加上他们的"负苦耐劳"精神，渐渐便夺去江西人之席。就我所知，某书肆主人背包袱时，每串大宅第，常当人面从袋中取食黄粱窝，询以故，则诉曰："卖书能有多大赚头？不得不吃这个！"如是，人怜其苦，便不与他争值了。这套把戏，酸狂举子，怎末能扮得来！

说到作生意方法，旧书肆与新旧出版家又大不相同。新书目是要拉些有名作家作后台，旧书却全靠采护所得，大一些的书肆，差不多常年要派人到各省各县去收买，性质颇近

古董商，有时虽一无所得，有时可获利无算，像那部哄传一时的“金瓶梅词话”，在山西来时才数十元，一转手便卖了数百元，再转到购主便千数百元了。

近年的刻板书价总都算涨，原刻或刻得精一点的都贵的了不得，宋元板不谈，即小说戏曲之类，一部“贯华堂水浒”就要五六十元，“清晕阁牡丹亭还魂记”非百元莫办。去冬我见着一部“十二律昆腔谱及京腔谱”想买，开口便索价 400，近年更有人搜罗淫词小说，两本“旧刊肉蒲团”也值 20 元了。

书价的涨落也看风头，胡适之先生谈了谈“传记文学”，谈到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梦痕录立刻涨价，林语堂先生表表袁中郎，中郎集又涨起。

县志近年价也大涨，大概是先有某国欲考索中国风土地理而采买，随着我们也感觉这个重要而争买，一部偏僻不经见的县志，论本头也须一二十元。前天一书贾向我说，要有一部“香河县志”(属河北)能卖 80 元。

“禁书”也了不得，载在禁书目录的书，不消说是卖大价了，即现在还在禁的那部清史稿，原定价百元，现售至四五百元，书是不管好坏，一禁便贵。

传钞作假，更是旧书肆的拿手活，遇到罕见的书，不管刻本、抄本，他们能用染制好了的旧样丝栏纸誊写上几部，有时会当“传抄未刻本”卖，一捆烂卷残稿，他们能描改挖补，装帧什袭，杜撰个名目，充“稿本”去骗卖。前年有书贾持一旧纸影印“玉台新咏”，冒称明刊到某图书馆求售，结果，居然被欺，用重价收下。

卖书还须有一种手腕，是攀交名流，要名流作甚呢，名流能替介绍主顾，凭他一言，书既可留，价且多给，名流乐

得接近他们，一来能借着多见些好书，长长见识，二来，高明些的书贾，他那点“横通”工夫，却真也“颇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者”(章实斋语)。原来旧书主顾，尤其好讲究点“版片”的，常离不开这些；规模大些的图书馆，中或外，或中外组织的学术团体，少数有力的收藏家，这些，非是名流在那儿主持，也和他有关连，有友谊。

这般书贾的记忆力也特好，谁已有何书，谁尚阙何书，谁欲觅何书，谁不收何书，胸中都有个大概，他在收买时固早在留意，拿来时你也定会十九中肯。

截至今日止，旧书肆生意，总算不恶，不过，今而后，便不敢说了，图书馆以连续的收贾，普通些的都有了，外邦人因金价跌落，搜罗之勇，也大不似从前，私人收藏家又越来越少——最欢迎的自然是私人收藏，因私人资财的持久无把握，子弟的优劣无把握，无论到哪个无把握时，书便会“流通”出来。图书馆藏书却是“一入侯门深似海”，永远不得再与“市”见，图书馆拍卖藏书，机会总少吧！这么一来，所谓“珍惜”，能经过书肆人之手者日稀，生意也便日稀了。

一般新出版家的影印旧书，也给打击非小，有了影印精版的，谁还肯买劣刻的，商务印书馆印了各省通志，通志只好落价，中华书局影印了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谁还肯花500元买那集成局两羼纸的匾字本？

以我看来，旧书肆今后若想发展，还须另寻途径。

北京的书店和书摊

—燕尘摭旧—

吴 小 如

我年近70年，从1932年起，在北京前后一共住了近50年。中间有15年移居天津，但每年总要来北京小住，或来度假(寒暑假及春假)，或来读书，加到一起，足够半个世纪了。平生所嗜，一是看戏，二是买唱片，三是买书。买书当然要逛书店和书摊；现在就来谈谈这方面的经历。

1932年初来北京，除看戏外，便是逛琉璃厂。当时琉璃厂有几家新书店，最大的是厂西头路南的商务印书馆。那是一座楼房，虽不高，但在众多平房瓦屋中便呈鹤立鸡群之势。而中华书局的门面就不及商务阔绰，因兼售文明书局出版的图书，我也不时光顾。当时新书店至少还有三家是我常去的，一是有正书局，二是神州国光社，三是会文堂新记书局。有正

主要是卖碑帖，并代售上海扫叶山房石印线装书，书品不精，但价格低廉，比较实用。神州国光社书价较昂，但时有冷门货。会文堂则多售小说，我到会文堂是为了买蔡东藩著的《历代通俗演义》。蔡书彼时尚为线装石印，十册一函，我只读了前汉、后汉、两晋、南北朝四部，每部价不足大洋二元。我的历史知识大都是从那时开始积累的。读前、后汉时，甚感兴趣；而两晋则写五胡十六国，南北朝则时而宋齐梁陈，时而东西魏变为北齐北周，头绪太纷繁，又记不住，便失去耐心，所以从《唐代通俗演义》以下就不再问津了。

琉璃厂的书店还延伸到迤东的杨梅竹斜街，如上海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在那一带都有分店。我和舍弟同宾曾把零用钱积蓄起来竭尽全力买了一部平江不肖生(即向恺然)著的《江湖奇侠传》，是世界书局原版排印本。这部小说我们看过不止一遍，后来终于丢失了。去年舍弟到中关村舍下来看我，竟在我住所附近沿街书摊上又买到一部翻印的《江湖奇侠传》，大有“浮屠三宿桑下”之意。其实我也有这种对儿时读物未能忘情的时候，故《霍桑探案》和《新新外史》的新印本又在敝架出现，而且在去年病中重读了一遍。

当然，自30年代至全国解放以前，琉璃厂主要的铺面还是旧书店。有名的如来薰阁、邃雅斋等，不但规模大，且印有书目，凡老主顾皆无偿奉赠。在先父玉如公的书筒中，有若干种都是当年北京琉璃厂旧书店所赠的书目。一编在手，眼界大开。我的版本目录知识，有一大部分是从这些书目中得到的。惜十年浩劫中荡佚无存，一本也没有了。

除了琉璃厂，东四隆福寺街也有旧书店若干家。直到50年代初，我还经常到这条街上的修绠堂、东雅堂等书店去搜求书籍。公私合营后，各家旧书店皆统一于中国书店。

当时我还得到一张“允许入库”的购书证。凭此证我到过琉璃厂、灯市口、演乐胡同等各大藏书“库”中，可以从架上自取选购。在这几处旧书集中地点，经常遇到的有何其芳、吴晓铃、王利器诸先生。最遗憾的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在琉璃厂中间路口的中国书店最后面的“库”中发现不少可买之书，称得起价廉物美。只缘当晚要去参加一个宴会，不宜多携笨重书籍，只用极低代价买了若干锭旧墨。谁知这一次与这些古旧线装书竟成诀别。十年浩劫俄顷即至，自己藏书损失了不少。近年来居处狭隘，书厨已无处安放，不敢放手买书。加上古书价日昂而货愈稀，就算再到中国书店，也非复畴昔所见之书和当年所标之价了。

谈北京书店，不可不谈东安市场。市场有书店和书摊两类，自30年代初即已如此。我有时到吉祥戏院看戏，往往先逛书摊书店。其特点是新旧书都出售。彼时如佩文斋代销人文书店出版的平装书，不少书摊都经售鲁迅主编的未名丛书和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这些都属于新书。而30年代中期最流行的则为各种一折八扣的平装书。这类书错字多而句读讹，很难登大雅之堂。但优点是价格便宜，书价比纸价还贱。且中多生僻罕见之书，起码能满足穷学生的求知欲。还有一个特点是雅俗杂陈，我旧藏有大东书局排印本王大错编《戏考》凡40册，都是在市场的书摊上买到的。记得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围城之际人心惶惑，东安市场寂如僧寺。有一天我竟故作好整以暇，去逛东安市场的旧书摊。四顾环望，原来只有我这唯一的顾主。于是群贾一拥而上，几乎半哭着央告我买他们点什么。我一时动了菩萨心肠，竟以两个窝头的代价买到一部精装的商务版大学丛书，即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上下册是也。一例既开，乃不可收拾，其他书

商竟将我团团围住。我紧抱着两本《中国音韵学》狼狈地杀出重围，走出市场犹心有余悸。只恨当时阮囊羞涩，无力多买，否则所得将远不止此。

还有一次是1958年初，时值“反右”之后，“大跃进”开始之前。当时东安市场内碑帖门市部不仅门可罗雀，而且室无灯火，阴森可怖。我踽踽独行，从容踅人，以极低代价买到《雍睦堂法书》和拓本《敬使君碑》各一册。后者裱工颇精，且附碑阴。及60年代，虽几度问津，已鲜有所获。这一碑一帖劫后仍存，至今犹可供临池之用，亦云幸矣。

记北京旧书店

刘 自 立

近一段时期，每逢周末，都去北京南城的报国寺旧货市场淘旧书。陆陆续续，已买到许多民国版旧书，如《马相伯先生文集》、《吴稚晖学术论著》，《修辞学发凡》，系陈望道先生继《马氏文通》一书出版后所著有关汉语修辞的研究著作。此外，尚有民国版张天翼先生之《大林和小林》，书中插图和1949年后重版的此书之插图不同。译文类也选获不乏，如林语堂先生之《苏东坡传》的中译本(原书系用英文所写)，林纾之《块肉余生记》译本等。报国寺旧书摊与潘家园旧书摊，是眼下北京最看热的旧书摊，海内海外、京城上下的爱书者都对其有兴趣。报国寺乃明代的一处道观，坐落在北京牛街附近，南面即是环路。环路西侧的现代大厦正在逐步扩建东来，很有一点要“威胁”此寺的架势，一如北京的许多老建筑，都面临

着被这些高楼围裹其中的命运。进得院内，地摊横陈，多是出售古玩古器如旧钱、旧画、“出土”文物等。另一特色就是出售“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像章，种类繁多，难以胜数，像章之外，尚有毛泽东语录、毛著，“文革”小报等。几进套院最北面的一处，尚在近期展出有关《红灯记》的各种材料，含图片、唱片、角本等，很有一番“招魂”“文革”的气氛。当然了，搜集这类货色的人，并不都是崇尚与追忆“文革”者，而多是贩此倒卖，以赚其钱。看来，“文革”的最后一点“油水”还未被榨干。在另一方面，关于“文革”的思考，却并不像这里的毛泽东像章那样，辉煌于白日阳光之下，收获可盼。

由此想起20年前逛北京旧书店的情形。

每忆至此，首推对琉璃厂的回忆。琉璃厂在海外的影响很大。但是，70年代初这里曾在现代“焚书坑儒”的运动中，一度保存和出售过一些旧书的事，并不太为人所知。笔者从60年代末开始恶补“文革”的书荒之饥，闻琉璃厂可以买书，十分意外。于是，按照要求，托母亲开出一枚部级单位介绍信，盖上公章，赶赴那个书店。不像今天，当时琉璃厂大院在南面有一大门，上写“中国书店”的字样。进得大门，走过一个广场——两侧也是书房，临街，也有店门向街道敞开的——直奔北面一座两层小楼。门房收取介绍信即可放人入内。里面有几间房子，面积多在百十来米，四壁皆书。一正厅中，尚放有沙发、茶几，买书人可在此小憩。浏览书架，书真不少。除“解放”后版，还有不少民国版，甚至更早的出版物。记得我当即挑中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高寒译，据查即楚图南先生)，柏格森之《突创进化论》(张东荪译)，高名凯的《西方近代哲学史》(高氏除系著名的

语言学者外亦修哲学,著译亦丰)。书价在当时很低，尼采书价格一元人民币，柏格森的书不到一元。

知道琉璃厂有书的人，大多是顽固看好看重“封资修”“大洋古”的知识分子，都跑到这里“抢购”。我曾随社科院近代史所一老伯一同去过几次。他也买了不少书。店内，这类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并不少。他们多一语不发地把十分近视的眼睛盯住书架，旁若无人，无“文化大革命”，一派世外有景的感觉。实际上，70 年代最初两三年，社会上的书只剩下《金光大道》等可以数出的一两本。想来，那时的畅销读物在琉璃厂这些买书人的眼里是不算数的。这一点多可肯定。

除琉璃厂外，灯市口的中国书店外文部也有书可看可选。那时，我们小青年正跟着乔冠华从美国带回来的一批《英语 900 句》学英文(除此之外,还有塑料唱片《灵格风》等英文教材，可供一读）。所以，发现这个卖外文书的地方，自然喜出望外。又，我的一位朋友父母是研读英语文学的，他家的英文书藏颇丰，也十分有兴趣去灯市口。

此店外文部面积不大，或可有二三十平方米。但书架上的英文书很不少。大至《卡莱尔全集》、《格罗夫音乐大辞典》，小至袖珍本《英诗金库》——都是硬皮本的小诗集、小散文，——如拉斯金、阿诺尔德、罗赛蒂等，都定价三毛钱。大一点的英诗也不少，如王尔德、柯勒律治、布雷克的诗集。我们当时的生活除读书学英文，也因对政治的极度失望而全身心扑在艺术上。所以，灯市口出售的西方艺术史、西方建筑史，同样引起我们的极大兴趣。因书价十几元，对我们这些知青来说是开了天价的，所以只好“采取行动”以“截获”之。于是，小兄弟们从父母的衣橱里找到“文革”

时无人再穿的皮领、细呢大衣，穿上父亲时代的“尖头曼”(gentelman)——一种“老式”皮鞋——打扮成一派富有纨袴模样——一两个人与店员攀谈，另一两个就开始……去灯市口，成为青年时代我们的一大乐事。迄今翻看当时的英文诗、文集，仍旧受益匪浅。可惜灯市口中国书店外文部因书源不足，只出无进，一两年内，很快告竭。80年代去过那里，店内格局已改，外文部被占大半，只剩下一间小屋，外文书也几近不存，剩些画报、杂志类。如今，琉璃厂书店东侧长廊内仍有卖外文版书的，可惜都开天价，一本英诗集卖到二三百元，一本胡适著作，品相已残，卖到五百元，已无人问津。

若说旧书肆、旧书摊，王府井东安市场的旧书廊我还有印象。记得初中时还买过那里的书，如《震撼世界的十天》。约·里德对托洛茨基的评介在我少年时代的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只有列宁和托氏的演讲，才能震住全场，呈现一种魅力“场”。这是里德的客观记录(一直到90年代中以后,大陆出版物中,方才出现肯定托氏的译著暨郑超麟先生关于中国托派的据实记载文字。而陈独秀与托派的历史与思想脉络，也才得廓清)。

70年代西单商场内尚有一旧书店，也称“内部”书店。门里很小，厅堂狭促，但也有书可买。我获购英国工党政治理论家拉斯基的《当代革命》。据前辈当时告诉我，是一本名著。以后，我家住沙滩西斋，和北大老教授吴恩裕先生同院，闻知他与修政治思想史之萧公权先生都为拉氏之学生。惜当时年少，未能多加求教之。出“内部”读物，是大陆出版界的一大怪事。上了一定等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即有权买这类书。比如，父亲当时就买了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所谓

"黄皮书"。70年代初，父亲去世后数年，我在他的老同学家一位老伯那里看到"内部"出版之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读后有惊心动魄之感。他所引用荷尔德林的欲入天堂实下地狱的论断，绝对的权力即绝对的腐败的警策名言，都从此烙刻心间。

"内部"出版物与"内部"书店，至今尚存在于京城。前此所述郑超麟老先生的书，就有"内部"的。而北京六部口一带，就有家"内部"书店，像"文革"时去琉璃厂一样，尚要带一封介绍信。一次忘带，被阻之门口。都21世纪了，还什么"内部"！大可"拆"之为快了。

读旧书，大有益，如读《马相伯》。近来，一家报纸通版载纪念马建忠之《马氏文通》的大文，写得不错，但读相伯先生文，才知马氏兄弟二人都参与了《文通》写作，只是相伯儒忍，将名位相让于其弟也。又，此文虽称陈望道组织人研究语法事，但未提到他的大作，即《修辞学发凡》。我获购此书出版于新文艺出版社，是上海民智书局版的重版吧！1932年，刘大白先生为序。有关此书与中国文字语法事，他说：

"中国人说了几百万年的话，并且作了几千年的文，可是一竟并不会知道有所谓有系统的文法。直到1898年，马建忠先生底《马氏文通》出来，才得有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古话文的文法书。"又说："直到1931年，陈望道先生底《修辞学发凡》出来，才得有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语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

所以，《修辞学》一书之得，意义弥深也！

粗计一下，鄙人近期所购之书已有：

《马相伯先生文集》 北平上智编译馆

《吴稚晖学术论著》 上海出版合作社

《闲情偶寄》（李笠翁著）贝叶山房张氏藏版

《马凡陀的山歌》 三联版

《六人》（巴金试译）文化生活出版社

《俄罗斯女人》（涅克拉索夫著）平明出版社

《两林的故事》（即《大林和小林》）张天翼著 上海文光书局

以及《旅顺口》、《海上述林》、《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胡适留学日记》等等。

1949年以后的旧书也有非常珍贵的，如70年代北京外文局(即外文出版社)出过一套外国文学译丛。70年代的哪一年，我拜读了《1984》。在那时译奥威尔的书是要有胆识的。在报国寺，一广东小贩出售三本黑色硬纸面的这套丛书，书价不过15元人民币。因我母亲当时在外文局工作，她是订了这套书的，所以才得见之读之。但惜以后家庭个人动乱或乱动，多已失却。此番买下，拾遗补牢为幸。另，潘光旦先生之译《性心理学》一书，流于书摊者较多，为霭理士所撰，买之也可。近友人徐晓女士携助潘氏家人出潘氏文选四本一套，她也送给了我一套。两书间隔已有近半个世纪。潘氏命运险恶，不堪细述之。近来，有学者讨论游民文化，此说出现，引发争论，不知中国政坛上游民文化之意义究竟如何与儒释道摆平关系。而开明版《闻一多选集》中所录闻先生观点十分有趣。闻氏云，“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

这是闻氏援引之英国人韦尔斯先生的话。之后他补充道，

但我们对韦尔斯先生的拥护，不是完全没有保留

的，我认为假如将‘儒家，道家，土匪’，改为‘儒家，道家，墨家’，或‘偷儿，骗子，土匪’，这不但没有损害韦氏的原意，而且也许加强了它，因为这样说话，可以使那些比韦氏更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人，感着更顺理成章点，因此也更乐于接受点。

闻氏此观念，不知对上述游民思想之大构有无裨益。只是觉得，如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牟宗三……诸位，可能会弃冠而怒了……

读旧书，买旧书，中国有着她的历史与时兴，国外亦然。笔者一友为社科院外文所专研索尔仁尼琴之专家。他在俄国买的《罗斯特罗波维奇传》，厚重阔大之十六开本，内文内画十分精彩。有此著名琴师和许多乐坛闻人的合影、演出照、音乐厅照。他买的普希金画的“色情”画，画如其诗，诗如其人，风流情种，跃然纸上。俄国旧书，大多装帧考究，纸张上乘，品相极佳，不像北京旧书已旧、已脏。我在国外出访时，也关注旧书。今年去苏黎世，所住旅馆前一小广场上，周末就出售折价书。我见过英文版的《奥威尔文集》，其中《1984》、《动物庄园》，都入集。塞纳河，萨尔茨堡，都有卖旧书的，惜人如乐符，画影匆匆，未及深览，引为今憾。

旧书封尘，要靠人的脑筋去洗。许多旧书的流失是一种遗珠现象——而今天，书中败笔、败类，常常以新为傲，全不知那句老话，“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可悲。

来薰阁琴书店

——琉璃厂杂记

[日本]吉川幸次郎
钱婉约译

昭和三年到六年，即1928～1931年，也就是民国十七年到民国二十年，这三年间，我作为留学生，在北京生活。这期间的记忆，值得反复回味的美好印象：不在剧场和戏院，不在饭馆和餐厅，而在古书街市。城内的隆福寺，城外的琉璃厂，占去了我北京生活的1/3的时间。将这份记忆草草成文，甚觉可惜，但被人要求写一篇关于书籍的随笔，首先想到的题目就是这个。

北京的内城是宫殿地带、政府办公地带、住宅地带；北京的外城是商业地带，将内、外城隔开的就是北京的城墙，城墙四方有四个门。出南城墙西侧的和平门，越过铁路线，往南走二、三町，过了师范大学的大门，有个十

字路。以这个十字路为中心，就是北京最大的古书店街——琉璃厂。

我的人力车，一般总是先在十字路口往西拐，向前行至南侧的第三家门面即来薰阁琴书店前停下。书店中可见的，虽与其他书店并无二致，一样是函装的中国古书，但这里不愧是琉璃厂第一新派人物陈济川经营的书店，在进门处改装成了全幅的玻璃门面，因此，我的车一到，店内透过玻璃门就能看到。这时，急忙走出相迎的，是主人的弟弟——二先生。而我的人力车费，一般就由他交付。

"吉川先生来了！"

他身边的四五个伙计，也都一齐站起来，向我点头行礼。而这里只是朝向街面的一间，不是接待我这样的老顾客的地方。这里，书都一律沿墙往上堆积，一直充斥到屋顶，而且都是那些通常惯见的书。

"请！请！"

我穿过这里，又穿过一个小的院子，来到最里面的屋子。

主人陈济川就在这间屋里。但他非常非常地忙，转眼间就离开这屋的情况也很多。或是出去接阅、分检同行不知从哪里买来的一大堆书，或是到书业总会去碰头见面。

但是只要接到店里派出的小使的通知，他一般就能回来。一跨入房间的门，就说：

"先生好！"

照例是灰色的长袍，北魏佛像那样的容颜。

我也立即站起来回礼道：

"陈先生好！"

没有敬语的中国做法。中国商人一般不使用卑微的语

言。特别是学者和书店之间，是对等的关系，彼此文雅而交。

我们俩就面对面促膝而坐，抽着烟，喝着茶，开始闲聊。话题多半是关于学者们的传闻。

然后，我就开始巡视那由书帙堆积起来的古籍的书壁，而对地上堆放的散书也捡起来翻翻，问：

“最近又进了什么新书？”

“喂，小二……”

随着他的声音，一个小伙计走上前来。他把一些装在书帙中的，或是没有装入书帙的裸书，恭恭敬敬地放在我的面前。书店里有十来个这样的小伙计，刚来北京时，我不知道怎样称呼他们好，后来，问了陈老板，他的回答也仍然是“先生”，很雅的称呼。

“因为学者与书店之间是以朋友相交的。”

原来，在中国，“先生”一词不像在日本一样，是那么庄重的敬称。

我翻看着由这些小“先生”们搬来的书，他自信地说：

“是好书吧！”

“不错，说得正是。这个，我买了！”

钱当然不是立刻付。而只是在每年的5月5日，8月15日和年终三次分付，而即使是到了这三个时间，全部付清书款的顾客也属少数。与他谈得欢时，有时就留下吃饭。端菜盛饭的也是小伙计——这些被称为“先生”的工作人员。我每次来，呆在这间里屋里的时间，不超过两小时的很少。

他是琉璃厂几十家古书店中惟一有创新意识的人。在那与日本人做买卖的书店还很少的时代，积极主动地与日本人交朋友的，就是他。他还两度来日本，在东京、京都、名古

屋开图书展卖会。同行们对他这种海外兴业行动，半是嫉妒，半是观望，而他以可观的收益证明了他的成功，也给同行中的观望者一个漂亮的回答。

另外，在民国初年，当北京大学崛起一批年轻的思想家时，其他的书店无动于衷，不予理睬，勇敢地与这些人接近的，也是他。与此相关联，对于以往的古书店从不关心的戏曲、小说类书籍的热心收集和买卖，也是他。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研究中国口语文学的人，而没有得到过他的帮助和恩惠的，绝无仅有。

进入新中国，北京的古书店据说大半都倒闭了。他怎么样了？他曾是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的朋友圈中，有着“蒙古人”诨号的豪爽直率的一个人，大概还照常做着他的老本行吧？但确切的消息一点也没有。

陈济川，是我最想相见的中国人之一。

书店名叫来薰阁琴书店，是因为其祖父辈是做琴生意的，这，也照例是在里屋间闲谈时听来的。

1951年5月29日

琉璃厂后记

[日本]吉川幸次郎
钱婉约译

以前，东京堂出版有一份叫《读书人》的杂志。其1951年7月号，登了一篇副题为“琉璃厂杂记”的我的文章，正题为：来薰阁琴书店。

这篇文章的大概是：琉璃厂是北京的古书店街，来薰阁是我昭和初年北京留学时很相熟的古书店，其主人陈杭，字济川，是我认识的中国人中，最值得怀念的人物之一。

“进入新中国，北京的古书店据说大半都倒闭了。他怎么样了？他曾是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的朋友圈中，有着‘蒙古人’诨号的豪爽直率的一个人，大概还照常做着他的老本行吧？”我在文章的最后结尾处，这样推测着他的健在。这篇文章收在创元社出版的《现代随笔全集》第21卷的我的集子里，可备

读者参阅。1951年，正是人民共和国成立甫始，我们之间的交往比今天更为不便，我想象着他的照常无恙，但能够证实这想象的消息则全然没有。

然而，去年，神保町山本书店的店主山本敬太郎去了北京，证实了我的想象是确实的。陈济川不愧是书林的英豪，有领时代之先的英明识断，在面对革命，其他书店都慌张失措之时，他很好地与新的政局协调了步调，成了古籍工会的工会长，很是活跃。这是我在前几日访问山本君的书店时听到的。对于老友的健在我十分高兴，同时，我把随笔全集中写陈济川的这篇文章，寄给了山本君，不久，得到山本君的回信：

"我拜读了您关于来薰阁的随笔，去年在北京的情形又浮现在眼前。'北魏佛像那样的容颜'至今未变，矍铄有神，'这个'、'这个'的口头禅仍留存在我耳边。'只要接到店里派出的小使的通知，他就立刻回来'也仍是这样。不同的是从他口里不断地涌现'社会主义'一词，而自信地推荐给人看的古书却没有了，我还在剧院和饭馆受到了招待。"

还同信给我寄来了在隆福寺街的饭馆里一起就餐时的照片。左起第二位，那个嘿嘿笑着的，毫无爽失的就是陈济川，简直与30年前的模样没有不同。其他人大概也是书店业中的人吧，大家都穿着人民装，只有他悠然地穿着长袍，这或许也表示了他在其中的地位吧。身后的墙壁上，可以看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中苏友好合作万岁"这样的宣传牌。

自信地推荐给人看的古书没有了，是因为近年来，中国对50年前的书籍，一律禁止出口。山本君从中国回来后的结论是：只就古书这一方面看，现在的北京不怎么有意

思了。

除来薰阁外，值得我追忆的琉璃厂的古书店，还有几家。

从来薰阁往东走至第五家店面，也是南边一侧的，是一家叫邃雅斋的价钱很贵的精品书店。这书店据说与湖南文人兼藏书家的何绍基家有特殊关系，不断能取出何氏的藏书来卖，且像不尽的泉水那样，汩汩不歇地摆上这家书店的书架。我所收藏的惟一明版，盖有高唐王府之印的《艺文类聚》就是从这里买得的。

过了它东面的十字路口，再往东行，也是在南侧，有一家叫翰文斋，他在整个琉璃厂也算是门面高大的大店，主人姓韩，他专营宋元版书，对我要买的“清朝本”书，叫作“新书”，口称没问题。他对我这个异国的白面书生，无疑也是十分热情的。

再回到十字路口，走上向南的大街，东侧是通学斋，其主人是孙殿起，因脸上有麻子，故有孙麻子的绰号，他的店也像主人一样不大清洁，但孙殿起对清朝考据家的书籍十分精通，如有神明，写有《贩书偶记》、《丛书目录拾遗》等书，记录他一生的见闻。这书店的东家——即资本拥有者是伦明教授，他是清朝文物的搜集家，为了更便于自己的搜集活动，才让孙麻子替他开店。但有一段时间，伦先生与孙麻子之间的关系似乎有些微妙，孙麻子到考据学的重地安徽、江苏去买书，回来之前把东西邮寄到北京，并瞒着东家伦先生，让我也不要泄露。后来，伦先生发现了什么线索，有一天，一大早来到我的宿舍，要看我昨天买的什么书。这些事，如今都成了令人回味的怀念，伦先生、孙麻子、翰文斋的韩氏，现在都已作古，从山本君的话中得知，他们的店也都没有了。

通学斋的北邻是文德堂,是由天津藏书家李木斋为东家的书店,也是一家精品书店。再往北一家是松筠阁,专门经营民国以来的杂志,这在当时是很稀罕的,现在都不知怎样了?

与城外琉璃厂相并列的，可谓城内隆福寺的古书店街。那里的老铺文奎堂，与来薰阁一样，是我三年留学中最经常去的书店。特别是这里的年轻文雅的老板赵君，与我的年龄相仿，因此，也更加合得来。

文奎堂在北京是屈指可数的老店，来薰阁的陈济川，也曾在这里做过徒弟，后来才独立出来，自己开店。年轻的赵君对于师兄的独立，似乎未必感到高兴：

“每年年底,陈先生也要来店里,向我们店的老主人叩拜。”

接着，赵君又同我商量他自己的事儿，他也想独立出来，拥有一家自己的店面。

我表示不赞成：

“你是店里老主人的心腹兼功臣，老主人老死后，有你在，这个店就能维持。我不是不理解你的心情，但不可能人人都是英雄，陈济川是英雄，而你不是，你是秀才；成为文奎堂年轻的主人，难道不是你最好的工作吗?”

笃厚实在的他把自己的前程大事与我这样的外国人商谈，对我来说是件欣慰的事；而对我的忠告，他或许也是听取的，终于也没有独立出来。文奎堂关门了，这使他的孤忠付于东流了。从山本君的话中知道，现在隆福寺只有一家国营的古书店，它的主管者是一位姓赵的，对书籍非常熟悉，那是否就是他呢？我默默地祈望着。

1958 年 5 月

三十年代北京旧书业及其它

[日本]长泽规矩也

索介然译

1984年3月，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了《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六卷，题为“书志随想”，包括文章21篇，头两篇是“中华民国书林一瞥”(作于1931年2月)和“补正”(作于1932年6月)，所记为30年代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地的旧书业状况。今将头一篇中的“北平书林”和第二篇中的“辛未燕京访书记”两章摘译如下，以供谈旧都书林掌故者参考。另外，“人物回忆”一文中，谈到作者在苏州购买明刊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的经过和作者同郭沫若的关系，也摘译附后，以助谈资。错误之处，尚祈读者指正！索介然识。

北京书林

北京从明朝以来，与其说它是出版地，不如说它是新旧书籍的集散地，从明到清，从清到民国，一直是这样。最近首都虽迁到南京，但北京依然是全国第一个古书集散地。因此北京的书店大半是旧书店，自己出版的很少。现在旧书店最多的地方是琉璃厂，以新华街为界，分为两部分(即东、西琉璃厂)。此外，南新华街有几家，海王村公园内有几家。还有一些叫作局子的，多在琉璃厂一带的胡同里或庙里租几间房，自己不卖书，专给顾客在各书店找书，从中取利，有多少个局子很难调查。明朝万历时的旧书店在正阳门(前门)内，见于胡应麟的《经籍会通》卷四，清初的旧书店在前门外西河沿，只有少数在琉璃厂，见于王士祯的《居易续谈》。也就是说北京的书店街从前门内迁往前门外西河沿，又迁往琉璃厂。关于琉璃厂的旧书店，下面专节论述，现在先说内城东四牌楼北隆福寺街的旧书店。震钧的《天咫偶闻》卷七和缪荃荪的《琉璃厂书肆后记》的"附记"，都曾谈到隆福寺街的旧书店，但和现在的情况已不一样。

从隆福寺街西口进去，到庙门前为止，路南第一家是带经堂王氏，铺面很大，藏书也不少，但日本人去的不多，这家书店一直是看顾客的需要高抬书价。近年常给我送书的店伙李某，去年春天拐了该店的银行存款800元，带着个女人逃跑了，在这不景气的时代使该店受了个大损失。再往东是文奎堂王氏，路南路北都有铺面，和琉璃厂的文友堂号称北京两大旧书店，经史子集无所不备，尤其是有很多满、蒙文的书。这家书店与他家不同的是掌柜的王氏不参与经营，而

由张、田、王、赵四大伙计共同经营，好像个委员会。文奎堂的东边是文萃斋樊氏，三友堂赵氏，稽古堂郭氏，宝书堂陈氏，都散居路南。樊氏原在宣武门小市开文鉴堂，直到大前年才搬到隆福寺街。那年春天我到文鉴堂去的时候，樊氏想知道我是不是长泽规矩也，就和我打听长泽规矩也的消息，我也装作不知道，说："听说长泽规矩也不喜欢书商老包围着他，暂时不来了。"可是不久就认出来我就是长泽规矩也。今年他还认识我的相貌。通学斋的主人也用过一回这种方法。原来北京的闲人很多，好谈闲事，不知什么时候，把我爱书的事以及和我有关系的事就宣扬开了，说我专买善本书，就拿去年买宋板书的事说吧，完全是受一个素不往来的人委托，给他选了一部医书，于是书店就误认我是专为大批搜购宋元板书来的，真没办法。其实大批搜购善本书的人不是我们，而是老北京人，于是我就装作老北京，这样，就可把真实姓名马虎过去。

"贵姓台甫?"随便回答个什么就能对付过去。"府上在?""北京。""北京什么地方?""城内。"这么一说，他就不再问了。这也是我的一个花招儿，可是中国人最善于辨认人的相貌，1927 年我去北京的时候穿的是西服，后来我想，换换装就行了吧，第二年春天我穿着长袍到琉璃厂去，一眼就被人看出来了，不用说书商，就是糕点铺的人和卖报的也看出来了，实在不易蒙混。这好像学生总认得老师，而老师对很多学生的相貌姓名却认不出来，在这点上很觉羞愧。

三友堂原来是赵、王、刘三人合营的，它和稽古堂之间有三槐堂王氏，原是琉璃厂的第一家老字号，前年关的张。宝书堂曾兴盛一时，近来突然衰落了，其中有个姓吴的伙计，很能干，颇受和田清学士的赏识。宝书堂的斜对过是保

萃斋韩氏，比起别的书店来不大活跃，它有个姓刘的伙计，在书商中是少有的诚实人，不像其他店伙那样滑头。据我个人看，在北京的书商中他是最可靠的人，虽然不怎么拿善本书来卖，可是当你求他把别的书店的书拿来时，他准能照办。而常拿善本书来的人，却不可掉以轻心，是真是假一时不易辨别。况且这个刘某从来不勾引你逛八大胡同，这一点也是非常可贵的。

路南的镜古堂段氏，据说清末很不错，近来因为少掌柜的好冶游，营业年年亏损，当我看到这个面色阴郁的少掌柜时，不免替他难过。悦古堂是前年关张的。聚珍堂刘氏和三槐堂、同立堂、宝书堂都是从咸、同之际有名的天绘阁分出来的，改名后，光绪时印行木活字聚珍板，和宝书堂争胜，可是现在全不行了，尤其是聚珍堂，铺面很大，更显得荒凉。再往东是修绠堂孙氏，目前在北京最活跃的是它和琉璃厂的文禄堂，北京的桥川时雄和大连图书馆的松崎鹤雄常买他们的书，但我对这类书商是不大接近的。孙氏和天津的陶家关系很好，去年夏天，常把陶家的精钞宋元版书拿我这里来，好像不知道我是不买这类书的。以上各书店都在路南。

镜古堂在东边路南的小胡同里，路西是文璘堂张氏，尽头是正雅堂李氏，两堂之间路西是德古山房孙氏，主人死后就关张了。

次于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店集中地是宣武门内小市及其附近，到前年为止，小市有十几家小书店，虽然善本很少，可是在木版和新版书中不仅有廉价书而且有时也有意想不到的好书，因此琉璃厂的书商也常到那里去搜寻。然而书店却逐年减少，除去靠近头发胡同的几家外，都是零零散散的，近来北京书店的趋势是都往琉璃厂和隆福寺集中。

琉璃厂东的杨梅竹斜街，有几家上海第二流书店的分店和一两家新书店。西口有一个专卖善书的书店，在印刷所内。其次有大东书局、开明书局、世界书局、广益书局等上海书店的分店，只有开明在路北，路南还有中华印刷局。这些书店除去卖少数学术书外，大多是唱本、鼓词、时调、小曲等，北京确是个戏迷多的地方，所以这些书的发行量相当可观。

前门外打磨厂，从前清以来就有几个小书店，从西头数，先是路北的老二酉堂、致文堂，其次是路南的泰山堂、文成堂、学古堂、宝文堂。这些书店在前清是印行童蒙小学课本、善书、和各种唱本，以一般民众为对象，买卖相当不错，可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营业全不行了。比如唱本，以前它们印行的都是满篇俗体字和简体字的木刻本，现在被中华印刷局的铅印本压倒了，就像泰山堂那样的活字本也难与抗衡。

东安市场有几十家卖旧书、新版旧书、以及新书的书店，其中有的是书摊，这个地方的书店大都精装、平装、外文原版旧书等杂然并列，有时能买到很好的外文原版旧书。有的书店还兼营文具，如佩文斋。专卖线装书的也有两三家。类似东安市场的地方，差不多都有几家卖这类书的书店。

前门外廊房头条路北的劝业场、路南的第一楼、杨梅竹斜街路南的青云阁、宾宴商场等工厂式建筑物里的商店，营业非常好，其中也有书店。可是近来北京的商业繁荣区由前门外移向东安市场一带，从而这些商场里的空房很多，书店也逐渐减少。青云阁里的富晋书社王氏，和罗振玉有特殊关系，代卖罗氏影印的贵重书，一时成了大书店，从它印行的

书目看，它的书显著比别家的书贵。去年夏天，书社主人王富晋亲自到南方，花重资买了扬州吴氏测海楼的藏书，事先把书目送给各地的学者、藏书家和书店，并且特地在上海租房卖这批书，由于各地要买的人多，成了拍卖的形式，价钱昂贵，似乎发了一笔大财。宾宴商场里的中商书局也可一提，不过它卖的始终是一般的杂书。第一楼里的集文阁，常可买到日本出版的贵重书，据说有某日本人作它的后台。我对这类书店是没有什么缘分的。

和东安市场相对，西四东北有西安市场，据说以前有很多旧书店，可是近年场内商业不振，从前年起只剩下一个宝文书局了。和西安市场的衰落相反，最近西单一带特别繁荣，以西单为中心，有戏院，有坤书馆，首屈一指的是西单北路东的西单商场，里头有很多小书店，以西城的学生为对象，多是新书。从西单到甘石桥，有几家新旧小书店，南边头发胡同外有两三家，宣武门外的会文书局有某名人常去，前年夏天我去的时候，已成了一个显眼的大书店，南边的华兴书局是个小书店。

后门(地安门)大街和鼓楼东大街，过去有不少旧书店，可是现在只有后门大街路西的赖古堂沈氏，鼓楼东大街路北的得利复兴和逸古阁两家了。赖古堂本来是专卖自家的藏书，价钱昂贵，而且拿残本当足本卖，所以名声很不好。北海公园里的蟠青书室，是近年开的旧书店，据说和北京著名藏书家傅增湘有关系，好像非常活跃。

卖新旧版杂书的书店，除去西单南北以外，在北新桥南、新街口南、护国寺等处也有几家。在东安市场北的王府井大街路东一带，有时也可看到几家，西单以东路南则没有。这类小书店和书摊没有多大差别，书摊有每天午后摆摊

的和赶庙会摆摊的两种，前者从西单到头发胡同路西最多，新街口南路西、北新桥南、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西口外北路东也有几个。东安市场里的大院，午后有书摊。关于赶庙会的书摊，陆陇其的《三鱼堂日记》提到报国寺，王士祯的《居易续谈》提到灵枢宫灯市和慈仁寺，震钧的《天咫偶闻》提到隆福寺，但都已成陈迹。现在只有白塔寺东路北、护国寺、隆福寺等庙会日有几个，还有白云观的开庙日和前门大街的夜市也有几个，但卖的都是唱本，没有别的书。

另外，还有所谓晓市俗称贼市，因为有的东西是赃物，天没亮时开市，太阳一出来就收。晓市有好几个，以崇文门外的最有名，商品分类，我去过两次，但没有书。德胜门内的晓市有书，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商品。去年秋天，我请来薰阁掌柜的陈济川君作向导，约会松本君、傅惜华君同去了一次，时间是夜里三、四点钟，天还很黑。有一些提着灯笼的人在各处等候，还有挑着担子的，买方争着在筐子里翻找，借着灯光找到要买的东西，然后和卖方议价，议价的方式很奇妙，双方伸出手来在袖子里用手指作暗号，陈君也懂得这个，使我一惊。有时可以廉价买得珍本，护国寺一带小书店的人常去，买了再卖给琉璃厂等地的大书店，然后再卖给顾客，价钱相差可几十倍。如果我们也直接从晓市买，不也可以买到廉价珍本吗？可是局外人根本办不到。我们从晓市或小书店买的珍本大都不可靠，因为琉璃厂、隆福寺、局子的书商都和小书店勾搭，好的都被他们买去了，局外人要从小书店买，只能买到残本或价钱更高，这是毫无办法的事。本来说的是旧书店，现在转到晓市上去了，不过说明古书转手状况的一例而已。

以上说的主要是旧书业，纯粹的新书店除去上述的上海

书店分店以外，有北新华街的北京文化学社，出版了些国学书，但北京第一家得属景山东街的景山书社。北京大学一部分学生组织的朴社，兼有出版部，发行了不少国学一类的书，还代卖上海书店出版的书刊。汉花园有北大出版部，但它的活动远在北新书局以前。其他散在各处的小书店就不值得列举了。北京的书业和上海的书业大体上相反，上海以出版新书居全国首位，北京以古书的集散地为全国第一。

琉璃厂书肆新记

谈琉璃厂书店的文章，前有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后有缪荃荪的《琉璃厂书肆后记》，前者说的是乾隆中叶（三四年）的状况，后者说的是民国初期（元年至三年）的情形。前年，海宁陈乃乾氏把两篇文章合印行世。日本的藤冢邻近作《李朝学者和乾隆文化》一文，据朝鲜李德懋的《入燕记》补充乾隆时代琉璃厂书店的状态。我在 1923 年头一次去中国，1927 年再度到北京，住了两个月，接到我祖父的死讯就回去了。第二年春天又到北京，住了大约四个月，1929 年夏四月又到北京，住了 70 天。今年夏天先去江南，后回北京。我在北京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书商到我寓所，我也一有时间就到东南城的书店。李文所记的书店重见于缪文的不多，缪文所记的也成了宣南掌故。我以前见到的买卖很好的书店，现在有的不行了，有的甚至关张了，变化真不小。于是效法李、缪二氏，作“新记”一篇，记录所见所闻，如有错误，俟将来改正。

从琉璃厂东口说起，路北是文光楼郭氏、富文堂李氏，现在都无足观。路南是宏远堂赵氏，前年春天，把卖给孔德

学校的车王府旧藏词曲的残余，经顾颉刚氏介绍，卖给了广东中山大学。我也时常隐姓埋名地到那里去，其他的书也不少，可是今年不知为什么在中间打了个隔断，看不见后房了，可能是营业不好的原故吧。路北的饷华书局娄氏，没什么可观的书，我有时在门脸买些新版书。路南的文宝堂曹氏，是缪氏所说的老铺子，现在铺面既小而且没书。路北的晋华书局孔氏，铺面虽小但常可买到善本，这些善本多收在柜子里。1927 年秋天，它和文奎堂、待求书庄合买了徐梧生的藏书，大肆活跃，现在颈头不足了。路南的锦章图书局，是上海新版书店的分店。路北的火神庙每年从阴历正月初一开庙半个月，主要是古玩珠宝摊，书摊和别的摊也排列其中，男女老少顾客杂沓，不可名状，而平常则人影寥寥。庙里的房子多为古玩商租住，只有上海的泰东书局在里面。今年春天，述文堂张氏也迁到那里，主人张秋山为人很好，曾经包揽过日本顾客，并到江浙访书，兴盛一时，但终为后辈把地盘夺去，藏书也逐渐减少，成了一个局子，实在可怜。近来北京的书商很狡狯，如果有别的书店没有的书，就高抬价钱几倍，牟取大利。书多的时候，就故意减低书价，甚至甘心若干亏损卖新印的书，以此表示自己的书便宜，新来北京的人多上他们的当。可是张秋山不这样，还和从前一样，现在他的书也不贵，不懂得拿别的书店的书卖给顾客，从中取利。他只能拿很少的书到我这里，常提到以前服部宇之吉博士在北京的状况，特别称赞博士夫人的北京话之好，喜谈庚子的掌故，颇有不胜今昔之感。我也尽量买他的书，可是他的书太少，不知他知道我的心情不知道。有工夫，就像老朋友似的，和我到天桥茶馆品茗。一天，我问他为什么这样，他坦然答道："厂肆的店伙大多偷闲涉足花丛，我颇

不以为然，以前你们的某学士在北京时，常使我作东道主，带他出入枇杷巷，除此以外，不懂得柳堤之美。没工夫不说，有工夫的话，在茶馆清谈，比那样好的多。”

荣禄堂丁氏在路南，清末每年印行《搢绅全书》、《都门纪略》等，盛行一时，1927年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个叫张礼庭的店伙，时常拿着两三部书访靳轩学士，近来也衰落了，有很多书架上竟空空如也。聚好斋魏氏，小而无足观，也在路南。路北有武学书局丁氏，往南有武学书馆程氏。路南有槐荫山房马氏，越来越不行，架上只有一般的医书，巾箱本弹词、小说等。回想以前我到该店要买一部书，他说誓不二价，我问了问价就要走，他忽然又减价了，我生气他食言，痛斥了他一顿就走了。可是后来我又后悔了，求别的书商替我买他那部书，他也知道这情况，没按原来他要的价钱卖我。我这个人生来急性子，好和人争吵，嗜书以后和书商争吵不止两三次，事后我又后悔，再去访求。因此常被朋友嘲笑，说我跟书商是争而不胜。前几年我去的时候，他已没有什么书了，我也没有当年的脾气了，恐怕他早已忘了这件事，但我还记得。每次经过这个书店，就不由得想起国内的几家书店。

这家书店的西边是宝华堂张氏，是个老字号，日本人也知道它，在店里可常看到神田喜一郎学士的书信。1928年春季某一天，该店某店伙拿几部书到我寓所来卖，其中有部蟫隐庐影印的《周宪王乐府》，故意装潢得很古雅，说是宣德刊本，我指出它不是，店伙说，他本来不知道是赝鼎，是从某顾客手里买的，于是连连向我道歉。我说：“如果你真不知道它是假的，我当然原谅你，可是这样的话，你就不够作个书商，不如赶紧改行。万一你们店主也是这样，你回去告

诉他说，不要干这行了，歇业越晚亏空越大。后来他转托其他书商再三向我道歉。去年夏天我经过这家书店门口时，已经关张了。莫不是真应了我的话了。路北的开明书局杜氏，和大连的松崎鹤雄很好，到江南搜集新印的木板书，在北京这家的书价最贱，近来好像特别在日本人中找销路。

翰文斋韩氏是路南的大书店，和达官宿儒来往密切，熟悉前清的掌故。店主把营业委托店伙，书价全凭店伙决定，因而价钱很高，可是对店伙很严。前年给我送书的店伙高某，虽好冶游，但常有善本。所以我也不避忌他，他作了几千元的买卖，仅吞没了一百元就被解雇了，可见店主的严厉。今年该店的日本刊本医书很多，我在那里买了部《七经孟子考文》。待求书庄李氏的书价也很贵，近来营业不振。路北有上海新书局的分局，文具店占了一角。龙文阁傅氏只是铺面大，没什么好书。宝仁堂张氏铺面小，摆着的也是新版古书，不值一提。文友堂魏氏是北京有名的大书店，和以李氏(盛铎)、傅氏(增湘)为首的著名藏书家交往多年，和日本的文求堂也书信不绝，善本颇多，在东口还有书库，但和我没有来往。往西有直隶书局宋氏，时常到江南访书，去年在长沙买了叶德辉的观古堂藏书。他平素知道各藏书家的爱好，先在上海卖了一部分，又巧妙地把书分卖给北京各藏书家，大获厚利，因此近来极为兴旺。南北新刻的木板书大多数都有，书上都标有定价，每年印行书目。新华街一角的崇文斋南纸店有少数新书。以上都在路南。

过了新华街，路南有文华堂李氏、南阳山房张氏、宏远堂赵氏、邃雅斋、来薰阁陈氏。李氏原为隆福寺街镜古堂的徒弟。南阳山房时有善本，一天晚上，我在寓所宴会，该店店伙拿来两三部善本书求售，有一部他说是金板《图经本

草》,其实是明刊黑口本《政和本草》,他硬说是金板元修,于是我让他找出金刻本的纸页,他回答不上来了。我乘着酒兴戏问他:“你见过多少部金板书?金板书不是传世的不多吗?”他慢吞吞地说:“只见过一部。”我说:“那么你听我的话,把这部书拿回去好了。”宏道堂铺面稍大可是没有书,店主以医为业,不顾世传的本业,店伙说:“我们书店没有书。”我也哑然失笑了。邃雅斋是郭、董、刘三氏合营,近来投顾客所好,以卖方志和金石书获利,也印行书目,可是现在也逐渐衰微了,据说有宋板书,我进去看了,是部《礼记集说》。来薰阁陈氏名杭字济川,原在文奎堂,起初得到京都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的支持,遂以日本人为顾客,揣摸日本学者的心理,有时拿着样本东渡,或者迎合来北京游历的日本人,大有赶上文奎堂之势。他投学术界的戏曲小说研究热之机,不惜重资搜求词曲小说,再以更高的价钱卖出,获取大利,一时为其他书商所羡慕。可是近来通行本逐渐多如山积,所以他翻然警悟,大力搜购清人文集。今年他买了力家的藏书,力家是中医,已故的家主在日本时买回大量的医书和杂书,他所买的只是杂书。陈君年纪正盛,和我同岁,为人也好,和我来往也很频繁,因此很得日本人的信赖,可是见识还不够深。以卖小说获利,前年以 150 元把嘉靖黑口本《三国志演义》卖给文求堂,又以洋钱若干把原本《平妖传》卖给马隅卿,至今传为话柄。近来日本顾客中出现了不如期付款的现象,使他很为难。

路北有公慎书局冯氏,原店主是商务印书馆的孙氏,以前在宣外铁老公庙。往西是开通书社杜氏、善成堂李氏、商务印书馆分馆,经理现在是孙伯衡,以上三个书店都在路南。对面有小书店国粹书庄,最近换了店主,姓张。再往

前，路南小胡同的局子有藻玉堂、肄文堂，藻玉堂王氏住东房，肄文堂丁氏住北房，藻玉堂近来兼营出版，重印《古文旧书考》等。敬文书社黄氏近来从头发胡同迁来此地路北，新版书占大部，日文书也不少，我在那里买到先祖的遗著。上海中华书局分局在路北，经理姓周。

路南有保古斋殷氏，今年买了陈士可的藏书，大半卖给了东方文化图书馆，一部分善本卖给别处，得了大利。一天，我在那里看到万历板的《玉簪记》，一问价，要 55 元，我给 40 元，他不卖，改要 50 元，我没答应，他说，徐森玉氏看过了，不能再让价，于是约定为 50 元，等我要拿书回去的时候，他又变卦了，说赵万里氏已看过，不能卖。我责备他说话不算数，当时我认为他不过要卖高价，借口徐、赵二氏看过，其实都是瞎话。我问同去的桥川时雄怎么办，桥川说可以买，于是我就买回去了。后来误传为我抢买了赵氏的书，经桥川向徐氏解释，事情才完。现在想起来，他是让徐、赵二氏看过，但没等回话就卖给我了，为的是多卖钱。保古斋西是文德堂韩氏，和马隅卿氏等有往来，前年戏曲小说很多。其次是上海有正书局分店，多是新近石印的碑帖。九经堂孟氏、述古堂于氏、鸿宝阁崔氏、瀛文斋孙氏、文焕堂赵氏、同好堂阎氏等都在西面路南。多数老铺子都衰微了。鸿宝阁和文焕阁的对面是文英阁丁氏、敬业堂丁氏，都见于缪记的附录。文英阁在这些书店中是个大的，可是近来也不振。文英阁以西，道路渐窄，过了同好堂，就到了厂西口外。

南新华街路西有海王商店，文具以外也卖新版杂书。路东有五个书店：最北是穆斋鬻书处马氏，其次是德友堂王氏、文雅堂郭氏、松筠阁刘氏，最南是通学斋孙氏。松筠阁

多是梨园内行的剧本，我去年在那里买了南府的剧本多种。通学斋的孙耀卿，有深通清儒著作的伦明氏为其后盾，得力于搜集清朝经籍，尤其是零种小册，供给同好而赢利，价钱虽高，但得便的人不少。桥川时雄和他有往来，藤冢邻也和他鱼雁不绝。

海王村公园内从南数是：荣华堂孙氏、长兴书局孙氏、九经阁谷氏、养拙斋李氏、群玉斋张氏、久安堂李氏，都是小书店，面对北新华街。像养拙斋，几乎是关门状态。长兴书局和通学斋是一家，荣华堂是他弟弟开的。是哪个店记不清了。其中有一家我每年去的时候每次问我，靳轩学士来了没有。从北新华街往北，路西有文化学社，印行新书。

以上是琉璃厂和新华街的书店的大概情形，还有在庙里租房的所谓局子，局子的藏书虽不多，可是像文昌庙里的会文斋李氏还收徒弟，是个大局子。从庙门前往左拐，路北有文禄堂王氏，是德友堂王氏的弟弟开的，哥哥死后合为一家，近来以搜求善本而出名，但似乎对版本并不太懂，最近买了姚茫父的藏书，其中有部宋板《汉隽》，卖了 2000 元，还听说有宋刻十二行本《尚书注疏》，一看是十行本。

回观厂肆的大势，李记固然不用说了，缪记也成了旧京掌故，像翰文斋、荣禄堂逐年衰微，宝华堂已关张。前清的书店到现在已不能保持旧观，代之而兴的是见机行事的能干者，投世人之所好而获利，来薰阁就是这样的一个，可是很快又落人后了，像述文堂似的。文友堂所以能独保持旧观的，是由于得到老儒的支持，恐怕它的命运也要和老儒共始终。局子的势力不可低估，文禄堂就是如此。局子不需要很多资本，在善本日少的现在，供给力大的自然占优势。

目前坊间的宋椠元刊寥若晨星，厂肆所藏的屈指可数。

太史(缪荃荪)已有世风下降之叹，他若活到现在不知将要说什么。而且厂肆里像老谢、老韦那样的书商一个也没有，更不用说陶五柳了。即使大令(季沧苇)再生，有谁可共谈的呢。空以子晋(毛晋)自居，在善本上捺印自己的图章吗！发这样浩叹的人恐怕不只子祥(田中庆太郎)一个吧。

辛未燕京访书记

我在"新记"末，感叹前清大书店的衰亡和局子势力的不可低估。今年到北京，这种感叹更深，稍加说明如下，保持旧观的就不提了。

琉璃厂东口的宏远堂更衰落了，这家铺子不仅和日本人来往少，而且主要在门脸卖书，因而它的价钱没准儿。有一天，我和傅惜华君到那里去，看见一部万历板的《闺范》四卷(内阁文库等也有这书)，虽缺第二卷，因为有插画，价钱如果便宜，可买来当样本。一问价，要15元，我们就放下书要走，店伙连连问给多少钱，我说相差太远，不买了，可是他还追着问，不得已，在门口回答说给五元，想不到他居然卖了。像这类事在书店里极少，只有路旁的书摊有这习惯，恐怕厂肆里也没有第二个例子。路北的晌华书局、路南的文宝堂都已关张，晋华书局更加不振。火神庙里的述文堂勉强维持，因为旧友小柳司气太博士的关系，还特意在福兴居老铺订了一桌酒席招待我们。我打算尽量买他的书，可惜没书可买，有时他拿一些到我这里来，看到别的书商拿来的宋元明刊本书，慢慢地说："我拿来的都是平常的书。"我听了这话真觉得可怜。去年夏天已经空架很多的荣禄堂，冬天终于关张，北京又少了一家旧书店。开明书局仍然致力代卖新

书。翰文斋近来又解雇店伙，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似乎是底子越来越空的关系。待求书庄也是空架更多，其他各书店好像没什么显著的变化。再往前就到了新华街。

新华街西的宏道堂关张了，邃雅斋则铺面加大，显得更兴旺，去年看起来好像衰落的样子是我的眼力不行。来薰阁也更兴旺，有人说它借了高利贷，里面有苦处，可是买了西边的善成堂，更致力和日本人作生意，日本很多学者和学生或明或暗地得到他的帮助。蟠青书室从北海迁到这里，在本立堂和保古斋之间。南新华街的五个书店照旧，没有变化。松筠阁近来看不到唱本了。通学斋主人今年到江南搜书，买了很多小册子，因为利多的关系要再度南下。海王村公园内群玉斋的店伙，在日本人中大肆活跃，虽然搜集了一些宋元板零本，据说还不能轻易相信。局子依然很多，会文斋的活跃很可观，文禄堂店伙的活动特别显眼，迁到同院北屋。藻玉堂买了海源阁的书，哄动一时。

隆福寺街的带经堂好久没进书了，店主不尽心营业，整天在东四的落子馆，但店里的消费也少，还能维持现状。文奎堂还居首位。宝书堂虽在，但更衰落了。保萃斋没书，可是据同业人说，今年它卖给哈佛大学不少书。镜古堂少掌柜的已不冶游，因负债太多，接近倒闭。修绠堂更兴旺了，买了东邻的铺面，也致力买卖新书。来薰阁的旧徒弟魏氏，在东口路北开了个东来阁，他和旧店主的关系不好，年前和同伙到沈阳开了这个铺子，现在还在沈阳开着。今年夏天开张时，陈济川也去了，看来两人的关系有好转之势。小胡同里的正雅堂也关张了。

宣武门内小市，从头发胡同进去，西边有文苑斋、蔚文阁、醉经堂，东边有茂林书庄、学海堂。稍远一点，东边有

华文书社。靠近抄手胡同，东有文学斋，西有树经堂。其中文苑斋、文学斋稍可观。树经堂主人是个奇人，专收零本小册。头发胡同东口路南，有被翰文斋解雇的某店伙的朝记书庄。西边的墨华斋以卖碑帖为主。胡同外南角有金城书社，对着西单路西有厚记书社，路东有神州国光社。宣武门外的会文、华兴两书局照旧，杨梅竹斜街的书店也没有变化。

东安市场内的书店也看不出特殊的变化，瑞文斋仍然难于信任。西安市场内仍旧是宝文书局和门口的泰山书局两家。西四到西单之间有尧川书屋、新华书店、汇记书局、荣盛书局等，都在路西。

地安门大街赖古堂南，有阴历二月开张的志城书局吴氏。鼓楼东大街的逸古阁没有了，路南的义兴和古玩店有少数书。

从北新桥到东四之间，路东有向之书局、道观斋，路西有耀文书局，二者还在东安市场里摆摊。

护国寺街西口路南有集成书局和文化堂，西口外大街路西有三述堂。庙会的日子，路西有书摊。一天，我到白塔寺庙会去，因为改修道路的关系，书摊没出。新书店没大变化，米市大街路西有新月书店。

一年间北京书店的变化是，旧铺子继续衰落，书价日涨。据傅惜华君说，木板唱本的绝迹和翻印上海的出版物是两个显著的变化，前清以来有长久历史的木板唱本，从打磨厂书店的门脸和庙会、夜市的书摊上消失了，而道旁的地摊上，在别的东西中间杂有新版唱本。出版法是禁止翻印的，据说以前《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盐谷温著)的出版还受到裁判，可是今年市场书摊上充满了各种颜色的上海出版物翻印

本，销路很畅，如《中国文学进化史》、《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文学小史》以及标点本小说等。这些翻印本的校对、纸张、印刷都很低劣，可是价钱便宜，所以大受欢迎，虽然禁令再三，还是实行不了。

人物回忆

某年夏天，中尾万三博士和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君次子震二君谈到明板《本草纲目》，我对这方面的知识一点也没有，但很感兴趣，于是细听他们谈论，知道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传入日本的比大字本少得多，不过四、五部。1930年7月，我到中国中部访书，想不到在苏州竟发现了一部金陵小字本的。事情是这样，前一年，我受武田长兵卫君的委托，在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给他买了一部宋板医书，这件事民国方面不知道，可是我回国后，似乎北京图书馆知道了。所以次年我到杭州、南京、苏州等地访书时，北京图书馆的赵万里君总是走在我的前头等着我，这也是由于我的疏忽，把我的行程告诉了北京的原故，因此我到任何一家旧书店也看不见宋元善本，结果毫无所获。不料有一天在苏州护龙街的一家旧书店架上，标有金陵小字本的《本草纲目》赫然入目，这使我大吃一惊，仔细观察，确是中尾博士所说的金陵小字本，而且标价只十元，于是立即照价买了。不仅如此，这部书旁还有一部日本复宋刊本《千金方》，确实的价钱记不清了，大概是50元左右，当时这书可值百元，于是也顺便买了。要不是赵万里君跟着监视的话，至少不会买这部《千金方》的。回国后和田中君一说，立刻用这部金陵小字本《本草纲目》换了他一部价值70元的四朝本《十七史》。可是这部

带木箱的《十七史》占地过大，我在叶山的临时住房搁不下，所以放在东京家里，可惜一次也没得使用就遭空袭而焚毁了。《千金方》一书，我听从中村善七君的话，在书市上以百元的价钱卖了，现在能值多少钱很难说，可是坊间终于见不到这书了。

郭沫若君常到文求堂来，田中君好像非常招待郭君。我当时是一高的教师，在去文求堂前，常给田中君打电话，告诉他午饭在那里吃。有时田中君在电话里说，因为郭君来了，我们到天满佐饭馆去吃吧，所以我常和郭君一起吃饭，可是没有到过天满佐以外的饭馆。郭君当时住在市川，和他的日本妻子同居，郭君的日语非常好，所以我们只用日语交谈。我和外国人谈话总是先用日语，现在也是这样。我的北京话不太好，除非对方不懂日语才用北京话。我这个人不好逢迎，战后，郭君成了了不起的人物，来日本时，我也没有特意去看望过他。有一件事我对郭君非常敬佩，就是他来日本时，不论多忙总要到叶山的田中君墓前致敬。战前郭君在日本时，当时日本警视厅常到文求堂侦察郭君的动静，田中君用各种办法保护郭君。中日战争开始，郭君留下日本的妻子儿女，只身秘密返国，事前也没有对田中君说，可是田中君对郭君的行动十分理解。

（译自 1974 年 11 月《日本古书通信》39 卷 11 号）

城隍庙的书市

阿　　英

熟悉上海的人，都知道城隍庙，每天到那里去的人是很多很多，有的带了子女，买了香烛，到菩萨面前求财乞福。有的却因为那里是一个百货杂陈，价钱特别公道的地方，去买便宜货。还有的，可说是闲得无聊，跑去散散心，喝喝茶。至于帝国主义者，当然也要去，特别是初到中国来的；他们要在这里考察中国老百姓的落后风俗习惯，以便在《印象记》一类书里进行嘲笑、侮辱。我也常常的到城隍庙，可是我却另有一种不同于他们的目的，说典雅一点，就是到旧书铺里和旧书摊上去“访书”。

我说到城隍庙里去“访书”，这多少会引起一部分人奇怪的，城隍庙那里，有什么书可访呢？这疑问，是极其有理。你从“小世界”间壁街道上走将进去，就是打九曲桥兜个圈子再进庙，然后从庙的正殿一直走出大门，除开

一片卖善书的翼化善书局，你实在一个书角也寻不到。可是，事实没有这样简单，要是你把城隍庙的拐拐角角都找到，玩得幽深一点，你就会相信城隍庙不仅是百货杂陈的商场，也是一个文化的中心区域。有很大的古董铺、书画碑帖店、书局、书摊、说书场、画像店、书画展览会，以至于图书馆，不仅有，而且很多。对于这一方面，我是相当熟习的，就让我来引你们畅游一番吧。

我们从小世界说起。当你走进间壁的街道，你就得留意，哪儿是第一个“横路”，第一个“湾”。遇到“湾”了，不要向前，你首先向左边转去，这就到了一条“鸟市”；“鸟市”，是以卖鸟为主，卖金鱼、卖狗，以至卖乌龟为副业的街。你闲闲的走去，听听美丽的鸟的歌声，鹦哥的学舌，北方口音和上海口音的论价还钱，同时留意两旁，那么，你稳会发现一家东倒西歪的，叫作饱墨斋的旧书铺。走进店，左壁堆的是一直抵到楼板的经史子集；右壁是东西洋的典籍，以至于广告簿；靠后面，是些中国旧杂书；20年来的杂志书报，和许多重要又不重要的文献，是全放在店堂中的长台子上，这台子一直伸到门口；在门口，有一个大木箱，也放了不少的书，上面插着纸签——“每册5分”。你要搜集一点材料吗？那么，你可以耐下性子，先在这里面翻；经过相当的时间，也许可以翻到你中意的，定价很高的，甚至访求了许多年而得不着的，自然，有时你也会化了若干时间，弄得一手脏，而毫无结果。可是，你不会吃亏。在这“翻”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不曾见到、听到过的许多图书杂志，会像过眼云烟似的温习现代史的许多断片。翻书本已是一种乐趣，而况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呢？中意的书已经拿起了，你别忙付钱，再去找台子上的。那里多的是整套头的

书，《创造月刊》合订本啦，第一卷的《东方杂志》全年啦，《俄国戏曲集》啦，只要你机会好，有价值的总可以碰到，或者把你残缺的杂志配全。以后你再向各地方，书架上，角落里，桌肚里，一切你认为有注意必要的所在，去翻检一回，掌柜的决不会有什么误会和不高兴。最后耗费在这里的时间，就是讲价钱了，城隍庙的定价是靠不住的，他“漫天开价”，你一定要“就地还钱”，慢慢的和他们“推敲”。要是你没有中意的，虽然在这里翻了很久，一点不碍的，你尽可扑扑身上的灰，很自然的走开，掌柜有时还会笑嘻嘻的送你到大门口。

在旧书店里，徒徒的在翻书上用工夫，是不够的，因为他们的书不一定放在外面，你要问：“老板，你们某一种书有吗?”掌柜的是记得清自己的书的，如果有，他会去寻出来给你看。要是没有，你也可以委托他寻访，留个通信处给他。不过，我说的是指的新书，要是好的版本，甚至于少见的旧本板书，那就要劝你大可不必。因为藏在他们架上的木板书虽也不少，好的却百不得一。收进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好书，这些好书，一进门就会被三、四马路和他们有关系的旧书店老板挑选了去，标上极大的价钱卖出，很少有你的份。但偶尔也有例外。说一件往事吧。有一回，我在四马路受古书店看到了6册残本的《古学汇刊》，里面有一部分我很想看看，开价竟是实价14元，而原定价只有3元，当然我不买。到了饱墨斋，我问店伙，“《古学汇刊》有吗?”他想了半天，跑进去找，竟从灶角落里找了20多册来，差不多是全部全了。他笑嘻嘻的说：“本来是全的，我们以为没有用，扔在地下，烂掉几本，给丢了。”最后讲价，两毛钱一本。这两毛一本的书，到了三、四马路，马上就会变成两块半以

上，真是有些恶气。不过这种机会，是毕竟不多的。

带住闲话吧。从饱墨斋出来，你可以回到那个“湾”的所在，向右边转。这似乎是条“死路”，一面是墙，只有一面有几家小店，巷子也不过两尺来宽。你别看不起，这其间竟有两家是书铺，叫做葆光的一家，还是城隍庙书店的老祖宗，有十几年悠长的历史呢。第一家是菊舲书店，主要的是卖旧西书，和旧的新文化书，木板书偶尔也有几部。这书店很小，只有一个兼充店伙的掌柜，书是散乱不整。但是，你得尊重这个掌柜的，在我的经历中，在城隍庙书市内，只有他是最典型，最有学术修养的。这也是说，你在他手里，不容易买到贱价书，他识货。这个人很欢喜发议论，只要引起他的话头，他会滔滔不绝的发表他的意见。譬如有一回，我拿起一部合订本的《新潮》一卷：“老板，卖几多钱？”他翻翻书：“一只洋。”我说：“旧杂志也要卖这大价钱吗？”于是他发议论了：“旧杂志，都是绝版的了，应该比新书的价钱卖得更高呢。这些书，老实说，要买的人，我就要3块钱，他也得挺起胸脯来买；不要的，我就要两只角子，他也不会要，一块钱，还能说贵么？你别当我不懂，只有那些墨者黑也的人，才会把有价值的书当报纸卖。”争执了很久，还是一块钱买了。在包书的时候，他又忍不住的开起口来：“肯跑旧书店的人，总是有希望的，那些没有希望的，只会跑大光明，哪里想到什么旧书铺。”近来他的论调却转换了，他似乎有些伤感。这个中年人，你去买一回书，他至少会重复向你说两回：“唉，隔壁的葆光关了，这真是可惜！有这样长历史的书店，掌柜的又勤勤恳恳，还是支持不下去。这个年头，真是百业凋零，什么生意都不能做！不景气，可惜，可惜！”言下总是不胜感伤之至，一脸的忧郁，声调也很凄

楚。当我听到“不景气”的时候，我真有点吃惊，但马上就明白了，因为他的帐桌上，翻开了的，是一本社会科学书，他不仅是一个会做生意的掌柜，而且还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呢！于是，我感到这位掌柜，真仿佛是现代《儒林外史》里的异人了。

听了菊舲书店掌柜的话，你多少有些怅惘吧？至少，经过间壁葆光的时候，你会稍稍的停留，对着上了门板而招牌仍在的这惨败者，发出一些静默的同情。由此向前，就到了九曲桥边。这里，有大批的劣货在叫卖，有业“西洋景”的山东老乡，把裸体女人放出一半，摇着手里的板铃，高声的叫“看活的”，来招诱观众。你可以一路看，一路听，走过那有名的九曲桥，折向左，跑过6个铜子一看的怪人的把戏场，一直向前，碰壁转弯——如果你不碰壁就转弯，你会走到庙里去的。转过弯，你就会有“柳暗花明”之感了。先呈现在你眼帘里的，会是几家镜框店，最末一家，是发卖字画古董书籍的梦月斋。你想碰碰古书，不妨走进去一看，不然，是不必停留的。沿路向右转，再通过一家规模宏大的旧书店，一样的没有什么好版本的书店，跑到护龙桥再停下来。护龙桥，提起这个名字，会使你想到苏州的护龙街。在护龙街，我们可以看到一街的旧书店，存古斋啦，艺芸阁啦，欣赏斋啦，来青阁啦，适存斋啦，文学山房啦，以及其他的书店，刻字店。护龙桥，也是一样，无论是桥上桥下，桥左桥右，桥前桥后，也都是些书店、古玩店、刻字店。所不同于护龙街者，就是在护龙街，多的是“店”，而护龙桥多的是“摊”；护龙街多的是“古籍”，护龙桥多的是“新书”；护龙街来往的，大都是些“达官贵人”，在护龙桥搜书的，不免是“平民小子”；护龙街是贵族的，护龙桥却是平

民的。

现在，就以护龙桥为中心，从桥上的书摊说下去吧！这座桥的建筑形式，和一般的石桥一样，是弓形的，桥下面流着污浊的水。桥上卖书的大“地摊”，因此，也就成了弓形。一个个盛洋烛火油的箱子，一个靠一个，贴着桥的石栏放着，里面满满的塞着新的书籍和杂志，放不下的就散乱的堆铺在地下。每到吃午饭的时候，这类的摊子就摆出了，3个铜子一本，两毛小洋一扎，贵重成套的有时也会卖到一元、二元。在这里，你一样的要耐着性子，如果你穿着长袍，可以将它兜到腰际，蹲下来，一本一本的翻。这种摊子，有时也颇多新书，同一种可以有10册以上。以前，有一个时期，充满着真美善的出版物，最近去的一次，却看到大批的《地泉》和《最后的一天》了，这些书都是崭新的，你可以用最低的价钱买了下来。比“地摊”高一级的，是“板摊”，用两块门板，上面放书，底下衬两张小矮凳，买书的人只要弯下腰就能拣书。这样的“板摊”，你打护龙桥走过去，可以看到三四处；这些“摊”，一样的以卖新杂志为主，也还有些日文书。一部日本的一元书，两毛钱可以买到；一部《未名》的合订本，也只要两毛钱。《小说月报》，三五分钱可以买到一本；这里面，也有很好的社会科学书，历史的资料。我曾经用10个铜子在这里买了两部绝版的书籍：《五四》和《天津事变》，文学书是更多的。这里不像“地摊”，没有多少价钱好还。和这样的摊对摆的，是测字摊，紧接着测字摊就有5家“小书铺”，所谓“小书铺”，是并没有正式门面，只是用木板就河栏钉隔起来的五六尺见方，高约一丈的“隔间”。这几家，有的有招牌，有的根本没有，里面有书架，有贵重的书，主要的是卖西书。不过这种人家，无论西书抑是中

籍，开价总是很高，商务、中华、开明等大书店的出版物，照定价打上4折，是顶道地，你想再公道，是办不到的；杂志都移到“板摊”上卖，这里很难见到。我每次也要跑进去看看，但除非是绝对不可少的书籍，在这里买的时候是很少的。这样书铺的对面，是两三家的碑帖铺，我与碑帖无缘，可说是很少来往。在护龙桥以至于城隍庙的书区里，这一带是最平民的了。他们一点也不像三、四马路的有些旧书铺，注意你的衣冠是否齐楚，而且你只要腰里有一毛钱，就可以带三二本回去，做一回“顾客”；不知道只晓得上海繁华的文人学士，也曾想到在这里有适应于穷小子的知识欲的书市否？无钱买书，而常常在书店里背手对着书籍封面神往，遭店伙轻蔑的冷眼的青年们，需要看书么？若没有图书馆可去，或者需要最近出版的，就请多跑点路，在星期休假的时候，到这里来走走吧。

由此向前，沿着石栏向左兜转过去，门对着另一面石栏的，有一家叫做学海书店的比“板摊”较高级的书铺，里面有木板旧书，有科学，有史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学书；门外的石栏上，更放着大批的“鸳鸯蝴蝶派”的书。你也可以花一些时间，在这里面浏览浏览，找找你要买的书。不过，他们的书，是不会像摊上那么贱卖的。一部绝版的《新文学史料》，你得花5毛钱才能买到，一部《滨海故人》或是《天鹅》，也只能给你打个4折。在这些地方，你还有一点要注意，如果有一本书名字对你很生疏，著作人的名字很熟习，你不要放过它。这一类的书，大概是别有道理的。外面标着郭沫若著的《文学评论》(是印成的)，里面会是一本另一个人作的《新兴文学概论》。外面是黄炎植的《文学杰作选》，里面会是一部张若英的《现代文学读本》。外面是蒋光慈的什

么女性的日记，里面会是一册绝不是蒋光慈著的恋爱小说。外面是一个很腐朽的名字，里面会是一部要你“雪夜闭门”读的书，至于那些脱落了封面的，你一样的要一本一本的翻，也许那里面就有你求之不得的典籍。离开这家书铺，沿店铺向右转进去，在这凹子里，又有一家叫做粹宝斋的店。这书店设立的不久，书也不多，木板旧籍也很少，但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文献却极多，而且很多罕见的。如果你是研究近代文史的，这粹宝斋你必得到到，但要想买到新文学的文献，或者社会科学书，是很难以如愿的。看过这家书店，你可以重行过桥了，过桥向右折，是一个长阔的走廊，里面有一个卖杂书的“书摊”，出了“廊”，仍归回到了梦月斋的所在。到这时，护龙桥的书市，算你逛完了，但是，此行你究竟买到几册书呢？

跟着潮水一般的游客，你去逛逛城隍庙吧。各种各样的店铺，形形色色的人群，你不妨顺便的去考虑一番。随着他们走进城隍庙的边门，先看看最后一进的城隍娘娘的卧室，两廊用布画像代塑佛的二殿，香烟迷漫佛像高大的正殿，虔诚进香的信男信女，看中国妇女如何敬神的外国绅士，充满了“海昧”的和尚，在这里认识认识封建势力，是如何仍旧的在支配着中国的民众，想一想我们还得走过怎样艰苦的道程，才能走向我们的理想。然后，你可以走将出去，转到殿外的右手，翻一翻城隍庙唯一的把杂志书籍当报纸卖的“书摊”。这“书摊”，历史也是很长的了，是一个曲尺的形式的板架，上面堆着很多的中外杂志和书。我再劝你耐下性子，不要走马看花似的，在这里好好的翻一翻，而且在你翻的时候，你可以旁若无人的把看过的堆作一堆，要买的放在一起，马马虎虎的把拣剩的堆子摊匀一下。卖书的是一个很和

气的人，无论你怎么翻，怎么拣，他都没有说话，只是在旁边的茶桌上和几个朋友谈天说地，直到你喊“卖书的”，他才笑嘻嘻的走了过来。在还价上，你也是绝对的自由，他要10个铜子，你还他1个，也没有愠意，只是说太少。讲定了价，等到你付钱，发现缺少几个，他也没有什么，还会很客气的向你说：“你带去看好了，钱不够有什么关系，下次给我吧。”他是如此的慷慨。这里的书价是很贱，一本刚出版的三四毛钱的杂志，10个铜子就可以买了来，有时还有些手抄本，东西典籍之类。最使我不能忘的，是我曾经在这里买到一部黄爱庞人铨的遗集。

城隍庙的书市并不这样就完。再通过迎着正殿戏台上的图书馆的下面，从右手的门走出去，你还会看到两个“门板书摊”。这类书摊上所卖的书，和普通门板摊上的一样，石印的小说，《无锡景》、《时新小调》、《十二月花名》之类。如果你也注意到这一方面的出版物，你很可以在这里买几本新出的小书，看看这一类大众读物的新的倾向，从这些读物内去学习创作大众读物的经验，去决定怎样开拓这一方面的文艺新路。本来，在城隍庙正门外，靠小东门一头，还有一家旧书铺，这里面有更丰富的新旧典籍，“一二八”以后，生意萧条，支持不下，现在是改迁到老西门，另外经营教科书的生意了。如果时间还早，你有兴致，当然可以再到西门去看看那一带的旧书铺；但是我怕你办不到，经过二十几处的翻检，你的精神一定是很倦乏了。

1934年

西门买书记

——《城隍庙的书市》续篇

阿　　英

只要身边还剩余两元钱，而那一天下午又没有什么事，总会有一个念头向我袭来，何不到城里去看看旧书？于是，在一小时或半小时之后，我便置身在那好像是自己的“乐园”似的旧书市场之中了。有一两家的店伙，当他们看到我时，照例的要说一句：“×先生，好几天不进城了。”“新近收到什么书吗？”我也照例的问。不过，在最近，失望的次数，是比较多的，除去一册周氏弟兄在日本私费印的《域外小说集》，没有得到特别使我满意的书。“为什么没有新的来呢？”看过了架上的书，自己感到失望以后，总欢喜这样的追究。他们的回复也总是：“唉！现在是不比前几年了，进得多，卖得快。有还是有的，但是我们不敢多收。”这话是很实在。就拿城隍庙的旧书市场

来说，在《城隍庙的书市》中，曾经对停业的邻人表示无限惋惜的菊舲书店主人，也就不得不受不景气的影响而停业呢。“没有生意”，“清淡极了”，现在走到哪里去，时时飞过耳畔的，不外是这一类的话。然而没有法，嗟叹尽管嗟叹，既没有别的方法，只有慢慢地忍受下去。结果，便成了如此的不死不活的状态了。

虽然没有以前那样的“好书时时见”，若果常常的去，也还能有所得。店铺虽然愈趋衰落，石桥上的摊子，还好像一折书的大贱卖，却日日在那里“新陈代谢”。这些书摊，拿四马路的新书店来说，是属于“薄利倾销”的一类。在这里，可以用15个铜子买一本寻了很久的杂志，两毛钱买到一部将近10年的杂志合订本，或者新的禁书。我从这里收到的重要资料，记忆所及，就有《民潮七日记》等等。而几毛钱买到《洪水》二卷的合订本，也是有过的事。和我以前所说的一样，只是看机会如何而定。摊家的生活大概是很苦的，薄利倾销，利已经是不多，而一遇到阴雨连朝的时候，更是不能做生意，只有坐吃。也有一两家兼售古书了，但他们不认识货，开价往往是胡天胡地，就是遇到残本，也视若拱璧，实际上并不是什么难得到的本子。我每次到了那里以后，总会有第二个念头袭来，不景气是到了城隍庙的旧书摊了。从那里走到庙前，烧香拜佛的人，也会使人感到日渐的少，没有往日那样的旺盛。世有城隍庙的张宗子么？我想写《城隍庙梦忆》，现在也是到了时候了。

经过长时期的疲劳，有些感了饿。走到庙前，便又照例的踱进那在右手的食物店，便休息，便检查一回所买到的书，吃一毛钱的酒米圆。时间还早，向哪儿去呢？靠东头的一家旧书店是停业了。于是我再走向西门。只要有20个子，

洋车就可以乘到蓬莱市场。在临近市场，博物馆转角的地方，如果发现哪天有旧书摊的时候，我总是下车看一看，不然，就让车子一直拉到目的地。走到市场里面，光看看卖古旧书的传经堂，这是上海旧书店书价最便宜的一家。要是那一天对于古旧书的访求没有什么兴味，就走出右手的边门，弯到场外靠西头的一条横马路上去。这里有的是地摊，一处两处，五处六处，有卖旧书的，也有卖一折书的。这里的书价，比之城隍庙，也许要大一点，但不会使人失望，一样的常常有难得的书。我的一部《中国青年》合订本，几年前被一个朋友烧了，今年我在这里又买到，价钱也只两毛一本。这卖书的人很知趣，当我买了这部书，他就问："先生，我还有一部禁掉的《新青年》，你要么?"我知道他有些门槛。"在哪里?"我问。他说："在家里，你先生要的话，我们可以约定日子，我带到这里来。"像这样的事，我不知道遇过几次。有时他们没有，但只要委托他们代找，他们是会到处为你去寻访的。

沿着西门的电车轨道走吧。这一带没有地摊，然而多的是新旧书店，招牌我没有抄下来，我不能一一的告诉你。但能以说的，就是这地方也有难买到的书。甚至有偷来卖的刚出版的书。问题是书价不会很低，新的总得6折，旧的也要三四折不等。因为西门是一个学校区，教科书特别的多，几家大书铺里尤其多。我对这条街没有什么好感，过门不入，是常有的事。不过，西门的书市，到这里并没有完，于是再走向辣斐德路，新建筑的道上。这里连续有几个书摊，比过去的那几个区域贫乏。但要买一点维新以后的小说的话，不妨停在这里捞捞。可以买到最初在中国出现的托尔斯泰的小说，《小说林》一类的小说期刊，新的章回小说之类。古旧书

也有，只是好的千不得一。再向前进，如果天色还早的话，走不到多少路，会看到在一条横马路上，堆满着人，排列着各色各样的地摊。就从这里向北，就到了上海有名的“黑市”，要买些文房四宝，不妨在这里寻觅。要买书架、书桌，也可以在这里买。虽没有真正端溪砚，他们开价到六七元的好砚，也可以找出几方。还有，就是有几个地摊，也在卖旧书，大都是儿童读物，鸳鸯蝴蝶派小说。走完了这条路，再回到辣斐德路向前，走不到贝勒路口，这儿是存在着这条马路上最后的一爿旧书店。到这时，灯总会来火了，腋下的书，大概也挟得不少了，“回家”一个念头，又会马上袭来。但在喊车之前，我总得先看看自己的口袋，究竟还剩几个钱。

1936 年

海上买书记

阿　　英

从郑振铎《佝偻集》里，看到了几篇关于买书的话，连带想起他在《欧行日记》里所说的一些，感到买书的艰苦，和获得好书时的愉快，真是被他说尽了。

获得了不经见的珍秘书籍，有如占领了整个世界，这说法虽不免有些夸张，但欢快的心情，确实不是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因此，钱谦益在无可奈何，不得不出卖他的宋版《后汉书》时，就不免有“如后主失却南唐”的感叹。

不过甘苦尽管相同，获得的经过究竟各异。想到自己为着一些书，弄得节衣缩食，废寝忘餐，其艰苦也多可记。有所感发，特拉杂存之，作为个人买书生活的一段回忆。正是：

米星儿没一颗，
菜根儿无一个。
空把着几本文章做什么？

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一部《三袁集》的买到。那是什么时候，已经不能记起了。从来青阁的书目上，看到《玉璠集小修稿》的名字，下面注着“缺中郎一卷，可谓遗憾”的话。当时，我已有《白苏斋类集》初刻本，《钟定袁中郎集》，并《袁小修集》，因其残缺也就没有注意。

有一天，去来青阁买书，偏遇着已经卖出。买书的人，大概总有这样心理，当满怀热望走进一家书铺，而什么都得不着，懊丧的情形，是难以言状的。所要的得不着，还总想另捞一两本书去。于是停住不走，问东问西，看架上书，翻地上书，……我当然不会成为例外。

这时我想起了《三袁集》。初意也不过是看看版本而已。哪知翻阅一过，竟使我快活得要跳起来。原来《中郎集》虽缺，全目是有的，而版本又是那样的可爱。小修诗不曾见过，这里所收又如此的多。我决定把它买下。经过许多时间的论价，他们让了一些，就定夺了。

约有一星期，把钱筹措齐了，取回了这5册书，心中的高兴，是不可言的。但又来了第二个问题，到什么地方去寻访缺少的中郎一卷呢？我把这事委托了各旧书店，特别是常常到内地收货的传经堂。我知道希望很少，但我幻想能够“遇”得着。

又是很久，各方面的消息，都如石沉大海，问到时，大家只有摇头。去年的夏天，传经堂又去收书了，当快要回来的时候，我几乎每天从环龙路跑到蓬莱市场去等。有一天，因为过于热了，我没有去。哪知第二天去，铺主已在前一天回来了。

胡乱的把他收来的书翻了一过，买了几部，但我托他找的，一本也没有。我感到很失望。无意的回过头去，看学徒

在那里修补一部明版书，凑近一看，竟忍不住的叫了起来。原来这正是我好久寻访不到的《三袁集》里的《中郎稿》。

“太奇巧了!”我这样想。接着就知道，这一卷书，已经于昨天到上海时卖了出去。铺主忘记我曾托过他了。我一定要他替我设法。他很为难，说那买主也爱这本书。我说：“在他得着，依旧是一个残本，而我却可把这部书配全。”后来，我急得没法，便征得铺主同意，先把这一搭散页带走。

经过中间人和对方好几次磋商，总算说好了，我把一部袁照校刊的梨云馆本《中郎集》调换给他。这部书一直放在家里好几个月，我不敢拿回去修，我深恐又发生其他波折。结果，是受古替我重装的。

也是去年的事。在北平文奎堂的书目上，看见有《潇碧堂集》20卷，续集10卷出售。袁无涯刻本中郎集5种，我是有的，但从不曾听到过有什么《潇碧堂集续集》。这是一部很少见的书，便决定去买。

那时我很窘，又一心想买，便想了一个办法，买了1元邮票寄去，要求文奎堂把书寄给上海和他们有来往的书店，告诉他那几家和我相识。因为这几家，我是都可以欠账的。从此，我以为自己又得到了一种珍本。

两星期快乐的梦，到底是被击得粉碎，原来竟是骗人的，哪里有什么《潇碧堂集续集》？这是一部印刻极劣的明版书，大约是当时的翻印本，《续集》云者，实是《瓶花斋集》的易名。我不但失望，也非常气愤。徒然做了两星期以上的没有报酬的梦。

不过珍本也有无意获得的时候。我再说买《珊瑚林》的事。无意中发现了这一部明刻书是《德山暑谭》的全稿，《暑谭》只是其间的四分之一，是选本。后来，他的门人又把全

稿刻了，就是这一部书，共分两卷，有陈继儒的序。我看被删的部分仍多佳作，且此书很少见，也决定买了下来。

从讲价到定夺，总算是很顺利，便付了定洋，言明晚间取书，要店里替我重订一下。问题就发生在这“晚间取书”上。我走进门，一个店伙迎头就说：“这部书缺了 18 页，怎么办?”我有点惊奇。接着另一个年轻的说：“我们老板回来，把我们骂了一顿，说是卖得太便宜了。”我这才懂得缺页是怎么回事。再接着来了一个有胡须的，望了这年轻的一眼：“我看这样，你先生且拿去，这缺页，将来我们设法替你补。”

当时，我气愤极了，我要他们把藏的拿出来。闹了很久，没有结果，他们一口咬定是原缺的。我深悔当时为什么不数一数。我明知道他们要留着这 18 页书，将来好敲我一回竹杠。我懊恼得把定洋要了回来，说：“我不买了。”

约有 3 星期，我再去那里，重行抽出这部书来看，缺页果然补上了，书价已经涨高了两倍。我忍不住的质问他们：“明明是原来的，朱笔圈也前后一样，你们为什么这样骗人!”他们却一口咬定是以重价配来的。

以后一连几个月，我在那里买了好几回书，总不再提起这一部。而这书因开价过高，也没有人肯买。直到过了年。一次我又愤愤地讲到，大概他们也知道照这样价钱是不会脱手，就再来要我买。终结是我照原价添了一倍，他们照改价让了三分之一，把它买了回来。这是一部很少见的难得的本子，虽然冤枉的多出了一倍钱，我始终感到欢喜。

买书真是不易。譬如买《徐文长集》，得到有图的《四声猿》本，以为是了不起了，却不知还有二种附刊他的笔记的本子。我之买《梅花草堂全集》，其情形也大体类似，因为此

书有两种，名同而实异。

何以言之？原因是张大复的著作，都题做全集，文集刻《梅花草堂全集》，笔记也刻做《全集》。卖书的人，版本是懂得的，内容却并不理解。《梅花草堂笔谈》14卷，流传得较多，也较易得，而文集16卷，因是禁书，却很难买到。但他们一般的只知道有两种卷数不同的本子。

受古不知从哪里收到了一部《文集》，他们并不知道这并非《笔谈》，只晓得多2卷，便把价提高了1倍。大概总有不少的人，以为这就是《笔谈》，价格既高，就一直没有人买。

有一天，我在那里闲着没事，谈起了这部书，告诉他们我买得的，价钱只有他们的一半，他们以多两卷为辞，拿出来给我看。哪知并非《笔谈》，而是禁毁的文集。

我知道这是一部极难得的书，而受古和富晋，却是“漫天开价”，不许你“就地还钱”的人家，便仍作为多2卷的《笔谈》来和他们论价，他们照规定的让了一点，我也就买了下来。

这部书买得并不公道，但如果受古知道并非《笔谈》，其开价恐怕要更多呢。不买又到哪里去找？我很庆幸得到了这部难以买到的书，虽说为了这部书，在经济上受了不少的累。

以后，还在受古家买到一部《婆罗园清语》，是虞德园的校刻本，有屠隆亲笔刻序。是全本，和《宝颜堂秘笈》的选本不同，他们作为宝颜堂本卖给了我，及至知道，才非常失悔。不过像这样幸运的事，究竟是不多见的。

“幸运”以外，也有“非幸运”的一面。于我买王季重集子的经过上，可以见之。发端也是在受古，他们给我看4册衬装的残书，是王季重的《游唤》、《游庐山记》、《律陶》、

《弈律》、《状志铭》，清初复刻本，索价很昂，我没有要。

蟫隐庐的新书目出来了，里面有《王季重全集》残本出售。我跑去看，计《避园拟存》、《杂文序》、《时文序》、《尔尔集》、《传》、《杂记》、《状志铭》各一卷，共14本，各种完全，无残缺。也是清初复刻本。《避园拟存》、《尔尔集》等且是禁书。开价并不高，当时我就买了来。

因为买得这7卷书，就颇有把受古《游唤》4册买来配补的意思，但这里面是重了《状志铭》两册。和受古商议，一点也不肯让价。《状志铭》拆开买，那更是办不到的。无可如何，只有照定价买了来。同样的两册书，超过了那边14册的价钱，真有些愤愤！

不久，又在一个店伙手里，遇到了明版的《王季重历游记》。直到后来见得原刻本，买到明版《名山胜概记》，才知道我买得的，并不是什么原刻，而是用《名山胜概记》里的一本衬装的。

去年，我看到了明版的《王季重十种》，内容没有我几次所凑合起来的多，书贾竟大标其为《王季重全集》，售价抬高到200元，真是可笑。他的《文饭小品》，是一直到现在还不曾见到过，不知将来有遇着的机会没有？

最近作《李伯元传》，买《海天鸿雪记》的事，是更奇巧了。好久买不到这部书，心里很焦急，后来翻一家的旧书目，看到这一书名，就立刻跑去买。店伙找了很久，找不到，约第二天再去。第二天依旧是找不出来，他们还坚持说没有卖掉。此书不得，在《李伯元传》上，是一大阙典，只得再委托他们。他们说，书一定在的，什么时候找到，是一点把握都没有。一团高兴，差不多灰冷了下来。

隔了两天，我去一家门摊书店，看看他们替我找到没

有，依旧是一个失望。在那里闲谈些时，只得告别回家。正要出门，一个人提了两大扎书来卖，打开他手里拿的书目来看，不禁使我心花怒放起来，开头的一部，竟是我焦急在寻的《海天鸿雪记》4 本。

他的开价是 4 元，共 72 册书。门摊书店的老板只肯出 1 元。两人拗住了。大约这是一个仆人，忽然的道："那么，书且放在这里，我回去问问看。"跑走了。有了这样的机会，我哪能不等待？真冤枉，一直候到太阳下山，竟再见不到这个人的影子。

怎么办呢？便和店主人商议，让我把《海天鸿雪记》带回来连夜的看掉，明天再送还，买得下就买，买不下就退还他。彼此都是很熟的朋友，自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哪知第二天去，又等了半天，此人仍不见来。第三天仍旧没有消息。弄得我简直不知要怎样才好。

到第四天，他还没有来。那时我也等不得了，便挑了几部，留下 3 元钱在那里，叫他们全部买下，剩下的四十几本，就送给他们去卖。1 元的让价，总不会再有问题的。又过了四五天，我才知道他们最后是以两元定局的，店里赚了 1 元现洋，得了几十册书。

我分了来的，是《海天鸿雪记》4 本、《文明小史》两本、《新繁华梦》5 本、《女界现形记》11 本，比平时的购价便宜多了！较之旧书店定《海天鸿雪记》价为 4 元，那是相差得更远。综计几天的辛苦，《海天鸿雪记》外，还得到《文明小史》的复本，以赠久访而不得的友人，我的欢喜也就可知了。正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

其实，如果只“遇”不“求”，那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苦恼，但在具有一定目标做学问的时候，又怎么办得到？何况“遇”得到也并非容易的事。如我今年之连续得到《黄平倩先生集》、《袁小修日记》、《徐芳悬榻编》，在我，可以说是一种例外。弹词小说，我虽不着意的求，年来却收得不少的好本子，大概是收藏家不注意及此的原因。如乾隆刻本《玉堂春全传》、乾隆本《赵胜关传》、《双玉燕传》、同治《诗发缘传》、抄本《马如飞珍珠塔》、嘉庆本《白獭传》、乾隆本《双玉镯前后传》、嘉庆本的《燕子笺弹词》，都是我所喜爱的。

虽然在这一方面用过很大的功夫，但几度思量，却觉得买书究竟是一件太苦的事，在我个人，是矛盾尤深。因为旧书的价格都是可观的，价高的有时竟要占去我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生活费，常常使自己的经济情况，陷于极端困难。而癖性难除，一有闲暇，总不免心动，要到旧书店走走。瞻仰前途，我真不知将如何是了！……在我个人想，总还有一篇《上海卖书记》好写吧。正是：

孜孜写作缘何事？
烂额焦头为买书。

1936 年

古城买书续记

李 高 信

近几年来，书店是很少涉足的了。这当然是很痛苦的事，但也无可奈何。原因何在呢？一来书价不断看涨，囊中之物总得用到最切要的诸如衣食之类的东西上去；二来，书的品位总难令人满意：要么是看不懂的热门著作，要么是打得一塌糊涂，脱的一丝不挂的劳什子，中意书极少。虽然早在书目上看到了，但要从书店去买就颇难。后来听说书店进货萎缩，有的干脆在订单上划零，这就难怪一些书常常和读者大捉迷藏了。

书店很少涉足，也并不绝对地一刀两断，比如减价书店、旧书店却时在打探之中。这类书店很少，门面也不冠冕，有点寒酸兮兮。这倒不要紧，我是去淘书，可不是看你的门面。或者更因了它们门面的寒酸，却正与清贫的读书人的心态契合，反而生出一些同病相怜的认

同和亲切来。

有几部书，就是日前从减价50%的书店购得：《巴金研究资料专集》，这次入手的是第二辑。第一辑早在7年前购得，定价1元6角，当时已经觉得有些贵。这第二辑薄一些，定价1元9角。书品很好，看来压库已久。内容很重要，全收巴金作品评论文章选辑，起于1932年，讫于1980年。当然只是选辑，但不乏名家手笔。更可贵的是专设了一个附录，内收了1968年发表的三篇“大批判文章”，而且原文照印，没有删节，其作者就有我熟悉的两位作家。这种编排办法，我是很欣赏的，尽管同一套资料中不少分册就是避讳这种不可或缺的“附录”。也是这同一套资料，我又找到《胡可研究资料》和《李英儒研究资料》。翻开来看，前面的照片都极眼熟，也许早已购藏到了。买吧，怕重复，不买吧，又怕此一别，无会期，踌躇再三，还是买了。我是宁可重复，也不愿失诸交臂。更何况，它是50%的折扣，便宜得让人吃惊，让人不忍心不买。

又购得《草堂之灵》一部。17万字的作品，对折只需7角，按现在作的书价，起码得3块多钱。作者杨钧，是大名鼎鼎的杨度同志之弟。杨钧善画善书，且以作书之法作画，自然天真，浩浩荡荡，按品格论，是令固守绳墨的“四王”信徒汗颜的，尽管也有人讥嘲他的画是野狐禅。以我行我素的杨钧的性格，他的《草堂之灵》早在我的搜求之列。这次邂逅，不胜兴奋得心跳怦然。此书分15卷，都是叙论杂出、博雅浩瀚的笔记短文，既不古奥，又不油滑，冷峻沉郁，活现出杨钧的独特性格。编者颜家龙有言：“杨钧笃学博闻，交游亦广，于处事、读书、治艺均有独见。其文锋芒犀利，风格明快，自成一家……内容广泛，有益之论甚多”，看来

也是的评，信得过的。

5块多钱，买书7本。走出这不起眼的减价书店，心中确乎愉快。“倒爷”得手，不知是何心情，也许有点相似罢——虽然这比喻不伦不类。

正规书店就在减价书店的左近，忍不住踱了进去，不是想买书，只是习惯使然。心存报复(我买不起你们,我却买得起它们,何况它们又并不弱于你们!)也说不定。一瞥之下，发现了岳麓书社新出的周作人散文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纸面精装，挺括精神，让人喜爱。这套书，前几年就有预告，计划很大，但几年下来，据我知连这本在内，不过出了4册。周作人的散文，素以“冲淡平和”为人称道，而很有些“暴躁凌厉之气”的散文就往往为人所忽略了。这部散文集里，这类作品却触目可见。其中“专斋随笔”10篇，实在把“暴躁凌厉”的文风发挥到了极致。一边翻看，一边就下了买下的决心。一看定价，5元7角，与刚才的7本减价书大体相同。1比7。孰轻孰重，一时也没法掂量。脑子忽然掠过一个奇怪的念头：待减价后再买不迟。刚想放脱，又赶快抓起：待减价之时，它不知已归何处。横下一条心，买了。

买书的心态，也实在说不清，道不明。对于读书人来说，与书总有那么一种缘分：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

1989年9月20日

长安有家旧书店

金　　平

西安有家古旧书店卧在青灰色的城墙下。

那天，与朋友倘佯长安市井，穿竹笆市、过南院门，仄到声名远播的五味什字巷口，蓦地发现一处人出人进、络绎不绝的店家——门前泊满自行车，出门的顾客正大包、小包往车架上驮。定睛一看，不是商场、货栈、展销厅，却是一家旧书店！

迈进店堂，环顾左右，是间三四十平方米的旧屋：低矮的顶棚悬着几支灯管，当中一只旧得发黑的吊扇，呼噜噜转得很响，却搅不起多少风凉。屋子的四壁全站着顶天立地红木书架。上下八九层首尾相接全是直挺挺的，一列列书脊！屋子当中也无闲地，展开又阔又大的几张书台，一摞摞的碑帖、典籍，一册册的图书、文集陈列着，让你一眼就看清书的封面！

书店有书这不希罕，希罕的是店里书多，

多得你四顾不暇。举例说吧，架上的图书每种至多三五册，不像有的书店半架子书都是一个姓氏的；还有就是备货足，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以来陆续出版的“三百题”系列新刊多种，可以一下子在店里配齐，像《古代艺术三百题》、《中国文化史三百题》精装本初版仅万册，如今你还可以五元多一册的定价买到；书店的服务员告诉我，书台上的新书、典籍七八天要一换，不兴尘埃重重、卷角缩页的“烂腌菜”；陈列碑帖的书架制得精巧而紧凑，一百二三十种碑帖图册各卧其位，帖间衔有纸条，书名定价版别一目了然。我惊奇碑帖的丰富，像《康熙御笔碑帖》、《乾隆御笔碑帖》、《明清书家墨宝》、《西安碑林全图》之类都是珍品。仅仅一个“现代作家传记”的架子上，便群星璀璨——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沈从文、台静农、茅盾、徐志摩等等作家传记，每一本都叫你爱不释手。

店堂雅净，店员虽都很年轻，但却很亲切，从你跨进店门的那一刻便如沐春风。店内所有的图书一律开架，没有一几一柜的阻挡，取书还书不过举手之劳。朱云影先生的《人类性生活史》不过 12 万字，薄薄一册，书在跟前一眼就看见、一手就买下；如若柜台阻隔再把守一位横眉立目的小姐，这么小小的册子，任你秋水望断也难觅得！铃木大拙的《通向禅学之路》热销，一会儿功夫架上便现虚席，怅然若失间店员奔来，“哗”地拉开书架下的贮书小柜，一边任我们取书，一边致歉。《中医学三百题》封面破损了，店员上下里外找遍了也没有第二本，他见我们抚弄着封面的破洞，欲购有憾、欲罢不忍的神态，便和蔼地与我们商量：这是运输中擦坏的，真对不起，不过内文完好，不影响阅读。俗话说，交友交颗心，交书交个瓤——这样吧，封面的破损马上替你

补一下，书价呢打个折扣。您看如何？一席话知冷知热、入情入理，你就是铁石一块也被这情怀捂热了。我们高兴地付了书款，年轻的店员又叫我们在风扇下凉快凉快消消暑，随即闪进书库。眨眼功夫，大大的一包书已经被几道浅绿色的纤维绳捆得方方正正、结结实实，外面还贴了一方书店自制的精美广告。

捧着这一只沉甸甸的纸包出门来，却忍不住频频回首。怪不得是西安市营业额最高的一家书店，我分不清这里边是厚厚的书页还是浓浓的人情，倏忽望见不远处岿然屹立的长安古城墙，心头热辣辣地，我就想：文章都是有情物，深情痴情莫如书。我在此时寻觅的，我从长安带走的不仅仅是这家国营书店的书吧，而是古都气象，汉唐民风！

外省旧书店两记

王 晓 建

乌鲁木齐旧书店小记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我在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生活了 10 年。作为北京人，我那时在文化生活方面常感两处缺憾：一是看不到北京人艺的戏，二是没有旧书店可逛。

大约是 1984 年春节前后吧，乌鲁木齐市中心忽然出现了一家旧书店。我问过几位权威的“老新疆”，他们都说新疆已往从无旧书店。那么，刚开张的这家，也许可以称做乌鲁木齐乃至整个新疆有史以来第一家旧书店了。

这家旧书店位于南门新疆人民出版社和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的西侧，我原以为是出版社或新华书店开拓思路经营起了旧书店，后来才知道与他们无关，这家旧书店是私营的。

从外表上看，这家旧书店实在不怎么起眼。租用的门市房建于盛世才统治新疆末期的40年代，地板早已凹陷，墙壁也斑斑驳驳，营业面积则只有几十平方米，七八千册旧书分门别类摆在简陋的木架上，木架上放不下的，就干脆堆放在地下。

我去买过几次书后，渐渐结识了旧书店的老板。他姓王，约摸三十几岁，应该说颇了解书的价值和行情。一般情况下，他节假日坐在店里照应门市，售书之外，也向顾客收购书。平日里，他常到乌鲁木齐市内或附近的县城收购书。我一边选书一边与他聊天，得知他去过昌吉、阜康、米泉、吉木萨尔等地。为降低经营成本，他总是搭乘拉货的大卡车，苦虽苦点儿，收获还算可以。他从外县收购来的书，我少说也买过几十本，至今仍摆在我书架上的，有《蒙古族简史》、《老学庵笔记》、《史可法集》等等。

王老板是爱书的内行，人又勤勉，所以店里常冒出一些新华书店里不见踪影的书。80年代我醉心于新疆地方史，曾在他的店中凑齐了一套《新疆文史资料选辑》，还买到过几本印数奇少的书。如：列为新疆历史研究资料丛书的明代文献《高昌馆课》，新疆人民出版社仅印了1300册；又如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编印的《维吾尔族简志合编》，因是征求意见的初稿，印数不超过1000册；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喀什噶尔》，是沙俄军官库罗帕特金记述阿古柏在新疆南部所建“哲德莎尔汗国”的著作，印数也只有3000册。我今天仍清晰地记得，当年淘到这些书时的喜悦心情。

书价，王老板采取常见的书、通俗读物减价，少见的书，有价值的文史书略微加价的做法。80年代盛行一时的言情、侦探小说，被他毫不留情地减了价，而中华书局1980年新版的《康熙字典》，原价7.40元，被他加价到10元一册。久居新疆

的人大都豪爽大方，历来是买肉论公斤，买瓜论麻袋，故尔并没有读者与那时尚很罕见的旧书加价行为计较。

不过，旧书店在新疆毕竟属于“新生事物”，难免会有一些人好奇，这些人进得店来便连连惊叹：“哟？怎么全是旧书？”“咦？旧书还能卖钱呀？”每遇这种场合，王老板并不尴尬，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好奇者解释，并且鼓动他们把打算卖给废品收购站的旧书送来。

恰好我那阵子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津津乐道旧书店》的小文，为了给王老板鼓鼓劲，便拿给他看了。王老板从此将我引为同调，每次我去买书，他都要和我倾谈一番北京、上海的旧书店，以及有关藏书的掌故等等。有几次，还请我帮他鉴定拿不准的线装书。可惜那些线装书中并无善本，多半是建国后新印的，如50年代印的《绝妙好词笺》，70年代印的《闲止堂集钞》之类。只偶尔有零星的清版书，印象较深刻的一本是《纲鉴易知录》，虽不完整，却是清代新疆巡抚衙门的旧藏，真不知这本书是躲过了多少兵燹和动乱，才得以保存至今流落到王老板的旧书店来的。

当我调离乌鲁木齐回北京之际，曾到旧书店与王老板作别。他讲过一番客套话之后，终于回到本行：“你的那些书呢？不可能全搬到北京去吧？有淘汰下来的，不想搬走的，一定送到这儿来，千万别称给收废品的。你的书我知道，进了造纸厂就太可惜了。”

我在新疆的藏书共有几千册，其中还真有一些搬不搬两可的，就挑出来给王老板送去了几大包。王老板按质论价，分别以四折、五折、六折甚至原价收购。

一晃，我在北京定居已有十余年了，对旧书的兴趣一仍其旧——中国书店的各门市部，报国寺、潘家园、玉泉路的

旧书市场，都是我经常出没的地方。论买旧书，北京真可以说是得天独厚，但不知为何我却十分怀念乌鲁木齐那家小小的旧书店。我曾向新疆的朋友打听，得到的答复是：那家旧书店早已停业了。

我有时候想：新疆地处祖国西陲，读者买书相对来说更困难一些。不少书是读者在北京、上海买到后千里迢迢带回新疆的，也有不少书是内地亲友花费挺贵的邮资寄到新疆去的。若有一家或一批旧书店，便可以延长许多有价值的好书的寿命。真巴望王老板能重操旧业，也企盼爱书的有心人起而继之。假如我再得到机会去新疆时，能再走进旧书店淘书，能再与懂书的老板侃侃书，那该有多好啊……

2000 年 7 月

长沙古旧书店印象

路过长沙，我下榻在蔡锷路上的湖南省文化厅招待所。多年来无论到何地，我都是要逛一逛旧书店的，便照例询问招待所的服务员："长沙现在可有旧书店么？"服务员一脸困惑地摇摇头："没留意过，也没听人讲起过。"

我有些失望地步出招待所。想起毛泽东早年在长沙求学时，曾于玉泉街的旧书店里花一块钱买到一部宝庆版的《韩昌黎集》，这样的机遇，在长沙恐怕再也不会有了吧？

不料，沿蔡锷路北行不过四五百米光景，路边竟蓦然出现了长沙古旧书店的招牌！

我兴冲冲地进得店来，发现这爿古旧书店的规模还相当不小——面积总有三四百平方米，书籍的种类也有七八千种之多。我觉得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店中的旧书还嫌少了一点

儿，只有四五架。然而，尽管旧书只占据全店七八分之一的营业面积，吸引的顾客却最多。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走进店来的顾客，十个人中倒有八九个人直奔旧书而去；有的人翻拣完旧书再去看看新书，也有的人浏览过旧书之后便匆匆离去。

我也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旧书架前，选购到中华书局80年代出版的三种书：曾国藩在湘军中的幕僚李光锐所撰《日记》，原价1.2元，减价为7角；清人汪辉祖撰《元史本证》，上下两册，近600页的篇幅，原价2.25元，减价为1.6元；还有湖南维新派人士樊锥的遗文集《樊锥集》，原价0.45元，减价为0.3元。三部书总共只花了2.6元钱，若用来买时下流行的新书，怕是连半本也买不来。

有幸见到了书店的罗经理，攀谈中他告诉我：目下长沙的旧书店，也就仅此一家。尽管经营旧书的利润远不如经营新书，但书店还是勉为其难坚持经营旧书，并且决心逐步扩大收售旧书的业务。罗经理的话，使我甚感欣慰。一座文化古城，假如没有一两家名符其实的旧书店，那么就不妨套用一句老话：读书人、爱书人何以堪？

说话间已到中午时分，店内的顾客骤然多了起来。我猜想，不少顾客大概是利用午饭和午休的时间来淘书或读书的。这又使我感到欣慰。

走出古旧书店的店门，我发现这一带颇有几家娱乐城和歌舞厅之类的场所。但接连好几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却视"城"、"厅"而不顾地踱了过来，一头扎进古旧书店中。此景此情令我忆起了阿英先生写在《城隍庙书市》中的一句话：

"肯跑旧书店的人，总是有希望的……"

1993年5月

旧书店一二三

奋　斋

我喜欢逛旧书店，一进去就舍不得出来。在里面东翻西阅，如入宝山，不觉心旷神怡，悠然意远，竟至忘却了劳累；忘却了冷热；忘却了吃饭。要是无意中买到一本稀罕的书，更是满心欢喜，如膺九锡，大有“万物皆备于我”之概，走起路来也飘飘然轻快之至。

过去旧书店的门面一般都不大，陈设也很简陋，里面除了旧书还是旧书。多半是线装的，也有平装的和精装的。经史子集，科学技艺，医卜星相，善书戏文，五花八门，杂然并陈。有的放在架上，有的摆在摊上，有的就搁在地上，任人翻阅，买否随便。一般的旧书，书店是论斤买进，论本卖出，因此，卖价虽然低廉，也少不了十一之利。如果属于什么善本、珍本、孤本，他们则藏之高阁，待价而沽，斩获当然更大。这些劳什子，穷措大只能

望洋兴叹，是不敢问津的。

值得一提的是旧书店的掌柜。他们大都很谦和，对顾客总是笑眯眯的，绝无居高临下之势。就是书被翻得七零八落的，他们也毫不嗔怪，等顾客走后，自行整理。有的书放在架子的高层，取拿不便，但如顾客要看，他们也会立刻搭凳搬梯，摇摇晃晃地取下来，轻轻拂去尘灰，递与顾客。如此，这本那本，七次八次，爬上爬下，取去取来，买了固好，不买也没有关系，生意不成仁义在，他们还是喜笑颜开，彬彬如也。但他们绝非无能之辈。一般的都具有应有的文史知识，还兼有修补、装订、鉴定古旧籍的本领。高深一点的，简直可入专家学者的行列。他们谈起什么版本学、目录学、校雠学、考据学、文献学；还有什么文坛掌故、书林佳话；以及某本书的精义要点，来龙去脉，真是头头是道，如数家珍，令人听得十分神往，不能不叹服其渊博。他们是有学问的人，道道地地的儒商。

从前旧书店很普遍，我每到一地，哪怕时间再紧，也要想方设法去浏览浏览。如果长住，那就更不用说了，也往往得到一些好书。

记得在抗战前的一两年，江津县城有一家卖“一折八扣”书的店子，也兼卖旧书。我在这里偶然看到一部钟耘舫的《振振堂集》。钟是清同治、光绪年间四川文坛一怪，愤世嫉俗，文笔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现今成都望江楼还悬挂有他一副有名的木制长联。他这集子早已散佚殆尽，不想在这冷僻小店里竟找到一部，真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这里附带说一下“一折八扣”书。30年代初，上海有家“大达图书公司”，专门翻印各种古籍，书前照例有篇朱太忙写的序。售价特

低，“一折八扣，拦腰一砍”。即定价为1元的书，打“一折”为一角；再“八扣”为8分；“拦腰一砍”即8分再打五折，成为4分。结果定价为1元的书只卖4分钱，几等于送。莘莘学子，每每花两三角钱就可买到一大摞，大家叫它“一折八扣”或“太忙书”。这些书虽然粗制滥造，错落不少，但由于肯大放血，销路特广，抢走了大书店好多生意。不久传来流言，说印这些书的纸，是日本的走私货，且带有细菌，可以毒害读者云云。于是该公司终被抗日浪潮冲洗以去。

抗战初，我在重庆米亭子旧书店买到一部《段注说文解字》，扫叶山房石印本。书不稀奇，但原书主在上面密密麻麻批了不少心得，使我很受启发，获益不少。有个星期天，我在两路口一家吊脚楼的旧书摊上买到一部《楚辞》，王闿运(壬秋)注，成都尊经书院刻本。大概是壬翁在该院作山长时的产物，字大额宽，确是佳本。

后在成都，祠堂街一带的旧书店我常去，恐怕挨宰，看多买少。有天我在一条背街发现一家旧书店，坐店的是两父女，书还不少。我以善价选购了嘉庆刻本《李太白集》和石印本《读通鉴论》。《读通鉴论》印制粗糙，甚不惬意，后被一个报社的朋友拿去，说揣摩其笔法好写社论。也算派上了用场。

抗战胜利后，我到了镇江、扬州。这里的旧书店很多。在镇江我买到一部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颇有皇家气派：开本挺大：字体整齐厚重，清晰明亮；书眉很宽；每册均有衬纸。原书主对它很爱护，特用楠木夹板夹成一函一函的，颇为别致。美中不足的是缺了《孝经》，书贾配以军阀张宗昌在山东刻的《十三经》中的《孝经》，比原本逊色多了。还买下

一部套朱《昭明文选》，是乾隆长州刻本，也有楠木书夹，纸色苍黄，古意盎然。有个大雪天，我在一家破落的旧书店见到一部黄仲则的《两当轩全集》初刻本，我嫌它被虫蛀了，迟疑未买，隔两天再去，已被人买走，至今惜之。

最有趣的是某天下午，我在扬州一条小巷里闲逛，见一老媪在门口守着个香烟摊，边晒太阳边打鞋底，摊上除香烟外也放了一些书。我近前一翻，竟有部初刻本汪中《述学》。老媪搭口便卖，不过两三块烧饼钱而已。友人云，这大都是书香门第的后代，式微了，把祖先的藏书零星出卖以救眉急。闻之恻然。更为有趣的，有家旧书店在门前屋檐下摆了两个大木脚盆，每天在里面堆起冒尖尖的书，形同废纸，随便给点钱就可以拿走一些。有回我在盆里翻出一部梁章钜的《楹联丛话》、《续话》，均为初刻本，喜出望外。后又翻到一部道光刻本《桃花扇》，印刷甚劣，与我幼年时看见赶乡场小贩卖的五六文钱一本的川戏脚本差不多，因价贱，还是买了，但不甚爱惜。以后被一个识货的朋友拿去大做其考证、校雠，竟写出一篇有分量的论文，刊载于《新中华》杂志。

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旧书店我也去观光过。由于囊空，不过是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聊且快意罢了。

解放初，在武昌旧书店买过湖北官书局刻本《庄子》、《墨子》、《列子》等书，均较普通，只有一本套色的《陶渊明集》版本尚好。后来新华书店在汉口开设了古旧籍门市部，我有次在那里见到了一部黄侃手批的《文心雕龙》，锁在玻璃柜里，标价为500余元，约等于我当时半年的工资，连索看一下的勇气也没有，嗒然而去。可是以后我还是在那里买了四部备要本《文心雕龙》和《弹指词》以及其他一些书，价不算

贵，差堪告慰。

“文化大革命”起，破旧立新，旧书店扫地以尽，想逛也无从逛起了。

我觉得旧书店是文化市场的补充。那里蕴藏着大量的中华文化瑰宝和无数前人的心血结晶；它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精神粮食；对建设精神文明和提高社会素质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又具有方便、价廉、供应面广、服务周到诸种特点。因此，似为城市不应缺少的一角。

假使让我作出选择，我宁愿多要些旧书店，少要些卡拉OK。

忆南后街旧书铺

郭　　风

40年代中叶，至福州定居以后，便开始与南后街有了某种缘分。那时，我还是一位阅世未深的年轻人，住在一条俗称西牙巷的小巷内。它虽与南后街相距甚近，却排不上分居于南后街两边的所谓三坊七巷的古老街坊之列。它也许只是一条陋巷，并无名宦大户之家，巷内民居简陋、破旧，不过就居室之建筑看来，属于福州一般的传统居民结构，所以平日出入于此陋巷，也往往有一种年代久远甚或古老的感觉。那时，生活的负担已经开始压在我的肩上；我除了固定职业(教书)外，还兼任两份工作，譬如报纸的副刊编辑，并忙于写些散文、小品乃至童话。那时，我似乎并不知世情、人生为何物，却又似乎对于自己的未来天地抱着某种期望、憧憬乃至某种追求和信念，心中有时点起一团希望的火焰。那时，肩上虽有生活

的负担，工作也忙，倒也时或忙里偷闲，从西牙巷寓所到附近的南后街去逛旧书铺。

当时，南后街的旧书铺比起北京琉璃厂的旧书肆来，自不可同日而语。但对于一位阅历和学殖均浅的我来说，逛这些书铺有如自由进入一座又一座的书城，心中总想此书城里处处有智慧之泉可掬，能慰藉心灵的渴求。我现在已不大记得在这些旧书铺里买下一些什么书籍。但我记得，那时不知何因，我喜欢我国古代的一些笔记小说、笔记散文。这主要可能是因为这类作品往往写得简洁、隽永、大方；所写有些事迹可能显得怪异，但仍觉有益于启迪心智。我记得从那些古旧书堆中间，曾找到诸如《世说新语》、《唐语林》以至《酉阳杂俎》、《梦溪笔谈》、《东京梦华录》；以至苏轼的《东坡志林》、陆游的《入蜀记》、柳宗元的《龙城录》等外，还寻访到若干部记述八闽故实、风土民情、遗闻轶事的笔记，诸如《闽小记》、《闽别记》和《浪迹丛谈》等等，这些笔记或为宦游福建的学人如周亮工等所作，或为闽籍学者如梁章钜等所作。十分有趣的是这些笔记散文、笔记小说，至今还为我所喜读，闲时还时或翻阅，常有所得。此外，当时我还喜欢寻找诸如《笑林广记》之类的古典的通俗作品。记得有一次偶然在旧书铺的书架上访得一部冯梦龙编纂的《古今谭概》，披读之余，觉得此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如无卓见，不可能作出此举。我至今还觉得笑话是一种具有深刻人生见解的文体，往往以民间的诙谐，揭示某些人性的疮疤，嘲弄某些世态的丑陋，它固然使你发笑，但在心中感到沉痛。寒舍有一书橱，专放经常翻阅的书籍，其中至今还摆有《古今谭概》、《笑林广记》，虽非当年在南后街旧书铺所购得者(是近年新添的)，但阅读它们，有时还会念及当年获得这些书籍时的喜悦心情。

在当年南后街的旧书铺里，我曾去寻访到30年代出版的一些文学期刊，譬如《北斗》、《拓荒者》等。我记得就在《拓荒者》上读到列宁有关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些文章。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了一套可能是由文学研究会主持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版式十分精致：32开本，布面烫银(不是烫金)。我就在南后街旧书铺中购得朱湘先生选译的《番石榴集》，书中选译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以及湖畔诗人等的诗歌。也寻访到卞之琳先生选译的《西窗集》。此书中除收入欧洲一些象征派诗人的诗歌，也收入包括纪德、里尔克、蒲宁等在内的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的小说。这本书使我念念不忘的是，收入史密士、阿索林和玛拉美等的散文诗，对于我的散文写作发生过影响。我至今还保存一册1934年出版的《西窗集》。

南后街的几家旧书铺的店主人和伙计，看来都是朴素的，专注于这份职业(以出售线装的古旧书为主)的独特的生意人和行家。我常到的一家旧书铺，是把店主人居屋的厅堂以至天井等作为书库，排着一排排的木书架的古旧线装书，书架中间腾出一块方形的小小空间，店主人就坐在木桌前修补装订旧书和接待顾客。那时他有五十出头？穿一件灰色旧长衫，戴一副老花眼镜。由于我常来，他已多少知道我欲寻访的旧书。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他正低头在修补一部刘克庄(此公是我的故乡莆田人氏,所以记得清楚)的《刘后村大全集》。可能听见我走近的步声，他不觉摘下眼镜，一下子笑吟吟地对我说："我为你搜集到一部《仇池笔记》……"

这部苏东坡的小品文集，从那时起即成为我的重要案头书之一。这部书对于我的散文见解，发生影响。

我到福州定居后，便与南后街结下一种良缘。

面对旧书摊

唐　　希

福州有两个旧书摊分别设在光明桥和左海公园旁的花鸟市场里，每逢节假日，爱书的人便与爱花爱鸟人一起有“墟”可赶了。开初似乎觉得不妥，这书市怎么能与花鸟宠物摆一块儿呢？细细想来也对，对于读书人、用书人、爱书人、藏书人来讲，这书也是“花”，也是“鸟”，一样的是“宠物”。

废品收购者走街串巷称斤买来的旧书报里良莠不分，而每一个购书人选书的标准也不尽相同，应了福州人的一句老话：“要如金，不要如土”。若能买到曾经想拥有，又没机会购买到的书，如果碰巧遇上全新的旧书(指没人读过却被送进废品堆的书)，那高兴决不只是节省几块钱而生出的高兴。

旧书摊上常有熟面孔出现。会看到熟悉的作家、书画家、摄影家的个人文集画册，十分

委屈地摆在形形色色的破书堆里。有时，平日里十分体面的作者正经八百地签了名送给某先生、小姐、方家、兄长，那大大小小的雅正连同礼节一起被人扔进了旧书摊，看了心里不是滋味，不怪谁，只怪作者自己没眼力。如果此时有兴致恶作剧，给赠书的作者打个电话曰：在旧书摊上看到你的大作，某年某月某日送给某至爱亲朋的。电话那边一定是先给个“国骂”，再加上自问：怎么会到那地方去了呢？大约有一半的人会接着说：快快帮我买回来。像是要赎回一只走失的猫。

理解了这心情，每回面对旧书摊，便瞪大了眼看是否有自己编印的书“落入风尘”。幸好未见着。没遇上不等于没有呀！不可能吧！那些书我仅送给朋友的，我相信友情。

其实，认真想一想也没什么，旧书摊也是书市呀！堂而皇之的大书店，世界名著与普通作品等级分明，决不混淆。在旧书摊上，任何一部作品都可以与雨果、罗丹、梁实秋、齐白石……平起平坐，这叫与大师一起练摊。

不必细问书是如何落入“风尘”的，每本书自有它的命运，离开主人便开始了漂泊生涯，并不是上了旧书摊便低人一等。庆幸的是，原来它在一个不懂书、不爱书的人手里(至少不爱不懂这本书)，或装模作样地摆在书架上，或囚禁在阴冷潮湿的杂物间里，是旧书摊让它重见天日。再有人赏识它、购买它，那一定是个爱书人，一个知音。

从此，坦荡面对旧书摊，不再害怕与自己编印的作品在此相遇，更加明白书印了只给知音阅读，给朋友收藏。

1999.11

香港的旧书市

戴 望 舒

这里有生意经，也有神话。

香港人对于书的估价，往往是会使外方人吃惊的。明清善本书可以论斤称，而一部极平常的书却会被人视为稀世之珍。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的亲戚珍藏着一部《中华民国邮政地图》,待价而沽，须港币5000元(合国币400万元)方肯出让。这等奇闻，恐怕只有在那个小岛上听得到吧。版本自然更谈不到，《明版康熙字典》一类的笑谈，在那里也是家常便饭了。

这样的一个地方，旧书市的性质自然和北平、上海、苏州、南京等地不同。不但是规模的大小而已，就连收买的方式和售出的对象，也都有很大的差别。那里卖旧书的仅是一些变相的地摊，沿街靠壁钉一两个木板架子，搭一个避风雨的遮棚，如此而已。收书是论斤断秤的，道林纸和报纸印的书每斤出售约港币一二

毫，而全张报纸的价钱却反而高一倍；有硬面书皮的洋装书更便宜一点，因为纸板“重称”。中国纸的线装书，出到一毫一斤就是最高的价钱了。他们比较肯出价钱的倒是学校用的教科书，簿记学书，研究养鸡养兔的书等等，因为要这些书的人是非购不可的，所以他们也就肯以高价收入了。其次是医科和工科用书，为的是转运内地可以卖很高的价钱。此外便剩下“杂书”，只得卖给那些不大肯出钱的所谓“藏家”和“睇家”了。他们最大的主顾是小贩，这并不是说香港小贩最深知读书之乐，他们对于书籍的处理是更实际一点，拿来做纸袋包东西。其次是学生，像我们这种并不从书籍得到“实惠”的人，在他们是无足重轻的。

旧书摊最多的是皇后大道中央戏院附近的楼梯街，现在共有五个摊子。从大道拾级上去，左手第一家是“龄记”，管摊的是一个十余岁的孩子(他父亲则在下面一点公厕旁边摆废纸摊)，年纪最小，却懂得许多事。著《相对论》的是爱因斯坦，哥德是德国大文豪，他都头头是道。日寇占领香港后，这摊子收到了大批德日文学书，现在已卖得一本也不剩，又经过了一次失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好东西了。隔壁是“焯记”，摊主是一个老是有礼貌的中年人，专卖中国铅印书，价钱可不便宜，不看也没有什么关系。他对面是“季记”，管摊的是姐妹二人。到底是女人，收书卖书都差点功夫。虽则有时能看顾客的眼色和态度见风使舵，可是索价总嫌“离谱”(粤语不合分寸)一点。从前还有一些四部丛刊零本，现在却单靠卖教科书和字帖了。“季记”隔壁本来还有“江培记”，因为生意不好，已把存货秤给鸭巴甸街的“黄沛记”，摊位也顶给卖旧铜烂铁的了。上去一点，在摩罗街口，是“德信书店”，虽号称书店，却仍旧还是一个摊子。主持人是一对少年夫妇，书相当多，可是也相当

贵。他以为是好书，就一分钱不让价，反之，没有被他注意的书，讨价之廉竟会使人不相信。“格吕尼”版的波德莱尔的《恶之华》和翰波的《作品集》，两册只讨港币一元，希米忒的《莎士比亚字典》会论斤秤给你，这等事在我们看来，差不多有点近乎神话了。“德信书店”隔壁是“华记”。虽则摊号仍是“华记”，老板却已换过了。原来的老板是一家父母兄弟四人，在沦陷期中旧书全盛时代，他们在楼梯街竟拥有两个摊子之多。一个是现在这老地方，一个是在“焯记”隔壁，现在已变成旧衣摊了。因为来路稀少，顾客不多，他们便把滞销的书盘给了现在的管摊人，带着好销一些的书到广州去开店了，听说生意还不错呢。现在的“华记”已不如从前远甚，可是因为地利的关系(因为这是这条街第一个摊子，经荷里活道拿下旧书来卖的，第一先经过他的手，好的便宜的，他有选择的优先权)，有时还有一点好东西。

在楼梯街，当你走到了“华记”的时候，书市便到了尽头。那时你便向左转，沿着荷里活道走两三百步，于是你便走到鸭巴甸街口。

鸭巴甸街的书摊名声还远不及楼梯街的大，规模也比较小一点，书类也比较新一点。可是那里的书，一般地说来，是比较便宜点。下坡左首第一家是“黄沛记”，摊主是世业旧书的，所以对于木版书的知识，是比其余的丰富得多，可是对于西文书，就十分外行了。在各摊中，这是取价最廉的一个。他抱着薄利多销主义，所以虽在米珠薪桂的时期，虽则有八口之家，他还是每餐可以饮二两双蒸酒。可是近来他的摊子上也没有什么书，只剩下大批无人过问的日文书，和往日收下来的磁器古董了。“黄沛记”对面是“董莹光”，也是鸭巴甸街的一个老土地。可是人们却称呼他为“大光灯”。

大光灯意思就是煤油打气灯。因为战前这个摊子除了卖旧书以外还出租煤油打气灯。那些“大光灯”现在已不存在了，而这雅号却留了下来。“大光灯”的书本来是不贵的，可是近来的索价却大大地“离谱”。据内中人说，因为有几次随便开了大价，居然有人照付了，他品出味道来，以后就一味地上天讨价了。从“董莹光”走下几步，开在一个店铺中的，是“萧建英”。如果你说他是书摊，他一定会跳起来。因为在楼梯街和鸭巴甸街这两条街上，他是唯一有店铺的——虽则是极其简陋的店铺。管店的是兄弟二人。那做哥哥的人称之为“高佬”，因为又高又瘦。他从前是送行情单的，路头很熟，现在也差不多整天不在店，却四面奔走着收书。实际上在做生意的是他的十四五岁的弟弟，虽则还是一个孩子，做生意的本领却比哥哥更好，抓定了一个价钱之后，你就莫想他让一步。所以你想便宜一点，还是和“高佬”相商。因为“高佬”收得勤，书摊是常常有新书的。可是，近几个月以来，因为来源涸绝，不得不把店面的一半租给另一个专卖翻版书的摊子了。

在现在的“萧建英”斜对面，战前还有一家“民生书店”，是香港唯一专卖线装古书的书店，而且还代顾客装璜书籍号书根。工作不能算顶好，可是在香港却是独一无二的。不幸在香港沦陷后就关了门，现在，如果在香港想补裱古书，除了送到广州去以外就毫无办法了。

鸭巴甸街的书摊尽于此矣，香港的书市也就到了尽头了。此外，东碎西碎还有几家书摊，如中环街市旁以卖废纸为主的一家，西营盘兼卖教科书的“肥林”，跑马地黄泥涌道以租书为主的一家，可是绝少有可买的书，奉劝不必劳驾。再等而下之，那就是禧利街晚间的地道的地摊子了。

漫话世界古旧书业

孟 宪 义

古旧书业在各国书业中虽然都不占重要地位，但在书刊流通，调节书刊市场，特别是在解决图书和读者的特殊需要方面，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世界许多国家都有为数不多的专营古旧书的书店，一些古旧书贸易发达的国家都有其行业组织。

1948年组成的国际古旧书商联合会，旨在增进个人、书店和协会之间的友谊，促进世界古旧书贸易的发展。

该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每3～4年出版一次《古旧书商指南》，每年出版1～2期《新闻通信》。

目前的会员有巴西、加拿大、美国、日本、奥地利、英国、比利时、丹麦、荷兰、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芬兰、挪威、瑞典、

瑞士等16个国家的全国性古旧书商协会。其中美国古旧书商协会的规模最大，有会员书店535家。

另外，还有一个由400家各国古旧书商组成的国际古旧书商协会，成立于1906年，每年6月在英国伦敦举办一次古旧书展。

古旧书商的经营范围，包括善本书，古书和旧书，以及过期期刊。专营善本书和古书的书店很少，多数为经营旧书，或兼营古书和善本书。

这些书店一般都各有自己的经营范围或侧重点，或专营艺术、社会科学、医学、技术类古旧书等等。专营过期刊物的书店为数更少，但一般都颇具规模，货源比较充足。例如美国的艾—耶格公司就是专营过期刊物的书商，它经常备有大约七八千种各国出版的各类过期期刊，而且有不少是从创刊号开始的。这家书店的顾主不限于美国国内，而是通过印发现货目录向各国图书馆推销。例如这家书店印发的1986—1988年目录中甚至还包括我国《中华医学杂志》1975—1985年的各卷，售价每卷70美元。当然，近年来由于缩微技术的进步，许多过期刊物，包括报纸，都有了缩微品，不仅品种多，而且价钱也低，因此，印刷本的过期刊物，在销售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古旧书店的货源来自多种渠道，但其主要来源是私人藏书的拍卖和出售。这类藏书往往内容丰富，数量很多，因而成为活跃古旧书市场的重要条件。

古旧书的价格依其历史价值和需求多寡的不同而有高有低。一部19世纪以前出版的古书，价值上万美元或更多，亦屡见不鲜。当然，近期出版的图书，一旦沦为旧书，则往往低于原价。美国有些旧书店就是专卖一美元一本的旧书，

不过许多有阅读价值的绝版书的售价还是很高的。

古旧书店的销售方式不尽相同，有在门市出售的，有通过印发目录开展邮购的，也有通过刊登广告或进行拍卖出售的。一般来说，英、美和日本等国的古旧书商都很重视宣传推广和信息交流，主要是通过出版行业期刊的方式。

现已出版的古旧刊物有：

英国的《古旧书月评》发行 3000 份；

美国的《古旧书商周刊》发行 8000 份；

日本的《古书通信》月刊，包括古书介绍，谈书随笔，古旧书邮购目录，以及古旧书市场动态等内容。

此外，美国专出各类工具书的盖尔研究有限公司还不定期出版一种《书商价格索引古书和绝版书书价指南》。

古旧书商印发的目录虽然很杂，良莠皆存，但仍值得仔细浏览，因为其中确实混杂有一些本来就是难得的出版物，例如在日本清和堂的古书目录里就常有日本官方机构、行业团体出版的专题报告性质的出版物，而这些出版物不少是过去不公开发行的，因此，可以把这类目录当作搜集难得资料的一种线索或途径。

日本的古旧书业比较发达，东京的神田神保町是古旧书店密集的地区，整条街上书店鳞次栉比，展示各种古今书籍，琳琅满目，且各具特色。日本古旧书店的许多经营者都是世代相传的古书世家，他们对其经营的旧书，包括版本，以及其历史渊源之类的专业学问了如指掌，连学者专家有时也到这里向他们请教一些书籍或版本的来龙去脉，至于整理或修补古籍的技艺则更是熟练，因此深受学者的尊敬。他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商业买卖的关系，而且还具有友谊和学问切磋的关系。

古旧书的顾主一般以个人读者居多，但许多图书馆和其它藏书单位也是古旧书店的重要买主，尤其是具有收藏价值的古旧书和过期刊物，其最终归宿恐非图书馆莫属。

三家书店

朱自清

伦敦卖旧书的铺子，集中在切林克拉斯路(Charing Cross Road)；那是热闹地方，顶容易找。路不宽，也不长，只这么弯弯的一段儿；两旁不短的是书。玻璃窗里齐整整排着的，门口摊儿上乱烘烘摆着的，都有。加上那徘徊在窗前的，围绕着摊儿的，看书的人，到处显得拥拥挤挤，看过去路便更窄了。摊儿上看最痛快，随你翻，用不着“劳驾”“多谢”；可是让风吹日晒的到底没什么好书，要看好的还得进铺子去。进去了有时也可随便看，随便翻，但用得着“劳驾”“多谢”的时候也有；不过爱买不买，决不至于遭白眼。说是旧书，新书可也有的是，只是来者多数为的旧书罢了。

最大的一家要算福也尔(Foyle)，在路西；新旧大楼隔着一道小街相对着，共占7号门牌，都是4层，旧大楼还带地下室——可并不

是地窨子。店里按着书的性质分 25 部；地下室里满是旧文学书。这爿店 28 年前本是一家小铺子，只用了一个店员；现在店员差不多到了 200 人，藏书到了 200 万种，伦敦的《晨报》称为“世界最大的新旧书店”。两边店门口也摆着书摊儿，可是比别家的大。我的一本《袖珍欧洲指南》，就在这儿从那穿了满染着书尘的工作衣的店员手里，用半价买到的。在摊儿上翻书的时候，往往看不见店员的影子；等到选好了书四面找他，他却从不知哪一个角落里钻出来了。但最值得流连的还是那间地下室；那儿有好多排书架子，地下还东一堆西一堆的。乍进去，好像掉在书海里；慢慢地才找出道儿来。屋里不够亮，土又多，离窗户远些的地方，白日也得开灯。可是看得自在：他们是早 7 点到晚 9 点，你待个几点钟不在乎，一天去几趟也不在乎。只有一件，不可着急。你得像逛庙会逛小市那样，一半玩儿，一半当真，翻翻看看，看看翻翻；也许好几回碰不见一本合意的书，也许霎时间到手了不止一本。

开铺子少不了生意经，福也尔的却颇高雅。他们在旧大楼的四层上留出一间美术馆，不时地展览一些画。去看不花钱，还送展览目录；目录后面印着几行字，告诉你要买美术书可到馆旁艺术部去。展览的画也并不坏，有卖的，有不卖的。他们又常在馆里举行演讲会，讲的人和主席的人当中，不缺少知名的。听讲也不用花钱；只每季的演讲程序表下，“恭请你注意组织演讲会的福也尔书店”。还有所谓文学午餐会，记得也在馆里，他们请一两个小名人做主角，随便谁，纳了餐费便可加入；英国的午餐很简单，费不会多。假使有闲工夫，去领略领略那名隽的谈吐，倒也值得的，不过去的却并不怎样多。

牛津街是伦敦的东西通衢，繁华无比，街上呢绒店最多；但也有一家大书铺，叫做彭勃思(Bumpus)的便是。这铺子开设于1790年左右，原在别处；1850年在牛津街开了一个分店，19世纪末便全挪到那边去了，维多利亚时代，店主马斯彭勃思很通声气，来往的有迭更斯，兰姆，麦考莱，威治威斯等人；铺子就在这时候出了名。店后本连着旧法院，有看守所，守卫室等，十几年来都让店里给买下了。这点古迹增加了人对于书店的趣味。法院的会议圆厅现在专作书籍展览会之用；守卫室陈列插图的书，看守所变成新书的货栈。但当日的光景还可以从一些画里看出：如18世纪罗兰生(Rowlandson)所画守卫室内部，是晚上各守卫提了灯准备去查监的情形，瞧着很忙碌的样子。再有一个图，画的是1729年的一个守卫，神气够凶的。看守所也有一幅画，砖砌的一重重大拱门，石板铺的地，看守室的厚木板门严严锁着，只留下一个小方窗，还用十字形的铁条界着；真是铜墙铁壁，插翅也飞不出去。

这家铺子是5层大楼，却没有福也尔家地方大。下层卖新书，3楼卖儿童书，外国书，4楼5楼卖廉价书；二楼卖绝版书，难得的本子，精装的新书，还有《圣经》，祈祷书，书影等等，似乎是菁华所在。他们有初印本，精印本，著者自印本，著者签字本等目录，搜罗甚博，福也尔家所不及。新书用小牛皮或摩洛哥皮(山羊皮——羊皮也可仿制)装订，烫上金色或别种颜色的立体派图案；稀疏的几条平直线或弧线，还有“点儿”，错综着配置，透出干净，利落，平静，显豁，看了心目清朗。装订的书，数这儿讲究，别家书店里少见。书影是仿中世纪的钞本的一叶，大抵是诗文之类。中

世纪抄本用黑色花体字，文首第一字母和叶边空处，常用蓝色金色画上各样花饰，典丽矞皇，穷极工巧，而又经久不变；仿本自然说不上这些，只取其也有一点古色古香罢了。

1931年里，这铺子举行过两回展览会，一回是剑桥书籍展览，一回是近代插图书籍展览，都在那“会议厅”里。重要的自然是第一回。牛津剑桥是英国最著名的大学；各有印刷所，也都著名。这里从前展览过牛津书籍，现在再展览剑桥的，可谓无遗憾了。这一年是剑桥目下的辟特印刷所(The Pitt Press)奠基百年纪念，展览会便为的庆祝这个。展览会由鼎鼎大名的斯密兹将军(General smuts)开幕，到者有科学家詹姆士金斯(James Jeans)，亚特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还有别的人。展览分两部，现在出版的书约莫4000册是一类；另一类是历史部分。剑桥的书字型清晰，墨色匀称，行款合式，书扉和书衣上最见工夫；尤其擅长的是算学书，专门的科学书。这两种书需要极精密的技巧，极仔细的校对；剑桥是第一把手。但是这些东西，还有他们印的那些冷僻的外国语书，都卖得少，赚不了钱。除了是大学印刷所，别家大概很少愿意承印。剑桥又承印《圣经》；英国准印《圣经》的只剑桥牛津和王家印刷人。斯密兹说剑桥就靠《圣经》和教科书赚钱。可是《泰晤士报》社论中说现在印《圣经》的责任重大，认真地考究地印，也只能够本罢了。——1588年英国最早的《圣经》便是由剑桥承印的。

英国印第一本书，出于伦敦威廉甲克司登(William Caxton)之手，那是1477年。到了1521年，约翰席勃齐(John Siberch)来到剑桥，一年内印了8本书；剑桥印刷事业才创始。8年之后，大学方面因为有一家书纸店与异端的新教派勾结，怕他们利用书籍宣传，便呈请政府，求英王核准在剑

桥只许有三家书铺，让他们宣誓不卖未经大学检查员审定的书。那时英王是亨利第八；1534 年颁给他们敕书，授权他们选三家书纸店兼印刷人，或书铺，“印行大学校长或他的代理人等所审定的各种书籍”。这便是剑桥印书的法律依据。不过直到 1583 年，他们才真正印起书来。那时伦敦各家书纸店有印书的专利权，任意抬高价钱。他们妒忌剑桥印书，更恨的是卖得贱。恰好 1620 年剑桥翻印了他们一本文法书，他们就在法庭告了一状。剑桥师生老早不乐意他们抬价钱，这一来更愤愤不平；大学副校长第二年乘英王詹姆士第一上新市场去，半路上就递上一件呈子，附了一个比较价目表。这样小题大做，真有些书呆子气。王和诸大臣商议了一下，批道，我们现在事情很多，没工夫讨论大学与诸家书纸店的权益；但准大学印刷人出售那些文法书，以救济他的支绌。这算是碰了个软钉子，可也算是胜利。那呈子，那批，和上文说的那本《圣经》，都在这一回展览中。席勃齐印的 8 本书也有两种在这里。此外还有 1629 年初印的定本《圣经》，书扉雕刻繁细，手艺精工之极。又密尔顿《力息达斯》(Lycidas)的初本也在展览着，那是经他亲手校改过的。

近代插图书籍展览，在圣诞节前不久，大约是让做父母的给孩子们多买点节礼吧。但在一个外国人，却也值得看看。展览的是 70 年来的作品，虽没有什么系统，在这里却可以找着各种美，各种趋势。插图与装饰画不一样，得吟味原书的文字，透出自己的机锋。心要灵，手要熟，二者不可缺一。或实写，或想象，因原书情境，画人性习而异。——童话的插图却只得凭空着笔，想象更自由些；在不自由的成人看来，也许别有一种滋味。看过赵译《阿丽丝漫游奇境记》里谭尼尔(John Tenniel)的插画的，当会有同感吧。——所

展览的，幽默，秀美，粗豪，典重，各擅胜场，琳瑯满目；有人称为“视觉的音乐”，颇为近之。最有味的，同一作家，各家插画所表现的却大不相同。譬如茂默伽亚谟（Omar Khayyam），莎士比亚，几乎在一个人手里一个样子；展览里书多，比较着看方便，可以扩充眼界。插图有“黑白”的，有彩色的；“黑白”的多，为的省事省钱。就黑白画而论，从前是雕版，后来是照相；照相虽然精细，可是失掉了那种生力，只要拿原稿对看就会觉出。这儿也展览原稿，或是炭笔画，或是水彩画；不但可以“对看”，也可以让那些艺术家更和我们接近些。《观察报》记者记这回展览会，说插图的书，字往往印得特别大，意在和谐；却实在不便看。他主张书与图分开，字还照寻常大小印。他自然指大本子而言。但那种“和谐”其实也可爱；若说不便，这种书原是让你慢慢玩赏的，哪能像读早报一样目下数行呢？再说，将配好了的对儿生生拆开，不但大小不称，怕还要多花钱。

诗籍铺（The Poetry Bookshop）真是米米小，在一个大地方的一道小街上。叫名“街”，实在一条小胡同吧。门前不大见车马，不说；就是行人，一天也只寥寥几个。那道街斜对着无人不知的大英博物院；街口钉着小小的一块字号木牌。初次去时，人家教在博物院左近找。问院门口守卫，他不知道有这个铺子，问路上戴着常礼帽的老者，他想没有这么一个铺子；好容易才找着那块小木牌，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铺子从前在另一处，那才冷僻，连斐歹克的地图上都没名字，据说那儿是一所老宅子，才真够诗味，挪到现在这样平常的地带，未免太可惜。那时候美国游客常去，一个原因许是美国看不见那样老宅子。

诗人赫洛德孟罗(Harold Monro)在1912年创办了这爿诗籍铺。用意在让诗与社会发生点切实的关系。孟罗是20多年来伦敦文学生涯里一个要紧角色。从1911年给诗社办《诗刊》(Poetry Review)起知名。在第一期里，他说，“诗与人生的关系得再认真讨论，用于别种艺术的标准也该用于诗。”他觉得能做诗的该做诗，有困难时该帮助他，让他能做下去；一般人也该念诗，受用诗。为了前一件，他要自办杂志，为了后一件，他要办读诗会；为了这两件，他办了诗籍铺。这铺子印行过《乔治诗选》(Georgian Poetry),乔治是现在英王的名字,意思就是当代诗选,所收的都是代表作家。第一册出版,一时风靡,买诗念诗的都多了起来；社会确乎大受影响。诗选共5册；出第五册时在1922，那时乔治诗人的诗兴却渐渐衰了。1919到25年铺子里又印行《市本》月刊(The Chapbook)登载诗歌、评论、木刻等，颇多新进作家。

读诗会也在铺子里；星期四晚上准6点起，在一间小楼上。一年中也有些时候定好了没有。从创始以来，差不多没有间断过。前前后后著名的诗人几乎都在这儿读过诗：他们自己的诗，或他们喜欢的诗。入场券6便士，在英国算贱，合四五毛钱。在伦敦的时候，也去过两回。那时孟罗病了，不大能问事，铺子里颇为黯淡。两回都是他夫人爱立达克莱曼答斯基(Alida Klementaski)读，说是找不着别人。那间小楼也容得下四五十位子，两回去，人都不少；第二回满了座，而且几乎都是女人——还有挨着墙站着听的。屋内只读诗的人的小桌上一盏蓝罩子的桌灯亮着，幽幽的。她读济慈和别人的诗，读得很好，口齿既清楚，又有顿挫，内行说，能表出原诗的情味。英国诗有两种读法，将每个重音咬得清清楚楚，顿挫的地方用力，和说话的调子不相象，约翰德林

瓦特(John Drinkwater)便主张这一种。他说，读诗若用说话的调子，太随便，诗会跑了。但是参用一点儿，像克莱曼答斯基女士那样，也似乎自然流利，别有味道。这怕要看什么样的诗，什么样的读诗人，不可一概而论。但英国读诗，除不吟而诵，与中国根本不同之外，还有一件：他们按着文气停顿，不按着行，也不一定按着韵脚。这因为他们的诗以轻重为节奏，文句组织又不同，往往一句跨两行三行，却非作一句读不可，韵脚便只得轻轻地滑过去。读诗是一种才能，但也需要训练；他们注重这个，训练的机会多，所以是诗人都能来一手。

铺子在楼下，只一间，可是和读诗那座楼远隔着一条甬道。屋子有点黑，四壁是书架，中间桌上放着些诗歌篇子(Sheets)，木刻画。篇子有宽长两种，印着诗歌，加上些零星的彩画，是给大人和孩子玩的。犄角儿上一张账桌子，坐着一个戴近视眼镜的，和蔼可亲的，圆脸的中年妇人。桌前装着火炉，炉旁蹲着一只大白狮子猫，和女人一样胖。有时也遇见克莱曼答斯基女士，匆匆地来匆匆地去。孟罗死在1932年3月15日。第二天晚上到铺子里去，看见两个年轻人在和那女人司账说话；说到诗，说到人生，都是哀悼孟罗的。话音很悲伤，却如清泉流泻，差不多句句像诗；女司账说不出什么，唯唯而已。孟罗在日最尽力于诗人文人的结合，他老让各色的人才聚在一块儿。又好客，家里炉旁(英国终年有用火炉的时候)常有许多人聚谈，到深夜才去。这两位青年的伤感不是偶然的。他的铺子可是赚不了钱；死后由他夫人接手，勉强张罗，现在许还开着。

牛津的旧书店

沈　　弘

在金秋季节里，你可以在牛津城闻到各种不同的气息，当你在十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从圣贾尔斯向东拐入布罗德大街时，轻风吹拂着树叶和鲜花，你准会感受到新学年的浓郁气氛。但扑鼻而来，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书的气味。

这里所指的并不只是新书，尽管牛津跟其它许多地方一样，呈现出书市兴旺的景象。1987年11月，狄龙书店在布罗德大街的西端开设了它的第一家分店，零售面积达1300平方英尺。街的另一端是英国最大的布莱克维尔书店，后者在牛津有多家分店，总零售面积为32000平方英尺。面临对手的挑战，布莱克维尔书店对其营业前景仍充满自信，因为它具有一个狄龙书店所不能企及的优越之处，这就是它的旧书部颇受大学和其他学者的欢迎。布莱

克维尔书店还整修了它在布罗德大街上的另外三个分店：其中帕克书店成了专售艺术类书籍和招贴画的分店，而原先的艺术书店则专门销售地图和旅行类书籍，另一个是儿童书店。这样，加上平装畅销书店和其他两个旧书店，短短的布罗德大街上就有了8个书店。

正是这儿的旧书给牛津赋予一种特殊的气氛。旧书店还跟过去一样，是书迷们最向往的去处，在一排排昏暗而拥挤的书架上，细心的读者可以找到他所爱好的书籍，其中不乏有价值的经典作品。

在面积不到一平方英里的区域里，你可以找到近20家这样的旧书店，谁也说不清这里的旧书总数究竟有多少，但因为其中最大的一家沃特菲尔德旧书店拥有近20万本书，所以旧书总数应不在50万本以下。

要从迷宫般的旧书堆中找寻一本有关书法的论著，或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植物分布地图，颇有点像大海捞针或侦探破案。然而旧书行业为成年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能重新找回童年读过的书籍，它也是藏书者收集精装本的唯一省钱途径。

令人惊讶的是牛津大部分旧书店并不是专门为大学服务的，因为总的说来学生还是太穷，买不起书。这仅仅是个购买力的问题。牛津成为买书者的天堂，其原因是这儿有众多的卖书者。许多离职退休的学者们在搬出学院之前不得不忍痛拆散很多年的私人藏书，把它们变卖给旧书店。就像瀑布吸引蜻蜓一样，是旧书的来源，而不是旧书的需求，造就了众多的旧书店。它们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整体。尽管所有的旧书店都力图在自己的书架上放置经典作品，但它们还是各具特色。沃特菲尔德旧书店主要经营人文类图书，从值

850 英镑的托马斯·克伦默 1548 年版的《教义问答》，到有多萝西·L·塞耶亲笔签名的书(8 英镑)，堪称无奇不有。牛津历史最悠久的索顿旧书店仍是以古典作品和神学论著为主，海伊街的古典书店也是如此。设在布罗德大街的罗森塔尔旧书店以收藏欧洲文学和犹太文学作品著称；而斯威夫特旧书店和桑德斯旧书店则专门经营有插图的书籍，尤其是古老的印刷品和雕版作品。

特尔街上的蒂特尔斯古珍本书店是农艺学和地质学书籍的荟萃之地，在这儿的首版书目录中你可以找到查理·莱尔和拉瑟福德的论著，以及从磨坊到水貂等五花八门的各类书籍，英国蜜蜂学会所编书目中共列有 80 本介绍英国蜜蜂的专著，而蒂特尔斯古珍本书店就拥有其中 15 本首版书，包括托马斯·魏尔德曼的《论蜜蜂的管理》和一本有牛皮封面的精装书《昆虫自然史》，后者的 450 英镑标价对于旧书来说是相当罕见的，还有一本蒂克纳·爱德华迪斯的首版《蜜蜂的传说》(1925 年)，售价仅为 5 英镑。在沃特菲尔德和布莱克维尔等大旧书店和旧书部里，有许多书的售价则低于 5 英镑。

有趣的是，牛津最好的一家旧书店根本就不在牛津。11 年前，布莱克维尔书店将它的古珍本分店迁到了离牛津城约 10 英里远的法菲尔德村一座 14 世纪庄园之中。那儿的景色令人陶醉，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经过一座相当现代化的酒店，把人们带到一座古老的教堂旁。法菲尔德庄园堪称是全英国最漂亮的书店，令人惋惜的是它地处偏僻，绝大部分业务都是靠邮购来完成的。

走完了那条长长的英国式沙砾车道之后，参观者不得不弯腰跨进一个低矮的小门。室内有一种古色古香的肃穆幽静，使人感觉周围摆设的尽是些稀世珍品。这儿陈列的大部

分书籍都是古珍本收藏家的瑰宝，像《等待戈多》之类的廉价书都被留在牛津了。尽管你可能什么也买不起，但徘徊在这座寂静的中世纪庄园之中，浏览着一排排曾经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各种珍贵书籍，一面在心里驰骋想象着这些博大精深的学问，仅此就足以使你心旷神怡了。

访书小录

董　桥

夏天里闹干旱，入秋以来雨就下个不停，果然比较像伦敦。客中听这些雨声，虽然不致于雅得“新愁易感，幽恨悬生”，心情确也不同平常。清初诗人金埴记自己潦倒他乡，“即寻常书卷，无从假视，旅况之恶可知”。住在伦敦，更谈不到买什么好中文书，闲中只好逛洋书旧书市，聊以解闷。这里旧书铺古玩店很多的长巷短街原是灰濛濛的，艳阳下看着委实寒酸，秋雨一来，反倒有些韵味。这时，随便跨进一爿旧书铺，经常会碰到三两老头，围坐在乱书堆中，人人一副京华倦客的神情。他们说一口考究的英语，浓茶香烟，闲谈梨园掌故，市井人情，藏书趣闻，乍听恍如翻读前人的笔记杂著。英国人的散文小品一向写得不坏，当年世道繁华，笔下固然可以旁征博引，煞有介事；如今是这样惨淡的光景，所说所

写，可又另有几分飘渺的意思，故意不去大搔痒处，淡淡白描就应付过去。这样，算是得了散文妙谛，可也往往是为政的败笔。

散文而谈妙谛，实在相当费解。说是散文影响世道固然行，说世道左右散文也不错。乔治·吉辛那本 The 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记得有人把书名译作《草堂随笔》，古雅得很。后来我偶然想到，这本书既然分成春夏秋冬 4 个章目去写，译成《四季零墨》，大概也行。这本书 1903 年初版，当时吉辛刚死了几个月，后来前前后后不知道出了多少种版本。前些日子，见过这部书的初版本，索价居然是 30 英镑。今年暮春，我在一个古玩市场上买到的，已经是 1910 年的本子了。那本书里，意外夹了一张藏书人留下的剪报，是 1953 年 1 月 25 号星期天泰晤士报的一篇书评，题为《吉辛的传世之作》，评的就是当时新印的《四季零墨》。作者考诺理在文末谈到今天世人对这本书的观感，他认为，吉辛笔下的莱克洛夫，其实是个极端小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是个和平主义者，憎恨民主，醉心莎士比亚、约翰森、史特恩和蓝姆的作品，也喜欢古老英国的烤牛肉，后来决心寄情乡野山水。与其说他的政治观点正确，不如说他在性灵问题上的见地正确。他所谈的自由、独立，和文学，今天看来还是很对云云。

当年，机械文明还不像今天这样嚣张，一个人看破世态，往往还可以归隐田园，粗茶淡饭，了却余年。后来，机械文明称霸，政治与阶级意识上的分歧日深，读书人跟社会格格不入，本身又不能突破重围，摈弃物质的牵制，弄得上下求索，身心憔悴。前几天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贝罗，他的小说写的就是这种心境。至于普通汲汲以求生计的小人

物，身在资本主义浮华社会里，偏又向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心灵上的寂寞矛盾，也就不难想见。可是，这种向往，其实也未尝不可以算是一种精神上的归隐：莱克洛夫是归隐山乡草堂，这些人是归隐主义理论的故纸堆中。这两者同样是出世的；有枪杆子或者有组织，那就比较入世了。当然，那些自甘受政客摆布的文丑，又该当别论；或者说，干脆不去论了。

世事原是不容过于苛求。做人做事，看上去干干净净也就算了。搜访旧书也是如此。伦敦旧书市固然不乏善本书初版书，还有不少作者题款，名家品题的书，也有很多皮面手裱的百年古籍；这些东西，偶然过一过目，就是有缘，应该满意。能够像缪荃荪那样“博见异书，勤于纂辑”的人，毕竟不多。我搜访旧书，完全没有系统，也没有计划，说穿了是一股傻劲而已。伦敦卖新书的大书店像超级市场，存书井井有条，分门别类；买书的人不是人，是科学管理制度下的材料。旧书铺里的藏书则杂乱不成章法，让人翻检，让人得到意外的喜悦，算是尊重人情。再说，新书太白太干净太嫩，像初生的婴孩，教人担心是不是养得大，是不是经得起风霜；新书也远没有几十年前旧版书那股书卷气：封面和书脊上的题字总是那么古朴，加上不经机器切过的毛边，尤其拙得可人。最要紧的是，开旧书铺的，大半是那些老头，“其搜辑鉴别，研赜校雠，深诣孤造，各有其独到之处”，起码不像超级市场书店那些少爷小姐那么肤浅庸俗；举动语言，像电子计算机那么无理。

仔细想想，买书看书，还要这般挑剔，真是迂儒陋习，太不长进。蓝姆有一篇散文谈书和谈看书，一开头先引了别人的一段话，说是一个人用心看一本书的内容，等于是用别

人绞尽脑汁苦熬出来的东西娱乐自己；品质高尚，教养好的人，想来一定会比较喜欢享受自己思想心灵上的新芽幼苗。蓝姆赞叹别人可以完全不看书，但求尽量增长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说，他自己则只会看书，老是不能坐下来静静思考。这也足见爱书看书，其实是有其弊端。蓝姆的散文，要费好大劲才看得半懂；他那温婉的笔风，还是值得摸索。那天发兴要买他的《伊里亚随笔》的初编和末编，翻了几家旧书铺都找不到。天都快黑了，走到火车站的半路，顺便上克里斯老头的那爿书店问一问，老头也说暂时没有。我不死心，自己去翻检他书桌底下那一堆经年不整理的书堆，昏黄的灯影下，居然照出一部《伊里亚随笔末编》，夹回家里抹刷一番，果然出落得非常秀拔。书是1937年印的，橙色书皮，鹅黄书脊，烫金的花草和烫金的题签，封面右下端还有一头烫金的圣羊。第三章扉页是一幅黑白钢笔古画，画一爿旧书铺，有3个绅士站在石板路上翻检书铺门前屋檐下的几架子书，书铺老头则倚门而立，神情悠然。这幅画印在厚厚的暗黄色纸上，四边压了直线凹纹作书框。这本书中的几十幅插图，也都是这样的工笔画，把蓝姆的散文，衬托得更见脱俗。过了几天，我又搜到两种不同版本的《伊里亚随笔初编》,其中有一本是白伦敦的注释本，另一本是更古的彩色插图本，非常精雅。旧书市中，的确不太见得到蓝姆的书；有一家旧书铺的橱窗里摆着一套6本的《蓝姆作品集》，书信已收在里面，版本相当古，索价25英镑。后来，我看到这个版本的再印刷，6大册，索价很贱，也就捡回来了。卢克斯的《蓝姆传》则始终找不到。

我一向爱看传记文学书，文人传记尤其尽量搜访。前一阵子在剑桥的旧书市中搜到不少英国历来小说家的传记，的

确开心。谈到英国传记作家，最重要的，当然是李顿·史特烈屈。他开了传记写法的新途径，融汇各家史料，对人物作心理分析，用介乎小说和小品的笔调去写，有人说他破坏偶像，牵强附会；有人说他把几个历史人物从神的地位还原成凡人，入情入理，更见亲切。他的几种作品，“企鹅”曾经重排行世，现在比较常见的，只有《维多利亚时代名人录》一种。至于这些作品的旧版本，旧书市里也不多见。我先买到1937年版的《维多利亚女皇》，是袖珍精装本。后来我又收购到《维多利亚时代名人录》；这部书原是1918年初版，我那本是1921年的重排本，版型跟初版很相似。史特烈屈还有一部名著，题为《伊丽莎白和艾塞克斯》。我在克里斯那儿看到一本1928年11月的初版本，可惜书让雨水浸过，又脏又破旧，居然索价4镑多钱，我当时没买。过了好几天，我偶然去问另一家旧书铺，那人在登记卡上一查，回头拉了长梯子爬到最高的书架上把那本书拿下来，说是只有一本，前两天才到的。我一看，书皮颜色和版型跟克里斯那本一样，只是收藏得好，跟新书一样。索价只90个便士，我买下一看，才知道这是1928年12月的第二次印刷本，跟初版印刷日期只差1个月。

这部书把伊丽莎白女皇刻画得很生动，写艾塞克斯也写得好；不过，最值得一提的，是史特烈屈把培根这位哲学家、散文大家的个性，分析得头头是道。他写培根在政界钻门路，最有意思。他刻画培根的个性，说培根最会精打细算，天生孤傲，带点神经质的敏感，野心大，像一头毒蛇，阴险毒辣。他不否认培根绝顶聪明，是个有深度的艺术家。有了这种气质，培根不难也就有辉煌的哲学观念，也因此成了一代文体大家。可是，他的才华很特别：他既不是个具有

科学头脑的人，也不是诗人。从文学上讲，他的文笔虽然丰富多姿，他的文才却只限于散文。他的文辞之所以这样典雅充实，完全得力于他的智力，不是出乎感情。史特烈屈写艾塞克斯求女皇把一个官位派给培根的那一段，实在令人叫绝。古今中外政界的勾心斗角，其实一样脏；老百姓在英雄人物的肖像前欢呼万岁，想想真是可笑。不过，这往往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史特烈屈还有一二本论人论书论文学的书，始终还找不到。迈可尔·贺尔洛艾德 1968 年出过上下两部《史特烈屈传》，我至今也只买到下册，上册阙如，只好祈诸他日机缘了。

搜访旧书，实在不能不信机缘。有一段时期，我搜求乔治·桑斯伯里的书甚殷，上自他的《英国文艺批评史》，下至他编校写序的小书，果然找到不少。此公渊博得很，著作多得教人不可想象。那天买到他编选的《书信杂录》的时候，无意间发现萧乾写的一本英文书，书名叫“The Dragon Beards versus The Blueprints: Meditations on Postwar Culture”，不晓得中文书名萧乾怎么译，这里不便乱凑。这本书是伦敦书商 1944 年 5 月印的，虽然只有 35 页那么薄，印得却蛮干净大方，扉页上有一幅木刻版画，萧乾名字下还注明是“大公报驻英国特派员”，版权页上写明书是献给小说家 E·M·弗斯特和汉学家阿瑟·韦理。

书中收 4 篇文章，原是些演说稿，又在几种杂志上发表过，后来才编集成这本小书；萧乾当时除了是特派员之外，还在剑桥大学修课。书中第一篇是讲机械文明在英国小说中的地位，以及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第二篇讲易卜生在中国，兼谈中国人对萧伯纳的看法；第三篇题目就是书名，是在为现代中国辩护；最后一篇讲文学与群众。4 篇东

西，内容都不很新颖，平铺直叙，加点幽默话，加点聪明话；如此而已。当然，对普通外国人谈中国人的人生观文艺论，充其量也只能这么将就着说。

伦敦郊外的小镇小乡，通常都有些古玩店，卖些旧瓷器小木刻古家私之类的玩意儿，偶然也兼卖旧书杂志。这些店主既不旨在卖书图利，也不懂得鉴别好书坏书，有些相当好的书，索价居然相当于两三份泰晤士报的价钱。我在这些铺子里，先后买到不少旧版小说，从丹尼尔·狄孚到康拉德的小说都有，装订设计之考究，版型插图之秀丽，绝不是当今新书所能望其项背。这些店主多半是乡下老粗，对谁说话都不太礼貌，可是话里不带话，为人耿直爽快。那天下午，我在我家附近桥边一爿古玩店里翻一箱杂书，外头还在下着小雨。我翻出一部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的传记，是她丈夫J·W·克罗斯编撰的，有藏书人的签名，写明是1896年9月；书有646页那么厚。我问那位粗眉大胡子的店主开价钱，他把书抢过去翻来翻去看一下说，“这他妈的书没图画，给他妈的50个便士算了。”

1976年10月在伦敦

圣米歇尔的旧书摊

沈 大 力

人们往往陶醉于巴黎的名胜古迹，可是也有人特别沉湎于那里圣米歇尔的旧书摊。

巴黎是世界旧书经营的“都会”。从城里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拉丁区到圣米歇尔广场，一路遇到许多家旧书店，特别是从巴黎圣母院钟楼放眼望去，塞纳河两岸摆满绿色书箱，东达杜赫奈尔码头，西至卢浮沿河大道，绵延数公里，形成圣米歇尔旧书摊区，跟埃菲尔铁塔一样，驰名于世。

每天，当生活的热潮开始在圣米歇尔林荫大道涌流，巴黎大学的青年学生、北欧的旅游妇女，美英学者和日本书商，以及从世界各地来的书籍爱好者们，纷纷到这里翻找旧书，不时会碰到一两册古籍孤本和稀有版画，甚至珍贵手泽。这对喜欢抚书思古的人说来，真是一种特殊的乐趣，因为他们觉得读旧版书，看古

体字和触到变黄的脆纸，既往的光景就会重现眼前，让人更能领略一部著作的时代特色。何况，有些书曾被狄得罗、巴尔扎克、贝朗瑞等文豪抚摸过，今朝获之若宝，别具一种意义。至于许多绝版文学名著，在书摊上也有机会找到，譬如普鲁斯特的全集、司汤达的短篇小说，左拉的《金钱》，波特莱尔的《恶之华》和配着精美插画的凡尔纳科学幻想小说等等，售价比一般书店里低。此外，还有上个世纪的报纸、“人民阵线”时期的杂志、万国邮票，各种纪念章和货币，以及古色古香的玲珑雕像。近年来，旧书摊还添售以前的明信片，丰富多彩。一个游人偶然从中发现自己故乡几十年前的风景，总是满心欢喜的。

——您经营旧书业多久了？

——整整 70 年。

一位老妇泰然自若地回答，耐人寻思。在那漫长的岁月里，她在巴黎不肯追求荣华富贵，不曾为条条生财之道所引诱，而在僻静的一隅坚守旧书箱，像一个哨兵站在自己的岗位上，这是多么的不寻常呵！再瞧瞧她老迈的伴侣，那布满皱纹的面容，使人想见他饱经沧桑的一生。

若问圣米歇尔旧书摊的由来，那要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年代。早在 17 世纪，塞纳河的新桥上就出现了旧书市场。1649 年，根据王室法院的裁决，旧书商被赶出新桥，流落塞纳河畔。不过，这新环境倒也更适合旧书商的活动。因此，他们抗拒以后历届当权者逼迫他们离开河岸的压力，终于在 1891 年获准把书箱固定在河岸石栏上，不再天天搬来运去，真正在那里安家立业，跟塞纳河相依为命了。

人们给他们的称呼是“BOUQUINISTE”(旧书商)。关于这个词的来源，众说不一，但有人肯定它出自法文“BOUC”

（山羊），因为旧时一般古籍是用羊皮包的。根据 1723 年版的萨瓦里法语辞典，这是些“无法在书店销售新书，只能摆摊卖旧书的穷书商”。总之，巴黎旧书商的社会地位是很卑微的。但在这些下层人的身上，既没有实业界和金融寡头那种追逐利润的无餍欲望，更看不到政客攫夺权力的勃勃野心。他们关注的是鉴定旧典籍的艺术价值，在谋生的同时，也传播人类的文化知识。他们崇尚的是无羁绊的生活，不受任何营业时间的约束。天气晴朗之时，一个个出来打开书箱，然后坐到旁边的旧椅上，在巴黎和煦的阳光照耀下和圣米歇尔广场“天使伏龙”喷泉淙淙的流水声中，沉浸于往事的回忆；阴霾笼罩之时，数日不见他们的踪影。这些人彼此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没有对金钱和权势的屈从，只靠出售旧书的微薄收入，静度清贫的岁月。

“我们要保持自己的高尚形象”，一位旧书商说，“最好的办法是保证销售质量，让购书者从中受益，维护首都的荣誉。”这种从业态度受到了公众的赞赏，尤其引起文学界关注。1953 年，一些法国著名作家为鼓励圣米歇尔旧书摊的文化活动，共同倡议创立了巴黎“旧书摊奖金”。其章程规定：“本奖金总额为一法郎，颁发给没得到评论家和文学奖金评委会重视的，在可能被捣成纸浆之前偶然落进旧书箱里的优秀作品。”

次年，人们决定将这项奇特的奖金授予摆在摊头的小说《强盗》。该书作者乔治·达利安已在 1921 年去世。他是个不肯向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屈服的反抗者，曾因之流亡布鲁塞尔和伦敦，结识了社会底层的“不法贱民”。小说《强盗》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写出来的。这部作品得奖，说明了巴黎旧书摊奖金的性质。它跟赫赫的诺贝尔奖金是何等的不同呵！

然而，许多作家还是更喜欢圣米歇尔旧书摊的活动，认为那里更有生活的气息。像高莱特、法尔葛、雷奥多等法国文学家都习惯去那里寻求知识，汲取创作灵感，并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对旧书经营者的怀恋。那时，诗人卡尔果也曾来这里眺望飘荡在圣路易岛水面的垂柳，欣赏堤岸上姑娘们拿着白铃兰花，流连忘返，吟诗抒情：

“淌过座座码头，
塞纳河流到
圣母院的钟楼下。
噢！令人快乐的
美丽的铃兰花……”

曾获诺贝尔奖金的进步作家法朗士，就出生在塞纳河左岸的书商家庭。他回忆说：

“那地方绿树成荫，书籍满摊，还有淑女漫步，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我在那里获得了智慧”。

而今，法朗士逝世已经半个世纪了，圣米歇尔古桥下的滚滚波浪淘尽多少风流人物，塞纳河岸的古旧楼房也逐年消失在现代的建筑群里。冬去夏来，秋雨春风，圣米歇尔的绿色书箱依然顽强地固定在那里，点缀着河畔的景色，丰富着巴黎的文化生活。令人欣慰的是，在老者离去空出的地方，现在涌现出愈来愈多的青年，从事传统的旧书业，尤其是在一个被私有制桎梏的社会里，他们似乎决心继承圣米歇尔旧书摊老一辈的信仰：

“自由比财富更可贵！”

塞纳河畔旧书摊

王 聿 蔚

巴黎，塞纳河穿城而过。河的两岸可以说是法兰西的名胜古迹荟萃之地，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各国观光客到这里参观游览。然而我总觉得，河边大大小小的旧书摊所吸引的游客之多绝不亚于那些举世闻名的名胜古迹。不信你看，从巴黎圣母院到新桥这其间大约一公里的沿河两岸的人行道上，旧书摊一个连着一个，恰如两条长龙，蜿蜒在塞纳河畔。无论是在什么季节，你只要来到这里，总可以看到每一个书摊前都挤满了人群。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已经成为巴黎的一景，而且据我所知，很少有人到了巴黎而不去逛逛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了。

这里既然名为旧书摊，所出售的自然都是旧书，然而品类却颇为齐全，哲学、宗教、文学、音乐、美术、历史、地理……各种各样应

有尽有。读书人可以到这里来寻找自己需要的各类书籍或期刊，游客们可以到这里来购置廉价的导游手册、导游地图，收藏家们则可以到这里来搜求各色精巧别致的纪念品，从各国邮票到各种纪念章，从色彩绚丽的明信片到小巧玲珑的钥匙串……总之，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简直会令你眼花缭乱。然而，这里却看不到低级下流的黄色读物，看不到妖冶艳丽的令人目眩的裸体女人像。至少，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有一次，我为了买一本书跑遍了圣·米歇尔大街的书店，但却没有结果。书店的售货员在为我费尽心力查找半天之后，不无歉意地对我说，此书早已售罄，并建议我不妨到附近的旧书摊上去碰碰运气。于是我来到塞纳河边，在旧书摊上仔细搜寻，最后果然发现了它！当夏特莱广场附近的一位旧书摊主把这本《戴高乐将军的暮年》递到我手中的时候，我心中的喜悦真是难以形容。自那以后，我对于这些简陋、甚至有些寒伧的旧书摊似乎又多了一份感情，在我的眼里，塞纳河畔的旧书摊，格调是健康的，色彩是绚丽的，气氛是亲切的。

也正因为如此吧，我对这些旧书摊总是难以忘怀。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里，我常常不由自主地信步走到这里，在旧收摊前盘桓一阵，呼吸塞纳河上的新鲜空气，领略法兰西文化的别一番魅力。

1993.9.15 寄自巴黎

巴黎的书摊

戴 望 舒

在滞留巴黎的时候，在羁旅之情中可以算做我的赏心乐事的有两件：一是看画，二是访书。在索居无聊的下午或傍晚，我总出去，把我迟迟的时间消磨在各画廊中和河沿上的。关于前者，我想在另一篇短文中说及，这里，我只想来谈一谈访书的情趣。

其实，说是“访书”，还不如说在河沿上走走或在街头巷尾的各旧书铺进出而已。我没有要觅什么奇书孤本的蓄心，再说，现在已不是在两个铜元一本的木匣里翻出一本 Patissier Francois 的时候了。我之所以这样做，无非为了自己的癖好，就是摩娑观赏一回空手而返，私心也是很满足的，况且薄暮的赛纳河又是这样地窈窕多姿！

我寄寓的地方是 Rve del’ Echaudé，走到赛纳河边的书摊，只须沿着赛纳路步行约摸三

分钟就到了。但是我不大抄这近路，这样走的时候，赛纳路上的那些画廊总会把我的脚步牵住的，再说，我有一个从头看到尾的癖，我宁可兜远路顺着约可伯路，大学路一直走到巴克路，然后从巴克路走到王桥头。

塞纳河左岸的书摊，便是从那里开始的，从那里到加路赛尔桥，可以算是书摊的第一个地带，虽然位置在巴黎的贵族的第七区，却一点也找不出冠盖气味来。在这一地带的书摊，大约可以分这几类：第一是卖廉价的新书的，大都是各书店出清的底货，价钱的确公道，只是要你会还价，例如旧书铺里卖到五六百法郎的勒纳尔(J·Renard)的《日记》，在那里你只须化 200 法郎光景就可以买到，而且是崭新的。我的加梭所译的赛尔房德思的《模范小说》，整批的《欧罗巴杂志丛书》，便都是从那儿买来的。这一类书在别处也有，只是没有这一带集中吧。其次是卖英文书的，这大概和附近的外交部或奥莱昂车站多少有点关系吧。可是这些英文书的买主却并不多，所以化两三个法郎从那些冷清清的摊子里把一本初版本的《万牲园里的一个人》带回寓所去，这种机会，也是常有的。第三是卖地道的古版书的，17 世纪的白羊皮面书，18 世纪饰花的皮脊书等等，都小心的盛在玻璃的书框里，上了锁，不能任意地翻看。其他价值较次的古书，则杂乱地在木匣中堆积着，对着这一大堆你挨我挤着的古老的东西，真不知道如何下手。这种书摊前比较热闹一点，买书大多数是中年人或老人。这些书摊上的书，如果书摊主是知道值钱的，你便会被他敲了去，如果他不识货，你便沾了便宜来。我曾经从那一带的一位很精明的书摊老板手里，化了五个法郎买到一本 1765 年初版本的 Du Laurens 的 Imirce，至今犹有得意之色：第一因为 Imirce 是一部干禁书，其次这价钱

实在太便宜也。第四类是卖淫书的，这种书摊在这一带上只有一两个，而所谓淫书者，实际也仅仅是表面的，骨子里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大都是现代人的东西，写来骗骗人的。记得靠近王桥的第一家书摊就是这一类的，老板娘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婆，当我有一回逗留了一下的时候，她就把我当做好主顾而怂恿我买，使我留下极坏的印象，以后就敬而远之了。其实那些地道的“珍秘”的书，如果你不愿出大价钱，还是要费力气角角落落去寻的，我曾在一家犹太人开的破货店里一大堆废书中，翻到过一本原文的 Cleland 的 Fanny Hill，只出了一个法郎买回来，真是想不到的事。

从加路赛尔到新桥，可以算是书摊的第二个地带。在这一带对面的美术学校和钱币局的影响是显著的。在这里，书摊老板是兼卖板画图片的，有时小小书摊上挂得满目琳琅，原张的蚀雕，从书本上拆下的插图，戏院的招贴，花卉鸟兽人物的彩图，地图，风景片，大大小小各色俱全，反而把书列居次位了。在这些书摊上，我们是难得碰到什么值得一翻的书的，书都破旧不堪，满是灰尘，而且有一大部分是无用的教科书，展览会和画商拍卖的目录。此外，在这一带我们还可以发现两个专卖旧钱币纹章等而不卖书的摊子，夹在书摊中间，作一个很特别的点缀。这些卖画卖钱币的摊子，我总是望望然而去之的，(记得有一天一位法国朋友拉着我在这些钱币摊子前逗留了长久,他看得津津有味,我却委实十分难受,以后到河沿上走,总不愿和别人一道了。)然而在这一带却也有一两个很好的书摊子，一个摊子是一个老年人摆的，并不是他的书特别比别人丰富，却是他为人特别和气，和他交易，成功的回数居多。我有一本高克多(Coclcau)亲笔签字赠给诗人费尔囊·提华尔(Fernand Diwoire)的 Le Grund E-

curt，便是从他那儿以极廉的价钱买来的，而我在加里马尔书店买的高克多亲笔签名赠给诗人法尔格(Fargue)的初版本Opera，却使我化了70法郎。但是我相信这是他错给我的，因为书是用蜡纸包封着，他没有拆开来看一看；看见那献辞的时候，他也许不会这样便宜卖给我。另一个摊子是一个青年人摆的，书的选择颇精，大都是现代作品的初版和善本，所以常常得到我的光顾。我只知道这青年人的名字叫昂德莱，因为他的同行们这样称呼他，人很圆滑，自言和各书店很熟，可以弄得到价廉物美的后门货，如果顾客指定要什么书，他都可以设法。可是我请他弄一部《纪德全集》，他始终没有给我办到。

可以划在第三地带的是从新桥经过圣米式尔场到小桥这一段。这一段是赛纳河左岸书摊中最繁荣的一段。在这一带，书摊比较都整齐一点，而且方面也多一点，太太们家里没事想到这里来找几本小说消闲，也有；学生们贪便宜想到这里来买教科书参考书，也有；文艺爱好者到这里来寻几本新出版的书，也有；学者们要研究书，藏书家要善本书，猎奇者要珍秘书，都可以在这一带获得满意而回。在这一带，书价是要比他处高一些，然而总比到旧书铺里去买便宜。健吾兄觅了长久才在圣米式尔大场的一家旧书店中觅到了一部《龚果尔日记》，化了600法郎喜欣欣的捧了回去，以为便宜万分，可是在不久之后我就在这一带的一个书摊上发现了同样的一部，而装订却考究得多，索价就只要250法郎，使他悔之不及。可是这种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跑跑旧书摊的人第一不要抱什么一定的目的，第二要有闲暇有耐心，翻得有劲儿便多翻翻，翻倦了便看看街头熙来攘往的行人，看看旁边塞纳河静静的逝水，否则跑得腿酸汗流，眼花神倦，还是

一场没结果回去。话又说远了，还是来说这一带的书摊吧。我说这一带的书较别带为贵，也不是胡说的，例如整套的Echanges杂志，在第一地带中买只须15个法郎，这里却一定要20个，少一个不卖；当时新出版原价是24法郎的Celine的Voyage au boutde Ianuit，在那里买也非18法郎不可，竟只等于原价的七五折。这些情形有时会令人生气，可是为了要读，也不得不买回去。价格最高的是靠近圣米式尔场的那两个专卖教科书参考书的摊子。学生们为了要用，也不得不硬了头皮去买，总比买新书便宜点。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些摊子的主顾，反之他们倒做过我的主顾。因为我用不着的参考书，在穷极无聊的时候总是拿去卖给他们的。这里，我要说一句公平话：他们所给的价钱的确比季倍尔书店高一点。这一带专卖近代善本书的摊子只有一个，在过了圣米式尔场不远快到小桥的地方。摊主是一个不大开口的中年人，价钱也不算顶贵，只是他一开口你就莫想还价：就是答应你也还是相差有限的，所以看着他陈列着的《泊鲁思特全集》，插图的《天方夜谭》全译本，Chirico插图的阿保里奈尔的Calligrammes，也只好眼红而已。在这一带，诗集似乎比别处多一些，名家的诗集化四五个法郎就可以买一册回去，至于较新一点的诗人的集子，你只要到一法郎或甚至50生丁的木匣里去找就是了。我的那本仅印百册的Jean Gris插图的Rewerdy的《沉睡的古琴集》，超现实主义诗人Gvi Rosey的《三十年战争集》等等，便都是从这些廉价的木匣子里翻了来的。还有，我忘记说了，这一带还有一两个专卖乐谱的书铺，只是对于此道我是门外汉，从来没有去领教过吧。

从小桥到须里桥那一段，可以算是河沿书摊的第四地带，也就是最后的地带。从这里起，书摊便渐渐地趋于冷落

了。在近小桥的一带，你还可以找到一点你所需要的东西。例如有一个摊就有大批 N·R·F·和 Crassct 出版的书，可是那位老板娘讨价却实在太狠，定价 15 法郎的书总要讨你十二三个法郎，而且又往往要自以为在行，凡是她心目中的现代大作家，如摩里向克，摩洛阿，爱眉(Ayme)等，就要敲你一笔竹杠，一点也不肯让价；反之，像拉尔波、茹昂陀、拉第该、阿郎等优秀作家的作品，她倒肯廉价卖给你。从小桥一带再走过去，便每况愈下了。起先是虽然没有什么好书，但总还能维持河沿书摊的尊严的摊子，以后呢，卖破旧不堪的通俗小说杂志的也有了，卖陈旧的教科书和一无用处的废纸的也有了，快到须里桥那一带，竟连卖破铜烂铁、旧摆设、假古董的也有了；而那些摊子的主人呢，他们的样子和那在下面赛纳河岸上喝劣酒、钓鱼或睡午觉的街头巡阅使(Clochard)，简直就没有什么大两样。到了这个时候，巴黎左岸书摊的气运已经尽了，你腿也走乏了，你的眼睛也看倦了，如果你袋中尚有余钱，你便可以到圣日耳曼大街口的小咖啡店里去坐一会儿，喝一杯儿热热的浓浓的咖啡，然后把你沿路的收获打开来，预先摩娑一遍，否则如果你已倾了囊那么你就走上须里桥去，倚着桥栏，俯看那满载着古愁并饱和着圣母祠的钟声的，赛纳河的悠悠的流水，然后在华灯初上之中，闲步缓缓归去，倒也是一个经济而又有诗情的办法。

说到这里，我所说的都是赛纳河左岸的书摊，至于右岸的呢，虽则有从新桥到沙德莱场，从沙德莱场到市政厅附近这两段，可是因为传统的关系，因为所处的地位的关系，也因为货色的关系，它们都没有左岸的重要，只在走完了左岸书摊尚有余兴的时候或从卢佛尔(Louwre)出来的时候，我

才顺便去走走，虽然间有所获，如查拉的 L’homme approximatif 或卢梭(Henri Rousseau)的画集，但这是极其偶然的事；通常，我不是空手而归，便是被那街上的鱼虫花鸟店所吸引了过去。所以，原意去“访书”而结果买了一头红头雀回来，也是有过的事。

“旧书之都”海昂怀

逍　遥

在英国威尔士靠近边境的地方，有一座名叫海昂怀(Hay-on-wye)的小村庄。它远离公路，地方偏僻，过去鲜为人知；但是，近些年来却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古旧书集散地，被誉为“旧书之都”。

海昂怀村每年出售的各种旧书达 100 万册，内容包罗万象。平均每个星期都有数十辆汽车来到这里，运走大批旧书以满足世界各地的读者、书商和书籍收藏家的需要。

这个只有 1300 多人的村子简直是一个书的世界。它平时的藏书量经常保持在 300 万册以上，村里的酒店、电影院、五金商店以至教堂统统成了贮存书籍的场所。

海昂怀村之所以成为“旧书之都”，要归功于一位名叫理查德·布思(Richard Booth)的人。60 年代，他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发现许

多人由于在学习或研究工作中找不到适当的参考书而苦恼，而一般的正规书店又往往满足不了人们的这种需要。因此，布思在大学毕业后回到海昂怀村，即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开设旧书店的计划。他从世界各地的书店及私人手中大量购进各类旧书，然后以低价出售。欧州和美国的书商们很快纷沓而至，使这个偏僻小村的旧书业日益兴旺起来。

布思的书店一开始设在一座废弃不用的消防队所在地，随着生意的发展，这几间房子很快就显得不够用了。于是，书店一步步扩展到村里的其他一些商店、教堂、电影院、“老年人之家”，最后甚至把一座古城堡也占用了。

经营旧书业不仅使布思成了威尔士报纸上的新闻人物，而且使他大发其财。后来他还被当地居民选为英国的下议院议员候选人。

诺埃尔·安塞洛特与旧书村

舒 中 胜

诺埃尔·安塞洛特(Noel Anselot)喜欢书，也喜欢古老乡村雷杜(Redu)的生活。这位一度供职于情报部门的比利时人认为，对喧闹的现代社会来说，寂静的乡村生活是十分需要的。行将退休时，安塞洛特更坚定了回雷杜的决心。要知道，在他那16世纪建造的石砌房子里，书籍不仅堆满了书架，且还占据了楼梯。

然而，当他听说欧洲的旧村落注定要走向消失，而电视正在破坏书籍的观点后，他决意要把全部精力贡献给振兴雷杜上。同时，经过全面的考虑，他下决心要把雷杜建设成一个巨大的旧书市场。

安塞洛特首先访问了英国。他听说一位名叫理查德·布思(Richard Booth)的“疯子”在威尔士也开辟了一个旧书市场。这位牛津大学

的毕业生目睹家乡海昂怀村(Hay-on-wye)急剧走向衰落后萌发了挽救它的思想。1961年，20岁刚出头的布思便发誓要使海昂怀成为英国的旧书中心。果然，当安塞洛特于1981年造访此地时，布思已获得了巨大成功。其他图书商纷纷效仿。这时，海昂怀共有15家旧书店，拥有图书50万册。

安塞洛特既高兴又丧气。高兴的是他找到了知音，丧气的是布思曾在离雷杜25英里的地方买到了一批好书。安塞洛特遂从布思那儿买回了一部分书籍并加紧筹建雷杜的旧书市场。1984年的复活节周末，雷杜旧书集市终于开张。比利时预算大臣和英国驻比利时大使都参加了开幕仪式。雷杜和海昂怀还结成了友好村。这一天，共有1.2万人来到雷杜。一些比利时书商纷纷购置闲置的房屋，开设了临时书店。迄今为止，雷杜村共有23家书店，此外还有多家装订厂、优质纸造纸厂、艺术馆等辅助业。“你无法想像这里发生的变化，”一位市长说，“80年代初，这里是个典型的衰败小村，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矿井、钢铁厂纷纷倒闭，大街上行人寥寥。可如今，这个小村简直变成了国际大都市。”

的确，在教堂旁的停车场，你可以看到来自各国的汽车。当然，大多数车都是比利时的，但也包括荷兰、卢森堡、法国、德国。日本人、芬兰人、捷克人也常光顾此地。从教堂出来，岔道朝向四面八方。安塞洛特站在他那漂亮的书店门前喜不自禁，一位读者欣喜地从这里买到了一本哥白尼的论文复印本。再往前是雷妮·富克斯(Renee Fuks)的书店。雷妮本是布鲁塞尔皇家图书馆的馆员，出于对旧书市场的兴趣，她主动放弃了馆员工作。路易斯·马尔法蒂(Louis Malfatti)的书店专营服装史类书籍。一位顾客在这里找到了介绍拿破仑帝国的骑兵服插图；另一位出于好奇在此闲逛的

读者意外地找到了有关中世纪盔甲和18世纪法官长袍方面的书籍。据估计，雷杜至少拥有50万册旧书。

安塞洛特认为，随着诸如电视一类的媒介的普及，人们的读书欲不仅不会下降，而且还会增加。理查德·布思也说，人们看了有关亚马逊河热带雨林的电视，他们往往想知道更多有关这方面的知识。为了迎合读者的趣味，理查德·布思在欧美许多国家都有通讯员，他们及时通知布思有关图书处理的消息。

继安塞洛特和布思之后，世界许多国家都已开始建立旧书市场。在法国，心理分析专家克罗蒂·托卢伯利特(Colette Trublet)于1989年在贝查雷尔(Becherel)建立了旧书市场，这将是欧洲第3个旧书村。布思和安塞洛特还将合作在法国西南部的蒙特利欧(Montolieu)开辟旧书村，藉以吸引来自地中海西部的顾客。在日本，书商们正考虑在北海道建立旧书村。在苏联，一音乐家计划在第比利斯郊外建立一高加索人旧书村。

美国的热门生意——旧书店

周 水 玉

旧书店在美国书业中堪称热门生意。美国人认为，旧书店是永恒的知识宝库，可以向读者展示昔日的历史进程，提供知识、写作的源泉，甚至是比咖啡馆更为有趣的消遣场所。比之于图书馆，有其吸引人的特点：可以用低廉的价钱换来急需的出版物。我在华盛顿和加州伯克莱走访了10余家旧书店，规模大小不一。有的拥有4层营业楼兼有地面书库，也有的只在家庭开业。旧书店也实行专业分工，有专供学生交换教科书的，有专售文艺作品的，也有专营音乐作品的等等。我看到的旧书店，呈现一派兴旺景象。

坐落在华盛顿老城乔治顿M大街上的“28街”旧书店，处于华盛顿旅游重点的一条小街口，铺面仅70平方米，布置典雅，风格迥然，形式古朴成书斋形式。沿墙为书柜，精

装书整齐排列，分门别类，以草体手书标记。室内布置了古色古香的家具、沙发、安乐椅、脚凳、写字桌等。晚上，立地台灯，光影绰约，宛若进入学者的书斋。读者可以随意就座读书，字典类的书放在专门的小立桌上，供查阅。书店临街的窗子装有百叶帘，使店内空气清新，环境舒适。

在华盛顿主要街道之一的威斯康辛大道上，有一家小巧的旧书店，名曰昨日书店。其特点是，在市中心大书店里正在出售的新书，仅几天，已为读者阅过而转手售给该店。按美国人习惯，凡看过的图书，即为二手货，转到该店价格则便宜一半。一般人不急于捕捉新的信息，新书出售后十天八天再到昨日书店买来阅读，书价低，看过后还可再出售给该店。

在西部旧金山伯克莱加州大学校门前，有一家4层楼的教科书交换书店，深受学生们欢迎。书店门口提供书目及该书所在的位置。书架之间，有长条桌供读者翻阅图书，小折凳可随意使用。楼内有一层，供学生出售自己不用的图书，张贴广告或售书启事，上有书名及联系电话、地址。购者可从启事上撕下附在启事上的电话号码小条，与卖主联系。还有一层是学生希望交换图书的信息处，学生可随意贴条，提出交换要求及代价，分门别类张贴。该店设有计算机，可在计算机中查询书目、价格，顾客可自行操作。顾客如不愿到货架上自取，也可请营业员代取。

在该店入口处有一名收款员，另有两名营业员负责上货。店面无需看守，其它布置、环境卫生等均雇临时工(加州大学学生)来担任。书店营业时间为早7时至午夜，终日灯火辉煌，人来人往。店主开办这家旧书店，受到加州大学及图书馆的支持。

离上述书店不远，还有一家旧书店。此店仅入口处有一收款员及一计算机检索员。检索员根据读者所需的专业书，可从屏幕上检索出类似的图书，提供书面资料，供读者备用；还可告诉读者检索出来的参考书在哪家图书馆可以借阅；也可检询其他国家最新出版的同类书目，以及美国有无进口此书等信息，免除读者徒劳寻觅。

纽约求书记

梁 治 平

4月返国，7月间，由海路运回的书到了。

把书迎了回来。堆得满床满地，我就坐在书堆之中，随意翻检。那情形，很像是旧友重逢。

这些书，尽是在纽约、剑桥两地所得。游学7个月，购书200余册，平均起来，至少日得一册。书与我之间关系的密切可以想见。事实上，我熟知所有这些书的故事，因我自己正是这些故事中的角色。虽然，以我所知的有限，要讲关于这些书的故事，自觉力不能逮，然而若只是作一角色的自述，却又不妨一试。求书的甘苦原是不分界域，凡读书人皆可以领略到的。

作为世界第一大都市，纽约是个充满机会的所在。书店及其种类的繁多自不待言，五花八门的经营形式才是它的特点。

在纽约期间，我住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公寓。这里虽然不是闹市，书店及常设的书摊却有10余处。书店有普通书店与旧书店之分，书摊亦有“桌摊”与“地摊”的不同，书贩中更有职业与业余的分别。至于书价，自定高低不同，未可一概而论。一般地说，旧书贱于新书，书摊书价低于书店书价。书摊之中，“地摊”最低。这是因为，地摊的经营者多是黑人、穷汉，他们并非职业书贾，既不懂书，更不爱书，不过是些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几本书换零用钱的角儿。

跟这种人，大可以讨价还价。只是，在这些时常经营各色破烂的小摊上面，好书总是少数。它们落到了这些全无爱书之心的人手中，又总是被杂陈于流行读物和劣质印刷品之中，一般地易于污损。因此之故，求书于地摊，只可偶一为之。

哥大一带有新、旧书店约7家。它们不愧是职业者所经营的，图书排列整齐，门类也相对齐全，有的书店还出售颇有年头的珍本、善本。这些书店里面，令我受惠最多的是设在121街和122街之间，一爿专营旧书的小店。那里的书质量不差，标价却不高。此刻摆放在我案头的《爱默生文集》、《瓦尔登湖》(梭罗,兰登书屋现代文库本,1937年)、《法国革命随想录》(柏克,企鹅本,1973年)等不下20册书，都是在这里购得的。这家店的老板兼伙计，一位中年男子，性情温和，彬彬有礼，熟谙书市行情。买他的书虽绝少还价的余地，却总是满心愉悦的。

哥大近旁可以一提的旧书店还有一家。这家店规模稍大，经营花样更多，颇见老板的创造力。其手法显见者有四，一是扩展营业于“门檐”(那“门檐”伸出数米至街面)之下；二是在邻街设“巡回”书摊；三是频繁改变门前图书的

摆列次序；最后是每隔一段时间在门前“无偿图书”的招牌下面扔上一堆年代不早不晚，内容难以归类的旧书。这位老板显然是行家里手，经他处理的“无偿图书”，我在翻阅之后总是恭敬放还。初到纽约，我在此购得几部画册，事后颇有反悔之意。时间稍长，看破了老板的花架子，心下更不以为然。以后即使在它门前的廉价书堆里面披沙拣金，觅得几册佳作(不知它们如何逃过了老板的算计)，也没有领情的意思。这可以算是买卖成而仁义不在的一例。

有人把读书人逛书店比之于女孩子逛商场，这种譬喻十分贴切。女孩子逛商店首先是出于爱好，买东西倒在其次。读书人的出入书肆也是如此。徜徉于书林之中，取架上图书随意检阅，且行且读，这样的乐趣，决不亚于女孩子在服装超级市场检看比量时的欢悦。我相信，读书人经常置身书林，必定于身心有益，且不说，这一种有益的“运动”，还可以让人大开眼界呢。

纽约城最大的书店位于下城，名 Barnes Noble，建于 19 世纪末，是家老字号的书店。一条大道贯通南北，将这家书店一分为二，西面的一半专营降价书。距此不远而稍南，有纽约最大的旧书店(名 Strand)。说是旧书店，其中也经营降价新书。我在那里买作纪念的两本书，一册马丁·布伯的自传《相遇》(1973 年)，一册《古代希腊的生活》(意大利，1986 年)，均是装帧精美的新书。

走进这一类巨型书店，每每自觉渺小。世上既已有了这么多的书，我们又何苦经年累月，伏案苦思，在这书海之中添加只如滴水的一册？一念及此，益觉劳作的无益。然而转念再想，倘写作只是人生的需要，又如果这种努力竟能够在另一些人心中引发共鸣，何乐而不为？再退一步，不谈写的

得失，读的价值永不可磨灭。想到此，复又心平气静，放脚行来，慢慢欣赏。这种“看”法，与其说是“逛”书店，不如说是“泡”书店。“泡”，主要不是为了买书，或更经济地买书(这种地方无价可还)，而在博览和观赏，虽然，最后总忍不住在“以为纪念”的名目下为自己买几本称心的好书。在 Barnes Noble 觅得一册柏拉图、奥勒留和爱比克泰德的合集(哈佛古典丛书,1980)，仿革硬面精装，三边烫金，书背书面均以金线勾勒，典雅之至，可作艺术品来欣赏。自然，像这样买书，买这样的书，在我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但是因此得享的乐趣，却是无穷无尽的。

读书人似乎没有例外都喜藏书，虽然未必是要做藏书家。记得有人说过，以为既有图书馆可以利用，则私人收藏大可不必，这样的人或者是不读书的人，或者是假冒的读书人。此话对极。书与读书人之间，实在有种说不清的关系。本来，这几年我身上求书的热诚已不比刚刚走出书荒那会儿的狂热(那种渴求之情只有亲历那个时代的人才可以真正理解)，然而来到这里，见闻所及，多少像是又一次走出书荒。再者，我的读书，多半出于一己的兴趣，“专业”之于我，饭碗而已，为“专业”而求书、读书；并不超过维持饭碗的需要之外。因此，赴美之后求书的热诚并不稍减，反倒是愈加高涨了。

在国内买书，除经常感叹书劣、书荒，近年又加上了对物价暴涨的惶恐不安。在美国，固然不敢放开了手来买书，但是至少不担心书荒。新书买不起，尽可以搜罗旧籍。只要是有心人，不愁得不到好书。在纽约，书店、书摊之外，图书的另一重要来源是书市。

教堂的贱卖，私人因迁居或清理房屋的处理旧物，都可

能包括卖书一项，我统称之为书市。其方式是以广告公示于众，指定日期、地点售卖。这种地方所卖旧书，真正是纽约旧书市场上最最便宜的一类。还记得有一次邻近一所教堂图书馆售书，我和另一嗜书的朋友整日泡在里面，收获颇丰。这里的旧书，多数为人捐赠，名曰旧书，未必破旧，许多书不见有人读过的印迹，只是在架上放够了年头，新颜换了旧貌。我曾经花 15 块钱购得一套 1953 年版、30 卷本的《美国百科全书》。在那上面，除了时光流逝遗下的痕迹之外，便什么都没有了。我并不怀疑那主人乃是笃学之士，然而即便在买书之时是为了读书，后来却因了种种缘故，令书摆在架上变为装饰的一种，在读书人也不是没有可能，况且，这只是一部当做资料使用的大书呢。

5 个月的纽约之旅，正贯穿着一连串与书有关的故事，要把这些故事一一讲述出来，怕读者也要嫌我琐碎了。

此刻，过去的一切都已变得遥远，恍若梦境。那是些美丽温馨的梦。每一次重温旧梦，我都会觉得感动。忘不了那许多个夜晚，桌前灯下，将一本本新得的书来过目，一面翻阅序、跋、提要，一面抚平折角，拂去灰尘。买到精致讲究的新书，更要反复把玩、欣赏。那一刻，总是一天里最平和、丰富的时候，心满意足，别无他求。不容否认，那一刻的快乐常常包含了因节省也许只是几十美分却到手一部佳作的小小得意在内。现在想来，当时那份得意未免有几分滑稽可笑。将这许多书搬运过海，送到地球的另一面，不独费时，而且破财，仅运费一项，就不知又可以买多少书了。这些，当时怎么就“忘”了呢?

人说读书人“痴”，信然。

漫游多伦多旧书店

余　　杰

初到加拿大多伦多，并不知道那里有旧书店。一天，在马路上，发现一家旧家具店里排了一排旧书，吸引我进去浏览一番。也许我专心致志地翻阅旧书，引起了五十来岁的加拿大店主的注意，于是他善意地走过来告诉我，如果我想淘旧书、珍本、绝版本，不妨到皇后街去看看。我当然十分高兴，立刻按址在皇后街找到了阿步迪亚旧书店。这是一家开在闹市区的，两开间门面的旧书店，一排书架几乎上达天花板，下及地板，分门别类地陈列着各类旧书。我酷爱逛旧书店，淘旧书，如今身置“宝山”，自然不能空手而返；就在大约两个小时后，我离开这家旧书店的当儿，无意间看见旁边柜台上摆着一些宣传品，我随手取来一份看看，又发现了旧书的新天地。原来这是一份多伦多旧书店店名录，出售珍本、绝版本、初版

本各类旧书，包括历史、地理、哲学、科技、文学艺术等书籍。据这份名录介绍，多伦多旧书店有特大型一家，大型11家，中型3家，小型4家，共计19家，并附有各家旧书店的店址。

我们到达多伦多的时候，已临近圣诞节，气温在摄氏零下17度左右，阴晴不定，时而大雪纷飞，瞬时阳光普照，经过这番对该市旧书店的了解，便把游览一事暂搁一边、顶风冒雪逛起旧书店来了。

我对多伦多那家特大旧书店很感兴趣，自不免先睹为快。这家特大型旧书店坐落在阿德莱街，店铺实际是在地下室。面积150平米，书架排列比较整齐，基本上都是硬面图书，纸面书另放一隅，店里一位四十来岁的加籍营业员，不但殷勤好客，而且对业务相当熟悉，他把全部藏书，包括店面的，以及设在另一处藏库里的藏书，全部输入电脑，只要你报出书名，或者作者姓名，他就能在电脑的荧光屏上找出来，如果该书是在另一处藏库里，约日可取，旧书价格一般来说在加币十元以下。这家旧书店另外一个特色，就是附设服务部，为读者觅购旧书，不过为读者觅购旧书，并非这家旧书店的独创。

本身并无旧书店店面，专门为读者觅购旧书、珍本、绝版本、初版……图书的是位于多伦多市场街的桑德图书服务社。这个服务社创办于1955年，他们不但和多伦多市，加拿大全国，而且和世界各大都市，如纽约、伦敦、巴黎各地约7000家书商、书店、出版社联网。一般书籍在接受订单后，约需6—8个礼拜就可以有结果；如果该书一时确实难以寻到，他们就把它列入待觅备忘录，每月到各处巡回一次，不另收费，直到一年为止。觅购的书籍每本收取订单费

加币 5 元，书到后另加手续费、邮资及书款。无论是桑德图书服务社，或者各家旧书店的服务部，对于解决读者迫切需要的图书来说，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尽管他们这样做也是受市场经济的支配。

在加拿大，不但多伦多市有众多的旧书店，在渥太华、温哥华、魁北克、蒙特利尔、埃德蒙顿都有类似多伦多的旧书店，而且也有旧书目录，便于查找，这一点比美国纽约的旧书店高明，纽约旧书店的店名、店址，只有翻阅纽约时报这类报纸的广告才知道。当然纽约旧书店的规模比多伦多的旧书店大多了。

东京的书店

周 作 人

说到东京的书店第一想起的总是丸善(Maruzen)。他的本名是丸善株式会社，翻译出来该是丸善有限公司，与我们有关系的其实还只是书籍部这一部分。最初是个人开的店铺，名曰丸屋善七，不过这店我不曾见过，1906年初次看见的是日本桥通三丁目的丸善，虽铺了地板还是旧式楼房，民国以后失火重建，民八往东京时去看已是洋楼了，随后全毁于大地震，前年再去则洋楼仍建在原处，地名却已改为日本桥通二丁目。我在丸善买书前后已有30年，可以算是老主顾了，虽然买卖很微小，后来又要买和书与中国旧书，财力更是分散，但是这一点点的洋书却于我有极大的影响，所以丸善虽是一个法人而在我可是可以说有师友之谊也。

我于1906年8月到东京，在丸善所买最

初的书是圣兹伯利(G·Saintsbury)的《英文学小史》一册与泰纳的英译本4册，书架上现今还有这两部，但已不是那时买的原书了。我在江南水师学堂学的外国语是英文，当初的专门是管轮，后来又奉督练公所命令改学土木工学，自己的兴趣却是在文学方面，因此找一两本英文学史来看看，也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实在也并不全是如此，我的英文始终还是敲门砖，这固然使我得知英国18世纪以后散文的美富，如爱迭生，斯威夫忒，阑姆，斯替文生，密伦，林特等的小品文我至今爱读，那时我的志愿乃在所谓大陆文学，或是弱小民族文学，不过借英文做了居中传话的媒婆而已。1909年所刊的《域外小说集》2卷中译载的作品以波兰俄国波思尼亚芬兰为主，法国有一篇摩波商(即莫泊桑)，英美也各有一篇，但这如不是犯法的淮尔特(即王尔德)也总是酒狂的亚伦坡。俄国不算弱小，其时正是专制与革命对抗的时候，中国人自然就引为同病的朋友，弱小民族盖是后起的名称，实在我们所喜欢的乃是被压迫的民族之文学耳。这些材料便都是从丸善去得来的。日本文坛上那时有马场孤蝶等人在谈大陆文学，可是英译本在书店里还很缺少，搜求极是不易，除俄法的小说尚有几种可得外，东欧北欧的难得一见，英译本原来就很寥寥。我只得根据英国倍寇(E·Baker)的《小说指南》(A Guide to Best Fictions)，抄出书名来，托丸善去定购，费了许多的气力与时光，才能得到几种波兰，勃尔伽利亚，波思尼亚，芬兰，匈加利，新希腊的作品，这里边特别可以提出来的有育珂摩耳(Jokai Mor)的小说，不但是东西写得好，有匈加利的司各得之称，而且还是革命家，英译本的印刷装订又十分讲究，至今还可算是我的藏书中之佳品，只可惜在绍兴放了4年，书面上因为潮湿生了好些霉菌的斑点。此外

还有一部插画本土耳该涅夫(Turgeniev)小说集，共 15 册，伽纳忒夫人译，价 3 镑。这部书本平常，价也不能算贵，每册只要 4 先令罢了，不过当时普通留学官费每月只有 33 元，想买这样大书，谈何容易，幸而有蔡谷清君的介绍把哈葛德与安特路朗合著的《红星佚史》译稿卖给商务印书馆，凡 10 万余字得洋 200 元，于是居然能够买得，同时定购的还有勃阑兑思(Georg Brandes)的一册《波兰印象记》，这也给予我一个深的印象，使我对于波兰与勃阑兑思博士同样地不能忘记。我的文学店逐渐地关了门，除了《水浒传》、《吉诃德先生》之外不再读中外小说了，但是杂览闲书，丹麦安徒生的童话，英国安特路朗的杂文，又一方面如威斯忒玛克的《道德观念发达史》，部丘的关于希腊的诸讲义，都给我很愉快的消遣与切实的教导，也差不多全是从丸善去得来的。末了最重要的是蔼理斯的《性心理之研究》7 册，这是我的启蒙之书，使我读了之后眼上的鳞片倏忽落下，对于人生与社会成立了一种见解。古人学艺往往因了一件事物忽然省悟，与学道一样，如学写字的见路上的蛇或是雨中在柳枝下往上跳的蛙而悟，是也。不佞本来无道可悟，但如说因“妖精打架”而对于自然与人生小有所了解，似乎也可以这样说，虽然卍字派的同胞听了觉得该骂亦未可知。《资本论》读不懂，(后来送给在北大经济系的旧学生杜君,可惜现在墓木已拱矣!)考虑妇女问题却也会归结到社会制度的改革，如《爱的成年》的著者所已说过。蔼理思的意见大约与罗素相似，赞成社会主义而反对“共产法西斯底”的罢。蔼理思的著作自《新精神》以至《现代诸问题》都从丸善购得，今日因为西班牙的反革命运动消息的联想又取出他的一册《西班牙之魂灵》来一读，特别是《吉诃德先生》与《西班牙女人》两章，重复感叹，

对于西班牙与蔼理思与丸善都不禁各有一种好意也。

人们在恋爱经验上特别觉得初恋不易忘记，别的事情恐怕也是如此，所以最初的印象很是重要。丸善的店面经了几次改变了，我所记得的还是那最初的旧楼房。楼上并不很大，四壁是书架，中间好些长桌上摊着新到的书，任凭客人自由翻阅，有时站在角落里书架背后查上半天书也没人注意，选了一两本书要请算账时还找不到人，须得高声叫伙计来，或者要劳那位不良于行的下田君亲自过来招呼。这种不大监视客人的态度是一种愉快的事，后来改筑以后自然也还是一样，不过我回想起来时总是旧店的背景罢了。记得也有新闻记者问过，这样不会缺少书籍么？答说，也要遗失，不过大抵都是小册，一年总计才 400 元左右，多雇人监视反不经济云。当时在神田有一家卖洋书的中西屋，离寓所比丸善要近得多，可是总不愿常去，因为伙计跟得太凶。听说有一回一个知名的文人进去看书，被监视得生起气来，大喝道，你们以为客人都是小偷么！这可见别一种的不经济。但是不久中西屋出倒于丸善，改为神田支店，这种情形大约已改过了罢，民国以来只去东京两三次，那里好像竟不曾去，所以究竟如何也就不得而知了。

因丸善而联想起来的有本乡真砂町的相模屋旧书店，这与我的买书也是很有关系的。1906 年的秋天我初次走进这店里，买了一册旧小说，是匈加利育珂原作美国薄格思译的，书名曰《髑髅所说》(Told by the Death s Head)，卷首有罗马字题曰，K. Tokutomi, Tokio Japan. June 27th. 1904. 一看就知是《不如归》的著者德富健次郎的书，觉得很是可以宝贵的，到了辛亥归国的时候忽然把它和别的旧书一起卖掉了，不知为什么缘故，或者因为育珂这长篇传奇小说

无翻译的可能，又或对于德富氏晚年笃旧的倾向有点不满罢。但是事后追思有时也觉得可惜。民八春秋两去东京，在大学前的南阳堂架上忽又遇见，似乎它直立在那里有八九年之久了，赶紧又买了回来，至今藏在寒斋，与育珂别的小说《黄蔷薇》等作伴。相模屋主人名小泽民三郎，从前曾在丸善当过伙计，说可以代去拿书，于是就托去拿了一册该莱的《英文学上的古典神话》，色刚姆与尼珂尔合编的《英文学史》绣像本第一分册，此书出至 12 册完结，今尚存，唯《古典神话》的背皮脆裂，早已卖去换了一册青灰布装的了。自此以后与相模屋便常有往来，辛亥回到故乡去后一切和洋书与杂志的购买全托他代办，直到民五小泽君死了，次年书店也关了门，关系始断绝，想起来很觉得可惜，此外就没有遇见过这样可以谈话的旧书商人了。本乡还有一家旧书店郁文堂，以卖洋书出名，虽然我与店里的人不曾相识，也时常去看看，曾经买过好些书至今还颇喜欢所以记得的。这里边有一册勃阑兑思的《19 世纪名人论》，上盖一椭圆小印朱文曰胜弥，一方印白文曰孤蝶，知系马场氏旧藏，又一册《斯干地那微亚文学论集》，丹麦波耶生(H. H. Boyesen)用英文所著，卷首有罗马字题曰，November 8th. 08. M. Abe. 则不知是哪一个阿部君之物也。两书中均有安徒生论一篇，我之能够懂得一点安徒生差不多全是由于这两篇文章的启示，另一方面安特路朗(Andrew Lang)的人类学派神话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不过我以前只知道格林兄弟辑录的童话之价值，若安徒生创作的童话之别有价值则至此方才知道也。论文集中又有一篇勃阑兑思论，著者意见虽似右倾，但在这里却正可以表示出所论者的真相，在我个人是很喜欢勃阑兑思的，觉得也是很好的参考。前年到东京，于酷热匆忙中同了徐君去

过一趟，却只买了一小册英诗人《克剌勃传》(Crabbe)，便是丸善也只匆匆一看，买到一册瓦格纳著的《伦敦的客店与酒馆》而已。近年来洋书也贵，实在买不起，从前6先令或一元半美金的书已经很好，日金只要3元，现在总非3倍不能买得一册比较像样的书，此新书之所以不容易买也。

本乡神田一带的旧书店还有许多，挨家的看去往往可以花去大半天的工夫，也是消遣之一妙法。庚戌辛亥之交住在麻布区，晚饭后出来游玩，看过几家旧书店忽见行人已渐寥落，坐了直达的电车迂回地到了赤羽桥，大抵已是十一二点之间了。这种事想起来也有意思，不过店里的伙计在账台后蹲山老虎似的双目炯炯地睨视着，把客人一半当作小偷一半当作肥猪看，也是很可怕的，所以平常也只是看看，要遇见真是喜欢的书才决心开口问价，而这种事情也就不甚多也。

1936年8月27日，于北平

东京的旧书店

姜德明

这次在东京，两次去神田的旧书店街，恨时间仓促，不能尽兴。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书店街，一家挨一家的小门面，家家有个古雅的店名，什么弘文堂、庆文堂、一诚堂、明伦馆、丛文阁……一时倒让我不知推开谁家的门才好。

这些店铺没有华丽的装饰，靠了一种古朴之风吸引着爱书的顾客。店内书多，几乎让你没有插足之地，稍一移步，前面的顾客便得侧身相让。有的书店还可上楼，楼梯一侧亦摆满了旧书，只要你有兴趣，便可一步一阶地看上去，楼虽不高，足够你看半天的了。

店门之外，还有露天书摊，一律 100 日元一本，任你挑选，任你伫立细读。可别忘了脚下还有不少塑料筐子，里面也装满了画册之类的重头书。我真想蹲在繁华的神田街头，翻尽

那些画册。

旧书之中，战后出版的为多，战前出版的几占1/3。侵华战争中的破书历经风雨显得很旧了，仍是无人问津。我抽出一本精装的《向广州挺进》，定价只有200元，是普通的日本读者羞于看它啊，还是对此不屑一顾？我倒觉得凡是想看看军国主义当年那一副洋洋自得嘴脸的，无妨破费稍许，把它当作一种反面教材未必是无益的。

一本《杂书杂录》，是增田涉先生的关于书的随笔集。翻了翻，书中还谈到了中国的好几本书，并有书影。看看定价，却要二千日元以上，遂即物归原处。

书店的招牌上大多写着可以在这里找到稀见的古本，并收购珍本云云。所谓珍本书都已锁在玻璃柜橱里，我粗粗一看，亦无非本世纪20年代前后出版的毛边书而已。日本读者喜欢夏目漱石的小说，很多旧书店都备有各种版本的《夏目漱石全集》，还有《葛饰北斋漫画全集》等。日本读者偏爱浮世绘，我还看到一种精印的《草枕子》，过去是禁书，现已开禁，封面上特别标明了这一点。我第一次领略了日本浮世绘中的色情部分。这种开禁的色情浮世绘，恰好同今天到处泛滥的色情书刊合流，形成一股恶浊的浪潮。为了生意眼，有的旧书店已逐渐失去典雅古朴的风格，不惜在僻静的一角，陈列刚刚出版的色情书刊，连那封面也在露骨地表现男女私情，实在不堪入目。色情的浮世绘甚至已经波及一般工艺品。我看到一套精致的日本烧瓷，12个白瓷小碗上面各有一幅春宫浮世绘。代表日本文化传统的当然是浮世绘，然而色情浮世绘的流行也许会毁掉这优秀的民族艺术吧。

看来这里的旧书店多是夫妻老婆店，男主人外出时，往往由主妇坐镇店中。东京的旧书店，听说有200家。当然，

其中亦有规模较大的。我很奇怪，既属私人分散经营，又不知怎样形成了那么严密的分工，比如有专门经营自然科学书籍的，还有医学、儿童读物等等专业书店。我看到南洋堂专卖建筑图书，三茶书房的特点是近代文学，大屋书房是江户时代的图书和浮世绘，庆文堂是历史和民俗考古学，玉英堂是名著全集和初版限定版书，悠久堂是专卖山岳和植物方面的书，而一心堂专门卖刀剑书和锦绘。听说这是长期以来自然而然形成的特点，我很羡慕日本读者逛旧书店的方便。

我在一心堂留连许久，其实刀剑书最多占了一半，其余是文史书，但美术书亦还不少。我在这家小店同一位日本青年和一位盛装的中年妇女，同时抢购到几本外加画套的精美画册。这是 1966 年河出书房版的《现代世界美术全集》，每本 500 日元，合人民币三元左右，比原价便宜多了。我很想选购那几本浮世绘，可那日本青年捂住书说："这是我要买的。"我只好买下介绍莫奈、罗丹、毕加索的那几本。

那位花白头发、穿和服的店主妇，一再向我鞠躬致礼，感谢我照顾了她的生意。她先用一条干毛巾把我选购的那几本画册擦拭一遍，然后小心地包装好，还没有忘记附送我一份彩印的"神田古书店地图帖"。最后她又用一个现成的塑料提手往绳上一套，我就像提着一个公函包似的继续在神田街漫步起来。

这样惬意地逛旧书店在我已是久违了，也许当年在我们的北京琉璃厂、上海的四马路、南京的夫子庙、天津的天祥商场、广州的文德路都曾经有过这种耐人寻味的文化气氛吧。现在一想起东行匆匆，我竟然在东京的旧书店里同邻邦的书痴们一起抢购旧书，仍然心有意会，不禁莞尔。

东京的旧书铺和旧书摊

晓　　　　晽

看过了第十期《人间世》陆侃如先生的“巴黎的旧书摊”，我不禁有感，所以也想来饶舌，把东京的旧书事业，只限于我所见到的来写一写。

许多人共认为东京是个极神秘的都市，这话的确说得不错。大正 12 年它也曾显过威风，地震后不知损失了若干，坍塌了多少地方，到现在仅仅十几年而又安然的建设起来，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们。如今的东京已非其真面目，较之从前又繁华得许多了，仍然是世界三大都市之一，而今人口已增加到 500 万余人。在这伟大的东京里不知包括了多少浪漫的地方，如跳舞场，咖啡店等。可惜我未曾涉足到那些地方，颇觉遗憾，可是旧书铺却是我的好友。

东京的旧书事业也很发达，书铺和书摊的设立颇也不少，旧书铺以神田本乡两区为最

多，盖因学校多之所致也。譬如神田之明治大学，专修大学，和本乡之帝国大学，第一高等(自然还有很多,这只是举例而已)。因此很能影响于旧书铺，到现在已有一惊人的数目了。所谓 Secondhand 书以此地为最多。

人各有嗜好，也是因为人的性情不同之故也，我的嗜好却是逛书铺，每日饭宁可不吃，而书铺却不可不逛。一年来如一日，可谓逛书铺成癖者也。不过逛时不见得准买，而不逛便又觉得不好过。

东京之中国人以神田区为最多，颇似美国之唐人街无一时没有不看见中国人的，本乡区的中国人却也不见得少。这两区的旧书铺特别的发达，在东京首屈一指；颇似北平之琉璃厂，上海之城隍庙等地。从书铺者并非我一人，志同道合者不在少数，无论是飞着雪花或是下雨的日子，总是有逛书铺者的足迹。日本学生尤甚，有些时不见他们上学，而在旧书铺里却时常看见他们。

逛旧书铺为的找便宜书固然也是一理，不过有的是希冀着在书铺中发现点什么绝版的书籍，或是新书铺不能找到的也许会在旧书铺中找到，人们普遍都怀着这两种心理，拥挤在书铺里急先恐后的在翻阅着书，唯恐被别人捷足先登抢去似的。其中有一特点，就是老板能忍耐的把每本书都标上价格，普通是标在书外，不过书内有时也许会有的。此点甚佳，给一些穷购书者一大方便，大概是穷人都有这种心理，手中若没有充足的钱就不敢爽然的闯进书铺，但是有些人既没钱而想过过买书瘾，看看书的价钱，这一来却是给穷朋友们增加了不少的勇气。

各书铺都拥有很多的书，无论是世界各国的旧书都有点，有的卖教科书，有的卖文学书，有的卖史地书，有的卖

工业书……英文书，法文书，日文书，俄文书……形形色色一无不有，有时还能找到刚出版不久的新书，书虽新而当旧书卖了，不可不谓奇迹；因此便宜了一些购者。逛书铺也得凭个人的运气好坏，若不幸却能一无所获，不过大致都能满意，至少也能过一过瘾。我逛书铺的方法是一家连一家的，把一条街逛完为止。这样的不知消磨了我多少的功夫。有时也能买到很便宜，或是理想中的书。据我所知道便宜的书有：哈代(Thomas Hardy)全集皮本的 80 元，托尔斯泰英译全集 15 元，屠格涅夫英译全集 10 元，旧版韦勃斯特大字典 4 元……日本古版书也很多，专有几家卖中国四书五经，杜甫诗大全，李白诗大全之类的书，版本虽佳，而讨价过昂。我不敢领教。

老板大半都有副笑脸，任凭你翻阅，不买也没关系，绝对没有我国老板施行那种加以白眼法，来对待看而不买的顾客；这地方的老板大概都是很客气的招待顾客，并且还能给顾客一种任意阅览的权利。还有是不讨虚价，决不像那令人胆寒的神田洋服店，那样讨虚价法。的确是购者的幸福。

每逢新年光临的时候，东京各地方特别的热闹起来，就是各旧书铺也同时举行大减价，有些铺子是摆出来一堆减价的书，而且家家都贴着“岁末大卖出”，“四割引大安卖”等的字，还有是在“图书祭”时也减价，也有“福引大安卖”，既便宜而又能抽笺得奖。便宜两字都印在各人的心上，于是都想买点书而得奖。大概有许多人都期待这种减价的时期吧！平常的时候，各书铺前也有极便宜的书。一堆一堆的摆在前面。或是标的“十钱均一”的字样。

夜市在东京很流行的，当着太阳落下去，渐渐的沉入黑的境地，一些书贩子便沿街摆起摊子了。这些都是旧书摊，

无论神田区，银座，日本桥，浅草等地，无一处没有，全都是按着一定的次序，沿着街道摆摊，大约每天由下午五点钟起至十二点为止。因为书摊太多的关系，也发生不景气的现象，各摊上差不多都标着："大安卖"，"十钱均一"，"廿钱均一"的字样，有些书比旧书铺还便宜，所以招来不少的顾客，在严寒的晚上仍有许多人缩着头徘徊在这街上，也有些人站在书摊前翻着书，都希望以最低的价格获得贵重的书籍。希望在各人的心中，像是寻找黄金似的。

给我一个极深刻的印象，就是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样善于藏书，许多人是爱买新书，只过过手，看看便转卖出去了。这样便宜了一些穷购书者，他们都省点钱，买同样的书，只是时间关系罢了。若要有忍耐的心无论甚么刚出版的新书，大半总会在旧书铺或旧书摊中获得的。

普通的日本人看书只为看书而已，并没有什么过分的企图，更不见得看书是为做文学家或是得名望。学生看书也许是有些奢望，不过下女(女仆)等，她们却不一定有过分的要求吧！总是忙里偷闲的在看书，看书者既多而书业便也特别的发达起来了，因此旧书事业也随着发达了吧！

总之无论是旧书铺或旧书摊里，逛的人很多，大家像是怀着一颗神秘的心，静悄的注意在书上，有时翻上瘾来，简直不走去，几乎要把书看完为止；而老板们却安然若无其事的，也不加以阻拦，更不加以白眼，像这种景况岂不都变成公共图书馆了么？没钱买书逛书铺或书摊也好，能够天天站在那儿偷偷的看点，日久了或者能在揩油中得点真实的学问；并且又能消磨时间，免得把钱花到不相干的事上。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神田的本祭

白 杰 明

日本旧历10月27日是天高气爽、枫叶通红的仲秋，也是每年在东京素负“书城”盛名的神田神保町举行“青空古本祭”的头一天。“青空古本祭”就是露天旧书展销会，历时8天，至11月3日为止。神保町的旧书会是全国规模最大，吸引一般读者、学生、学者和游客最多的古本祭，但近几年各地大小城镇都在同一个时候举办自己的本祭了。在古都京都，书贩云集京都大学附近的百万遍寺摆摊设铺，在古色古香的庙宇前大兴图书交易。其他城市，像神户、金泽、大阪等等，也都在书店或高等学校集中的地点办旧书会。

神保町的本祭历年都在附近的空地举办，但今年因为没有合适的地方，书摊最后摆设在岩波大厦前面和三省堂后面来迎接纷纷而来逛第23届古本祭的群众。参加展销的东京市中

央地区 128 家旧书店在靖国通两旁张灯结彩，并用五颜六色的塑料枫叶及红白纸灯笼装饰在各商店门面和电线杆上，以增加节日气氛。

开祭的第一天人山人海，想浏览书摊的人几乎挤不到摆书的地方，即便挤到了，也不能驻足享受平日“立读”的乐趣，不得不“走马观书”。最吸引人的是大量降价的二手平装书——大多数比平时便宜 50% 以上；精装旧书同样降价 30%。抢手的贱价书里有 10 册一套的日本古典文学集，12 册一套的日本文学精选及各种词书和百科全书。一般读者则抢购平装小说类,特别是侦探小说及著名外国作家的翻译小说。美术图书也同样受人欢迎;近代欧洲画家画集,日本名画集等等和五花八门的入门书,深受欢迎。神田区的外文书店也设了摊参加古本祭,有英、德、法、俄和汉语图书多种。

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掀起了一个至今不衰的“知识热”,神田区的生意兴隆,“古本祭”的举办既是这个知识热的产物,又是它的媒介之一。平日神保町的旧书店买卖很好,尤其是平装书的大量周转。这些书虽然一般保存犹新,但出售价格不超过原价的 50%。在古本祭期间,参祭的书店更降价一码。买书的人可以参考日本全国图书联盟所编的正式本祭目录(今年有 96 页之长),然后选择重点,浏览书摊。

神保町本祭也获利于附近 4 所大学的学生，附近大书店的读者也有很多去逛旧书市。卖新书的书店如三省堂并不怕古本祭抢生意，因为看完旧书的人也经常去买一两本新书。因此，三省堂在这届本祭期间提供了摆摊地方，在店内也自设了一个英国平装书展来凑热闹。

1982 年 12 月 31 日京都

东京的神田书祭

黄　　天

日本人的求知欲极旺盛，他们的政府将每年的11月3日定为"文化日"（本为明治天皇的诞生纪念日，但战后，民主政制将这一天改为文化日，让国民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文化生活），列为公众假期。在这一天的前后，社会上会举行各种文化活动来庆祝，而学校则一连三天在校园内举行多姿多采的"文化祭"、"学园祭"。与此同时，名闻世界的书店街——更展开一年一度的"神田书祭"来，将数十万旧书堆出街巷，以飨读者。

座落在东京千代田区的神田书店街，书店、文房铺林立，特别是专卖旧书的"古本屋"，更是鳞次栉比。早于明治年间，神保町已成为文化人荟萃之所，爱书人挥金之地。在这附近一带，有著名的东京大学、明治大学、日本大学等其他专上学校。单是这批往返学校

的师生，就足使各书店门庭若市。至于远道而来的学者、藏书家，亦川流不息。当年在上海投拜鲁迅门下的增田涉先生，虽远在关西和九州等地任教，但每当经过东京，神田必是他流连的地方。而我国留日的学生，为了追求知识，当然亦会涉足神田书店街了。30 年代避居东京近郊市川市的郭沫若和在武藏市习画的傅抱石，都经常到神田搜寻他们所喜欢的书籍。

既然神田书店街是文化人的“采花园”，则“文化日”的到来，自然会有节日般的盛况了。

刚踏入 11 月，书店街便串挂起灯笼、结上彩花来迎接佳日。而附近庆祝“学园祭”的学校的文艺表演队伍，穿着各式服装，唱唱跳跳地游行而至，为节日增添不少谐笑气氛。书店街的旧书肆，为着更好地将书本推销出去，也使节日更加热闹，便在指定的人行路处，把书堆放出来，实行露天售卖，其盛况不减本港大笪地。由于该处恰恰在十字路口，而人丛又有几重，不少“书迷”挤到马路中心，所以每年都要动员警察和工作人员不断向“书迷”提醒。

除了这个设在人行道上的露天售书场外，还有一个是设在一条内街里面。这条街已是无车地带，书堆放在两旁的书架和平台上，路的两端均设有收款处，选购好的书，在离开这条内街时才结算。

这个“神田书祭”，约连续一个星期，各书店联合推出的旧书，总数每达三、四十万册，闻风而至的顾客，令书场终日挤得水泄不通，尤其是“文化日”和周日，一个个家庭总动员而来。纵是萧萧秋风下，街头书场仍然是一片暖烘烘的。

书场内虽然是摩肩接踵，但日本人都很自律，在选购书

刊时，已有一个共同的前进方向，不会“逆驶乱来”；一个个挨着铺放书籍的平台，向着同一方向前行。人丛虽有几重，但如果前面的未离开，站在后面的人，不会从后挤前强硬攀取拿不到的书，而是耐心地等候前面的人向旁边移动之后，才趋前取阅。

笔者每年逛“神田书祭”，发觉每年堆放出来的旧书，以普及、实用和大学参考书为主，其中如各类辞典，历史图集，摄影画集，小说和社会科学的参考用书为多。如欲购买这方面的书籍，在“书祭”期间，包可买到好货。至于专业性和学术价值高的书刊，就不是那样容易找到了，就算偶然碰到，其价亦不菲。因为日本的学术论著，定价相当高，旧版就更加昂贵，正是“书好价好”，不是一般人问津，而面对一般读者的“书祭”，自然就不把这些书陈列上架了。另一方面，学者、专业研究员、教授等层面的人，甚少逛“书祭”，因为在那里感兴趣的书不多，而且挤拥踏杂，益使他们退避三舍。

神田书店街的旧书铺

黄　　天

3年前，自日回澳，小住数月，闲来无事，写了一篇《东京的神田书祭》，载于《读者良友》1985年1月号。其后，和朋友聊起日本的事物时，往往又扯到东京的神田街去。

一些好友，尽管不懂日语，但嗜书成狂，对神田书店街倾慕至极，每当旅游东瀛，都要求画图，指示交通工具，以便前往书店街，一睹“书城”风采。

最近，我获得一张《神田古书店地图帖》，详录书店方位和交通线路，值得向读友介绍。

神田书店街坐落于东京千代田区，书店的分布，集中于神保町一带，部分则散置于三崎町、西神田、骏河台和小川町，交通方便，乘地下铁都营三田线、新宿线皆可直抵神保町站，如乘搭由原国铁改为现在的JR线，则可在御茶之水站或水道桥站下车，然后徒步6分

钟左右，即可抵达神保町。至于巴士，亦有6条线抵此，但论方便，还是以铁道交通快捷。

神田的书店街，以卖旧书的“古本屋”为主。现据地图所载，“古本屋”多达133间，其中约有120间开设在神保町一带。

在日本，绝大部分的旧书都保护得很好，不致太残破。有一些所谓“旧书”，实际上是从发行商处转来的未出门新书，只是因为发行了一段时间，还没有售出，才以“旧书”形式转到这些“古本屋”去。

也许读者会问，百多间旧书店开在一条街上，岂非竞争到你死我活？

竞争当然有，但不是“斗平斗贱”的恶性竞争，而是各搞特色，互相依存。因为他们也明白到把同业全部打垮，书店街会大为失色，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好处。

在这些旧书店里面，除了一些历史悠久、财力雄厚的经营者才会贩卖各类书刊外，一般的小本经营者会考虑经销哪一种图书为主。如37号朝日书林，专门经销近代文学书；86号东城书店，专销东洋史；102号丸沼书店，专营法律书；卖浮世绘和版画的有3号大屋书房、132号酒井好古堂和126号中岛尚美社。由于日本的出版物丰富，几乎每一项专题的书籍都可堆满一屋，因而可以根据本身的条件制定经销的方针和贩卖的书种。有时，他们能够在“书城”立于不败之地，就是靠独沽一味的专门书来支持。如111号文库川村，是专售文库本的旧书店；133号清昌堂则是茶道书的专门店；至于专卖漫画书的有73号西泽书店。如果想买中国旧版书，70号的山本书店是最负盛名的。

以上只是随便举的一些例子，足证各店都有其专门和特

色。这样一来，顾客选书也容易，不必挨着一间间店铺去找，径往专门店去找，自然容易买到所要的书。但话又说回来，专门店的旧书，在该学科来说确实搜罗得很齐全，但书价是不菲的，因为经营者在这个领域摸得烂熟，书价定多少，心中有数，对一些绝版或限定本，他们更知之甚详，实行吊高来卖。所以，在这些专门店里面，是不容易买到“便宜货”的。

那么，什么地方可买到平书？按笔者过去逛神田的经验，平价的专书反而在其它书店中买到。譬喻专卖文学书的书肆，也会收购到一些历史书，甚或其它杂书，这些书刊，他们不一定熟知行情，于是便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开天杀价，采取宁枉勿纵的手法；另一个就是薄利倾销，不作调查研究。如属后者，顾客就可以执到“平”嘢！不过，这样逐店走访，对一些急于应用该书或没有时间的人来说，只好向有关的专门店洽购。但如果时间充沛，就可以逐店去找，在古书堆中寻“宝”！这就是何以有这么多人喜欢逛旧书店街的来由了。

走笔至此，忽想起本文刊出之日，神田的书祭又要举行了。

“神田书祭”举办到今年已是第28届，地点是岩波会场至神保町的十字路口；日期则由10月24日至11月3日（文化日）。如果购买一般性的图书、辞典和图录等的书籍，这是很好的机会，但那些学术性强的专门书，则甚少摆卖。

有百多年历史的书店街，贩书、访书的趣事迭有所闻，以后有机会，再续谈下去。

东京淘书琐记

陈 子 善

昔日读知堂老人的《东京的书店》，对东京颇有特色的旧书店，不禁心向往之。当然，时过境迁，今日的东京早已不是知堂老人那里的东京了，丸善书店与老人笔下所写的也已大不相同。但东京的书店仍然很多很多，大书店、小书店、新书店、旧书店、各式各样的专业书店、连销书店仍足以让爱书人流连忘返。著名的神田神保町旧书街，更是号称世界最大旧书区。我第一次去，只走马观花逛了三家书店，整整一个下午就消磨掉了，而这条街上及其周围的新旧书店竟有近百家之多！因此，旅日半年，我每周至少一次去逛书店，每次都有所收获，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意思。

我是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我的搜书范围很明确，尽可能搜集与我专业有关或间接相关的各种初版本、签名本和稀见书刊。在东

京有时也能见到明清刻本，包括珍贵的善本。和刻本和高丽刻本更是多得不计其数，单是翻翻各大小旧书店的古籍书目就令人眼花缭乱了。但一则古籍线装书不属于我的搜书范围，二则书价之昂令人咋舌，所以我也就不去问津了。本文所谈，只能以我的搜书范围为限。

大名鼎鼎的内山书店现在主要出售大陆和台港版的文史哲新书，旧书已难见踪影，我光顾多次，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淘到了二本旧书。一是1937年6月上海三闲书屋初版《鲁迅书简》影印丙种本(胶布书脊本)，完好如新，而且可通过我所访学的东京都立大学图书馆以标价的八折购买；二是在该店的特价部无意中搜出一本1936年3月东京文求堂初版，鲁迅当年曾购置的《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在另一家与内山书店齐名的东方书店，我没有遇上这样的好运气，只得到一本《留东外史》初版影印本。《留东外史》近年国内已重印，但有所删节，以区区百元日元之价买到未作删改的影印本，也算是物有所值了。

东京另有一家台湾人开设的东丰书店，颇有名气，日本许多教授常来此店访书。但店堂狭小，台港版旧书堆积如山，读者置身其间，随时有被书倒下来砸伤的危险。尽管如此，我还是去了数次，淘到我感兴趣的《采访新记》(曹聚仁著,1956年旧香港创垦出版社初版)、《旅人小记》(殷海光著,1980年1月台湾水牛出版社再版)和《浪漫的与古典的》(梁实秋著,1980年4月台湾大林出版社重排再版本,有梁实秋的新序)等，特别是已故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侯健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1974年12月台湾中外文学月刊社初版)一书，我久觅不获，托台湾友人代找也未果，却在东丰书店检得，快何如之。此书中《梅光迪、吴宓与学术派的思想

与主张》颇有见地，比内地重译吴宓早了整整20年！店主简先生与我一见如故，还邀请我到“居酒屋”去喝了一次日本清酒，这也算是在东京淘书的奇遇之一。

不过，许多日本人开设的旧书店没有门市部，只定期向读者寄发书目，读者根据书目向书店邮购。由于书目所列大都仅有一本，以至读者稍一迟疑，所需之书往往就会被他人捷足所得。有一次，我在一家旧书店书目上见到日本太阳社80年代初出版的图文集《书之美》，这是研究日本近代文学装帧的必备书，印制十分精美。我对中国现代文学装帧受日本影响这个题目甚感兴趣，早就想得到这本《书之美》以为参考，但书目上索价已高出原价一倍，犹豫再三，待到下决心去电邮购，都已售出了，失之交臂，至今犹感惆怅。但我毕竟通过东城书店、鹤本书店等几家有名的邮购书店入手数种我所喜爱的书，计有：

鲁迅《呐喊》，1929年4月北新书局第12版毛边本。《彷徨》，1930年1月北新书局第8版毛边本。两书书品甚佳，前者的毛边尚未裁开。鲁迅这两部小说名著的艺术价值自不必在此饶舌，就版本价值而言，当然也是初版本为最，但因鲁迅著作版本复杂，现在若想搜齐《呐喊》和《彷徨》的各种版本已无可能，能得手较早且较好的版本也就心满意足了。何况《呐喊》这一版是改版抽出《不周山》之前的最后一版，也还是值得收藏的。

林语堂《大荒集》线装上下册，1934年6月生活书店初版本。这是林语堂的杂文代表作，虽然近年已有影印本和重排本问世，能得到线装初版本仍属难得。记得80年代中期在上海旧书店的一次书展上曾见到《大荒集》初版本下册，因不成全璧而未购，此次终于如愿以偿。有必要补充一句的

是，新文学作家的线装作品集，以诗集为多，散文集就我所见到的，就只有《大荒集》、华真栋的《文坛登龙术》、俞平伯的《燕知草》和徐志摩的《爱眉小札》四种而已。

俞平伯的《杂拌儿之二》，1933年2月开明书店初版本。我对俞平伯凝练平正的散文本来就很欣赏，这本《杂拌儿之二》又被知堂老人誉为“文词雅致”和“思想之美”兼而有之，书品又那么好，“疑古玄同”题写的书名就古色古香，惹人遐思，能在东京得到也堪称幸事。

张资平《不平衡的偶力》，1927年4月商务印书馆再版精装本(中华学艺社文学丛书之三)。张资平的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褒贬不一，而从版本学的角度考察，他的书既杂且乱，国内图书馆所藏大都破烂不堪，能找到这样一本有精美插图的张资平早期代表作的精装本，殊出意料。

叶绍钧《倪焕之》1932年7月开明书店第4版精装本。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初版于1930年8月,不到二年就重印四次,可见很受欢迎。从这个意义上讲,除了初版本,再版本和历次重印本也不是毫无价值的,实际情形是,现代文学史上许多著作的初版本还不难找,而要弄清其版本源流,最后一版是何时印刷的,反而难上加难,目前只出版了鲁迅一人的《著译版本研究编目》,其他所有作家都是空白。这本第4版的《倪焕之》书品也不错,书脊上的烫金书名还清晰可见呢。

高罗佩藏《北京黑幕大观》，不幸我生喋喋著，共6册，小32开本，1918年6月上海广文书局初版。这部书乍看书名，我还以为是笔记体，其实不然。这是一部6卷30回的章回体小说，是一部揭露清末民初北京政坛黑幕的政治小说。它在当时五花八门的章回体小说中不算很有名，但还值得研究，作者“不幸我生喋喋”是谁？就值得考证探究。这

部书原是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平井博先生邮购的，我拿来一看，发现每册目录页右下角均钤有“高罗佩藏”阳文藏书印，这不是荷兰著名汉学家、《中国古代房内考》作者高罗佩的旧藏吗？我不禁惊喜交加。高罗佩还曾以公案小说《狄公案》名世，他收藏《北京黑幕大观》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我以前只知道长期担任驻日大使的高罗佩逝世以后，他的藏书已捐赠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中心图书馆，没想到还有藏书流散在外。日本旧书店的老板都精通版本目录文学，一旦发现签名本和名家藏本，书价立即飚升。我在东京的旧书店见过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和安部公房等日本大作家的签名本，还见到T.S.艾略特的签名本，都是天价。这部高罗佩旧藏，所幸旧书店主不知道 Pobort Hars van Gulik 的中文名是高罗佩，以致成漏网之鱼，否则这部书的书价起码要比现价高出三四倍。平井博教授见我爱不释手，慨然相让，使我的东京淘书增添了光彩的一笔。

除此之外，东京好几家大百货公司每年都要举行定期的旧书集市，成为东京一道诱人的文化景观。我曾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的一家百货公司的春季旧书集市上以200元日元的超低价觅得黄裳的散文集《西厢记》与《白蛇传》(1953年7月平明出版社初版)，还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日文书中翻出一本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心经随喜》(1967年4月日本“筑波山梅田开拓筵”发行)签名本，也都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在东京淘书最得意之笔是为上海鲁迅纪念馆觅到鲁迅1936年3月20日致内山完造的亲笔信一封。

东京淘书其乐无穷，下次如再到东京，一定会再去逛新旧书店，也一定会据书目邮购旧书，说不定又会有令人惊喜的发现，我期待着。

后　　记

这本小书里的文章，一部分选自我多年来收藏的旧书刊，如30年代出版的《南洞文集》、《人间世》等；一部分选自新近的出版物，如作家文集、报刊专栏等。其中最早的一篇是李文藻作于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的《琉璃厂书肆记》，最晚的一篇是陈建功1993年的新作《我与海淀的一家书店》。50几篇文章，跨越了200多年时间。为保持文章的原貌和风格，除个别明显的笔误、错字外，凡与今天习惯用法不尽相同的字和词，以及外国人名、地名的旧译，均一仍其旧，未加更动。

在本书编纂过程中，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陈海滨先生花费了许多精力推敲书稿，提供了宝贵意见。我素所仰慕的老作家汪曾祺先生题写了书名，使本书增色不少。在这里，谨向汪曾祺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晓建

1994年5月

重版后记

《逛旧书店淘旧书》出版后，一年之内便告售罄。我曾多次收到读者希望购买此书的来信。现中国文史出版社决定重印，利用这个机会，我增补进了十几篇文章，以便使这本小书的内容更加充实。

在《逛旧书店淘旧书》重印之际，我不能不深切地怀念曾关心、支持过这本书的萧乾、汪曾祺先生；并衷心感谢中国文史出版社，在也许赚不到钱的情况下，仍然肯为爱书的读者再出这本书。

王晓建

2000 年 11 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逛旧书店淘旧书
作者＝王晓建编
页数＝３０５
ＳＳ号＝１
出版日期＝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小引＆王晓建
旧书店＆施蛰存
买旧书＆施蛰存
旧书店＆叶灵凤
旧书铺＆茅盾
旧书摊＆汪曾祺
逛旧书摊＆唐挚
逛书摊＆陈平原
逛书摊＆柳萌
买书＆朱自清
旧书＆华嘉
由旧书想起的＆张中行
书林即事＆唐　ｓｅｐｅｒａｔｏｒ
访书琐忆＆黄裳
旧书梦寻＆辛笛
淘旧书＆袁鹰
淘旧书＆田原
读书志＆郑振铎
皇朝礼器图式＆郑振铎
买《太平广记》记＆孙犁
冷摊得来＆姜德明
旧书新得题记＆梁永
我与海淀的一家书店＆陈建功
淘书之乐乐淘淘＆叶永烈
乐而不疲“淘书”翁＆士铮
津津乐道旧书店＆王晓建
古旧书的笑与泪＆马立诚
旧书之灾＆朱光潜
救救旧书业＆萧乾
琉璃厂书肆记　（清）＆李文藻
琉璃厂　（清）＆金梁
海王村人物　（清）＆张祖翼
厂甸＆周作人
琉璃厂的优良传统＆叶灵凤
琉璃厂＆黄裳
琉璃厂寻梦记＆姜德明
琉璃厂＆陈平原

海王村记＆李书磊
北平的书摊儿＆唐鲁孙
北平旧书肆＆商鸿逵
北京的书店和书摊＆吴小如
记北京旧书店＆刘自立
来薰阁琴书店－－琉璃厂杂记　［日本］＆吉川幸次郎　钱婉约译
琉璃厂后记　［日本］＆吉川幸次郎　钱婉约译
三十年代北京旧书业及其它　［日本］＆长泽规矩也　索介然译
城隍庙的书市＆阿英
西门买书记－－《城隍庙的书市》续篇＆阿英
海上买书记＆阿英
古城买书续记＆李高信
长安有家旧书店＆金平
外省旧书店两记＆王晓建
旧书店一二三＆奋斋
忆南后街旧书铺＆郭风
面对旧书摊＆唐希
香港的旧书市＆戴望舒
漫话世界古旧书业＆孟宪义
三家书店＆朱自清
牛津的旧书店＆沈弘
访书小录＆董桥
圣米歇尔的旧书摊＆沈大力
塞纳河畔旧书摊＆王聿蔚
巴黎的书摊＆戴望舒
“旧书之都”海昂怀＆逍遥
诺埃尔·安塞洛特与旧书村＆舒中胜
美国的热门生意－－旧书店＆周水玉
纽约求书记＆梁治平
漫游多伦多旧书店＆余杰
东京的书店＆周作人
东京的旧书店＆姜德明
东京的旧书铺和旧书摊＆？
神田的本祭＆白杰明
东京的神田书祭＆黄天
神田书店街的旧书铺＆黄天
东京淘书琐记＆陈子善
后记
重版后记